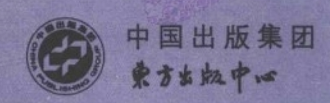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威廉·M.马奥尼 著　陈静 译

# 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ISBN 978-7-5473-0555-3

定价：35.00元



# 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 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1 -4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捷克和斯洛伐克史/(美)马奥尼著;陈静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1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555-3

Ⅰ. ①捷… Ⅱ. ①马… ②陈… Ⅲ. ①捷克—历史
②斯洛伐克—历史 Ⅳ. ①K524 ②K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693 号

责任编辑：张芝佳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55-3
定 价：35.00 元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致　　谢

我[*]想要感谢凯特琳·夏尔米耶略，格林伍德出版社的编辑，为了她的指导、乐观以及使我保持积极态度的能力。我也非常乐意感谢《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丛书的编辑们，弗兰克·W.萨克莱和约翰·E.芬德林，给予我承担这个有挑战性的、有价值的项目的机会。无论如何，耐心的确是一种美德。

我还要将我的感激之情赠予我在西弗吉尼亚卫斯理学院历史和国际研究系的同事们，因为他们在我时常分心于教职之外的一年左右时间里，表现出对我研究的支持以及良好的共事和协作关系。我的感谢还要给予主修我们系的学生以及学院中的其他学生们，他们显示出对此项目的兴趣和热情，提供了急需的轻松氛围，容许了完善过程中偶尔的延迟。我非常乐意向学院安妮·梅纳·菲弗尔图书馆和善并且总是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致以谢意，他们提供了卓越的协助，还为神情疲惫的学者送上一杯香浓的咖啡。最后，我要感谢学院管理层的支持和准许我学期休假，使得我可以集中精力在手稿上。

我的感谢还要给予1992年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福尔布

---

* 威廉·M.马奥尼是位于巴克汉嫩的西弗吉尼亚卫斯理学院历史和国际研究系的历史学副教授。马奥尼博士教授现代欧洲历史并担任国际研究专业的主任。

莱特—海斯夏季海外研讨会计划,以及 1994 年夏季在马里兰大学举办"东欧民主和种族"研讨会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与学生们的旅行提供了一次以全新的并且有时是独特的方式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机会,所以我珍视 2005 年由阿巴拉契亚大学协会赞助的五校学生中东欧旅行计划。那次旅行引发了一个由我和我文学方向的同事德文·麦克纳马拉拓展的类似项目,使得 20 名来自西弗吉尼亚卫斯理学院的学生可以在 2009 年春季学期考察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这些旅行和研讨会中获得的个人和职业经验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母亲多丽丝·马奥尼、我的兄弟姐妹和我所有的家庭成员,在我深居简出、有时不能翻山越岭出席家族聚会的那段时间里,对我的爱、支持和耐心。

# 历史事件年表

xiii

| | |
|---|---|
| 公元前约 450 年 | 波伊人、沃尔卡—特克托萨季人、科蒂尼人和其他凯尔特部落在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地区定居。 |
| 公元前 9 年 | 被罗马军团打败的马科曼尼人向东迁移，与夸迪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一起终结了这一地区的凯尔特文明。 |
| 2 世纪 70 年代 |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率领罗马军队对抗夸迪人的马科曼尼之战过程中，在斯洛伐克的赫龙河沿岸写下了他的《沉思录》的部分章节。 |
| 500—600 年 | 从东北方跨越喀尔巴阡山脉的斯拉夫部落定居在以后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 |
| 568 年 | 阿瓦尔人，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侵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开始征服该地区的斯拉夫民族。 |
| 523—658 年 | 法兰克商人萨莫领导的反抗阿瓦尔统治的起义导致了一个斯拉夫人部落联盟——萨莫王国——的建立。 |
| 796 年 | 阿瓦尔人被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小查理和丕平击败，离开了斯洛伐克领土。 |
| 833 年 | 大摩拉维亚帝国由摩伊米尔在统一了摩拉维亚和尼 |

xiv

| | |
|---|---|
| | 特拉公国后建立。 |
| 863 年 | 西里尔和美多德的到达,他们是正教会的兄弟和传教士,将基督教和书面字母表带给了大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 |
| 870 年 | 博日沃伊一世成为波希米亚的君主,并且创建了普舍美斯王朝。 |
| 874 年 | 大摩拉维亚和法兰克王国之间签署了《福希海姆和约》。 |
| 896 年 | 阿尔帕德领导下的马扎尔人到来。 |
| 907 年 | 在遭受马扎尔人的进攻后大摩拉维亚帝国覆灭。 |
| 935 年 | 波希米亚大公瓦茨拉夫一世(圣文采斯拉斯)被谋杀。 |
| 955 年 | 奥托一世率领日耳曼军队在莱希菲尔德击败马扎尔人。 |
| 1000 年 | 阿尔帕德王朝的马扎尔人君主斯蒂芬即位匈牙利首位国王成为斯蒂芬一世(圣斯蒂芬)。 |
| 1035 年 | 波希米亚王权领地和摩拉维亚侯爵领地联合在一起建立捷克王权领地。 |
| 1085 年 | 普舍美斯王朝的弗拉季斯拉夫二世加冕首位波希米亚国王。 |
| 1212 年 | 腓特烈二世颁布了《西西里金玺诏书》,公开肯定波希米亚王国的独立性。 |
| 1278 年 | 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在摩拉瓦河滨的杜恩克鲁特被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的军队击败。 |
| 1301—1321 年 | 特伦钦的马特乌·察克及其盟友背叛了匈牙利君主,控制了斯洛伐克大部,赢得了“瓦赫河与塔特拉斯山之主”的称号。 |
| 1306 年 | 随着瓦茨拉夫三世被谋杀,普舍美斯王朝走向终结。 |
| 1346—1378 年 | 卡雷尔四世(查理四世)作为波希米亚国王以及从 |

| | |
|---|---|
| | 1355—1378 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 |
| 1381 年 | 路易一世颁布法令——《斯洛伐克人的特权》——授予斯洛伐克人在日利纳与日耳曼人同等的权利，并且开启了特定城市和城镇的双语制。 |
| 1415 年 | 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命令下，波希米亚宗教改革家扬·胡斯作为异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
| 1420—1434 年 | 胡斯战争。 |
| 1434 年 | 利帕尼之战结束了胡斯信徒革命，激进派胡斯信徒被圣杯派和捷克天主教军队击败。 |
| 1458 年 | 圣杯派贵族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波杰布拉迪的乔治）当选为波希米亚的“胡斯信徒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被选为匈牙利国王。 |
| 1526 年 | 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当选波希米亚国王，成为斐迪南一世——捷克国土上首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路易二世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在摩哈赤的决定性失败，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大部分匈牙利王国。 |
| 1576—1612 年 | 鲁道夫二世作为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 |
| 1618 年 | 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和三十年战争开始。 |
| 1620 年 | 新教贵族率领的波希米亚军队在白山（Bíla hora）之战中为哈布斯堡—天主教联军所败。 |
| 1683 年 | 奥斯曼军队在维也纳被击败，导致了 1699 年使得匈牙利王国重新统一的和约。 |
| 1713 年 | 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为哈布斯堡王室的女性继承权作好了准备。 |
| 1740—1780 年 | 玛丽娅·特蕾莎在位。 |
| 1764—1790 年 | 约瑟夫二世在位。 |
| 1781 年 | 宽容特许证准许除罗马天主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奥 |

| | |
|---|---|
| | 地利帝国的领土上开展活动。 |
| 18 世纪 80 年代 | 斯洛伐克民族觉醒,以安通・贝尔诺拉克在归纳整理一种斯洛伐克书面语言方面的最初努力为开始。 |
| 1791 年 | 匈牙利议会开始马扎尔化的进程,颁布第一项支持匈牙利语在法律制度中的最高地位的立法。 |
| 18 世纪晚期 | 捷克民族觉醒开始。 |
| 1805 年 | 拿破仑和他的大军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布尔诺的斯拉夫科夫)击败了奥地利和俄国的联军。 |
| 1809 年 | 拿破仑的军队围攻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造成城堡被焚毁以及德温城堡附近被破坏。 |
| 19 世纪 40 年代 | 卢多维特・什图尔和一批斯洛伐克学者归纳整理了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并且出版了第一部斯洛伐克语言的词典。 |
| 1844 年 | 匈牙利议会确立马扎尔语作为行政管理和教育的单一语言,马扎尔化挑战斯洛伐克文化和语言。 |
| 1848 年 | 波希米亚人发动了由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和捷克自由主义者领导的起义。捷克人召集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讨论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斯拉夫人间的协作。 |
| 1848—1849 年 |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起草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呈送给匈牙利当局。斯洛伐克人随后发动了武装起义,支持从马扎尔统治中获取民族独立。 |
| 1848—1916 年 |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位。 |
| 1861 年 |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了《斯洛伐克民族备忘录》,要求在匈牙利北部创建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地区。 |
| 1862 年 | “索科尔”作为一个捷克爱国组织创立。 |
| 1863 年 | 一个专注于斯洛伐克文化的机构“斯洛伐克之源”成立。 |
| 1867 年 | 作为和解(*Ausgleich*)的结果,奥地利帝国成为奥匈 |

| | |
|---|---|
| | 帝国，捷克领土由奥地利统治而斯洛伐克归匈牙利。 |
| 1871 年 | 斯洛伐克民族党(SNS)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成立。 |
| 1875 年 | 匈牙利当局下令关闭"斯洛伐克之源"和 3 个斯洛伐克体育馆。 |
| 1907 年 | "切尔诺瓦大屠杀"夺走 15 条生命，当时匈牙利警察在这座斯洛伐克城镇向人群开火。 |
| 1913 年 | 安德莱·赫林卡及其他人成立斯洛伐克人民党(SL'S)。 |
| 1914 年 | 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杀，引发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 |
| 1915 年 | 由美洲斯洛伐克人联盟和捷克全国委员会签署的《克利夫兰协定》认可了一个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捷克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组成的联邦国家的建立，其中斯洛伐克人拥有分离的议会和行政机构。 |
| 1916 年 | 在巴黎的捷克国民委员会创建，不久更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 |
| 1918 年 | 《马丁宣言》和《匹兹堡协定》支持了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同国家的创建。 |
| 1918 年 | 由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担任总统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成立。 |
| 1919 年 | 巴黎和会举行。 |
| 1919—1920 年 |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离开俄罗斯回国，途中穿越西伯利亚，随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启航。 |
| 1921 年 | 博胡米尔·什梅拉尔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 |
| 1925 年 | 斯洛伐克人民党更名为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HSL'S)。 |
| 1935 年 | 马萨里克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辞去总统职务，爱德 |

| | |
|---|---|
| | 华·贝奈斯被选为总统。 |
| 1938 年 | 9 月末的《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转入德国控制,随后的《维也纳裁定》割让斯洛伐克地区给匈牙利。 |
| 1939 年 | 3 月纳粹德国的入侵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捷克领土成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纳粹德国保护国",而斯洛伐克被允许在约瑟夫·蒂索领导的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一党执政管理下保持"独立"。 |
| 1939 年 | 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 1941 年 | 斯洛伐克参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同盟国承认贝奈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 |
| 1942 年 | 代理纳粹德国保护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杀,随后德国人血洗了布拉格附近的村庄利迪策和波希米亚东部的莱扎基。 |
| 1944 年 |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始于 8 月。 |
| 1945 年 | 布拉格起义在 5 月初爆发,先于苏联红军对这座城市的解放和德国的投降。爱德华·贝奈斯和国民阵线政府从科希策抵达,对日耳曼裔的"野蛮迁移"开始。 |
| 1947 年 | 前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被宣判死刑,随后被处决。 |
| 1948 年 |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KSČ)在二月事件中夺权,贝奈斯辞去总统。 |
| 1948—1949 年 |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使经济转型。 |
| 1952 年 | 在政治清洗和摆样子公审期间,14 名捷共高层官员——其中包括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被判处叛国的罪名,其中 11 人被处决。 |

| | |
|---|---|
| 1954 年 | 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其他斯洛伐克共产党(KSS)最高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受审并被判入狱。 |
| 1960 年 | 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宣布一个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创建。这部宪法剔除了斯洛伐克自治。 |
| 1968 年 |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安托宁・诺沃提尼成为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对改革和“人道社会主义”的支持有助于激励布拉格之春,这次试验被 8 月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打断。 |
| 1969 年 | 古斯塔夫・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捷共第一书记,开启了“正常化”时期。 |
|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 “正常化”支配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停滞和冷漠成为长期问题。 |
| 1975 年 | 胡萨克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一年该国成为保障人权的《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国。 |
| 1976 年 | 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和“DG307”的成员由于未经正式批准表演音乐而受审。 |
| 1977 年 | 瓦茨拉夫・哈韦尔和其他主要政治异见者成立了“七七宪章”组织,目的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 |
| 1985 年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引入了“公开化”和“改革”。 |
| 1987 年 | 米洛什・雅克什取代古斯塔夫・胡萨克成为捷共总书记。 |
| 1989 年 | 天鹅绒革命紧随着 11 月 17 日对学生示威活动的袭击而开始。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成立,游行示威和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倒台。瓦茨拉夫・哈韦尔被选为总统。 |
| 1990 年 |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成立,同时经济改革和 |

xix

大规模私有化开始。自由和民主选举在 6 月举行。

1991 年　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

1992 年　经过 6 月的选举后,瓦茨拉夫·克劳斯和弗拉基米尔·梅恰尔分别被选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理。在这一年的年底,协商达成的“天鹅绒分离”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和两个独立共和国——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诞生。

1993 年　瓦茨拉夫·哈韦尔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米哈尔·科瓦奇当选斯洛伐克总统。在捷克共和国承袭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席位之后,斯洛伐克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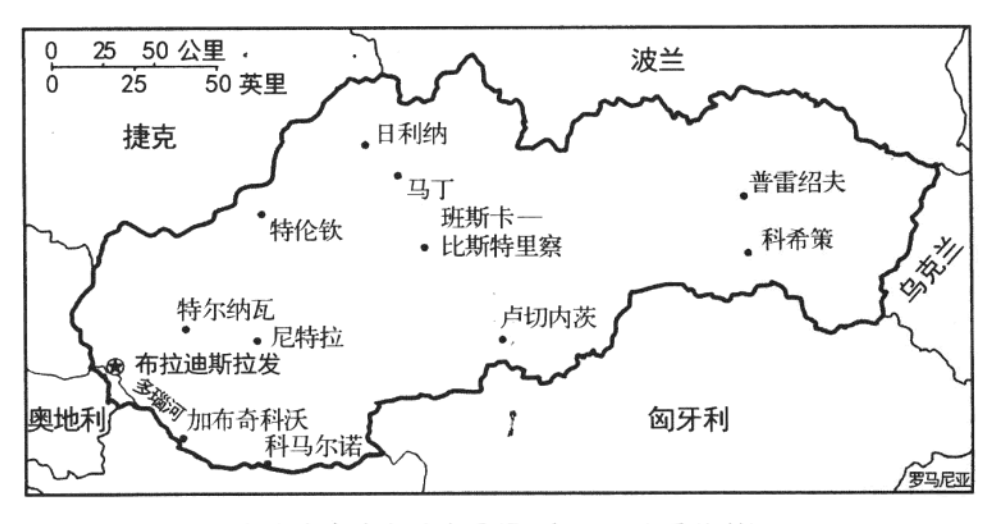
xx

1998 年　米库拉什·祖林达接替弗拉基米尔·梅恰尔成为斯洛伐克总理。

1999 年　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鲁道夫·舒斯特通过直选当选斯洛伐克总统。

2004 年　捷克共和国加入欧盟。斯洛伐克共和国加入北约和欧盟。

捷克共和国地图(Bookcomp 公司绘制)




斯洛伐克共和国地图(Bookcomp 公司绘制)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今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1

这是两个有着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的国家，在 1993 年导致两个独立国家诞生的“天鹅绒分离”之前的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邻国曾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共同的历史。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地处中欧，一个在传统上是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西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故乡的地区。与西欧、东欧和东南欧不同，这片大陆的广大中部地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历过超越这个地区边界的大事件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宗教趋势的影响。尽管布拉格已经被公认为欧洲心脏上的城市，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地区却被许多人看做是介于东西欧文化地带之间的边界区域，东边是斯拉夫民族及其语言的发源地，西边是拉丁基督教的成型文明。

## 捷克共和国

2

### 地理

捷克共和国，简称捷克，是位于欧洲中心区域的中等大小的内陆国，与波兰、德国、奥地利和斯洛伐克接壤。该国的国界线总长达 1 169 英里，与威廉·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冬天的故事》中提及的波希米亚

地理相反，捷克共和国既没有沙漠也没有海岸。

今天的捷克领土与历史上构成波希米亚王国的王室领土相仿，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部分西里西亚。西面的波希米亚——三者之中最大的地区——占捷克共和国的三分之二，占有该国国土总面积30 450平方英里中的 20 367 平方英里。捷克共和国的面积与欧洲的爱尔兰和奥地利相近，只是稍稍小于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

位于波希米亚中部的布拉格是该国首都，人口大约 120 万。布尔诺——长期的摩拉维亚行政中心——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有居民 370 592 人。其他主要城市包括位于波希米亚的比尔森(169 273 人)、利贝雷茨(100 914 人)、乌斯季(95 289 人)、捷克布杰约维采(94 936人)和赫拉德茨—克拉洛韦(94 497 人)，以及位于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307 767 人)和奥洛莫乌茨(100 373 人)。

捷克共和国是一个比较多山的国家，超过 93%的国土平均高度介于海拔 656 至 3 280 英尺之间。该国位于波希米亚地块与西喀尔巴阡山脉的分界线上，西面是被多山地带环绕的波希米亚盆地，东部则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山脉长久以来一直是捷克人与邻居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天然边界，东北部是克尔科诺谢山脉(巨人山脉)和奥尔利采—霍里山脉(鹰山脉)，南部和西部有捷克林山与舒马瓦山相接，两者合称为波希米亚林山。在东部，比莱—卡尔帕蒂山(白喀尔巴阡山)分隔了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

被低山环抱的波希米亚是一块集合了平原、高原、丘陵的土地，而摩拉维亚有着山峰和高地以及在南部边界汇入多瑙河的摩拉瓦河盆地。克尔科诺谢山脉包括了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海拔 5 260 英尺的斯涅日卡山(Sněžka，源于捷克语单词“雪”)。

3

捷克的国土被称为“欧洲的屋顶”，指其处在分隔汇入北方的两大海(北海和波罗的海)和南方黑海的河流流域的欧洲主要分水岭的通道上。从波兰边界上的克拉利茨基—斯涅日尼克峰(4 668 英尺)和斯涅日尼克山起，降水根据不同斜坡的路径流向这三个大海。

尽管捷克国土上湖泊的数量相当稀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却是

众多矿泉和温泉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易北河、摩拉瓦河和奥得河的集水区。易北河的源头可以在克尔科诺谢山区找到，这条河流几乎连接着捷克共和国所有其他的河流，其中包括其最重要的支流，流经首都布拉格并且汇集该国整个南部地区水系的伏尔塔瓦河。由于它对捷克最大城市的重要性，伏尔塔瓦河被认为是捷克的国家河流。易北河与伏尔塔瓦河汇流之后流向西北，穿越波尔塔—波希米卡的山谷，那是波希米亚高地火山地块的波希米亚大门，接着继续蜿蜒数百英里贯穿德国最终汇入北海。海拔 378 英尺的捷克共和国海拔最低点也位于易北河流域。

摩拉维亚最重要的河流是摩拉瓦河，它的源头在克拉利茨基—斯涅日尼克峰，然后向南流过低地与迪耶河汇流，之后汇集摩拉维亚西南地区的水系，跨过奥地利边界，汇入流向黑海的多瑙河。第三条主要河流——奥得河——的上游位于摩拉维亚北部，不过只有一小段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它流经西里西亚，接着贯穿波兰并在港口城市什切青汇入波罗的海。

捷克共和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其中一些位于比莱—卡尔帕蒂、克尔科诺谢、伊泽尔斯克—霍里和舒马瓦等高地和山区。

## 人口和人口统计

2009 年，统计显示捷克共和国的人口刚刚超过 1 020 万，在世界 193 个国家中排名第 82 位。基于 2005 年的估计，捷克共和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 337 人，其中波希米亚中部和摩拉维亚的密度最高。大约 7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中间年龄是 40.1 岁(2009 年的估计)，其中 13.6%的人口年龄在 0—14 岁，71%在 15—64 岁，还有15.5%的人口在 65 岁及以上。捷克共和国的识字率据报道是 99.8%。

4

捷克共和国的民族构成是 94%的捷克人(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捷克人)，3%的斯洛伐克人，0.6%的波兰人，0.5%的日耳曼人，0.4%的乌克兰人，0.2%的匈牙利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包括西里西亚人和一

个正在成长的越南人社区。官方估计罗姆人——亦称吉卜赛人——的比例在 0.3%，尽管其实际数量可能高达人口总数的 2.5%。曾经兴旺的日耳曼人当纳粹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结束时被驱逐和迁移出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年内减少了 95%。捷克国土上的犹太人口很可能不多于几千人，犹太社区自从纳粹占领欧洲后在集中营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自此就没有得到恢复。

尽管宗教反叛和战争在捷克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今天的捷克共和国被认为是欧洲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国家，40%的居民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在那些表明宗教信仰的人中间，39.2%信奉罗马天主教，4.6%信奉新教，剩下还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成员，包括仅剩的最小的犹太人社团。

捷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捷克语，是斯拉夫语族西斯拉夫语支的一种语言，由此与波兰语和斯洛伐克语相关联，其中后者与捷克语是相互可理解的。捷克语口语包括几个地区的方言，同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一样是一种印欧语言。[1]

## 经济

自从 1989 年的重大事件发生和共产党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丧失政权以来，捷克一直是这一地区最发达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经济传统产生于 19 世纪期间，当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以农业为重的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当捷克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为创造一个健康的投资环境作了很大的努力，近些年已将捷克建成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极具吸引力的目标。为了创建一个私有化的体系，为健康的消费产品和更有效的工业基础制造条件，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发起了一项使大多数国营企业通过一套凭证制度进行私有化的计划。市民获得了通过购买凭证获得国营企业股份的机会，这些企业大约占共产主义时期所有公司和企业的 97%。在今天，私有领域之外的企业只占总数的 20%。总体上，在共产主义制度消失 20 年之后，捷克共和国的经济

改革依旧在进程中。

从 2004 年 5 月 1 日捷克共和国加入欧盟起，该国居中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良好教育的人口和有技术的劳动力已经使其投资环境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与欧盟体系的融合需要捷克的法律法规与欧盟的调和，这使大部分工业产品贸易以及服务和农业领域的自由贸易障碍得以清除。大量规章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捷克生产商陷入竞争困境，不过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也使其在结构性融资和农业支持方面得益。

总体上，这些正面的因素给一个重点在出口的经济体在 2005—2007 年带来每年超过 6%的增长率，尽管 2008 年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其增长率跌到了 3.2%。随着 2008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大约 2 170亿美元，捷克共和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40 名，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位列第 37 名。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捷克共和国朝加入欧元区的方向迈进，而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到 2012 年能否达到所需标准。与此同时，捷克共和国将继续使用捷克克朗作为国家的官方流通货币。

2008 年官方估计的劳工总数为 537 万，其中 56%在政府和其他服务机构工作；40%受雇于工业、建筑业和商业领域；4%从事于农业。与全球经济衰退相关，失业率从 2008 年 5 月的 5%升至 2009 年 10 月的 8.6%，在波希米亚北部和摩拉维亚北部依赖于煤钢产业的地区，缺乏技术和年龄较大的工人的失业率更高。

## 环境问题

6

在波希米亚西北部和摩拉维亚北部俄斯特拉发附近的工业区，空气和水污染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了产生能源而长期使用的低劣褐煤会造成持续的健康风险。煤是一个主要的污染源，同时还有导致酸雨和对森林地区的损害等持续问题的工业化难题。然而，为使捷克工业符合欧盟标准而设计的计划预计在整体上对减少污染有积极效果。

根据捷克统计局的数据，2007 年，煤炭驱动发电厂、混合动力发电

厂和燃烧发电厂占捷克共和国电力供应的67.3%,29.7%的电力由核电站生产,只有超过3%来自水力发电和其他再生资源。然而位于波希米亚南部靠近奥地利边界的泰梅林的一个核电站的建设,在初期就引起了争端。1986年,即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灾难夺走了31个人的生命并且导致10万人撤离的同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宣布计划在泰梅林附近的山顶建造一个苏联式的核电站。在邻近的奥地利,198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调查对象反对任何形式的核能发展。这种普遍的对核电站的反对,加上对泰梅林计划在设计上的安全性顾虑,引发了反对捷克—奥地利边界附近的苏联式核电站的游行示威和临时的边境封锁。

在1989年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许多当地的捷克居民和政治领袖开始反对这个核电站,这成为了捷克共和国1993年成立以后的国家问题。然而尽管经历了无数与建设相关的延期和问题,泰梅林的第一个反应堆在2000年开始运转,两年以后是第二个。来自政府的消息显示,对安全标准的重视有利于更多公众增加对核能的正面看法,并且有60%的捷克人会支持核能的发展。

## 捷克共和国政府

1992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鹅绒分离”中分解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成立于1993年1月1日。宪法于1992年12月16日签署生效。

7

在行政部门方面,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作为国家的正式首脑,通过上下议院的联席会议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有权通过再次竞选寻求连任。总统拥有召集议会的职责,在特定的符合宪法的条件下可以解散议会。此外,总统签署议会通过的立法,并且有权否决立法,退回议会,但总统并没有权力修正立法。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同时也是与其他国家交往时的国家代表人,可以协商和签署国际条约和协议。宪法并没有给予总统强大的执行权威,其职务更多是仪式性的。

捷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是瓦茨拉夫·哈韦尔,在共产党政权向民

主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过渡期间,曾于 1989 年 12 月 29 日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统。继任哈韦尔成为捷克共和国总统的是前总理和公民民主党创始人瓦茨拉夫・克劳斯。克劳斯于 2003 年 2 月 28 日由议会选举为总统,接着在 2008 年 2 月 25 日通过选举获得第二个任期,此次选举在 2 月 8 日和 9 日的早期选举轮次被证明无效。

捷克共和国总统的首要职责之一是根据全国选举的结果提名总理,获得选举相对多数票的政党首脑通常会受邀组建政府。紧接着推荐总理之后,总统提名其他政府部长作为副总理和内阁成员。当得到批准后,现任总理和其他部长向总统提交他们的辞职书,然后总统着手组建新的政府。

捷克共和国的双议会立法机关包括下议院(200 个议席)和上议院(81 个议席)。下议院的成员选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 14 个行政区域,包括首都布拉格。选举权在 18 岁以后是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下议员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获得 4 年任期,基于比例代表制。上议院在 1996 年第一次选举,以美国参议院为模型,议员任期为 6 年,每两年对其中三分之一进行改选。通过以政党提名的方式或者作为 81 个选区的独立候选人,所有 40 岁以上的捷克公民都有资格被选入上议院。候选人获得超过 50%的选票可以赢得上议院的一个席位。如果没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将在两名获得最高选票的候选人之间进行决选。

8

捷克共和国的司法制度是在前奥匈帝国的民法法系基础上建立的,经过修改去除了共产主义时期的马列主义法律理论,并且满足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规定的义务。民法法系包括一个法院层次体系,从地区、区域和高等法院到作为国家最高上诉法院的最高法院。捷克共和国还保留了分离的宪法法院,裁定有关宪法的问题,法官由总统任命,任期 10 年。

以 2006 年 6 月全国选举的选举为顺序,捷克共和国的议会政党包括公民民主党(ODS)、捷克社会民主党(ČSSD)、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CM)、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KDU -

ČSL)和绿党。公民民主党是中右翼政党,1991 年 4 月成立,前身是公民论坛的一个分支,而中左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在支持市场经济下有社会意识的国家方面与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相似。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高举传统基督教民主的旗帜,是捷克政治事务中长期传统的一部分,而最左翼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是另一个传统——从 1948 年到 1989 年统治这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继承人。结果是共产党被认为是一个“反制度”的政党,自从捷克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参加过一届政府。绿党专注于生态问题,采用与欧洲其他“绿”党类似的方式普遍支持宽松政策。[2]

2004 年,捷克共和国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并且在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捷克共和国也一直保持着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资格。

捷克共和国的国旗由两条水平的红色和白色条纹以及靠近旗杆一侧的一个蓝色等腰三角形组成。专门的总统旗上标有标语:“真理必胜”(*Pravda vítězí*)。国歌《家在何处?》选自为喜剧《菲德洛娃奇卡》——亦称《没有愤怒没有争吵》,首次演出于 1834 年——所创作的配乐。这首歌由作曲家弗兰蒂舍克·什克劳普和剧作家约瑟夫·卡耶坦·蒂尔创作,后来被生活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民族主义者选为非正式国歌。

9

## 斯洛伐克共和国

### 地理

斯洛伐克,亦称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将国土分割为不同地理区域的山地和河流构成了其多变的地貌。多岩石的山脉横卧在斯洛伐克的中部和北部,南部则是低地。斯洛伐克 19 832 平方英里的国土面积,大体上两倍于新罕布什尔州*,国土最东端到最西端延伸

* 美国州名。——译者注

266.5 英里。

斯洛伐克与波兰、捷克共和国、乌克兰、奥地利以及匈牙利接壤，有 109 英里长的多瑙河河段作为与匈牙利的界河，而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正位于这条欧洲重要水路的两岸。

历史上，斯洛伐克曾经被分为 3 个显现为一种共有的文化，却带有明显地方口音的斯洛伐克语和地方文化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地区——西部、中部和东部。通过从山地到南部和东南部低地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地形在这种多样性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低地包括东斯洛伐克低地、扎霍尔斯卡低地和多瑙河低地，它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具有与其他地方的山谷、山峰、高地和山脉完全不同的环境。作为大多瑙河平原的一部分，低地被草原和草甸，还有森林、荒野和盐沼覆盖。

在这个多山地带占国土面积 30%的国家，喀尔巴阡山脉通过大喀尔巴阡弧北部的相关山系占据斯洛伐克地貌的首要位置。这些山系包括斯洛伐克矿山、低塔特拉山、什佳夫尼卡山、大法特拉山和小法特拉山。高塔特拉山，斯洛伐克最高的山脉，是该国范围内仅有的具有阿尔卑斯山特征的山脉，构成了北方与波兰的部分边境，并且包括了斯洛伐克的最高点，海拔 8 710 英尺的格尔拉赫峰。小喀尔巴阡山脉，亦称白喀尔巴阡山脉，将斯洛伐克与捷克共和国分隔，再往南延伸至奥地利并且与阿尔卑斯山系连接。斯洛伐克矿山从斯洛伐克中部的兹沃伦延伸到东部的科希策，长约 90 英里。山的周围布满矿泉和温泉，使巴尔代约夫、皮耶斯塔尼、斯米尔达基、卢茨基、诺维—斯莫科韦茨等地成为矿泉疗养地。 10

河流也在斯洛伐克扮演着重要角色，欧洲最重要的水路之一——多瑙河——将斯洛伐克与从德国到黑海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布拉迪斯拉发和科马尔诺作为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上的关键港口，每天都有渡船连接斯洛伐克首都到北面邻近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西部，摩拉瓦河形成了与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的边界，而在东部，乌赫河将斯洛伐克与乌克兰西部的下喀尔巴阡—鲁赛尼亚分隔。

其他重要的河流包括蒂萨河，其构成了部分与匈牙利的边界。总

长 286 英里的瓦赫河源自中部地区，然后流向西部，最后往南汇入多瑙河，是全境都在斯洛伐克的河流中最长的一条。斯洛伐克的最低点位于克林—纳德—博德罗格姆村附近，海拔 308 英尺，靠近博德罗格河穿过国境进入匈牙利的地方。

## 人口和人口统计

截至 2008 年末，5 412 254 的斯洛伐克人口总数排名世界第 113 位，使得斯洛伐克共和国成为欧洲战略要地的一个小国。斯洛伐克的人口分布是不规则的，大城市和多瑙河低地的人口密度最大。即使经历了欧洲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约 45%的斯洛伐克居民生活在人数少于 5 000 人的乡村，14%生活在人数少于 1 000 人的乡村。东斯洛伐克盆地和扎霍尔斯卡低地是人口较少的地区。由于缺乏肥沃的土壤，低人口密度成为北部多山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特征。

斯洛伐克的主要城市化地区包括人口为 428 791 人(2008 年年底的估计)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以及国家东部拥有 233 659 居民的科希策。其他斯洛伐克大城市包括西部的尼特拉(84 070 人)、特尔纳瓦(67 726 人)、特伦钦(56 826 人)和普列维扎(50 644 人)；中部的日利纳(85 327 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80 106 人)和马丁(58 433 人)；东部的普雷绍夫(91 273 人)和波普拉德(54 621 人)。

11

斯洛伐克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0 人，其人口增长率，包括自然增长和净移民，在 1993 年、2001 年和 2008 年分别是 4.2%、0%和 2.1%。2008 年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8.3 岁，15.45%的人口在 0—14 岁的年龄之间，72.46%的人口年龄在 15—64 岁之间，12.09%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女性构成了人口中的 51.41%，男性占 48.59%。该国的识字率是 99.6%。

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包括占人口总数 86%的斯洛伐克人以及若干少数民族。单词“斯洛伐克”(Slovak)被认为是“斯洛万”(*Slovan*)的笔误，斯洛伐克语中“斯洛万”就是“斯拉夫”的意思。大部分生活在靠近匈牙利边界的南部低地的匈牙利人，亦称马扎尔人，是占

该国居民总数大约10%的最大的少数民族。据官方统计,罗姆人——即吉卜赛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7%,不过非官方统计提供的数字可能高达6%到10%。这部分是因为许多罗姆人自认为是匈牙利人或者其他种族群体的成员。捷克人占人口总数的1.4%,其余还有乌克兰人(0.1%)、日耳曼人(0.1%)、摩拉维亚人(0.07%)和波兰人(0.1%)。鲁辛人——也被称为鲁赛尼亚人或者喀尔巴阡—鲁赛尼亚人,后者是就他们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中的山村而论——是构成人口0.3%的一个东斯拉夫民族。

斯洛伐克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国家,有69%的斯洛伐克居民承认遵奉这一信仰。新教徒是占大约10%的第二大群体,随后是希腊天主教徒(4%)、东正教徒(0.9%),以及少于4 000人的犹太人口,其中包括全欧洲最小的少于1 500人的大屠杀幸存群体。[3]

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斯洛伐克语,一种西斯拉夫和印欧语言,与波兰语有关系并且更接近捷克语,尤其是邻近的摩拉维亚所说的捷克方言。在国家的南部通常讲匈牙利语。鲁赛尼亚语、吉卜赛语和乌克兰语作为更小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存在。1995年,斯洛伐克政府通过了一项国家语言法,旨在通过对正式交流中未能使用斯洛伐克语进行指定的处罚来保护国定语言,该法律完全没有考虑到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比例。引起麻烦的多个条款后来被宪法法庭裁定违反了斯洛伐克宪法,它们都被废除。随着斯洛伐克得到欧盟的成员身份,其被要求于1999年接受一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在那些少数民族人口至少占20%的地区可以公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然而在十年之后的2009年,对1995年法律的修正案寻求确立斯洛伐克语的首要地位以作为对斯洛伐克共和国主权的反映。修订后的法律提供了在公开和正式场合的一小部分豁免,不过在其他方面鼓励书面和口头形式使用斯洛伐克语,对于未能按照法律所陈述的和在紧随书面警告之后使用斯洛伐克语课以100至5 000欧元的罚款。2009年修正案遭到不仅仅是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邻国匈牙利政府的强

12

烈指责。

## 经济

1993 年 1 月进入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时期，它必须完成一场从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国营企业转型为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个困难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面的改革和一个成功的私有化进程，不过这场变革在 1994 年到 1998 年期间由于弗拉基米尔・梅恰尔总理政府的腐败和有疑问的财政政策而大大延缓了。那些年被标记为经济增长以及部分经济领域的全面改进，尽管一些所谓的增长可能归因于政府高财政支出和过度介入。反复无常的政府政策导致了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以及高水平的公共和私人债务。任人唯亲、内幕交易和有疑问的决策造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缓慢而不稳定的私有化进程，反映在 GDP 上是实际年增长的下降，从 1995 年 6.5%的顶峰到 1999 年的 1.3%。

在米库拉什・祖林达任总理的政府的治理下，通过修订税制、大幅促进私有制进程以及劳工法和养老金制度方面的进展，经济改革获得了新的发展。这在祖林达的第二个任期(2002—2006 年)内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斯洛伐克共和国经历了 2006 年高达 8.3%的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2007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10.4%，其经济发展继续超越人们的期盼。消费物价上涨从 1993 年的 26%跌到 2006 年的 4.5%，接着在 2007 年早期，当合适的全球能源价格和汇率的提升支撑经济增长时，更是跌到 2.4%以下。2008 年，斯洛伐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 950 亿美元，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56 名，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中位列第 57 名。

13

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后，斯洛伐克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进入欧元区，欧元取代了斯洛伐克克朗，成为了国家流通货币。由于适度的劳动力成本、有技术的劳动人口、自由开放的劳工政策、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以及对个人和公司征收 19%的单一税的合适税制，斯洛伐克

共和国同样经历了国外投资的急剧增长。到 2009 年，主要的私有化进程接近完成，汽车和电子企业的国外投资继续在增长，该国的银行业几乎全部是外资的。不过欧洲经济衰退的影响导致 2009 年第一季度斯洛伐克的出口缩减了 5.4%，积极的经济增长遭受了挫折。

2008 年，斯洛伐克的劳动人口据估计在 225.4 万人，其中 39%从事工业、建筑业和商业；56.9%在政府和其他服务行业工作；还有 4%从事农业。国家的失业率在 2003—2004 年曾经上升到 18%，2008 年 9 月是 9%，而在前一年 6 月记录的比例是 7.6%。到 2009 年 3 月，由于欧洲范围的经济衰退，失业率达到了 10.5%，在欧盟中，斯洛伐克的失业率是最高的之一。

### 环境问题

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化相关的原因造成的空气污染始终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酸雨和森林采伐造成的后果持续威胁着该国广袤的森林。对于环境的担忧也在有关多瑙河上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大坝的建造的被大量报道和长期无休的争论中成为主要话题。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府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加布奇科沃和匈牙利的大毛罗什之间合作建造一系列水利枢纽。这个计划需要通过大坝和泄洪闸的方式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多瑙河改道进入一条人工水道，连接布拉迪斯拉发东南方向的加布奇科沃附近的水力发电站。第二个较小的发电站会建立在匈牙利的大毛罗什附近。该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套更有效的流量控制系统，并且在重度污染的匈牙利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生产更干净的能源。

14

1981 年，面对困难的经济条件，匈牙利政府提议放弃这个计划，接着在 1983 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经过协商达成了延缓大坝建设进度的协议。面对不断增长的针对大毛罗什发电站的公众抗议，匈牙利领导人在 1989 年暂停了建设，接着在 1992 年宣布终止了 1977 年的协议。匈牙利对该项目的反对演变为两国关系的严重争端，这时斯洛伐克已经

开始了在加布奇科沃的多瑙河改道，并且导致了河水水位两米的降幅。多瑙河改道和为了水力发电而截流的环境后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尤其是按照原定计划很长一段的多瑙河都受到影响。

欧洲共同体介入说服了两个国家将案件递交到海牙的国际法庭。1997 年 9 月，法庭裁定匈牙利搁置 1977 年的协议是不合法行为，按照该协议规定这项合作计划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然而，法庭也裁定在加布奇科沃的河流改道，即所谓的“C 版本”计划也违背了协议，忽略了水利枢纽计划的“一体而不可分割的”特性。此外，法庭裁定 1977 年协议保持有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必须继续协商有关履行协议的事宜，即使每个国家有可能对协议的条款继续保持不同的解读。这些协商在此后十年持续进行，一方面匈牙利反对在大毛罗什的下游大坝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斯洛伐克要求大坝必须按计划建成。

### 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

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分离成两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的直接结果而正式成立。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在 1992 年 9 月 1 日正式批准，文件在 1993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宪法后来在 1998 年 9 月进行了修订，允许总统的直接选举，在 2001 年 2 月又进行了修订，以便为加入北约和欧盟做好准备。

15

斯洛伐克划分为 8 个行政区和 79 个地区，其中布拉迪斯拉发作为首都和政府所在地。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旗由白色（顶端）、蓝色和红色等长的水平条纹构成，居中略靠近旗杆一侧叠加上斯洛伐克国徽。国徽的外形是一个镶着白边的红色盾牌，盾牌内部是在三座蓝色山峰上的一个白色洛林十字架。斯洛伐克国歌——《塔特拉斯山上的闪电》（*Nad Tatrou Sa Blýska*）——写于 1884 年，歌颂 19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精神，由扬科 · 马图什卡给传统民歌《她挖了一口井》（*Kopala studienku*）配上新词而成。歌词激励斯洛伐克人起来保卫自己，对抗象征威胁的祖国山峦上的闪电和雷暴。

在斯洛伐克政治体制中，行政部门包括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以及

由总理、副总理和其他内阁部长组成的政府。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由合格的选民直接选举,任期 5 年,可以重新当选第二个任期。选举权在 18 岁以后是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如果一位候选人不能得到绝对多数的选票,第二轮选举将作为决选被安排在两名获得最高选票总数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轮获胜的候选人将当选总统。

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同时也是与其他国家交往时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代表人,有权力协商和签署国际协议。除了任命总理和接受政府首脑推荐的其他部长职务,总统可以签署由议会——或称国民议会——提交的立法,或者将附上他自己的建议将立法退回给那个机构。总统在特定的宪法规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解散国民议会。

2009 年 4 月 4 日,由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和斯洛伐克民族党联合支持的伊万·加什帕罗维奇,在第二轮总统竞选中,以55.5%对 45.5%击败了斯洛伐克民主与基督教联盟(SDKU-DS)的伊韦塔·拉迪乔瓦,成为首位在公开选举中获得连任的斯洛伐克总统。加什帕罗维奇在 2004 年 4 月 3 日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当时是由民主运动和方向党(HDZ-Smer)支持,其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了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HZDS-LS)的弗拉基米尔·梅恰尔。作为导致独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的"天鹅绒分离"中的中心人物,梅恰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三次出任斯洛伐克总理,并且在 1998 年当国会不能对任期已满的米查尔·科瓦奇的继任者达成一致意见时短暂担任代总统。

16

作为政府的首脑,总理通常在国民议会选举后由总统从多数党或者少数党联盟中提名。总理接着会要求总统批准由副总理和内阁部长组成的新政府。由总理领导的政府,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首席设计师,负责在国家预算范围内制订计划。

斯洛伐克的立法机构是一院制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其 150 名成员通过基于比例代表制的普选获得 4 年任期。由总统召集的国民议会有权通过和执行法律,提议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国家预算,建

立政府部门和机构,批准国际条约和协议,对其他国家宣战,以及批准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外的军队部署。国民议会也可以以简单多数票不顾总统否决权,安排对一届政府或者单独一名部长进行不信任投票,但必须以绝对多数票通过。

2006 年 6 月 17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使罗伯特·菲乔被任命为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乔的政党——方向—社会民主党(50 个议席)——在选举中与斯洛伐克民族党(20 个议席)、人民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LS-HZDS,15 个议席)建立了联盟。其他议会政党包括斯洛伐克民主与基督教联盟(31 个议席)、匈牙利人联盟党(SMK-MKP,20 个议席)以及基督教民主运动(KDH,14 个议席)。参加选举但是没有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包括斯洛伐克共产党(KSS)、自由论坛(SF)、新公民联盟(ANO)和其他更小的党派。

17

作为捷克共和国的邻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司法制度源自前奥匈帝国的民法法系,经过修改去除了马列主义法律理论,并且遵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规定。斯洛伐克政府的司法部门包括最高法院,或称最高上诉法院,其法官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组成各个小组,分别裁定民事和刑事案件,商议由区域、地区和军事法庭作出的裁决,以及检查由政府机构作出的决定的法律依据。一个特别的宪法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有权裁定与宪法相关的问题。宪法法院由 13 名任期 12 年的法官组成,候选人由国会提名并经过总统批准。

斯洛伐克是一系列主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包括欧盟和北约(于 2004 年春天加入)。斯洛伐克同样是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针对经济、科学和安全问题的地区性、欧洲和全球各类组织的成员。[4]

**注释:**

1 有关捷克共和国人口还有地理和经济相关主题的信息,参见以下在线资源:捷克共和国官方网站(捷克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czech.cz/en/discover-cz/facts-about-the-czech-republic);CIA:世界概况(https://www.cia.gov/

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z. html);美国国务院,“背景注释:捷克共和国”(http://www. state. gov/r/pa/ei/bgn/3237. htm),以及英国外交部,“国家概况:捷克共和国”(http://www. fco. gov. uk/en/travel-and-living-abroad/travel-advice-by-country/europe/czech-republic? profile = politics&pg=7)。联合国统计署也在联合国数据网站上提供了有关人口统计的信息(http://data. un. org/CountryProfile. aspx? crname=CZECHREPUBLIC)。

2 捷克共和国的官方在线政府资源包括总统网站“布拉格城堡”(http://www. hrad. cz/en);捷克共和国政府(http://www. vlada. cz/en/default. htm),以及捷克共和国议会,参议院(http://www. senat. cz/index-eng. php? ke_dni=11. 05. 2010&O=7)和众议院(http://www. psp. cz/cgi-bin/eng/sqw/hq. sqw)。近期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可以在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的选举手册上找到(http://www. electionguide. org)。

3 有关斯洛伐克人口、经济和地理特色的信息,可查阅以下在线资源:CIA:世界概况(https://www. cia. 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o. html);美国国务院,“背景注释:斯洛伐克”(http://www. state. gov/r/pa/ei/bgn/3430. htm);英国外交部,“国家概况:斯洛伐克”(http://www. fco. gov. uk/en/travel-and-living-abroad/travel-advice-by-country/europe/slovakia);联合国统计署的联合国数据网站(http://data. un. org/CountryProfile. aspx? crname=SLOVAKIA)提供斯洛伐克的人口统计数据。 18

4 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官方网站包括:斯洛伐克总统(http://www. prezident. sk/? introduction);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机构(http://www. government. gov. sk/9711/government-of-the-slovak-republic. php? menu=1290),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http://www. nrsr. sk/Default. aspx? Lang=en)。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的选举手册(http://www. electionguide. org)提供斯洛伐克近期选举的信息。

19

# 第二章　起源和中世纪遗产

## 史前时期和早期定居者

最初的印欧人早在公元前 3 000 年末期就沿着以高加索为起点经由黑海北部土地的路线到达了中欧东部。他们的到来恰巧与爱琴海地区欧洲早期文明的出现同步，并且以布拉格附近一个地点命名的乌涅提采文化的发育也与他们有关，这是青铜器时代早期第一个地区性的文化。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使用金属生产武器和装饰品，这些东西在墓室或者更少见的石冢里经常与死者放在一起。铜质短剑、燧石箭头、陶土杯以及类似物件作为男子的随葬品，而臂环、手镯以及铜针或骨针与女性死者相伴。乌涅提采文化影响了欧洲中部的其他文化，传遍了德国的南部和中部以及波兰西部地区。

印欧凯尔特人在公元前 4 世纪中期到达波希米亚，将此作为从大西洋沿岸绵延到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被他们逐步占领地区的一部分。凯尔特人中的一个部落——波伊人——在波希米亚定居，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是这片土地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居民，而当时已经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凯尔特人为希腊人尤其是罗马人所熟悉，他们称这片波伊人的土地为“波海姆”(*Boiohaemum*)。在中世纪期间，用拉丁文写作的学者借用罗马地理学者的工作成果，命名这个

20

部落为“波伊米”(*Boemii*),或称“波希马尼”(*Bohemani*),而命名他们的土地为波希米亚。在德语国家,这个地区被称作“波曼”(*Böhmen*)。

其他凯尔特人部落——沃尔卡—特克托萨季人和科蒂尼人——分别在今天的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土地上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中东部的凯尔特人口得到来自西部地区的后继凯尔特人的补充,他们主要来自将成为法国和瑞士的土地。

与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公元前750—前450年)联系在一起的凯尔特人后来建立起与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的联系,把拉登文化(公元前500—前50年)介绍到多瑙河流域及其他地方。凯尔特人时期的历史是以铁制品和手工艺品的技术先进为特征的,铁犁头、碾碎谷物的陶轮和石轮对专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凯尔特人在生产简单日用物品方面很有效率,这对于在工具和武器制作上广泛使用铁为基础的拉登文化来说尤为实际。铁匠、陶工和宝石匠受到交换和交易增长的刺激,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凯尔特人开始铸造金银币。拉登文化的凯尔特艺术以抽象的几何图形和简化的动物形状为特征。

凯尔特人在广阔而防御牢固的地方建立定居点,罗马领袖尤利乌斯·恺撒称之为“奥皮达”(*oppida*)。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抵达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以及北方日耳曼人部落的入侵,中欧的凯尔特人处于危急的情势中,这可能加速了这些定居点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的建设。日耳曼当权者到来并控制当地凯尔特人,削弱他们的习俗和文化,波希米亚在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期间一直受困于这样的入侵。当高卢人在公元前58—前51年败给了尤利乌斯·恺撒,与西方接触减少的结果加速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凯尔特人的衰弱,其在拉登时期结束和基督纪元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消失了,由此终结了延续五个世纪代表这个地区史前发展最高阶段的凯尔特文化。

公元前9年,一场在罗马军团手下的败仗使得马科曼尼人——一个日耳曼人部落——向东迁移进入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东部波伊人残余势力居住的地域。国王马罗博杜斯治下的强悍日耳曼统治的不合理

21

负担和凯尔特人经济的瓦解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倒退，初期凯尔特人国家创建的潜在可能遭受挫折，农业回到了前凯尔特人时代的技术水准。

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位于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东南部在国王瓦纽斯统治下的邻近日耳曼人部落——保持着同罗马人的外交联系，罗马人偶尔会介入地区政治事务或者在看来有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边界线上潜在的军事威胁使罗马人相信要修筑“罗马防线”，这是沿多瑙河前线用道路连接的加固城镇网络。罗马人驻扎在文多博纳(维也纳)和邻近的卡农图姆，也就是“琥珀之路”跨越多瑙河的地方，作为他们(在今天奥地利领土内)两个主要的军事基地。马科曼尼人和他们的夸迪人联军对罗马人的潘诺尼亚省的入侵，导致了马科曼尼之战的爆发(166—172 年和 177—180 年)。当时统治罗马的皇帝是马可·奥勒留(161—180 年在位)，战役过程中他在卡农图姆和斯洛伐克的赫龙河沿岸写下了他的《沉思录》的部分章节。不过罗马人从没有在多瑙河对岸建立永久性的立足点，斯洛伐克城市特伦钦的城堡下一块石头上的题字是其仅有的几个立足的纪念品中的一个。

## 斯拉夫人的到来

6 世纪中，新的关键历史力量在中欧的东部边界上酝酿。西罗马帝国在 5 世纪晚期的衰败和该地区日耳曼人口的减少，与希腊的拜占庭帝国兴起以及基督教的天主教(罗马)和东正教(希腊)的出现同时发生。6 世纪和 7 世纪期间斯拉夫人的迁移给这片从欧洲中东部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带来了新的居民。发源自第聂伯河对岸，斯拉夫部落迁徙进入喀尔巴阡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占据了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充足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广袤的森林以及已建立的贸易路线、道路和通行河流的利益吸引着斯拉夫人，他们在之前占领的城镇定居下来，在拓殖过程中建造简陋棚屋组成的村庄，更多依赖于和平的农业事务而不是武力行动。

22

这些新到达者称自己为“斯洛韦尼”(*Sloveňi*)，以“斯洛沃”(*Slovo*)这一单词命名。这些定居者最初由独立的部落组成，操带有不

同口音的同一种语言，渐渐地混合和吸收其他原住族群，发展为更大的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为西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此外还包括在北方安置了自己土地的波兰人。

斯拉夫人生活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定居点，耕作共有的土地，喂养作为部落财产的牲口。部落首领在村庄中行使他们的权威，在缺少任何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保持分散而公平的自治。奴隶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源在 7 世纪被采用，部落的自由成员不再履行繁重的劳作，社会的公有性质开始改变。部落体系演变为宗族体系，首领们占有土地作为他们自己宗族的财产而不是一个更大部落的公有财产。

捷克教士布拉格的科斯马斯（1054—1125 年）在他 12 世纪的《捷克编年史》中写了一个虚构的斯拉夫领袖，名叫波希穆斯（Bohemus），他领导他的人民寻找一片可以占为己有的繁荣土地。当到达奥勒河和伏尔塔瓦河之间的日普山时，波希穆斯宣布他们到达了他们命中注定的土地，“一片不受任何人管辖的土地，野兽和禽鸟成群，花蜜、蜂蜜和牛奶成河，正如你亲眼所见，空气也为生存而愉悦”。[1] 于是波希穆斯的人民占有了这片土地，根据他的名字命名为波希米亚。这个神话演变为几个世纪来捷克历史幻想的中心元素，14 世纪早期的某个时候，其他编年史者将其改写成另一个故事，一个同样是虚构人物的切赫（Czechia）成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的建立者。

到 6 世纪中期，随着来自中亚的阿瓦尔人的到来，一支新的力量兴起并控制了潘诺尼亚盆地，创建了中心地带位于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汗国。骑兵和牧民组成的阿瓦尔人掌握了对于斯拉夫人和残余的日耳曼族群——格皮德人和朗伯德人——的控制。尽管斯拉夫人具有武士素养，部落间的不统一阻止了通用语言和中央集权的形成，相应地，让斯拉夫人最初溃败于阿瓦尔人的军事力量。然而，阿瓦尔人的打击最终驱使斯拉夫人统一各部落，在 623—624 年掀起了保卫他们土地的反抗斗争。

根据弗莱德加的《法兰克人编年史》，半虚构的反抗阿瓦尔人严酷

23

统治的领袖是来自日耳曼的法兰克王国的一位名叫萨莫的商人,他建立了一个斯拉夫部落联盟来保护商人以及在汗国所及的西北部保卫斯拉夫人的土地。在萨莫(623—658 年掌权)的领导下,这个联盟发展为一个独立地区,可能包括了斯洛伐克西南地区以及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的部分地区,还可能包括波希米亚。当梅罗文加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于 631 年派遣一支法兰克军队入侵萨莫的领土时,萨莫的战士在沃加斯提斯堡的三日战斗中击溃了法兰克部队。萨莫继续统治这个帝国直到 658 年他去世为止,不过这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的早期尝试并没有在他卒后留存下来。经历了 8 世纪阿瓦尔人统治权的衰落以及通过亲属关系、婚姻关系和联姻关系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斯拉夫家族的出现之后,斯拉夫人放弃了组织性,回归了部落群聚性。

阿瓦尔人势力在 8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在与法兰克人的军事斗争中溃败而加速衰落,斯拉夫人面临着崛起于他们西部边界的强大帝国的新挑战。在 800 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了法兰克王国的日耳曼统治者的头上,并称他为“罗马皇帝”,由此希望重建西方的罗马帝国并且在教会和日耳曼统治者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查理(768—814 年在位)——史称查理曼大帝——早已通过在意大利、西班牙北部和德意志发起数次军事战役而扩张他的帝国。其中在德意志的战役给他成长中的帝国添加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在它的顶峰,加洛林王朝控制了大部分西欧和中欧地区,并且随着东部阿瓦尔人的覆灭,还掌握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波罗的海的边界。805 年,查理曼大帝的军队侵入捷克土地,由于一位重要的领袖莱赫在战斗中阵亡,捷克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一年以后,一次新的法兰克人入侵迫使捷克人接受了一种形式上的隶属关系,同意作为沿帝国边境互相依赖的斯拉夫人领土的一部分向帝国进贡。在强大的武力威逼下,摩拉维亚人也被迫屈服。

## 大摩拉维亚帝国

斯拉夫人邻近于日耳曼人的帝国,这在刺激商贸活动的同时,也推动了在斯拉夫人中传播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法兰克和爱尔兰传教士的传

教布道。由于法兰克教堂通过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与查理曼大帝关系紧密，传教活动也增强了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拉近了斯拉夫人与拉丁基督教传统的距离。 24

征服相邻的斯拉夫人的努力导致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们在 9 世纪中发动了数次入侵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军事行动。然而，查理曼大帝创建的庞大帝国却不能流传到再下一代。843 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通过签署《凡尔登条约》结束了几乎是无休止的战斗，分割了帝国，为欧洲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演变打下了基础。日耳曼的路易(843—876 年在位)获得了未来会成为德国的东部土地，并且试图通过军事力量和东部日耳曼主教辖区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宗教影响的扩张来重新建立对斯拉夫部落的控制。为了保证对东部宗教事务的控制，波希米亚被置于雷根斯堡主教的管辖范围，而摩拉维亚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帕绍主教的管辖范围。现代文献显示出 9 世纪时斯拉夫部落的发展壮大与他们居住的土地的更直接的联系，包括西部的波希米亚斯拉夫人和东部的摩拉维亚斯拉夫人以及在今天斯洛伐克的尼特拉河、赫龙河和瓦赫河沿岸生活的斯洛韦尼人。

随着阿瓦尔人的战败，西部和南部斯拉夫人的重新统一成为可能，在查理曼帝国的边界也许会出现一个大斯拉夫国家。在斯拉夫部落中长期存在着一个传统，允许自由的男性成员在集会时聚在一起，在精英战士的家族中挑选领袖(捷克语为 *kníže*，意为君主或公爵)。9 世纪和 10 世纪期间，精英家族开始模糊部落之间的界线，这一过程导致了原先独立的自治部落在单一领袖或公爵的统治下得到统一。用这样的方式，摩拉维亚公爵获得了各部落的管辖权，在军事事务上作为领主发号施令，在其统治下，摩拉瓦和尼特拉的斯拉夫公国逐渐形成。

与法兰克帝国的联系使得这些公爵发展出国家的雏形，并且通过建造石质教堂以及从意大利北部、巴伐利亚和亚得里亚海的拜占庭海岸请回牧师和修道士，巩固了成长中的基督教影响。800 年左右建造的摩拉维亚最老的教堂位于韦莱赫拉德附近的摩德拉。其中一个公国的中心位于斯洛伐克西部和中部，尼特拉城是斯洛伐克土地上最早的

25 基督教堂所在地,在 828 年由萨尔茨堡的阿达尔兰大主教祝圣。尽管依然是个异教徒,尼特拉公爵普里比纳支持在他管辖的土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

这些公爵中的首领是摩伊米尔一世(约 830—846 年在位),摩拉维亚公国的领袖,通过削弱部落间的联系以及在 831 年接受帕绍主教的洗礼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摩伊米尔随后努力在摩拉维亚人中传播基督教,在他们防御坚固的定居点中设立教堂。在摩伊米尔的领导下,摩拉维亚人扩张进入斯洛伐克西南部和尼特拉北部,在 833 年联合这两个斯拉夫公国形成大摩拉维亚帝国。

普里比纳带着仆人逃离尼特拉,并最终到达了位于雷根斯堡的日耳曼人路易的宫廷。与他的随从一起皈依基督教后,普里比纳成为法兰克诸侯,得到潘诺尼亚土地作为赏赐,他于 839 年在此处定居,在位于布拉特诺赫拉德—摩萨堡的城堡里管辖这个公国。

摩伊米尔的大摩拉维亚也成为东法兰克统治者的诸侯国,被要求照例每年进贡。然而贡品成为一个内部纷争的源头,部分尼特拉贵族的成员反对这个要求,由此造成了尼特拉和摩拉瓦公国之间的紧张状态。846 年,持续的冲突使日耳曼人路易确信要介入大摩拉维亚事务中去,他站在支持摩伊米尔的侄子尼特拉的拉斯蒂斯拉夫公爵一边,后者命令逮捕摩伊米尔并且将他逐出了帝国。

拉斯蒂斯拉夫(846—861 年在位)在日耳曼人路易的支持下就任国王,后者以为新的统治者将继续他前任的合作态度。然而一旦获得权力,拉斯蒂斯拉夫考虑到他的扩张和兼并政策,便努力在大摩拉维亚限制法拉克的政治和宗教影响。拉斯蒂斯拉夫向东部扩张帝国的版图,并且在南部建立了与保加利亚王国的边界。853—854 年,拉斯蒂斯拉夫开始卷入东法拉克王国的内部斗争,支持奥斯特马克边境伯爵拉特布罗德,反对日耳曼人路易。路易以 855 年对大摩拉维亚的入侵作出回应,企图推翻拉斯蒂斯拉夫,这个目的他没能达到,战争一直持续到 859 年。

在与法拉克人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拉斯蒂斯拉夫通过阻碍法拉克

人的传教活动,发展一种斯拉夫礼拜仪式,并且说服罗马教廷在大摩拉维亚建立超越德意志主教教区影响的教区,以此来寻求获得大摩拉维亚的宗教自治。861—862年,拉斯蒂斯拉夫要求来自罗马的援助,恳请教皇尼古拉一世派遣能够用斯拉夫语言同大摩拉维亚的人民交流的教士。当书面信件和一个罗马代表团的到来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时,拉斯蒂斯拉夫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的宫廷,寻求统治者的协助来帮助大摩拉维亚的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信奉基督教。862年,米海尔皇帝派遣了多名教士和一位主教到拉斯蒂斯拉夫的王国,由此将拜占庭的影响带入了一个日耳曼的法兰克人和罗马天主教会的西方文明早已进入的地区。教皇尼古拉一世对这一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可能是出于对一个更加独立的东法拉克——或者说日耳曼人控制的——中欧教会的顾虑。 26

## 基督教来到大摩拉维亚

863年,希腊修道士康斯坦丁(后称为西里尔)和美多德到达大摩拉维亚,与他们的追随者一起通过教授、传教活动以及将宗教著作翻译为斯拉夫语言来传播基督教。出身贵族并且是塞萨洛尼基的一位希腊军队将领的儿子,康斯坦丁和美多德兄弟由于在摩拉维亚中的工作而被尊称为"斯拉夫人的圣徒"。

与康斯坦丁一起从事传教活动并合作翻译许多著作的是他的兄弟美多德,一位教规和民法专家。美多德结合当地的习惯法和拜占庭法律的先进体系,撰写了大摩拉维亚的法典——斯拉夫民族第一本法典。西里尔和美多德的著作和译作代表着斯拉夫语言中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

为了便于将圣经和礼拜作品翻译为斯拉夫语,康斯坦丁早先发明了一种"格拉哥里"字母,使用适应于斯拉夫语言发音的希腊字符和基督教符号。这成为后人所知的古教会斯拉夫语的基础。后来的"西里尔"字母表基于拜占庭希腊字母,很有可能出自10世纪早期生活在老保加利亚王国的西里尔和美多德的学生的工作。

27

因为将当地语言引入礼拜仪式看来将希腊和拜占庭正教变为一种独特的宗教，使其在政治上优于法兰克人和罗马天主教信仰，法兰克教士反对康斯坦丁和美多德在大摩拉维亚的工作，并要求罗马教廷对他们东部邻居的国内事务进行干预。864 年，日耳曼人路易说服他的保加利亚盟友对他们的大摩拉维亚竞争对手发动战争，不过当拜占庭帝国作出反应进攻保加利亚时，结果并不是法兰克人对大摩拉维亚的胜利，而是一个和平协议，由此拉斯蒂斯拉夫通过接受来自法兰克统治者的宗主权的部分条款而更新了与法兰克人的宗主关系。

然而，拉斯蒂斯拉夫拒绝放弃在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一个分离的和独立的教区的计划。867 年，已经接受邀请向教皇尼古拉一世辩护他们的工作的康斯坦丁和美多德，离开罗马教廷，决心将他们神学院的学生祝圣为大摩拉维亚的牧师。翌年，继位尼古拉一世的教皇哈德里安二世欢迎兄弟俩回到罗马，祝圣美多德为主教，提名他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位于大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的斯拉夫主教辖区的大主教。两位教皇的主教任命了神学院学生，他们获得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主持教堂事务的许可。意识到康斯坦丁和美多德已经被邀请来公开辩解礼拜仪式中地方语言的使用，教皇仔细检查并批准了翻译版本的《圣经》及其他宗教文字，在圣母玛利亚大教堂长方形廊柱大厅的圣坛上逐字逐句地为这些作品祝圣。同时在罗马，康斯坦丁在一个希腊修道院立誓修行，并且接受了修道士的名字西里尔，不过三个月后他在那里去世。

法兰克人为大摩拉维亚得到教皇的支持所激怒，在 869 年入侵拉斯蒂斯拉夫的王国，领军的是巴伐利亚的卡洛曼——奥斯特马克的边疆伯爵和日耳曼人路易的长子。当大摩拉维亚被证实不能组织针对法兰克人攻击的有效防御时，拉斯蒂斯拉夫的侄子——尼特拉公爵斯瓦托普卢克——与卡洛曼组成了联盟，并提供帮助来抓捕他的叔叔。拉斯蒂斯拉夫被戴上镣铐押送到巴伐利亚。在日耳曼人路易的命令下受尽折磨并且被弄瞎后，拉斯蒂斯拉夫被关押在一座巴伐利亚修道院中，随后不久便死去了。

拉斯蒂斯拉夫被废黜后，美多德从罗马返回，在法兰克教士的命令

下他被抓捕并且被带到雷根斯堡的宗教会议上，日耳曼人路易在场，他被控告在不是他自己的主教辖区里行使教会权力。美多德被关押了两年半，直到教皇约翰八世干预还他以自由，并且恢复他在大摩拉维亚和潘诺尼亚的教会权力。尽管在礼拜仪式中使用本地语言仍然被禁止，只有在布道时可以使用，但美多德很有可能无视这个禁令。

28

随着对拉斯蒂斯拉夫的胜利，卡洛曼和法兰克人试图获得摩拉维亚土地的控制权，并把它们纳入法兰克人的管辖下。与此相反，斯瓦托普卢克却希望消除法兰克人在大摩拉维亚的影响，并且创建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帝国。卡洛曼在 871 年任命两个法兰克贵族——恩格尔沙尔克和威廉——管理大摩拉维亚，遭到了斯瓦托普卢克的反对，他被逮捕并送往巴伐利亚，接受违背他忠诚誓言的指控。当摩拉瓦的斯拉沃米尔领导了一场反对法兰克领主粗暴政策的叛乱时，为了帮助卡洛曼的部队镇压叛乱，斯瓦托普卢克被释放。在交战当中，斯瓦托普卢克转变了立场，与斯拉沃米尔结盟反击法兰克人。随着恩格尔沙尔克和威廉在战斗中被杀死，斯瓦托普卢克一世(871—894 年在位)在 871 年成为大摩拉维亚的新统治者。

翌年，法兰克人对斯瓦托普卢克的权力提升作出反应，发动了由日耳曼人路易派遣、萨克森和图林根军队带头的攻击。斯瓦托普卢克的军队成功地挫败了法兰克人的入侵，根据历史记载，使用的战术包括让斯拉夫妇女伏击逃跑的骑兵。874 年，斯瓦托普卢克与法兰克人缔结了《福希海姆和约》，协议要求斯拉夫统治者每年向日耳曼人路易和法兰克人进贡，作为回报法兰克人承诺放弃针对大摩拉维亚的侵略性政策。

在其后的八年和平时期里，斯瓦托普卢克不断地扩张他的版图，向北进入波兰土地，向西进入捷克土地和卢萨蒂亚—塞尔维亚，向南到了与保加利亚的共有边界。斯瓦托普卢克的兼并代表着大摩拉维亚的版图和权力在这一地区最远的扩张。

879 年，斯瓦托普卢克请求教皇的保护，旨在通过增进大摩拉维亚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来与法兰克人抗衡。一年之后，为了应付法兰

克教士关于斯拉夫礼拜仪式的异教指控，美多德带着一个代表团从大摩拉维亚出发去罗马。在罗马的时候，美多德获得了来自教皇约翰七世的保护承诺，他赐予大摩拉维亚及其统治者等同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地位。教皇还赠与美多德以教皇诏书——《你的著作》（*Industiae tuae*），这也支持了由美多德担任大主教并且掌管所有教士的大摩拉维亚独立教区在更早时间的创建。尽管福音书仍然用拉丁语朗读，教皇批准了古教会斯拉夫语的使用，其与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一起被承认为一种礼拜仪式用语。最后，教皇同意在尼特拉建立一个新的主教教区，祝圣斯瓦托普卢克提名的候选人——士瓦本修道士维金——为尼特拉主教。

29

斯瓦托普卢克对维金的支持以及他与日耳曼人路易的合作，促使尼特拉主教和美多德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然而尽管美多德威胁要把维金逐出教会，直到885年春天美多德去世之前形势并未逐步升级到严重冲突。斯瓦托普卢克写信给罗马教廷反对美多德挑选的继任者戈拉兹德，而是支持被提名暂管大摩拉维亚教会的维金。教皇拒绝承认戈拉兹德的合法地位，而同时维金当然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他向美多德的门徒发起进攻，在885年将他们驱逐出大摩拉维亚。教皇斯德望五世还禁止了在礼拜事务中使用地方语言，由此宣布了法兰克和拉丁教士在大摩拉维亚消除斯拉夫语礼拜仪式的努力取得成功。在保加利亚帝国定居以后，这对希腊兄弟的门徒们建立了教会学校并且最终从康斯坦丁的“格拉哥里”字体发展出了西里尔字母表。由于他们在斯拉夫人中的工作结果，西里尔和美多德最早在10世纪初期被敬奉为圣徒。

## 波希米亚的崛起

在波希米亚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政治和军事事务上的权力传递给了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公爵，他们借助武装随从，或者单独投靠在其所服务的公爵门下的武士团体，积聚着影响力。自由人集会在波希米亚的显赫家族之中挑选公爵。这些公爵的观点和行动通常是独立的，尽管他们也能够在某些关键时刻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比如在845

年1月,14位捷克公爵来到日耳曼人路易在雷根斯堡的宫廷,准备通过洗礼来皈依基督教。术语"领地公爵"(Duke of the Land)也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特指波希米亚领土上最初的非世袭统治者。

史书记载普舍美斯家族的博日沃伊公爵(872—889年在位)是波希米亚的首位君主,尽管关于普舍美斯王朝的起源鲜有证据存在。编年史者布拉格的科斯马斯在莉布舍公主的故事中提供了普舍美斯家族神话般的起源。莉布舍公主是克罗克的女儿和开国者波希穆斯的孙女。根据这个故事,莉布舍是一个女预言家和受爱戴的统治者及立法者,她相信她的人民在男性君主更强有力的统治下会变得更幸福。她由此预言一个代表团会找到她未来的丈夫,一个名叫普舍美斯的农夫,他正在比利纳河河岸上耕种他的土地。莉布舍还预言普舍美斯的后人会永远统治这片土地,后来还将此跟她的幻觉联系在一起,在幻觉中一个男人在靠近伏尔塔瓦河的佩特任山附近的森林中给他的房子建造了一条门道。在那个地点,她告诉她的人民,他们会修建一个定居点,名叫普拉哈(布拉格),那将会成为"整个波希米亚的门户"。科斯马斯关于莉布舍和普舍美斯的故事赋予布拉格城堡——未来公爵和国王的权力宝座——源自传说和预言的开端。而普舍美斯家族将频繁地统治波希米亚领土直到1306年,也的确是始于维舍赫拉德高原上的一座城堡。

30

当法兰克部队在872年于斯瓦托普卢克掌权后进入波希米亚,博日沃伊与其他5位波希米亚公爵合作阻止法兰克人向下伏尔塔瓦河区域进发。不过,在883年斯瓦托普卢克夺取对波希米亚领土的控制并且安置博日沃伊作为中波希米亚的从属统治者之后,波希米亚人在与东法兰克王国斗争中对大摩拉维亚的支持很快转变为服从。博日沃伊和其他捷克公爵很有可能被要求提供正式的义务报偿给他们的最高领主——斯瓦托普卢克,他授权给博日沃伊主要是因为大摩拉维亚没有多余的战士来直接统治波希米亚。斯瓦托普卢克还鼓励美多德在波希米亚进行传教工作,而正是美多德给博日沃伊公爵及其妻子卢德米拉施行洗礼——据说是在斯瓦托普卢克的宫廷里。博日沃伊负责建造波

希米亚第一座教堂，就在布拉格西北的莱维—赫拉德茨，后来又将伏尔塔瓦河附近的一座较小的教堂祝圣给圣母玛利亚。不过尽管统治者对这个新的信仰热情高涨，还是有大量博日沃伊的臣民未能脱离异教接受基督教。

在莱维—赫拉德茨牢固的山顶堡垒中，博日沃伊一世努力通过削弱异教和种族的联系，侵蚀集会的传统权威以及建立将会保持在普舍美斯王朝手中的公爵权力的世袭基础等手段，巩固普舍美斯家族在中波希米亚的权力。为了扩展君主权威而建立的一个社会和经济机构导致了农民中农奴身份的强化和来自乡村的强制税赋的积聚。中波希米亚以外的地区保留在依靠普舍美斯家族的公爵手中直到 935 年。

31

博日沃伊的儿子斯皮季赫涅夫一世(894—915 年在位)通过在今天被称为赫拉德恰尼的地方周围的石质教堂旁边树立一座土木结构城堡，促成了布拉格的建立。从 10 世纪早期开始，捷克殉道者被安葬在这个地方，最终这里成为了普舍美斯王朝统治成员的住所，并且成为一个新兴的捷克人国家在波希米亚的中心点。由沿着山顶的狭长地带建造的城墙防护，城堡坐落在伏尔塔瓦河的左岸之上，对岸是布拉格的主城区。城堡外围山脚下发展起来的定居点日后被称为马拉—斯特拉纳，即“较小的城区”或者“小城”的意思。

为了保卫他们在布拉格的权力基础，普舍美斯家族在距布拉格周围 20 英里修筑了一个坚固的圆形防御工事。这些城堡充当普舍美斯管理机构的前哨站，同时也是仿效大摩拉维亚做法的基督教会中心。然而从长远来看，没有在大摩拉维亚的最早的斯拉夫国家的存在，普舍美斯家族建立一个初生的捷克人国家的努力不会成为可能。

892 年和 893 年，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进军大摩拉维亚，并且劝说新近到来的马扎尔部落、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人加入军事行动。作为结果，阿努尔夫可能吞并了包括位于今天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公国在内的摩拉维亚地区，尽管他未能在 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战斗中完成对大摩拉维亚的彻底征服。阿努尔夫分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努力在 895 年获得了成功，当时波希米亚拒绝了大摩拉维亚的君

主权威，转而更紧密地联系阿努尔夫，他接受了波希米亚作为他的附庸国，并且达成协议在波希米亚遭到可能的入侵时出兵援救。895 年 6 月，由斯皮季赫涅夫带头的捷克公爵团正式归顺阿努尔夫国王，并且发誓效忠于法兰克统治者。

## 大摩拉维亚的覆灭

到斯瓦托普卢克于 894 年去世的时候，大摩拉维亚国家早已开始衰弱。根据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的编年史记载，斯瓦托普卢克在他的临终卧榻上警告他的三个儿子，他们继续齐心协力对大摩拉维亚的领土和权力的保持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未能听从那个警告。面对内忧外患，兄弟不和使得摩拉维亚风雨飘摇，导致斯瓦托普卢克脆弱的王国迅速地灭亡。作为一个征服的产物，并且由完全自治的斯拉夫部落和公国组成的斯瓦托普卢克的国家，缺少中央集权或者治理结构，来保证在没有他个人领导力的情况下把各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捏合在一起。

32

在斯瓦托普卢克的长子继承他成为摩伊米尔二世(894—907 年在位)之后，一场权力争斗在新国王和他的弟弟——尼特拉封地的统治者——斯瓦托普卢克二世之间展开。有了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的支持，斯瓦托普卢克二世于 895 年接着又在 897 年仓促谋反，当时阿努尔夫派遣法兰克军队协助护卫斯瓦托普卢克二世以免遭到他兄长的攻击。

一个新的威胁——马扎尔部落——随后出现。他们在遭到游牧的佩切涅格人的攻击后，于 895 年被迫从他们在黑海边的土地向西迁移进入喀尔巴阡盆地。根据传说记载，7 个马扎尔部落的首领推选阿尔帕德为第一任君主，授予他为他的人民找到新的家园的任务。寻遍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以及多瑙河与蒂萨河(Tisa，马扎尔人称为"Tisza")之间不受摩拉维亚人和日耳曼人控制的平原后，马扎尔人于 896 年翻越喀尔巴阡山，作为游牧战士定居在这个地区。他们作为马上骑兵的技巧在与不熟悉马扎尔人战场招数的新邻居的战斗中被证明是难以对

付的。在对巴拉顿公国和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之后，马扎尔人于 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沿蒂萨河的大摩拉维亚地区安顿下来，之后又占据了疏于防卫的潘诺西亚地区，并且入侵法兰克人控制的外多瑙地区，那里在 900—901 年属大摩拉维亚所有。

在这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反复战斗之后，东法兰克王国与大摩拉维亚于 901 年协商了一个和平协议，在摩伊米尔和斯瓦托普卢克之间促成了和解，巴伐利亚和大摩拉维亚合作共同对付马扎尔人，停止了大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之间持续六年之久的冲突。然而来自马扎尔人的威胁对东法兰克王国和大摩拉维亚来说并没有减少，901 年的协议使得马扎尔人转而对付摩伊米尔二世和他的帝国。摩伊米尔被迫于 902 年和 904 年迎击马扎尔人的入侵，其中在后一次冲突期间得到了来自巴伐利亚人的支持。

33

906 年，马扎尔军队进攻大摩拉维亚，在可能发生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沿岸的一次主要对抗中，摩伊米尔二世的军队遭到了重创，许多带头的摩拉维亚领主战死在沙场上。摩伊米尔自己也可能在这场战役中丧生。巴伐利亚人在随后一年追击马扎尔人，不过于 907 年 8 月 4 日在未来布拉迪斯拉发所在地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损失惨重。巴伐利亚君主在战斗中阵亡，他的继任者协商了一份和平协议以确保巴伐利亚和此后百年兴起的匈牙利王国之间的边界。

在马扎尔人手中的失败标志着大摩拉维亚作为“中欧第一个持久性的政治组织和斯拉夫人中第一个具有其本土王朝的国家”[2] 的覆灭。最后，政治和宗教冲突的汇流侵蚀了发展中的大摩拉维亚国家的根基，将中欧的斯拉夫人民带入希腊—罗马文明和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中。法兰克人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法兰克高级教士控制的宗教权威的传播，即便是得到了旨在限制东法兰克教士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自主性的教皇支持，仍然被证明是摩拉维亚统治者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历史学家弗兰西斯 · 德沃尔尼克的说法，“新生的国家屈服于日耳曼人的剑下，随后在马扎尔人的铁蹄下被踏平”。[3]

大摩拉维亚国家的残余势力在 10 世纪以有限的形式留存了一小

段时间,尽管组成地区和征服的土地早已丧失殆尽。摩拉维亚最终归入一个崛起的波希米亚的势力范围,而斯洛伐克人成为匈牙利的马扎尔王国的臣民。马扎尔的胜利和大摩拉维亚的覆灭不仅导致了斯洛伐克与捷克土地一千多年的分离,而且造成了中欧的斯拉夫人由于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原因与南方的斯拉夫人永久的隔离。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或者说强大的斯拉夫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中欧出现的任何机会,已然丧失。

## 斯洛伐克人和马扎尔人(955—1038 年)

对于马扎尔人来说,955 年在莱希菲尔德平原的大败终结了向西远至今日法国边界的突袭。马扎尔人转而在他们已经掠取的多瑙河沿岸和喀尔巴阡山西部的土地上建立永久定居点,其中包括斯洛伐克人栖息的土地。随着大摩拉维亚的衰落,马扎尔人在斯拉夫人从前的土地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国,宗族首领占据已有的城堡,通过他们的仆人行使地方权力。从前的摩拉维亚帝国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尼特拉公国,被授予作为领袖的阿尔帕德,其他地区则分给了不同宗族。与马扎尔人合作的斯拉夫贵族被授权继续控制他们的土地,从事农业的斯拉夫人被允许在马扎尔首领的监视下继续劳作。

34

除永久定居点之外,还有从宗族制度到基于地区及公国相对自治的社会和行政组织的过渡。斯拉夫人向马扎尔当权者和新兴的匈牙利国家缴纳税款,但在另一方面被允许对他们自己的事务具有部分控制力。在多瑙河北部地区和塔特拉山谷,斯洛伐克人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尽管此后这成为语言学家之间的一个争论点,即斯洛伐克语是否早在 10 到 11 世纪就已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斯拉夫语言。

“斯洛伐克”的说法是否涉及中世纪时期是有疑问的,因为它实质上产生于 18 世纪以后,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在 9 世纪期间,斯洛伐克的土地通常被称为“下摩拉维亚”,而在马扎尔人的统治下被迫成为“上匈牙利”或者“上地”。由于它被认为是一个公爵封地,“上匈牙利”传统上归为匈牙利王位继承人或者国王兄弟的管辖之下,他们会在

首都城市——拉丁语称为“波索尼乌姆”,匈牙利语称为“波佐尼”——管理这个地区。这座城市以后将被称为普雷什波罗克(斯洛伐克语)或普莱斯堡(德语)以及 1919 年以后的布拉迪斯拉发。许多匈牙利统治者会在尼特拉的斯洛伐克大主教手中接受加冕礼。

马扎尔人领土的统一始于盖萨(945? —977 年在位)——阿尔帕德的曾孙,他说服了大多数宗族首领接受他作为马扎尔大公的统一权威。那些反对盖萨集中权力的努力的人被击败,他们的土地被夺走。盖萨为了寻求与日耳曼人和平相处,还放弃了维也纳盆地,并且于 973 年派遣代表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提交主教请愿书要求在马扎尔人的领土上组织传教活动。尽管盖萨据称接受了洗礼,他却继续崇拜异教的神,把他的人民的基督教化看做是获取外国支持和消除通过萨满(Shamans)延续部落特性的祖先祭拜的一种手段。盖萨在一种欧洲方式的封建君主制度之下统一匈牙利的计划未能得到实现,直到他的儿子瓦伊克——匈牙利首位国王——掌权。

35

瓦伊克于 985 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更名为伊什特万,或称斯蒂芬,根据传说,波希米亚的圣阿达尔贝特为他施行了洗礼。斯蒂芬接受了尼特拉公国的封地,并且通过与巴伐利亚的亨利大公妹妹吉塞拉的婚姻与日耳曼人建立了血亲关系。这使得斯蒂芬成为未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的妹夫。在他的父亲死后,斯蒂芬一世(997—1038 年在位)要求教皇正式承认他为匈牙利国王,于是在 1001 年,匈牙利赢得了王冠,并且在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和皇帝奥托三世的全力支持下加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

斯蒂芬在位期间,基督教在匈牙利中心区域取得极大的进展,建立了多个教区和教会,并在埃斯泰尔戈姆设立了大主教,该市位于布达佩斯以北。盖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布达佩斯,斯蒂芬也选择在那里的城堡统治他的王国。1083 年,教会加冕匈牙利的首位国王为圣斯蒂芬。

斯蒂芬寻求建立一个中世纪意义的集权国家,将匈牙利王国的领土分封为郡(*comitats*),每个郡由一位国王挑选的伯爵(*comes*,匈牙利语 *ispán*)掌管。这个郡的所有居民直接效忠于伯爵,由他主持公道,管

理地方事务，以及征集税收、通行费和关税，其中他可以保留三分之一的收入，其余的上缴国库。在85%左右的斯洛伐克土地由国王控制的上匈牙利，尼特拉郡包括了斯洛伐克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到14世纪早期，近代的斯洛伐克土地上容纳了12个地方政府，其居民在匈牙利的统治之下。

## 普舍美斯家族统治下的波希米亚(921—999年)

随着大摩拉维亚的消失，捷克人可以相对自由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发展路线，顺便留意西边日耳曼人土地上的发展。911年，最后一位东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去世，巴伐利亚、萨克森、图林根、弗兰肯和士瓦本等独立地区的大公们忙于权利斗争，其中在弗拉季斯拉夫一世(915—921年在位)统治下，并且归附于巴伐利亚人的捷克人，选择支持巴伐利亚大公阿努尔夫，对抗萨克森人。919年，当被称为捕鸟者亨利的萨克森大公亨利一世被其他大公承认为国王，接着在两年以后赢得了阿努尔夫的支持，胜负已定。

36

当弗拉季斯拉夫于921年去世时，他的儿子瓦茨拉夫(译成拉丁语为文采斯拉斯，921—935年在位)只有13岁，还没有到掌握波希米亚大公权位的年龄，瓦茨拉夫的母亲德拉霍米拉以他的名义摄政。德拉霍米拉拒绝接受阿努尔夫支持亨利一世的声明，她与瓦茨拉夫的祖母——博日沃伊一世的妻子——卢德米拉之间产生了摩擦，后者被认为承担了养育瓦茨拉夫成为基督徒的责任。德拉霍米拉保持对儿子影响力的举动导致了与卢德米拉的公开矛盾，后者躲进特廷城堡寻求庇护，德拉霍米拉说服了两个贵族在那儿谋害了她。根据传说记载，卢德米拉被用她自己的面纱闷死。瓦茨拉夫长到18岁时，开始行使他自己执掌政权的权威，他将他敬爱的祖母的遗体转移到布拉格，在那儿由曾与她共事的牧师供奉她为圣卢德米拉。

尽管瓦茨拉夫积极地寻求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睦相处，但他对亨利一世和萨克森的过度防卫引致了东法兰克国王于929年与巴伐利亚的阿努尔夫一起发动了针对波希米亚的联合入侵。亨利的军队击败了

普舍美斯王朝的防御者，进军布拉格，在那儿瓦茨拉夫承认被击败，同意发誓效忠亨利一世，以免波希米亚落入日耳曼人的控制。瓦茨拉夫还同意进献 500 枚银币和 120 头公牛作为对国王的贡品。作为回报，瓦茨拉夫与捕鸟者亨利的王国里其他大公相同的地位得到承认，并且从萨克森迎回了圣维图斯的遗骨。瓦茨拉夫将这位 3 世纪圣人的遗物放在了一座圆形大厅里，以后就是圣维图斯大教堂，由他在布拉格城堡中修建。

作为统治者，瓦茨拉夫寻求建立一个更加统一和有组织的国家，他向那些利用摄政的时机谋取自身利益的大公们重申他的权威。10 世纪早期，波希米亚保留着一批时有不和的公国，对普舍美斯家族的忠诚度不一，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瓦茨拉夫的母亲德拉霍米拉生于一个异教家庭，后来在与弗拉季斯拉夫结婚后皈依基督教。瓦茨拉夫在卢德米拉手中以一种浓厚的基督教方式养育成人，他把信仰看做是在波希米亚领土上创建更加有序的管理组织的一个好助手。

37

与瓦茨拉夫更加谨慎的策略相反，他的弟弟波列斯拉夫认为，普舍美斯家族对各公国权力的扩张需要针对大公使用武力以及在共有的管理机构下的中央集权。一个更加统一和有效的管理机构，相应地会有利于支配资源来培养一支足以抵御邻国对波希米亚进攻的军队。瓦茨拉夫在建议策略上与波列斯拉夫的分歧，加剧了他们的兄弟之争，最终在 935 年 9 月 28 日（也可能在 929 年）纪念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的宗教节日上达到顶点，瓦茨拉夫在旧波列斯拉夫市被波列斯拉夫的三个下属谋杀。

原本是出于政治动机而对掌权大公的谋杀，迅即带上了宗教暗示，教士们正式宣布年轻的基督教卫道者为殉教者，他为了基督教信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并且随着他的死成为一些传说的圣迹的来源。10 世纪对瓦茨拉夫一生的描述，把他被波列斯拉夫及其帮凶出卖比做基督遭受的犹大和犹太人的对待。瓦茨拉夫的遗体被埋葬在圣维图斯大教堂的圆形大厅，他死后不久即被追封为圣人，由此与圣卢德米拉一起成为了捷克土地的庇护圣人。瓦茨拉夫和卢德米拉的成就，以及他们最

终成为圣徒的结果,“给予普舍美斯家族神授的力量,保证捷克国家的基督教合法性”。[4]

瓦茨拉夫之死和大公波列斯拉夫一世(残忍的波列斯拉夫,935—972 年在位)标志着普舍美斯家族统治下捷克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的结束,以及一个完全改变的新时代的开端。到了波列斯拉夫的时代,将世袭的普舍美斯王朝寄托在小股武装随从和保卫自身半独立状态的公爵身上,以此作为执行权威和募集税赋的有效方式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波列斯拉夫建立一支数千名战士组成的由普舍美斯统治者控制的“大卫队”的目标,亟须单单由波希米亚中部地区无法提供的经济资源。只有动用全波希米亚的资源才能允许“大卫队”和国家管理机构的发展;不过这反过来又必须限制半独立的公国,代之以普舍美斯家族对波希米亚领土的全面掌控。

为了推进一个统一国家的创建,波列斯拉夫击败了诸多波希米亚的公爵,其中不少把他们的命运押宝在捕鸟者亨利的继承人——奥托一世(奥托大帝)的身上。波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带有教堂的城堡网络,由大公侍从的成员主管,他们支配地方资源并且管理税赋的征集。城堡以及常驻其中的教士和地方长官一起,允许了普舍美斯统治者控制范围的扩张、基督教的传播以及一个更具扩张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立。所有自由人必须缴纳的治安税的采用,在一个更加扩大化的和地方性的基础上为波希米亚事务的君主管理提供了财政支持。作为对这第一例国税缴纳的回报,自由人获得了他们君主的保护。

38

10 世纪前半叶,从西欧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到东方的商业中心基辅,再往前到下伏尔加河的哈扎尔、中东和中国的主要东西方贸易路线逐渐北移。这条有利可图的路线从多瑙河沿岸往北改道至布拉格,结果它经由雷根斯堡、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克拉科夫穿过中欧。由于穿梭在这条生机勃勃的商业网络的商人必须缴出他们货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作为保护费,波列斯拉夫寻求通过对诸如奴隶、锡器和毛皮的出口支持,增长他对这个获利颇丰的收入来源的享用权。波列斯拉夫还引入铸造模仿巴伐利亚硬币风格的最初的第纳里,并且鼓励包

括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的外国商人参与到当地商业活动中。

借助来自贸易和征税的稳定收入来源，波列斯拉夫有能力满足他建立一支“大卫队”的目标，这支卫队由几千名武装战士组成，旨在保护普舍美斯家族的利益，以及协助吞并新的地区来作为更多收入和资源的来源。950 年，随着波列斯拉夫通过对奥托一世的效忠誓言而使双方的封建关系得到更新，终结了他与萨克森统治者延续 14 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波列斯拉夫接受他作为奥托封臣的角色，取决于他要保留军事力量用于针对邻近的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小波兰的扩张战役的策略。从新地区攫取的贡品和战利品对维护新的武装侍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波希米亚现有边界内已经不能汲取足够的资源了。

955 年 8 月 10 日，波列斯拉夫和他的“大卫队”参加了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击退马扎尔人入侵的决定性的莱希菲尔德之战，战场位于奥格斯堡以南。千余名捷克骑兵参与了莱希河沿岸的战斗。在莱希菲尔德吃了败仗之后，马扎尔军队的残部转攻波希米亚，在那儿他们被波列斯拉夫的战士击败。962 年，教皇约翰十二世赐予奥托皇帝冠冕，这一事件标志着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波希米亚成为帝国领土之一，尽管皇帝从未掌控那里的土地或者在捷克领土上行使直接的权威。

39

在保卫摩拉维亚不受更远的马扎尔人的入侵后，波列斯拉夫发动了旨在吞并上西里西亚和马沃波尔斯卡(小波兰)的战役。出于对北方不断增长的波兰势力的担忧，波列斯拉夫商定了他女儿杜布拉芙卡与波兰皮亚斯特大公梅什科一世的联姻。梅什科随即在婚后一年皈依基督教，由此将波兰与基督教西方连在一起。到波列斯拉夫在位的后期，普舍美斯王朝的征服已经将从摩拉维亚北部和斯洛伐克部分地区到克拉科夫以及更东面的布格河和基辅罗斯边界的新地区吞入波希米亚王国。

在波列斯拉夫于 972 年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成为波列斯拉夫二世(虔诚的波列斯拉夫，972—999 年在位)。即位波希米亚大公后不久，波列斯拉夫二世说服教皇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一个波希米亚主教辖区，成功地将波希米亚从位于雷根斯堡的德意志教士的直接权威之下分

离。借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的支持，布拉格的教区被置于美因茨大主教的权威之下。波列斯拉夫和他的妹妹姆拉达还劝说罗马教廷于 973 年在王宫附近建立了圣乔治女修道院，这是波希米亚的第一座女修道院。姆拉达后来成为这座本笃会女修道院的首位院长，而圣乔治的长方形廊柱大厅成为了膜拜圣卢德米拉的中心。

尽管雷根斯堡的教士权威在布拉格被削减了，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萨克森人蒂特马尔(杰特马尔)被任命为布拉格主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在更低的级别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波希米亚教士中会包含外国人，日耳曼人和其他非捷克人直到 11 世纪中叶还在教会高级职位中占支配地位。这种外国影响，同捷克教士在国外接受教育一起，有助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捷克土地上更广泛的传播，也推动了本土知识阶层的成长。

982 年，一位波希米亚本地人接受了圣职成为第二任布拉格主教。沃伊捷赫是波希米亚东部斯拉夫尼克宗族的一员，献身后得名阿达尔贝特，他后来完成了波希米亚改宗基督教，并且支持教士被任命获得世俗管理机构的职位，这比较接近在日耳曼人土地上演进的制度。历史上记载，阿达尔贝特(沃伊捷赫)使得马扎尔人的瓦伊克大公(后来的圣斯蒂芬)改信基督教，由此促成了匈牙利王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

40

由于他的本笃改革主义以及对他教区里挥之不去的异教影响感到沮丧，沃伊捷赫花了大量时间待在波希米亚以外。他于 988 年离开去了罗马，直到四年后波列斯拉夫二世注意到关于他的主教缺席的频繁抱怨，才把他召唤回国。在国外的时候，沃伊捷赫定居在罗马，有时陪伴着年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然而，沃伊捷赫与普舍美斯家族的头号竞争对手斯拉夫尼克宗族的血亲关系，使他在布拉格处于危险的状态中。主教于 994 年离开波希米亚，这很有可能救了他的命，因为一年之后，波列斯拉夫命令他的随从在利比采的斯拉夫尼克城堡屠杀了所有沃伊捷赫最亲近的家庭成员。沃伊捷赫直到去世都留在国外，致力于传教活动，扩大基督教在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中的影响。

沃伊捷赫完成了匈牙利的改宗，并且由于之前也曾表达过将基督

教带给波罗的海的普鲁士人的愿望,他于 997 年开始着手一项使命,代表教皇去改宗普鲁士人。在由波兰的勇敢者波列斯瓦夫派遣的军队的陪同下,沃伊捷赫到达了波罗的海之滨,在那儿他殉道而死在普鲁士人手下。999 年,在他早年的挚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的支持下,他被追封为圣人。波列斯瓦夫用相同重量的黄金买下了这位主教的遗体后,将遗骨带到格涅兹诺并且竖立了一座教堂。奥托于 1000 年完成了一次到波兰首都的沃伊捷赫坟墓的朝圣。在波列斯瓦夫的支持下,奥托成功地使沃伊捷赫被封为圣阿达尔贝特,后来成为波兰的庇护圣人。直到 1039 年布热季斯拉夫一世入侵波兰,沃伊捷赫的遗体才回到布拉格,并在赫拉德恰尼重新安葬。

**注释:**

1 Cosmas of Prague, *The Chronicle of the Czechs*, trans. and ed. Lisa Wolvert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9), 35 - 36.

2 Vladimir Budrin, "Great Moravia: Slovak History in its Formative Stages" in *Reflections on Slovak History*, ed. Stanislav J. Kirschbaum and Anne R. C. Roman (Toronto: World Slovak Congress, 1982), 5.

3 Francis Dvornik,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4.

4 Hugh Agnew,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4), 13.

# 第三章　中世纪晚期

## 11 和 12 世纪的波希米亚

在 999 年波希米亚大公波列斯拉夫二世去世后的几年里，伴随着他的儿子们对统治权争论不休，一场权力斗争接踵而至。这场王朝争端导致了一段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尤以波希米亚卷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和波兰的波列斯瓦夫一世(勇敢者波列斯瓦夫)之间的长期争斗为标志。波列斯拉夫二世的长子继位成为波列斯拉夫三世(红衣波列斯拉夫，999—1002 年在位)，直到强悍的弗尔绍夫齐家族在 1002 年挑起叛乱将他赶到了德意志。勇敢者波列斯瓦夫用他嗜酒如命的堂弟弗拉迪沃伊(1002—1003 年在位)取代了波列斯拉夫三世，于是，一个波兰人成为了波希米亚公爵，直到他一年之后去世。

1003 年 2 月，红衣波列斯拉夫在波兰的波列斯瓦夫一世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波希米亚的控制权，作为结果，波列斯拉夫的兄弟和竞争对手——普舍美斯家族的公爵亚罗米尔和奥尔德日赫——被驱逐出了王国。波列斯拉夫三世紧接着就由于在维舍赫拉德向主要的弗尔绍夫齐贵族下令进行四旬大屠杀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幸存的贵族向波兰统治者请求援助，波列斯瓦夫一世邀请红衣波列斯拉夫到他的城堡，把他弄瞎并且在随后 30 年一直关押在那儿，直到 1037 年他死去为止。波

兰统治者——普舍美斯家族杜布拉芙卡的儿子——进军布拉格，自立为波希米亚君主，作为波列斯拉夫四世(1003—1004 年在位)统治了仅一年多，其间占领了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地区。波列斯瓦夫把波希米亚和波兰地区统一在同一个统治者之下的企图，遭到了德意志统治者亨利三世的强力阻挠，其转而支持亚罗米尔和奥尔德日赫，使其继波列斯拉夫四世之后，在 1004—1034 年间轮流统治波希米亚。

奥尔德日赫的儿子——布热季斯拉夫一世(1035—1055 年在位)——通过巩固波希米亚对摩拉维亚的控制，以及联合波兰和波希米亚的领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试图稳定波希米亚作为一个地区性力量的地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布热季斯拉夫在他父亲在位期间入侵了匈牙利，为的是重新夺取摩拉维亚东部地区以及限制伊什特万一世统治下的马扎尔王国的扩张。最终，他未能将东部领土并吞入波希米亚，这导致了未来的斯洛伐克领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与捷克领土分离并处于匈牙利人的控制之下。

八年之后，即 1039 年，布热季斯拉夫对大小波兰发起攻击，为的是重新夺回曾经丢失给波兰人的地区。布热季斯拉夫攻下了波茨南，并且在格涅兹诺成功地发起了进攻，获得了阿达尔贝特遗骸的所有权，这样圣人的遗体就可以返回布拉格。在回师的过程中，布热季斯拉夫公爵夺取了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弗罗茨瓦城。

不过在 1041 年，亨利三世的德意志军队成功地攻入波希米亚，包围了布拉格，迫使布热季斯拉夫接受了波希米亚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封地的地位，并且放弃所有为摩拉维亚保留的地区的所有权，这对捷克王位非常重要，原因是其具有作为授予统治者家族及其随从人员中的成员的赏赐的价值。由于君主继位仍然取决于波希米亚权贵阶层对新统治者的推举，布热季斯拉夫想要回避长子继承权的法律和贵族的选举权，他的办法是通过让普舍美斯家族中年长的公爵获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统一地区的君权，而年轻的普舍美斯家族成员统治摩拉维亚的独立地区。

在弗拉季斯拉夫二世(1061—1092 年在位)统治时期，由于弗拉季

斯拉夫加冕为捷克领土上首位国王，波希米亚赢得了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对弗拉季斯拉夫在平息撒克逊人叛乱和针对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中协助的报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普舍美斯公爵“波希米亚和波兰国王”的称号，尽管只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期限内。



在弗拉季斯拉夫死后，他的儿子布热季斯拉夫二世(1092—1100年在位)和弗拉迪斯拉夫(1110—1118 年和 1120—1225 年在位)先后继位，然而布热季斯拉夫的统治以悲剧结尾。布热季斯拉夫二世希望执行布热季斯拉夫一世的计划，消除权贵阶层在推选统治者中的作用，不过领头的家族利用普舍美斯家族内部的争斗来保卫他们的权力和权威。1100 年 12 月 22 日，布热季斯拉夫二世借宿在布拉格城外兹贝奇诺的猎人小屋时，被他的敌人谋杀。

弗拉迪斯拉夫的弟弟索别斯拉夫一世(1125—1140 年在位)的当政，为普舍美斯家族之间持续不断的王朝斗争带来了内部稳定和缓解，尽管索别斯拉夫对王位并没有合法的拥有权。德意志国王洛泰尔试图在 1126 年通过入侵波希米亚推举他自己的候选人，不过索别斯拉夫在赫卢梅茨的战场上打败了日耳曼人。根据一本捷克编年史的说法，有个索别斯拉夫的战士宣称看见圣瓦茨拉夫穿着白色长袍，骑着他的白马，在战斗中加入到捷克人中，对付他们来自西部的老对手。由于被捷克人击败，洛泰尔把波希米亚作为封地授予索别斯拉夫，由此为他的地位以及使他对波希米亚权贵阶层的权威合法化提供了支持。[1]

## 趋向捷克民族特性

前面已经提到，捷克民族特性的萌芽始现于赫卢梅茨大捷的记录中，同样还出现在当代的编年史中。出自大公随从和显赫家族的封建贵族阶层的出现，与捷克语言起源和本土圣人崇拜在时间上重叠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将用基督教保卫祖国和文化领域——口头和书面——的发展连接在一起。圣瓦茨拉夫的狂热崇拜成功地将这位殉道的公爵塑造成一个民族象征，他被尊奉为上帝选择的捷克人领袖和他在人间的代表。作为结果，圣瓦茨拉夫在赫卢梅茨战场上出现的传说，

将在捷克骑士们心中唤起强烈的自豪感,与他们的庇护圣人一起对抗好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保卫家乡的土地。

在1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圣瓦茨拉夫(文采斯拉斯)最初的传奇故事出现在古斯拉夫语中,随后在波列斯拉夫二世在位期间出现了新的传说,起先使用古斯拉夫语,然后是拉丁语。持续几个世纪的一种传统说法声称在某个大危机的时刻,瓦茨拉夫会回来召集一大批沉睡在布拉尼克山下的骑士。对本土庇护圣人的尊敬在某一时期使民族情绪高涨,与此同时,也见证了古捷克语作为一种语言从古教会斯拉夫语中独立出来。斯拉夫语的传统在写于11世纪初期的捷克圣歌《主啊,宽恕我们吧》(*Hospidine, pomiluj ny*)中有所反映,不过圣歌本身是用捷克语言创作的早期文学作品的代表。



## 迈向波希米亚王国(1140—1310年)

作为索别斯拉夫一世的继承人,他的侄子弗拉迪斯拉夫二世(1140—1172年在位)受益于处在上升阶段的贵族阶级的选举支持,他们把他看做是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傀儡。然而,新君主面临着来自普舍美斯同族和摩拉维亚的兹诺伊莫、奥洛莫乌茨和布尔诺的地方公爵对他权力的早期挑战。摩拉维亚人在维索卡打败了弗拉迪斯拉夫,接着包围了布拉格,不过在奥洛莫乌茨主教的帮助下,弗拉迪斯拉夫得到了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首位君主康拉德三世的援兵。康拉德在弗拉迪斯拉夫的护卫下进入波希米亚,战斗趋向结束,此后弗拉迪斯拉夫重新获得了对摩拉维亚关键地区的控制。

1147年,弗拉迪斯拉夫跟随康拉德一起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只走到君士坦丁堡就返回了他的祖国。然而,他与康拉德的侄子和继承人——腓特烈一世——的联盟对捷克人产生了可观的回报。腓特烈·巴巴罗萨在1152年加冕为德意志国王,并在三年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卷入了与教皇的主教叙任权以及对意大利北部富有城市的控制权之争。弗拉迪斯拉夫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站在腓特烈一边,还率领波希米亚军队前往意大利,在那儿他们作为腓特烈盟友的军

事努力非常成功，尤其是在围困米兰期间。在腓特烈的支持下，弗拉迪斯拉夫于是在1158年成为第二位被加冕的波希米亚国王，尽管跟以前一样，王位不能传递给继承人。

带着建立世袭王位的目标，弗拉迪斯拉夫在1172年自动退位，以此来保证他的儿子贝德日赫（腓特烈）不会成为继承权选举过程的受害者。然而，贝德日赫只掌权了很短的时间，就由于腓特烈·巴巴罗萨和波希米亚权贵的反对而在1173年被废黜，他们拒绝这位新统治者是基于他并非通过选举而即位。为了在波希米亚事务上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腓特烈·巴巴罗萨正式宣布摩拉维亚为独立的侯爵领地，并将这个地区作为封地赐予普舍美斯家族的敌对支系康拉德·奥托。对于捷克人来说，由短暂的公爵统治和频繁经受帝国干预的王朝斗争所造成的政局动荡成为了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标记。



在康拉德·奥托一世作为波希米亚君主（1189—1191年在位）的短暂统治期间，捷克人通过1189年公爵法令的方式接受了他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然而，康拉德·奥托未能达成他统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领土的目标，到了1193年，随着普舍美斯·鄂图卡的崛起，权力又一次回到了普舍美斯家族的主系手中。普舍美斯·鄂图卡于1198年在美因茨加冕，成功地重新建立了王权，由此促进了中世纪的捷克国家向一个新等级的权力和影响力发展。从此以后，波希米亚将由国王代替传统的公爵进行统治。

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正式承认普舍美斯·鄂图卡的君主统治，并且教会通过追封圣普罗科匹厄斯引出了另一位捷克圣人——曾经的萨扎瓦的斯拉夫修道院院长，据称他于11世纪强行驱逐了日耳曼修道士。随着教皇与皇帝之间持续不断地摩擦，期间还夹杂着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王朝斗争，普舍美斯·鄂图卡有可能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的弱势，促使一个摆脱帝国权威的独立波希米亚王国的建立。然而，波希米亚国王却选择保留在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秉承着互相提供支持的策略作为对特许权的报答。

奥塔卡尔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波希米亚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地

位。1212年，年轻的霍亨斯陶芬国王和未来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颁布了《西西里金玺诏书》，承认波希米亚王位的世袭状态，并且声明只有通过波希米亚人自己推选或接受的国王才会得到皇帝的承认。诏书规定了波希米亚国王在帝国内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统治者的义务，不过也使国王摆脱了帝国的委派，通过应用长子继承权原则在继位过程中削弱了权贵的选举权力，这跟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情况是一样的。波希米亚国王被任命为神圣罗马帝国七名选举人之一，拥有选举罗马人国王的共有职责，这反映了波希米亚君主在帝国内不断增长的声望。

普舍美斯·鄂图卡的儿子和继承人——瓦茨拉夫一世（1230—1253年在位）奉行与帝国之间建设性的关系，他与腓特烈二世紧密联系，并且与士瓦本菲利普大公的女儿昆胡塔·什陶夫斯卡（库内贡德·霍亨斯陶芬）结婚。然而，瓦茨拉夫对奥地利的图谋成为了摩擦的根源，当时最后一位奥地利巴本堡公爵之死开启了对奥地利领土的竞争。在10世纪后半叶，巴本堡家族被封为侯爵领地，在1156年升级为公爵领地，其封地位于日耳曼人的帝国东部边远地区。巴本堡家族居住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在这里他们统治的这片公爵领地被称为“东部王国”（*Ostarrichi*），他们的领土将会被称为奥地利（德语中称为*Österreich*）。



瓦茨拉夫在位早期，波希米亚面临着巴本堡公爵腓特烈二世（好争吵的腓特烈）统治下的奥地利的入侵威胁，他计划以邻近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匈牙利为代价扩张他的土地。腓特烈二世于1246年在同匈牙利的边境冲突中战死，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导致巴本堡家族世系终结，公爵继承权引发了争端。

1248年，瓦茨拉夫面临他自己的儿子奥塔卡尔领导的起义，后者在1248年7月至1249年11月短暂登上了王座，直到被他的父亲关进监狱。镇压了起义之后，瓦茨拉夫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奥地利，并于1251年入侵了这片公爵领地。瓦茨拉夫释放了他的儿子奥塔卡尔，最初宣布其为摩拉维亚侯爵，随后在贵族阶层的支持下使他当选为奥地利公爵。为了使继承权得到认可，瓦茨拉夫于1252年安排了奥塔卡尔

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联姻,她是巴本堡家族世系的女性成员,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妹妹,尽管他们两人年龄相差 20 岁。

瓦茨拉夫死于 1253 年 9 月,奥塔卡尔登基波希米亚王位,成为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1253—1278 年在位),从 1253 年到 1334 年,普舍美斯·鄂图卡和他的继承人们掌握着波希米亚国王和摩拉维亚侯爵两个头衔。作为波希米亚的统治者,被称为"金铁国王"的普舍美斯·鄂图卡奉行扩张主义的政策,目标是建立一个从北方波罗的海延伸到南方亚得里亚海的王国。在 13 世纪 50 年代中期,普舍美斯·鄂图卡加入日耳曼和波兰骑士对抗异教的普鲁士及其他波罗的海民族的十字军,其后又试图向南进入阿尔卑斯地区的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尼鄂拉。他吞并所有巴本堡家族领土的策略中包括了赢得这个地区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支持,并且作出承诺用稳定的领导终结多年的不稳定局面,还有割让施蒂利亚给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波希米亚人于 1260 年在克莱森布伦击败了匈牙利人,普舍美斯·鄂图卡取得了施蒂利亚的控制权,接着他结束与玛格丽特的婚姻,娶了贝拉的孙女库尼贡德,以此巩固了和平。1269 年,普舍美斯·鄂图卡继承了卡林西亚和卡尼鄂拉的领土,由此把他的王国扩展到从西里西亚远至亚得里亚海的疆域。



随着对匈牙利人的另一场胜利以及皇帝影响力的衰退,普舍美斯·鄂图卡成为帝国内最有权力的统治者候选人,并且表明了对皇位的野心。然而,波希米亚国王未能获得皇位,德意志的君主们转而于 1273 年选择了对丢失给捷克人的土地有企图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普舍美斯·鄂图卡还面临着来自奥地利贵族不断增长的反对情绪,他们于 1276 年发动起义。随后的一年,捷克贵族复制了起义,这次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国王试图利用王室城镇和修道院来扩张其在他们的土地上的权力。在终结了国内的叛乱后,普舍美斯·鄂图卡寄望于一场对鲁道夫及其联盟的决定性战役,那将会使他重新获得最近在奥地利丢失的领土,作为对鲁道夫支持那里发生的叛乱的回击。

1278 年 8 月 26 日,普舍美斯·鄂图卡在进军维也纳的途中,在摩拉瓦河滨的杜恩克鲁特遭遇挫败。普舍美斯·鄂图卡的军队与鲁道夫

及其同盟的部队英勇作战，不过当三个小时的战斗让身背沉重盔甲的捷克骑士精疲力竭时，奥地利和匈牙利骑兵从他们侧翼发起的一次突袭打垮了波希米亚人，迫使他们撤退。尽管成功地扭转了战局，但这样的突然袭击违背了战争中正面进攻的骑士精神准则。普舍美斯·鄂图卡忠实于他的骑士精神价值观，拒绝屈服，战死沙场。

随着鲁道夫击败了捷克人，他获得了奥地利和施蒂利亚的控制权，为哈布斯堡家族在多瑙河地区掌握支配权开辟了道路。鲁道夫采取了一种慎重的方式处理波希米亚问题，他与丧偶的库尼贡德协商，允许她的儿子瓦茨拉夫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依据这个契约，勃兰登堡的奥托将充当摄政人，而年轻的继承人将与鲁道夫的一个女儿订婚。随着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领导下赢得的领土的丧失，以及代表鲁道夫管理摩拉维亚的人的委派，捷克的君主权逐渐被削弱，王室领土落入了摄政人和波希米亚贵族阶层成员的手中。

1283 年，12 岁的瓦茨拉夫二世（1278—1305 年在位）回到波希米亚，此前他一直被奥托监禁在不同的地方。最高级别的贵族和教士阶层的成员逼迫奥托送回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还成功地说服鲁道夫撤出摩拉维亚。瓦茨拉夫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朱迪特的婚姻左右了他的决定，使他避免与哈布斯堡家族直接冲突，转而窥视北方的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波兰贵族把克拉科夫割让给他，他随后于 1300 年在格涅兹诺登上波兰王位。

48

到了瓦茨拉夫的时代，发生在波希米亚的经济变化使得统治者有可能获得独立的收入来源，将王室权力从一些早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王室收入源自关税、王室地产以及国王建立的王室城镇和修道院，再加上从采矿和铸币中赢得的丰厚利润，尤其是 13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伊赫拉瓦以及 80 年代在库特纳—霍拉发现银矿之后。后者经历了迅速的扩张，并且成为王室铸币的中心。

1298 年，瓦茨拉夫二世安排他儿子瓦茨拉夫与匈牙利统治者安德烈三世的女儿伊丽莎白订婚。当阿尔帕德王朝随着安德烈之死而于 1301 年终结时，瓦茨拉夫利用他的家庭关系索求匈牙利王位，接受了

匈牙利支持者交出的王位并赐予他的儿子。同年 8 月,瓦茨拉夫的儿子加冕为拉迪斯拉斯五世(拉斯洛)。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的王权第一次得到统一。直到 1304 年,由于遭到教皇、皇帝还有来自主要的匈牙利人的反对,瓦茨拉夫二世把他的儿子从匈牙利调离。

瓦茨拉夫三世(1305—1306 年在位)放弃了他对匈牙利王位的要求,并且短暂地成为波希米亚国王,随后他在按计划前往波兰确保王位的旅行中,在奥洛莫乌茨被刺杀。由于瓦茨拉夫婚后无嗣,普舍美斯王朝的男性世系由于瓦茨拉夫被谋杀而中断。

哈布斯堡家族随后努力控制波希米亚王位,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鲁道夫一世(1306—1307 年在位)短暂继位,他的父亲还安排他与瓦茨拉夫的遗孀——波兰的埃莉什卡·雷伊奇卡(伊丽莎白·里切扎)——联姻。为了在策略上战胜权力竞争者卡林西亚的亨利,阿尔布雷希特占领了布拉格,并且安置他的儿子登上波希米亚王位。鲁道夫于 1307 年死于痢疾,而且没有留下继承人,而阿尔布雷希特一年后被他的侄子谋杀。卡林西亚的亨利——瓦茨拉夫三世的妹夫——被推选为国王,掌握王位直到 1310 年,当时波希米亚的贵族和高级教士在新的日耳曼君主卢森堡的亨利四世的协助下向亨利发起攻击。亨利安排了他的儿子约翰与瓦茨拉夫三世的妹妹埃莉什卡(伊丽莎白)·普舍美斯洛芙纳的婚姻,并与波希米亚的精英集团商量准予约翰王位。1310 年,约翰领导了一场针对亨利的运动,并且成功地罢免了他,为自己争得了王位,建立了一个属于卢森堡家族的新的波希米亚统治王朝,它将统治捷克领土直到 1437 年。



## 卢森堡家族统治下的波希米亚

出生在巴黎并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卢森堡的约翰(扬·卢岑布尔斯基,1310—1346 年在位)同时还是卢森堡的伯爵和波兰名义上的国王。约翰不能说他捷克臣民的语言,并且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法国和卢森堡,或者在欧洲各地旅行。他相当精通于法国和德国事务,不

过却对被一个在影响政治事务的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中赢得自信的捷克贵族阶层当作是外国人感到恼怒。约翰获得王位后不久就肯定了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位，不过他对提升卢森堡家族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的影响力的专注，以及他对布拉格市民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努力的支持，最终导致贵族阶层反过来对抗他。

鉴于在他即位初期颁布的《帝国公文》中的条款，约翰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协商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方案允许约翰居住在卢森堡并且实行特别税，对此的回报是贵族阶层得到在极少遭到王室干预的情况下管理捷克土地的权力。约翰认可了贵族的传统权力和特权，重申了贵族在王朝缺少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推选君主的权力，保留了贵族阶层在国外战争中为了国王的利益是否采取武装行动的选择自由——不过如果发生来自边界外的威胁，他们仍然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卫捷克领土。这个折中方案对王室权力施加了一些约束，包括贵族阶层提出的外国人不能代替捷克人担当要职的要求。约翰违背了这个协议，出于他对捷克事务的无把握而任命了外国官员，不过捷克贵族阶层中被激怒的成员迫使国王于 1315 年将他的日耳曼朝臣赶出了王国。

在约翰在位期间，他将王室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了贵族阶层的高等级成员以换取现金收入，这进一步削弱了约翰作为国王的权威，其中一项政策将大量王室地产和城堡从国王的手中移走。支持他的国际活动的更进一步财政资源来自城镇，这些城镇获得了国王授予的商业和管理特权，作为回报它们支援国库成为其资金储备的常规来源。

1316 年，约翰的儿子查理出生在布拉格并被取名为瓦茨拉夫，不过后来被改为查理，即他的叔叔法国的查理四世和伟大的查理曼大帝之名。七年之后，他被送到他叔叔在法国的王室宫廷，在那儿他与瓦卢瓦家族的布朗歇结婚。不过 1333 年在意大利，查理收到了捷克贵族要求他返回波希米亚的请求，以免王室权力的进一步削弱。约翰授予他儿子摩拉维亚侯爵，这是王位继承人的传统头衔，为的是树立查理作为捷克事务管理者的合法性。然而，当查理到达波希米亚的时候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没有父母和兄弟的陪伴，而且发现王室资产的实际状况相

50

当糟糕。回到波希米亚后不久，查理努力收复失去的王室地产，并且寻求领头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支持。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查理，早已丢失了用捷克语交流的能力，不过不久就重新学会了这门语言。

在 1336 年对立陶宛的一次讨伐中，约翰由于缺乏医疗条件而双目失明，由此被称为瞎子约翰。在随后的那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导致约翰成为法国腓力六世抵御英国人的盟友。查理去法国驰援他的父亲，不过约翰于 1346 年 8 月 26 日在克雷西会战中阵亡，查理也受了伤。

在他的前任法国宫廷教师教皇克雷芒六世的帮助下，查理以计谋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于 1346 年 6 月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七位推侯中有五位支持他。路易于 1347 年去世避免了冲突的可能性，查理在他的妻子瓦卢瓦家族的布朗歇去世后与皇帝的女儿安娜结婚。查理于父亲在克雷西过世后继位，他于 1347 年接受了波希米亚王位，通过他的行动和策略，开启了捷克历史的一段黄金时期。

## 查理四世的全盛时期(1347—1378 年)

作为波希米亚的国王，查理四世(卡雷尔四世，1347—1378 年在位)被证明是一位专注的、有才能的和务实的统治者。查理积极地接纳了捷克土地上的斯拉夫传统，宣称自己由于母亲的血统属于普舍美斯统治者的古老家族。有时，查理也把自己归于大摩拉维亚的继承人。

查理打算用他的加冕典礼来加强卢森堡王朝世系与普舍美斯王朝保留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从布拉格城堡到维舍赫拉德的加冕典礼夜步行游行。维舍赫拉德从 12 世纪索别斯拉夫一世在位期间起就再也没有成为王室权力的圣座。加冕典礼在 1347 年 9 月举行，包括合唱《主啊，宽恕我们吧》和授予根据查理的愿望修改过的王冠，反映了普舍美斯家族和法国王冠的影响，以及对波希米亚的庇护圣人圣瓦茨拉夫的献礼。

51

1349 年，查理第二次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不过这次是由所有

当值的选侯一致通过。六年以后的 1355 年,查理前往罗马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成为查理四世,德语中称为卡尔四世。意大利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恳请查理在他的领土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人的帝国,不过查理选择聚焦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和波希米亚事务上。加冕后不久,查理立即着手达成两个短期目标:通过分配特权给同盟来巩固他们的支持,以及确定波希米亚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布拉格当时成为了帝国的首都。翌年,查理在纽伦堡颁布了他的《金玺诏书》,为帝国疆域内一个独立的和自治的波希米亚王国设立了法定基础,制定了皇帝选举的多数票决制度,并且确认了波希米亚国王作为七名担当选侯的君主和主教之一的永久的和显著的地位。自从 12 世纪早期起,波希米亚的公爵和国王就已经拥有了帝国斟酒者的头衔。

受到查理自己使用多种语言的激励,1356 年的宪章要求君主选举者的儿子从 7 岁起就接受德语、意大利语和捷克语的教育。在查理四世的统治下,拉丁语在宫廷里被广泛使用,德语也非常普遍,而捷克语随着 1370 年第一份捷克语官方文件的出现,进入了管理和法律领域。宫廷的多国文化特性反映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作为代表文化的语言的出现上,后者尤其成为崭露头角的人文主义的语言。主要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诸如彼特拉克和科拉・迪里恩佐,作为查理四世的熟人前往了布拉格。

查理四世推动了捷克语言的使用,部分是由于他对他的斯拉夫遗产的浓厚兴趣。不过,查理也懂得捷克语言在定义贵族阶层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贵族与王国政治和行政制度的联系中的重要性。通过鼓励在宫廷用语中使用捷克语,查理寻求借助贵族的支持来增强他的王朝权威,这些贵族之前将捷克语言与他们反对以本土贵族统治阶级为代价增强君主权力联系在一起。



前任统治者执行的长子继承制消除了贵族阶层在推选国王中的作用,不过卢森堡的约翰确保了贵族们在高层官员和法律事务执行中的存在和影响力。在 14 世纪 50 年代,查理提议编纂法典,目的是增强君

52

主各方面的权力，不过来自贵族阶层的反对导致《查理法典》于 1355 年被废除。政治关系更多地保持原有的状态，贵族们保有宫廷中的要职，不过查理四世的政策是，通过选择受过教育的牧师担任行政官员以及富裕的市民阶层成员担任侍从和铸币厂主来抵消贵族在国家和王室事务中的作用。

在查理四世在位期间，波希米亚的中世纪王国达到了它空前的国际影响和繁荣。作为帝国的首都，布拉格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中心，有大约 4 万名居民受益于皇帝对商业和外交的强烈兴趣。波希米亚躲过了从 1347 年到 1350 年间黑死病的蹂躏，而且诸如相对稀疏的战事等因素将导致到世纪末的一段人口增长期。然而，饥荒的蔓延引发了沿贸易路线的骚乱以及欧洲其余地方的商业崩溃。在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波希米亚的国际贸易依赖于原材料、银币和铸币的出口以及葡萄酒、香料、盐、水果、鱼和上层社会及教士的奢侈品的进口。

布拉格作为皇帝住所的地位，使得这座城市受益于查理对建筑、城市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兴趣。在查理于 1344 年说服教皇克雷芒六世将布拉格从主教辖区升级为大主教辖区后不久，一座位于布拉格城堡周围空地的、献给圣维图斯的新天主教堂开始修建。布拉格城堡周围地区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了赫拉德恰尼城堡市镇。

为了使用当时流行的哥特式风格整修城堡和教堂，查理雇佣了声名显赫的外国建筑大师，比如从阿维尼翁被带到布拉格的法国建筑师阿拉斯的马蒂亚斯，还有德国大师格明德的泥瓦匠彼得・帕尔莱勒。查理想要用世界上最精致的小教堂向王国的庇护圣人致敬，结果造就了装饰极其华丽的圣瓦茨拉夫小教堂，在圣维图斯大教堂里圣人长眠之处上方修建，装饰着精美的壁画和宝石。

53

彼得・帕尔莱勒在阿拉斯的马蒂亚斯于 1352 年去世后担起了完成建造教堂的职责，后来担任了旧城(斯塔雷—梅斯托)的蒂恩前圣母玛利亚教堂和横跨伏尔塔瓦河的一座建有哥特式塔楼的长石桥的建造者。长桥后来被命名为查理大桥(卡尔卢夫—莫斯特)，桥结构连接旧城和马拉—斯特拉纳——布拉格城堡基部的“小城”。帕尔莱勒也是新

城(诺韦一梅斯托)的首席设计师,新城于 1348 年建立,源于一个创造性的城市规划,在中央旧城的南部和东部的城墙之外创建一个由宽阔大街和广场构成的城区。由于吸引了商人和工匠,新城成为了布拉格的繁华区域,并且发展出自己的强大的城市贵族阶级。

其他主要的建筑计划包括维舍赫拉德的整修和围绕所有布拉格城镇的城墙,城墙有七座城门和横跨伏尔塔瓦河连接不同城区的大桥。查理授命在布拉格城外 22 英里的山顶上建造卡尔什泰恩教堂,还亲自参与督建和内部空间的装饰。在 1365 年完成了圣十字小教堂的献祭仪式之后,卡尔什泰恩成为了圣骨以及捷克和帝国加冕礼宝石的存放地。

作为教育和文化的拥护者,查理四世于 1348 年实现了在布拉格开设一所大学的梦想——到了现代将被称为查理大学*,以此向它的王室庇护人致敬。受到诸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的索邦神学院等主要大学的影响,布拉格大学吸引全欧洲的学生,并且成为了有高度影响力的中欧事务的知识中心。在财政上由波希米亚国家支持,并且由布拉格大主教担当校长负责主持,大学的校徽上刻有圣瓦茨拉夫的头像,并且与那些主要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一样接纳全体教师。在监督许多王室城镇中没有修道士或者不由教会掌管的那些学校方面,布拉格大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查理鼓励捷克人留意意大利和法国,激励学生们离开波希米亚去博洛尼亚、巴黎以及在牛津和剑桥的英国大学学习。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法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也意味着文化和知识事务在传到布拉格之前不再通过德国土地的过滤。最后的普舍美斯家族的宫廷文化可以与在英格兰、法国和那不勒斯的那些相比拟,查理四世保持了这个传统。宫廷的成员通过委托画家、插图画家和雕塑家创作作品来支持艺术,其中肖像包含了财富和权力的特殊诉求。在布拉格大学里的意大利艺术家和学者向侍臣引介在文艺复兴早期出现在意大利富

54

* 即布拉格大学,全称为布拉格查理大学。——译者注

裕城邦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且帮助布拉格成为中欧的早期人文主义中心。

作为波希米亚的统治者,查理四世的外交策略专注于建立一个占有领土面积与其在帝国内地位相称的王国。此外,查理希望把他的王国从中欧扩张到莱茵河、卢森堡以及法国的边界。查理更多地选择通过外交和联姻带来机会而不是以冲突或者战争来对欧洲事态施加波希米亚的影响。为了这个目标,查理开启了与哈布斯堡王朝、波兰和匈牙利国王的谈判,确立他领土的边界,消除冲突的潜在源头。

在瓦卢瓦的布朗歇于 1348 年去世之后,查理经历了另外三次婚姻,每段婚姻都带来了领土收获。通过他第三任妻子亨利二世公爵的继承人希维德尼察的安娜的家庭关系,查理得以进驻西里西亚最后一个独立公国。这段婚姻还带来了一个孩子——瓦茨拉夫,他使查理改变了传位给他的弟弟摩拉维亚侯爵扬·因德日赫(约翰·亨利)的计划。安娜死后,查理娶了波兰国王卡齐米日的孙女以及可能的波兰王位继承人波美拉尼亚的伊丽莎白。然而卡齐米日死后不久,波兰王位传给了匈牙利国王伟大的路易,他当时没有自己的继承人。

查理四世认识到卢森堡王朝的崛起改变了欧洲关系,有可能产生敌对和冲突,他寻求与教皇的联盟,那将需要教皇接受查理的外交政策。有关阿维尼翁教皇的危机提供给波希米亚统治者一个通过推动教廷回归罗马而赢得教皇支持的机会,这样教皇可以摆脱法国人的直接影响,并且被迫接受来自查理四世的保护。这一被称为"巴比伦囚禁"的时期,始于 1305 年法国人教皇克雷芒五世的选举,以及他留在阿维尼翁不前往罗马的决定。

1370 年,查理从维特斯巴赫选侯勃兰登堡侯爵奥托五世手中买下了下卢萨蒂亚的帝国土地,把这个地区并入紧邻上卢萨蒂亚的波希米亚国土,那里早已由他的父亲吞并。到了 1373 年,奥托似乎要退出旨在扶植查理四世的儿子成为勃兰登堡侯爵继承人的协议。不过,查理拒绝了武力解决办法,而是为他的儿子们——齐克门德(西吉斯孟)和扬(约翰)——买下了勃兰登堡,并且承认这个地区作为波希米亚王国

55

领地的特殊地位。对勃兰登堡的吞并使查理获得了柏林城,还有第二位帝国选侯——勃兰登堡侯爵——的选票。

为了澄清波希米亚和皇帝的继承权,以及在他的儿子中间安排王室领地的分配,查理让他的长子于1363年加冕波希米亚国王,当时瓦茨拉夫只有两岁。14年之后,查理安排选举使瓦茨拉夫成为罗马国王,他继承的地区包括波希米亚、德意志的部分地区、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并且拥有整个波希米亚王室领地的王室权力。第二个儿子西吉斯孟获得了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地区,而第三个儿子扬得到了上卢萨蒂亚和勃兰登堡的一部分。扬·因德日赫的儿子约什特和普罗科普,将作为波希米亚王权控制下的封地持有者,统治整个摩拉维亚。

查理四世于1378年11月在布拉格去世,并且被葬在那里成为"祖国之父",一个他死后不久即获得的称号。作为他的政策及领土扩张的结果,卢森堡王朝成为14世纪末欧洲最强势的王朝,王朝拥有的土地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从匈牙利直至法国边界。不过随着查理四世之死,他的儿子瓦茨拉夫四世(1378—1419年在位)作为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与他父亲主政的黄金年代截然不同。

## 波希米亚的女性和文化

由于宗教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修道院和受过教育的教士,中世纪对于有写作欲望的女性来说不是一个多产的时期。这当中肯定有一些例外,比如13世纪时布拉格的阿格尼斯(圣阿格尼斯),她是克拉雷安贫会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的院长,用拉丁语跟教皇和阿西西的克拉雷通信。不过,女性文学很可能必须依赖教徒和教士对男性作家的赞助,令其为女性读者创作作品。

56

女性对艺术和文学赞助的传统,到15世纪末催生了几位著名的和有影响力的捐助人。中世纪时期最重要的女性赞助人可能是波希米亚的库尼贡德(1265—1321年)。她是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和王后库尼贡德的女儿,布拉格圣乔治女修道院的院长,她提供捐助给作家和插

图画家，同时在她的图书馆里建立了庞大的图书收藏。

埃莉什卡(伊丽莎白)·雷伊奇卡(1288—1335 年)是普舍美斯王朝倒数第二个统治者瓦茨拉夫二世的遗孀，在卢森堡的约翰在位期间，她在布尔诺建立了自己的宫廷。除了创建一个比布拉格的卢森堡家族更加辉煌的宫廷之外，埃莉什卡开设了一间手稿间，为她投资的西多会女修道院委托创作精美的插图手稿。

查理四世的波希米亚被描绘为一个有活力的和世界性的社会，其中文学、建筑和艺术由于宫廷和贵族的公开支持而盛行一时。在这种环境中，上层社会的女性通过她们对艺术品的投资赢得注意和尊重。然而，15 和 16 世纪的宗教斗争将会消除适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取代它的是一个女性被期望回归基于信仰和家庭的传统角色的社会。[2]

## 查理四世之后的卢森堡王朝

17 岁登上王位的瓦茨拉夫看来缺少他父亲的政治敏感，他选择不再继续利用教士抵消贵族阶层政治影响力的政策：作为结果，王室权力衰落，国王在抵抗挑战和维持秩序方面很少取得成功。1393 年，瓦茨拉夫与布拉格大主教关于国王在波希米亚西部建立新教区的计划所引发的争端，导致了大主教的代理主教波穆克的扬的殉难，他被国王下令从一座石桥上扔入伏尔塔瓦河。1792 年，教会追封被谋杀的主教为内波穆克的圣约翰。

1380 年，大饥荒的到来减少了波希米亚 15%的人口，并且导致银矿开采和贸易遭到重大破坏，同时地主们被迫与剩余农民协商更有利于后者的新合约义务，也造成了前者收入的减少。衰退的状况引发了广泛的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批评，教会由于腐化的指控、“巴比伦囚禁”和“大分裂”(导致最初是两个，后来是三个敌对教皇的选举)而分裂，这同样引发了不满情绪。

14 世纪晚期，欧洲见证了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这是宗教不容异说、对犹太人兴旺的不满以及对祭祀杀牲和犹太人引发黑死病暴发的指控的结果。波希米亚大屠杀有时候提供给市民和贵族消



57

除债务证据或其他财务责任的机会。在布拉格，查理四世为了安抚对他试图通过《查理法典》增加王室权力的努力而愤怒的贵族阶层成员，容忍了对犹太社区的攻击。瓦茨拉夫四世在位期间，布拉格教士的成员们通过散布犹太人亵渎和侮辱主人的指控，煽动反犹太情绪。1389年4月18日，愤怒和不满爆发导致对布拉格犹太社区的公开大屠杀，犹太人社区的建筑被点燃，数百人被谋杀，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被强逼受洗礼皈依基督教。

到了瓦茨拉夫四世在位末期，波希米亚成为了一个高人口密度的国家，有接近200万居民，超过100个大城市，以及数倍于此的较小规模的市镇。人口增长和土地开拓造成了对有用土地的更大需求，只有小片保留下来的森林覆盖在最早的定居点区域。其中大约30%—40%的区域属于教会，它创建了遍及全国的超过2 084个教区的体系，包括大量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

事态发展到顶点时，不断累积的问题和对其无能的指控导致瓦茨拉夫于1394年被贵族们关入监狱，其后在1402年又被他的弟弟西吉斯孟监禁，尽管通过协商卢森堡家族内部的矛盾得以终止。瓦茨拉夫在作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这个岗位上进展得也不怎么样，他于1400年被罢免，并且遭遇了“反国王”的选举。1410年，瓦茨拉夫放弃对罗马王位的请求，传给了他的侄子摩拉维亚的约什特，其短暂即位至1411年去世为止。王位随后传给了瓦茨拉夫的弟弟西吉斯孟，他早在1387年已经登上匈牙利王位。瓦茨拉夫于1419年死后不久，西吉斯孟成为了波希米亚名义上的国王，不过国内冲突和宗教战争使得捷克人17年之后才接受他为国王，由此于1436年统一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权。

58

## 斯蒂芬一世之后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1038—1437年)

匈牙利的事态在圣斯蒂芬一世于1038年去世后发展得更加复杂，这是由于阿尔帕德王朝并没有确定王位继承的规则。王朝斗争迅即产生，而且日耳曼人试图对匈牙利的王位继承施加影响，从而导致斯蒂芬死后数十年间的军事斗争。持续不断的内部争端和外部干预的潜在可

能引发了一种制度的实行,即由王室议会批准新的统治者。1077 年,贵族们行使这项权利,挑选了拉迪斯拉斯一世(拉斯洛,1077—1095 年在位),绕开了继位过程中的第一位王位申请人。

拉迪斯拉斯继续巩固由他的前任传下的匈牙利国家,推进法律体系的发展,倡议刑法的编纂,引入了对犯罪行为的特殊和严厉的惩罚。尼特拉境内一个新的主教辖区成为第一个完全在斯洛伐克领土内的辖区,而第二个位于亚格尔(埃格尔),服务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征服克罗地亚王国使拉迪斯拉斯赢得了克罗地亚的王位,让他扩张匈牙利的疆域,在一个个人的联盟下统一了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出于对他的成就和坚定信仰的认可,罗马天主教会于 1192 年追封拉迪斯拉斯为圣人。

到了贝拉三世(1173—1196 年在位)在位时期,匈牙利的中世纪君主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允许国王有与法国和英国国王相同的收入。不过贵族阶层的强劲影响依旧存在,1222 年,安德烈二世(1205—1235 年在位)被迫发布了《金玺诏书》——一份与 1215 年英国大宪章类似的文件。出于对国王转让王室土地给支持他的权贵的愤怒,次等的贵族们迫使国王讲和,接受一个有关封建权利的宣言。《金玺诏书》要求匈牙利君主免除贵族阶层和教士所有形式的税赋,指派宫廷大臣负责管理议会,并且接受贵族和教士对王室违反法律和宪法的行为的阻止,而且不会受到叛国罪的追究。这份宪章对王室权力施加了限制,并且对所有贵族阶层在权利和特权上公平对待。

在安德烈二世的儿子——贝拉四世(1235—1270 年在位)在位期间,蒙古人于 1241 年到来,灾难降临阿尔帕德王国。贝拉未能守住他王国的东部边境,这些游牧战士横扫了匈牙利的城镇和乡村,于 1241 年 4 月在穆希之战中击败了贝拉的军队。蒙古骑兵进攻了斯洛伐克的西南地区以及东部低地区域。1242 年春天,窝阔台可汗死后,蒙古人撤兵回家,结束了入侵。与瘟疫和食物短缺联系在一起,蒙古人入侵导致匈牙利人口减少了 20%到 40%,造成很多人口聚居地荒无人烟。



尽管经济不断发展,但由于贝拉四世守卫王国的失败,匈牙利君

主的权力还是被严重地削弱了。王朝的危机接连发生，1272 年王位传给了拉迪斯拉斯四世，当时他只有 10 岁，并于 1290 年被行刺身亡。君主权力式微的首要受益者是上层封建集团的成员，他们开始在这个王国内部施加他们自己的影响，大贵族和高级教士继续享有极大的权威，次等的贵族阶层通过他们对郡的掌管支配着地区性事务。作为结果，这一时期见证了五六个大贵族家族的兴起，其中包括特伦钦的察克家族，其借助不稳定的政治形势使自己受益。

1301 年，安德烈三世(1290—1301 年在位)逝世，阿尔帕德王朝的男性世系也随之终结。王室权力早已屈服于诸如马特乌·察克(匈牙利语是马加什·恰克，斯洛伐克语是马图什·恰克这样的大权贵)，其控制着这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安德烈死后不久，一些贵族选择将王位交给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家族，尽管法国的昂热万家族通过安茹的查理二世与斯蒂芬五世的女儿玛丽娅早先的联姻要求得到匈牙利的王位。马特乌·察克选择支持波希米亚的瓦茨拉夫，后者作为拉迪斯拉斯五世从 1301 年至 1305 年统治匈牙利，不过随后决定放弃匈牙利王位，在他父亲死后作为瓦茨拉夫三世统治波希米亚。

当巴伐利亚的奥托提出统治匈牙利的要求时，已经从拉迪斯拉斯手里夺走土地和影响力的察克转而支持昂热万的王位索求者查理·罗贝尔。出于恢复秩序的努力，权贵们同意把王位交给查理·罗贝尔，尽管最有权力的贵族中的某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昂热万家族的候选人。查理·罗贝尔接受王位成为查理一世(1308—1342 年在位)不久，察克受王国中三位封建领主之一委派，掌管上匈牙利，一个大致相当于今日斯洛伐克的地区。

到了 1311 年夏天，马特乌·察克转而反对国王，并且对首都布达进行围攻。查理成功地保卫了他的首都，并且在一年之后的罗兹豪诺夫采(罗兹格尼)之战中，击败了察克和他的新盟友——东斯洛伐克最强大的阿马代家族——的联军。察克停止了对抗国王的军事行动，他获得了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的支持，于 1314 年向摩拉维亚发动进攻。马特乌·察克自封为“瓦赫河与塔特拉斯山之主”，继续从他在特伦钦

60

的城堡里统治斯洛伐克；不过察克于1321年去世时没有继承人，他的土地为国王查理·罗贝尔所有。

由于马特乌·察克在上匈牙利当权，并且雇佣了大量斯洛伐克军人和官员，一些斯洛伐克历史学者曾经以斯洛伐克口头文化中"特伦钦的马特乌"(Matias Trenciansky)的称颂为证，推崇察克为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然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察克仅仅是一个马扎尔贵族，他使用来自主要斯洛伐克家族的可利用的资源和盟助，来支持他自己的封建权力和政治目的。

14和15世纪期间，由于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和瘟疫，匈牙利王国经历了一段和平和经济增长时期，伴随而来的还有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这有利于斯洛伐克的新采矿移民，他们开采某些欧洲最多产的矿藏，为这个王国提供银、铜、铁和黄金。矿业的重要性和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使得国王邀请日耳曼移民定居在矿业城镇，并以封建体系下的法律和经济特权作为回报。

这段经济发展时期促进了上匈牙利的贸易，使得斯洛伐克地区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区域。贸易渠道从布拉迪斯拉发伸展到欧洲其余部分，同时科希策、莱沃恰、特尔纳瓦、日利纳、巴尔代约夫和普雷绍夫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引进盐、手工艺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出口诸如葡萄酒、马匹、牲畜和其他原材料。

当斯洛伐克人与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一起生活时，这个民族开始发展出一种身份感，不过在城镇中，日耳曼人在城镇议会中不成比例的代表席位导致其与在城市事务上要求公正和平等发言权的斯洛伐克市民产生摩擦。路易一世(1342—1382年在位)当权期间，为了缓和不断激化的民族紧张状态，国王颁布了王室文件——《斯洛伐克人的特权》(*Privilegium pro Slavis*，1381年)，授予斯洛伐克人和日耳曼人在日利纳城市议会中平等的地位，并且宣布市长职位将在两个民族群体之间轮换。双语制也在一些斯洛伐克城镇和城市成为官方政策。

61

在路易一世在位期间的相对平静后，短短五年内三位统治者占据了匈牙利王位，导致政局不稳。他们中最后一位是卢森堡家族的西吉

斯孟(1387—1437 年在位),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的儿子和路易一世的女儿安茹的玛丽的丈夫。西吉斯孟和玛丽在路易一世将匈牙利的统治权传给女儿后结婚。1387 年,西吉斯孟密谋为自己赢得了王位,不过也面临着来自匈牙利贵族阶层、波兰雅盖隆王朝以及路易一世的侄子都拉佐和那不勒斯的查理等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在西吉斯孟能够对这个王国实现全面控制之前,斗争多年持续不断。

**注释:**

1 对于中世纪晚期在波希米亚的捷克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性质的综合分析,参见:Lisa Wolverton, *Hastening toward Prague: 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Medieval Czech Land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2 参见:John Klassen, *Warring Maidens, Captive Wives, and Hussite Queens: Women and Men at War and at Peace in Fifteenth Century Bohem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Alfred Thomas, *Anne's Bohemia: Czec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310 -14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第四章　宗教争论和军事冲突（15—18 世纪）

63

到了 12 世纪末，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改革开始席卷波希米亚。异教在捷克土地上的出现时间可能与当时定居在波希米亚的日耳曼移民中瓦勒度派的到来相一致。瓦勒度派是彼得·瓦勒度的追随者，他是来自里昂的一位商人和漫游传教士，由于传布自愿贫穷的理念并将《圣经》翻译为平民的语言而激怒了教会要员。

由于与“巴比伦囚禁”相关的问题持续不断，以及腐化在教会所有等级中的渗透，对宗教改革的支持在波希米亚逐渐增强。查理四世在位期间，波希米亚教士的成员加入了托钵传教士和宗教作家对改革的呼吁，并获得了皇帝的默许，他邀请激进派的传教士访问布拉格，并且向布拉格大主教改革主义者帕尔杜比采的阿尔诺什特给予鼓励。然而，查理与许多统治者一样，干着买卖圣职的勾当，鉴于王室或贵族对教会管理的介入所造成的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这成为了改革者的一个目标。查理和改革者的其他重要争论点包括赎罪券以及 1378 年教会分裂之后和巴比伦囚禁期间由多个教皇而导致的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有一段时期曾出现两个敌对的教皇，甚至同时有三个。

64

为了达成通过改革拯救教会的目标，查理四世寻求通过在城市和乡村社区鼓励福音布道来根除腐化行为。被邀请到帝国首都的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派传教士中就有来自奥地利的康拉德·瓦尔德豪泽，一位

奥古斯丁教团教士,他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提恩教堂用德语布道,反响热烈。瓦尔德豪泽公开指责许多教士道德败坏,怒斥买卖圣职的行为和与圣物相关的欺诈行为。

在皇帝支持的传教士中第二位有权威的人物是前多明我会教士,克罗梅日什的扬·米利奇。这位具有煽动性的摩拉维亚人甘于贫穷,并且作为瓦尔德豪泽的接班人传布福音。他警告他的会众天启即将来临,还在1369年指责查理四世无异于反基督者。米利奇还挑战社会等级制度,传布平均主义的信条,承认从君主到农夫的每个人在上帝眼中平等的地位。

《圣经》被翻译为捷克语为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改革者带来了便利,同样有利的条件还有1391年由捷克改革派教士创建的伯利恒礼拜堂。伯利恒礼拜堂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可以容纳3 000名听众。而这些教士和信徒听到的布道更多使用的是捷克语而不是拉丁语。

14世纪末,英国宗教改革者和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的作品流传到了波希米亚,并且有助于改变宗教争论的性质。在他于1384年去世之前,威克里夫被教会权威宣布为异教徒,主要理由包括他挑战教会官员和教士的权威、批评教会的财富以及宣布《圣经》是天赐法律的真实来源,还有反对教皇和高级教会官员对上帝口令的解释。威克里夫推动了本地方言在宗教机构中的使用,并且促进了《圣经》被翻译 65 为普通大众的语言。为此,威克里夫于1382年完成了一个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威克里夫的后继者——自称为罗拉德派——要求宗教文本使用英语并且对那些他们认为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公正发起挑战。

当威克里夫的作品出现在布拉格时,在布拉格大学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该校按照学生的民族划分为四个派别:波希米亚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波希米亚学生的教师主要是捷克人,而其他学生的教师通常是日耳曼人。1403年,这所大学提议,就是否对威克里夫的作品包含严重的理论错误而发起谴责进行投票。当三个外籍学生群体投票支持谴责而与捷克人意见相左时,学校内部的宗教和

民族情绪开始高涨。

在布拉格大学的冲突不断升级的同时，瓦茨拉夫四世也在努力促使罗马天主教会在比萨召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多个敌对教皇的问题。瓦茨拉夫希冀获得对他成为罗马国王企图的支持，不过大学里的三个外籍学生群体投票反对在比萨的协商会议。1409 年，瓦茨拉夫以《库特纳—霍拉法令》作为回击，法令将三个外籍学生群体的选票减少为一张共有选票，同时赋予捷克学生群体三张选票。由这条法令引发的一个结果是外国教师和学生离开去了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另一个结果则是布拉格大学转变为波希米亚宗教改革的中心。

## 扬・胡斯

在《库特纳—霍拉法令》引发变革后不久，布拉格大学的一位捷克学生的主要发言人——扬・胡斯(1370—1415 年)——接受了校长的职务，监管学校的学术性事务。胡斯出生在波希米亚南部农村，他在担当教职并成为广受欢迎的讲师之前，就已经在学校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他曾被任命为牧师，不过 14 世纪宗教研究家的影响使他转向改革并与伯利恒礼拜堂建立联系，1402 年起他在那儿与其他改革主义者一起布道。胡斯成为了索菲娅王后的告解神父，她经常到访礼拜堂，聆听他的布道。

作为一位改革者，胡斯被威克里夫的作品吸引，尤其是他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摒弃，以及当个人与作为教会真实首脑的基督保持着直接精神联系时神职人员是多余的这一信念。对灵魂的拯救并不通过仪式或者教会法令达成，而是通过对《圣经》和基督的教诲的严格遵守。这继而使得《圣经》和其他圣典必需翻译为捷克语——波希米亚信徒的语言。

66

尽管胡斯把国王瓦茨拉夫和王后索菲娅算在他的支持者之内，他对教会的批评把他引入了与布拉格大主教兹比涅克・扎伊茨的争论，此人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未经允许的地点布道，并且赢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支持来对抗胡斯和国王。1410 年，这位大主教下令公

开焚烧威克里夫的作品，随后开除了胡斯的教籍，理由是他为威克里夫的思想辩护和拒绝停止在伯利恒礼拜堂的活动。胡斯挑战性地在大学组织了一次反对大主教行动的抗议，并且向梵蒂冈发起了申诉，不过罗马教皇法院宣布胡斯为异教徒，重申了将其逐出教会的法令。

由于瓦茨拉夫四世从波希米亚的赎罪券交易中收获了经济利益，他允许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代表从事活动，作为替教皇的军事活动收敛资金的一种方式。胡斯对赎罪券的批评因此妨碍了国王的利益，尤其是在 1412 年 7 月大批学生在布拉格游行反对赎罪券并且表达对胡斯的支持之后。这批学生由来自布拉格的教师耶罗尼姆(杰罗姆)领导，他是扬・胡斯的朋友，并且被认为是将威克里夫的作品带到捷克土地上的人，那是在他拜访了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和王后波希米亚的安妮之后。

当国王下令处决三位满师学徒，作为对他们在教堂毫无顾忌地宣扬反对有关赎罪券的圣旨的报复，胡斯的运动收获了最初的殉道者。教会分裂时期的敌对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威胁停止布拉格的教权，这将会戒绝对信徒的圣礼，并且宣判他们永恒的灵魂有罪。1412 年 10 月，胡斯出于安全考虑离开首都去了波希米亚南部，在那儿他可以继续布道并在当地贵族阶层的保护下写作。在这一时期，胡斯对现代捷克语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拼写进行了标准化，并且引入了变音符，在字母和语音之间创建了清晰的连接。

波希米亚南部很快成为了胡斯信徒运动的中心区域，随着胡斯的追随者在比尔森、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和扎泰茨建立起关键中心，运动迅速遍及整个王国的王室城镇。胡斯的支持者赢得了大约三分之一城镇市政厅的控制权，这使得胡斯信徒改革者得以施加行政影响来支持不同城市地区的宗教改革。

67

1414 年，瓦茨拉夫四世的弟弟——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利用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影响，召集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期终止敌对教皇的分裂时期。教士们从欧洲各地到达瑞士城市康斯坦茨，到了 1418 年，随着马丁五世的当选，分裂结束了。然而，西吉斯孟还把大批

聚集的著名教士视作一个机会,通过邀请扬·胡斯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演讲并且当面对质对他的指控,设法解决胡斯信徒的“异教徒”问题。

收到来自皇帝的传唤和安全承诺后不久,胡斯出发前往康斯坦茨。他于1414年10月到达那里,皇帝随即违背了豁免的允诺,下令逮捕了他,并且在随后的整个冬天都将其关在城堡里,手脚上了镣铐,没有衣物御寒。当胡斯最终被准许公开审判,直面放弃他的异教立场的要求时,他拒绝放弃他的信仰,或者承认他的作品包含宗教错误。他反而宣称背叛他的良心——即使是在一个教会宗教会议面前——将会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孽,使他永恒的灵魂遭到谴责。记载下来的胡斯最后的话语包括,他声明自己对于许多有关他布道内容的指控来说是清白的,还宣布他很高兴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1415年7月6日,扬·胡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的骨灰被撒进莱茵河,永远不能回到他的波希米亚故土。5个世纪之后,1915年7月6日,布拉格市在旧城广场竖立起扬·胡斯的雕像,以此来纪念一位民族英雄之死。

在胡斯被处死后的几年间,他的胡斯教徒支持者从布拉格以及王国其他地方的教堂里驱逐效忠教皇派,并在此过程中夺取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在布拉格大学,领导的教师是来自斯特日布罗的亚考贝克,他发起了规定两种形式圣餐礼——面包和葡萄酒——的实践,尽管胡斯并没有推动这一圣礼的改革,他在他死前对此给予认可。由于准许普通信徒获得葡萄酒所具有的重要性,圣餐杯成为胡斯信徒运动的象征,而圣餐以两种形式(*sub utraque specie*)的分发,使得“圣杯派”(Utraquist)成为温和的胡斯信徒派别的标签。

在1418年完成其使命之前,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再次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希米亚的异教问题上,谴责以两种形式向普通信徒提供圣餐的实践。翌年,西吉斯孟要求他的哥哥瓦茨拉夫镇压胡斯信徒激进分子,否则就会由于庇护异教运动而面临针对波希米亚的讨伐威胁。尽管赞同胡斯信徒的原则,瓦茨拉夫还是指派了胡斯信徒的对手进入布拉格新城市政会,并且让忠于罗马的教士回到布拉格和其他城市地区的教

68

堂里。胡斯信徒失去了他们的教堂,作为回应,他们在露天场地举行仪式,通常在他们以圣经名字命名的山顶上。1419 年 7 月,在塔博尔的这样一个山顶上聚集了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地的激进派改革主义者,由此胡斯信徒运动开始在统一性和力量上得到增长。

## 胡斯革命

1419 年 7 月 30 日,一位名叫扬・热利夫斯基的激进派传教士领导了一次针对布拉格新城市政厅的进攻,释放了关押在那里的胡斯信徒。热利夫斯基的支持者将 11 名敌对议员扔出窗外(第一次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处死他们,随后安置胡斯信徒在他们的位置上。在此后的三天里,布拉格的群众冲击了各所教堂和修道院,破坏了说德语的市民的住所,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离开了布拉格。

卢森堡的西吉斯孟于 1419 年被推选上波希米亚的王位,由此点燃了革命的火花,导致他只在 1436 年至 1437 年直接控制这个王国。由于他在扬・胡斯的审判和处决中起的重要作用,波希米亚的贵族反对西吉斯孟加冕为他们的国王,并且发起了有关宗教自由和民族权利的长达 17 年之久的斗争。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胡斯主义表现为十字架和圣餐杯之间的圣战"。[1] 然而,由于胡斯信徒成员内部的分裂,以及日耳曼贵族参与到这场通常被看做是捷克民族运动的革命中,形势变得复杂化了。胡斯信徒从早期开始就依据地理和学理的分界被区分,温和派系接受胡斯的教义,同时他们主张并且最终被证实更愿意寻求妥协立场,而不是承受长期的冲突并使波希米亚成为在欧洲不受欢迎的王国。温和派几乎包括了所有最高层的贵族胡斯信徒、他们在次等贵族阶层中的盟友以及许多布拉格旧城的市民。相比之下,激进派寻求比原计划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吸收社会公理的元素进入他们的目标和要求。由于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动机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激进派在乡村和波希米亚东部及北部某些城镇最为活跃。在布拉格,持续不断的摩擦存在于更加激进的新城市民和由斯特日布罗的亚考贝克及扬・罗基察纳领导下

69

占优势地位的旧城温和派胡斯信徒之间。

在波希米亚南部城镇塔博尔,激进的塔博尔派信徒建立了一个加固营地,最初是由农民和工匠组成的平等主义社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作为胡斯信徒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塔博尔派拒绝教会权威,效仿早期的基督徒信奉《圣经》作为他们信仰的来源,并且实行财产的集体所有化。塔博尔迅速成为了地区性武装联盟的主要部分,自愿与波希米亚北部的激进派城市合作,保卫他们的信仰。

皇帝西吉斯孟对波希米亚事态发展的回应是,于 1420 年 3 月与在位教皇协作,发起对胡斯信徒异教徒的讨伐。结果,捷克贵族阶层公开指责西吉斯孟是波希米亚王国人民的敌人,转而抵制皇帝在布拉格接受波希米亚的王位。贵族们随后于 5 月在布拉格大教堂集会,通过了一项胡斯信徒共同计划,名为"布拉格四条"。这些条款要求布道的自由、教士和普通信徒以两种形式领圣餐的自由、征收教会财产和消除教会的世俗权力,以及为了取悦塔博尔派和其他激进派而由世俗权力机构惩罚罪犯。

当由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法国士兵组成的西吉斯孟讨伐军于 1420 年 5 月到达布拉格时,布拉格各镇的胡斯信徒请求来自塔博尔派及其盟友的军事协助,以应对围攻城镇的西吉斯孟的军队对维特卡(今天的日兹科夫)山顶的胡斯信徒守军的进攻。在一位波希米亚南部次等贵族成员——来自特洛茨诺瓦的扬·日兹卡——的率领下,超过 3 000 名塔博尔派兄弟姐妹作为援军抵达并且帮助解除围攻。西吉斯孟夺取这座城市的计划失败了,他撤兵并放弃了第一次对胡斯信徒的讨伐。然而,在离开布拉格之前,西吉斯孟在布拉格城堡的圣维图斯教堂仓促安排了一场加冕仪式,保证他以国王的身份离开波希米亚。

在随后的 14 年里,胡斯信徒又面对了四次以波希米亚回到天主教欧洲怀抱为目标的讨伐。胡斯信徒的武装力量由日兹卡领导,他以前是一名雇佣军,瞎了一只眼睛,早已通过率领农民军队使用由农具改造的兵器投入战斗证明了他的能力。为了能够抵挡封建骑兵的进攻,日

70

兹卡依靠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农民步兵，他们由宗教热情和对宗教自由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及生活条件的改善的信仰驱使。胡斯信徒唱着战争圣歌《所有上帝的战士》(*Ktož sú boži bojovníci*)行军进入战场，通常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削弱了敌人的斗志。胡斯信徒军队还依赖于一些军事创新，比如使用火药的捷克榴弹炮，以及能够被用来形成防卫路障的重型战车。

这一时期，胡斯信徒夺取教会土地和财产，进攻修道院，对真正的和名义上的敌人采取行动，王国事务的管理权随之落到了地方贵族的手中。暴力在被认为是反对胡斯信徒的城镇和乡村里宣泄，说德语的居民被杀死或者赶出他们的家园。王国的犹太居民也成为宗教冲突的受害者，许多人被宣布为异教徒或者胡斯信徒的盟友。1426 年，摩拉维亚侯爵提议将所有犹太人从王室城镇伊赫拉瓦赶走，最终导致 1454 年在布尔诺和其他三个王室城市类似的驱逐行动。第六个王室城镇——乌赫尔堡——在 1514 年完成了这一过程。

内部冲突在 1422 年 2 月变得激烈，有关针对激进派工匠的政策和行动的争端不断激化，结果温和的圣杯派布拉格旧城市民在旧城市政厅谋杀了激进派的扬·热利夫斯基及他的九名同伴。热利夫斯基被斩首后，他的后继者们投身到破坏城镇官员和教师住宅的狂潮中，其中也包括这座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暴力行动逐渐停息后，圣杯派贵族开始考虑与天主教贵族更紧密地联系。

1424 年 10 月 11 日，日兹卡死于瘟疫，这带给他的追随者以挫折，自此以后他们把自己看做是遗孤，在日兹卡的继承人——普罗科普·霍利(秃头普罗科普)——的指挥下继续战斗。1431 年，皇帝发起了第四次针对胡斯信徒的讨伐，两支军队分别从北面和西面进入波希米亚。在被迫行军后两天，胡斯信徒于 8 月 14 日抵达多马日利采，并且击垮了敌军，据说许多外国士兵一听到胡斯信徒的行军圣歌就落荒而逃。

在多马日利采的耻辱性大败后，教皇放弃了用武力解决的办法，转而与胡斯信徒公开协商，而胡斯信徒内部不断分化，形成了圣杯派接受协商而激进派拒绝外交选项的对立局面。一支捷克代表团于 1433 年

抵达巴塞尔,目标是在这座瑞士城市举行的大公会议上迈出走向协商解决的第一步。西吉斯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外交努力,因为他仍旧希望保住波希米亚的王位。

1433年的夏天,激进派胡斯信徒对比尔森城的军事行动导致圣杯派与天主教贵族合作,共同对抗激进派的进攻。1434年5月30日,圣杯派信徒和捷克天主教徒的联合部队在利帕尼的关键战役中使激进派信徒遭到决定性重创。随着普罗科普·霍利在战役中阵亡,激进派的军队走向灭亡,利帕尼之战将胡斯信徒革命引向终点。

1435年,圣杯派扬·罗基察纳被推选为布拉格的胡斯信徒大主教,并且被西吉斯孟正式承认。一年以后的1436年,在巴塞尔的协商产生了《巴塞尔条约》(*Compactata*),将胡斯信徒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联系起来,并且陈述了"布拉格四条"提出的要求。通过协议,普通信徒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可以领受两种形式的圣餐,但是在王国的其他地区不被允许。这在天主教欧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权,尽管"布拉格四条"的其余部分或者被废除或者被削弱。一个额外的特许权允许从教会手中夺走土地的贵族保留这些土地。随着敌对状态的暂停,西吉斯孟前往摩拉维亚的伊赫拉瓦,并于1436年8月14日在城镇广场举行的典礼上接受了圣瓦茨拉夫的王冠。

作为胡斯战争的结果,波希米亚王国显现出社会和政治的转变,其中一些是中世纪末期产生的长期趋势的后果,由于胡斯革命而被提前了。斗争严重削弱了波希米亚的经济基础,不过也引发了农村秩序的转变,大量的教会土地和其他财产落到了贵族阶级的手中。对于次等贵族和市民,革命意味着更强的身份感和对国家政治生活更多的参与。在西吉斯孟的继承人在位期间,这些新的社会和政治潮流将会影响国王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 波杰布拉德的伊日

西吉斯孟死后,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各政治集团推选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尔伯特)——西吉斯孟的女婿——担当他

72 们共同的统治者。出于对选择阿尔布雷希特的反对，波希米亚东部的激进派胡斯信徒和他们的塔博尔派盟友赢得了圣杯派大主教罗基察纳的支持，筹划波兰君主雅盖隆家族的卡齐米日成为候选人。在接下来的军事斗争中，阿尔布雷希特的奥地利军队于1438年在塔博尔赢得了对波兰人和他们的波希米亚盟友的军事胜利，不过当阿尔布雷希特于1439年10月去世时，他的支持者丧失了目标。阿尔布雷希特从1437年至1439年掌有波希米亚王位，不过从未赢得对王国的控制权。随着他的去世，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联盟解散，而贵族阶层拒绝承认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为国王。结果，直到1453年捷克国土都处于空位期，在这期间，维持秩序成为省级或地区级权力机构的责任。

圣杯派贵族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波杰布拉迪的乔治）被选择担任阿尔布雷希特13岁的儿子拉迪斯拉夫·波赫罗贝克（遗腹子拉迪斯拉夫，1453—1457年在位）的摄政者。拉迪斯拉夫于1453年即位波希米亚国王，被称为“遗腹子”是因为阿尔布雷希特在他出生前就死了。拉迪斯拉夫统治了四年后因病而死。他死后不久，捷克各政治集团于1458年3月举行一次选举，达成了特别决定，献出王位给波杰布拉德的伊日（1458—1471年在位），一位与以前的王朝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捷克贵族阶级成员。作为普舍美斯王朝结束后第一位捷克统治者，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由于宗教信仰和他与扬·胡斯及扬·日兹卡的关系，也被认为是一位“胡斯信徒”国王。

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的选举从一开始就为争论提供了来源，捷克王室领地中最初只有波希米亚选择接受他的王室权力。他得到皇帝的认可，不过却没有获得教皇代表们的承认。1462年，教皇庇护二世撤回了对《巴塞尔条约》的支持，四年之后，他开除波希米亚国王的教籍，认定他为异教徒，发动了一次针对捷克国土上的胡斯主义的讨伐。

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的女婿——匈牙利的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出于他自己对波希米亚王位的打算，于1468年发动了一次对捷克胡斯信徒的军事进攻。翌年，胡斯信徒致信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盟友，“武装召唤以捍卫真理”，以此寻求聚合捷克爱国主义，捍卫语言、

文化和土地。然而,当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加入到许多摩拉维亚贵族之中,接受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对波希米亚王位的索取时,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只剩下波希米亚地区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冲突一直持续到波杰布拉德的伊日于1471年3月去世,于是150年里的第一位捷克国王成为最后一位戴上圣瓦茨拉夫王冠的捷克人。



当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的统治结束时还没有准备好直接继承人,于是波希米亚人失去了建立一个持有圣瓦茨拉夫王冠的本土捷克王朝的一次关键机会。在此,波希米亚王国或许可以循着西欧国家——比如英格兰和法国——的道路,发展为一个在本土统治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不过波希米亚却反而把它交到外国统治者——波兰人和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他们几乎没有捷克土地上人民的身份感。

## 雅盖隆王朝统治下的波希米亚

去世之前,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已经接受了波兰的卡齐米日四世的建议,他支持雅盖隆王朝的候选人登上波希米亚的王位,而不是试图开始他自己的王朝继承。出于对伊日的愿望的尊重,1471年5月末,议会在库特纳—霍拉开会并推选卡齐米日的儿子弗拉迪斯拉夫·雅盖隆斯基(弗瓦迪斯瓦夫·雅盖隆)即位,成为弗拉迪斯拉夫二世(1471—1516年在位)。

借助它在骑士和贵族中的市民和工匠代表团,1471年的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由胡斯革命引发的政治变革。传统上,波希米亚王室掌控的每一个地区在地区议会拥有其自己的政治社团,其中包括贵族、骑士和教士等不同的政治集团。波希米亚地区总议会长期以来握有推选国王的权利,不过每个地区议会有权制定法律、通过王室对税收的请求、授予公民权、决定本地对国外军事行动的参与,以及保护本地居民更大的权益。有时候,统治者可以在布拉格召集来自所有五个圣瓦茨拉夫王位统治下的地区代表组成的总议会,讨论整个王国的重要问题。

15世纪的后半叶见证了不同政治集团作为政治力量的崛起,不过摩拉维亚和下卢萨蒂亚却是例外,胡斯革命已经削弱了教会在世俗事

务中的作用，并且允许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在议会中的出现，它代表自由城镇。市民阶层最终在摩拉维亚获得了政治地位，不过没有达到其在波希米亚达到的程度。不过到了 1471 年，次等贵族和市民显然在议会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很长的一段不稳定时期中赢得了影响力。

74

当弗拉迪斯拉夫二世被授予王位时，他被要求发誓接受《巴塞尔条约》的条件，成为胡斯信徒和天主教徒的波希米亚王国的统治者，马提亚·科尔维努斯抵制这样的安排，于 1469 年宣布自己为波希米亚国王，派遣他的军队占领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马提亚成为了未加冕的“反国王”，为了统治权而战斗。1479 年，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和马提亚·科尔维努斯达成了《奥洛莫乌茨和平协议》，协议确立弗拉迪斯拉夫为波希米亚的统治者，马提亚为其他捷克地区的君主。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于 1516 年去世，他活得远比他的竞争对手长，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已于 1490 年离世。捷克地区的王位传给了弗拉迪斯拉夫的儿子——路德维克一世（路易，1516—1526 年在位），他另外还当选为匈牙利国王，建立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个人联盟。和他的父亲一样，路德维克与波希米亚鲜有直接接触，与弗拉迪斯拉夫在 1490 年以后三次出现在首都相比，他仅仅到访布拉格一次。

## 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

1526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一世的当选，给波希米亚王国的管理带来了重要的变化，这主要由于斐迪南努力创建一套专制的王室管理体系，这与他出生的哈布斯堡王国的西班牙相类似。在波希米亚，王室权力的扩张要求斐迪南削弱城镇和地区议会的权威，代之以王室官员的治理。为了这个目的，斐迪南废除了地区议会，并且努力使布拉格和其他城镇步其后尘。1547—1548 年，捷克贵族加入到许多王室市镇反抗王权的起义中，斐迪南成功地平息了叛乱，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安插王室官员掌管城市管理机构，同时引入一个新的优先于城镇和地区法院的上诉法院。

斐迪南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建立一个世袭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导致他采用了对波希米亚王国的各级议会更大的王室控制,剥夺了捷克议会推选国王的权利,要求其承认哈布斯堡家族为合法的世袭王朝。议会不再有权选举统治者,不过它保留了承认的权利。斐迪南重组了捷克土地上的行政机构,创立枢密院管理外交和国内政策,并在维也纳建立了宫廷议院管理他土地上的财政。有组织和有规律的征税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机构提供了财政来源,使其逐渐侵蚀波希米亚王国的独立性,最终融入奥地利帝国。

## 宗教改革

75

1517年10月31日,日耳曼修道士马丁·路德(1483—1546年)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萨克森的维滕贝格宫殿教堂大门上,由此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斗争的序幕。由于波希米亚在15世纪在胡斯信徒手下早已经受了它自己的捷克宗教改革,路德对赎罪券和其他教会仪式的批评得到充分接受。路德公开表达他对扬·胡斯作为宗教改革先驱者的敬意,并且认识到他自己对赎罪券的反对,与胡斯在15世纪早期对这一行径的抨击是一脉相承的。

路德及其追随者创建的路德教会迅即在捷克土地上找到支持,尤其是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日耳曼人社区里。正当路德教徒明白他们将不能在现有的教堂内信奉他们的信仰之时,长期与欧洲其余部分隔离的胡斯信徒教会,而今与这个已经从罗马天主教会脱离的教派同命相连了。

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冲突使一个独特的捷克教会走向前台,那就是兄弟会联盟(*Jednota bratrská*)。15世纪中期起源于胡斯信徒中的激进派别的兄弟会选择使自己分离于天主教会,不像胡斯信徒那样相信他们依旧是一个更宽泛的教会团体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会不同。兄弟会最初信奉激进的基督教作家佩特尔·黑尔奇茨基的幻想,他一并批评天主教徒和胡斯信徒,并且拒绝暴力和战争,支持实行不抵抗主义。黑尔奇茨基还鼓吹基督教徒应该拒绝担任公职、从商

或入伍。

使兄弟会与其他宗教信仰得以区分的是他们依赖于从传教士和凡人的成员中选举出的神职人员。在早期，兄弟会主要吸引平民信奉他们的信仰，不过当他们放弃了黑尔奇茨基对公职和职业的禁忌时，他们的数量和社会多样性得以增加。随着路德主义及随后的加尔文主义来到波希米亚，兄弟会在 16 世纪的进程中先后被这两者吸引，不过其重点一直更多地聚焦于基督教的日常实践而不是基督教理论。

由于对基督教信仰的激进方式，兄弟会在弗拉迪斯拉夫二世让步于教皇的要求并于 1502 年颁布对兄弟会教堂和作品的禁令之前，早已遭到了迫害。然而兄弟会继续存在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经常仰仗于贵族和市民的财力资源以及农民和工匠的主动加入。尽管许多兄弟会成员在斐迪南一世在位期间离开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继续成为兄弟会活动的中心，其中包括《克拉利采圣经》(*Bible kralická*)的印刷，这是由摩拉维亚的教会成员翻译的本国语的圣经版本。

76

作为宗教改革的结果，到 17 世纪初，大部分波希米亚人很可能属于各新教教派。许多贵族和市民追随这些信仰，尽管到最后，哈布斯堡王朝行政机构的最高官阶仍然被罗马天主教徒占据。斐迪南一世最初的几位继承人，包括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 年在位)，倾向于宗教容忍，甚至同情新教信仰，不过这也将在 17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发生变化。

对于波希米亚的犹太人社区来说，宗教狂热时期造成了不确定的环境，当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摩擦偶尔会演变为暴力行为，而皇家政策随着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到 16 世纪 20 年代，人口增长和新建筑对有限空地的占据导致了一些社区成员离开了犹太人城区，他们在布拉格的其他地方建立新的犹太人社区，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据称在 1522 年至 1541 年之间翻了一番。

1557 年，来自市民的压力使斐迪南一世考虑从波希米亚所有的王室城市驱逐犹太人，不过这项政令从未执行，此后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他即位初期取消了该政令。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下情况得到改善，

犹太城镇甚至于1571年款待了国王及其朝臣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礼节性拜访。在鲁道夫二世1577年的特许状中,他颁布了新的权利和特权给犹太人,允许其从事之前拒绝犹太人的手工业和职业,传统上,犹太人作为放贷人和小贩来供养他们自己。行会不再限于基督徒,由此犹太人可以成为工匠,或者在犹太城区之外以及在旧城的市场中开店和从事商业活动。

## 鲁道夫时期

1576年,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获得了他父亲和祖父曾把持的王权。出生在维也纳的鲁道夫曾在西班牙待了8年,年满19岁之后回到维也纳。像他的哈布斯堡先辈一样,鲁道夫必须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之间选择其一作为权座。鲁道夫选择了布拉格,随着他即位波希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布拉格再度成为帝国首都和重要的文化中心。



鲁道夫对于捷克人显得毫无热情,在一次依靠一小群天主教官员治理王国之后变得更加冷漠。终其一生及整个在位期间,鲁道夫都沉迷于对艺术和科学的兴趣之中,尤其是在当时公认为科学领域的占星术和炼金术方面。鲁道夫在城堡收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藏品,并且从欧洲各地召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到他的宫廷。著名的科学家包括植物学家查尔斯·库希乌斯以及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和约翰尼斯·开普勒,后者发展了鲁道夫星行表,用于绘制星体的行进。炼金术士爱德华·凯利和约翰·迪被找来协助鲁道夫,完成他寻找魔法石的任务,这种传说中的化学制品能够把铅和其他贱金属变成黄金。鲁道夫的其他兴趣可以在他的植物园、珍稀动物展厅和宏大的珍品收藏室中得到展现。

然而,相对于鲁道夫作为一名艺术和科学庇护人的所有成功,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能力并不够强大,无法使他避免作为统治者要面对的主要阻碍。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鲁道夫的心理状况逐渐恶化,从偶尔的躁郁症发作发展为慢性妄想狂和精神分裂。这位皇帝衰退的心理健

康影响了宫廷,各种阴谋暗中破坏行政事务,而可耻小人利用宫廷的不确定状态谋私利。

鲁道夫联合所有的基督教欧洲对抗来自东南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犯的努力引起了一直持续到 1606 年的敌对行动的大范围爆发。1605 年,一次反哈布斯堡叛乱在匈牙利爆发,鲁道夫将匈牙利事务置于他的弟弟马蒂亚斯大公手中,后者成功地通过协商结束了叛乱和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在鲁道夫抱怨马蒂亚斯在协议中丧失太多之后,马蒂亚斯利用了对鲁道夫日益增长的怒火,要求鲁道夫向他交出匈牙利的圣斯蒂芬王冠以及奥地利的王冠。

1609 年,波希米亚的新教徒要求对宗教自由进行保护,鲁道夫只能通过一封肯定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和其他新教教徒权利的陛下信函中规定的宗教自由来保持对波希米亚王冠的占有。来自新教徒的进一步的要求迫使鲁道夫要求他的侄子帕绍主教利奥波德派遣一支军队,他可以用这支军队先镇压新教徒,然后对抗他的弟弟马蒂亚斯。然而,新教徒请求马蒂亚斯提供协助把鲁道夫赶下王位,于是鲁道夫成为阶下囚直到他死前一年的 1611 年将王冠让与马蒂亚斯。年事已高的马蒂亚斯把持着波希米亚王冠直到 1617 年斐迪南二世(1617—1637 年在位)被推选为国王。



## 波希米亚起义

1618 年 5 月 23 日,一伙新教派捷克贵族来到布拉格城堡中两名斐迪南二世官员的办公室,将这两名官员和他们的秘书扔出了一扇窗外,这被称为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第二次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这次强迫驱逐行动的受害者在 60 英尺的跌落中幸存,他们落在了下方护城河的一堆粪肥上。贵族们这次代表波希米亚社会阶层利益的行动是受对斐迪南选举的反对所激发,此外还基于在天主教会认领的土地上关闭新教教堂是对 1609 年陛下信函中所陈述权利的违背这样一个信念。抛出窗外事件的后果推动了在 1618 年至 1648 年间主导欧洲事务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1619 年 8 月,捷克地方议会否决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权,推选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成员巴拉丁的腓特烈(1619—1620 年在位)担任国王。腓特烈定居在布拉格城堡作为斐迪南的反国王,他寻求来自新教联盟的各君主和他妻子伊丽莎白·斯图尔特的父亲英国的詹姆斯一世的协助。他被人们视作“冬王”,仅仅佩戴了一年多的王冠,斐迪南二世就结束了叛乱,把腓特烈赶下了王位。

1620 年 11 月 8 日,大约 2 万到 2.1 万波希米亚士兵和雇佣兵在布拉格城外的白山(Bíla hora)与人数更多的哈布斯堡—天主教联盟军队发生小规模冲突。由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和约翰·冯·蒂利伯爵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和他们的天主教联盟盟军,在一场将决定捷克直到 20 世纪早期的历史进程的战斗中击败了捷克人。这场战斗本身并不是一次具有捷克人对抗日耳曼人的意义的国家战役;相反,它是波希米亚新教贵族(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和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及其盟友之间的一次斗争。然而,这次战败将使捷克民族从贵族到农民都出现分支。

79

斐迪南二世决定惩罚捷克人的叛乱,他的方式是挫败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抵抗、恢复天主教信仰以及削弱捷克民族特性,他宣称“一片沙漠也要好过一个满是异教徒的国家”。[2]1621 年 6 月 21 日清晨,27 名贵族和市民在布拉格旧城广场被处决,他们的头颅随后被挂在查理大桥的一座塔楼上示众。此后十年,直到这些受害者被赐予在提恩教堂举行的正式葬礼之前这些头颅一直挂在那里。27 个白色十字现在被镶嵌在旧城市政厅外广场上的人行道上。

在这些处决之后,腓特烈*转而对付捷克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夺走属于新教贵族的土地并将其卖给或授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带领哈布斯堡军队的雇佣军军官将获得土地作为报偿,由此新的西班牙、佛兰德、爱尔兰、意大利和日耳曼贵族加入到地主阶层的行列中。天主教教士重新获得了他们曾经失去的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并且继续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大盟友。

---

* 原文有误,与下段相同,都应为斐迪南。——译者注

1624 年，腓特烈遵循他早期对非天主教教士的驱逐政策，并通过一份定义天主教为波希米亚王国内仅有的被允许的教派的诏书，禁止普通信徒接受两种形式的圣餐仪式。三年之后的 1627 年 7 月，“重新皈依天主教特许证”迫使新教贵族在天主教和被驱逐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大约 20%的贵族阶层离开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在行政背景上，波希米亚被进一步拉进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 1624 年捷克大臣被重新安置到维也纳之后。在斐迪南三世(1627—1657 年在位)的统治下，波希米亚(1627 年)和摩拉维亚(1628 年)的地产条例解除了各社会阶层在立法和司法事务上的权力，与此同时，还宣告圣瓦茨拉夫王冠的土地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

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的多项政策目标直指捷克文化和本地知识阶层，一些知识分子面临处决，其他人被迫移民，而那些留下的人发现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是极端困难的。那些离开他们祖国的新教知识分子中间就有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扬·阿摩司·科门斯基(夸美纽斯)，他 1623 年的讽刺作品《世界的迷宫和心的天堂》一直到 18 世纪末在波希米亚都无法找到。夸美纽斯曾经是在摩拉维亚的兄弟会的一名领导者，在与其他跟他信仰一致的人一起逃避波希米亚的反宗教改革政策之后，成为了一名兄弟会主教。夸美纽斯最后定居在阿姆斯特丹，于 1670 年去世，其身后在教育领域留下的遗产为各类以他名字命名的机构所传颂，其中就包括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夸美纽斯大学。

80

长期作为宗教改革知识中心的布拉格大学被置于耶稣会教士的权力之下，他们于 1653 年将其与克莱门特学院合并。由此而来的卡尔·斐迪南大学的校长负责管理王国内所有的学校，并且维护由严格审查制度强加的限制。作为那种审查制度的工具，耶稣会教士安托宁·科尼亚什的“被禁的或危险及可疑的图书索引”包含几乎所有捷克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胡斯、路德和加尔文教派作家的作品。由于这种语言本身甚至都成为可疑的，捷克语的教学只在学校教育的早期阶段被允许。随着德语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捷克语成为下层语言，而德语则是贵族

和中上层市民的语言。

##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正当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和反宗教改革变换波希米亚的宗教、政治和文化面貌之时,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蔓延,其中也包括了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作为欧洲最后一次重大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由1618年的波希米亚起义引发,战火遍及这个大陆直到1648年,从布拉格的一次抛出窗外事件扩展为德国新教统治者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组成的联盟之间的斗争。由此,贯穿它的四个发展阶段,三十年战争展现为牵涉欧洲几大王朝的权力斗争。

斐迪南二世得到了一名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瓦尔德什泰恩)主动提出以2万名士兵支援这位皇帝的天主教事业。华伦斯坦是一名在兄弟会经营的学校中受过教育的没落贵族,在1609年改信了天主教。华伦斯坦希望通过协助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来扩张他所拥有的土地,他很快展露出作为一名帝国军队优秀将领的才能,并由此获得嘉奖。诸多军事胜利和对波希米亚北部地区的吞并为华伦斯坦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赢得了弗里德兰公爵的名衔。随着丹麦加入战斗站在新教君主这一边,而华伦斯坦帮助击败了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丹麦军队,他的军事作用和威望随之增长,为此华伦斯坦还被赐予梅克伦堡公国。

1629年,斐迪南二世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重新激发了宗教争论,该敕令命令归还自1552年以来所有被挪用的天主教土地,并且通过禁止加尔文教徒进行礼拜来胁迫新教教徒。随后的一年,担心华伦斯坦的动机并且对他的雇佣军规模有所顾虑的天主教和新教君主说服皇帝解除了华伦斯坦的军事指挥官职务。然而,瑞典人对帝国将军蒂利伯爵的胜利——蒂利本人也于1632年在莱赫阵亡——以及萨克森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迫使皇帝恢复华伦斯坦的统帅职位。曾经占领布拉格的萨克森人被赶出了波希米亚,随后华伦斯坦转向与古斯塔夫·阿

道夫二世统帅的瑞典军队作战。华伦斯坦于 1632 年 11 月在吕岑的一次重大战役中与瑞典人遭遇，尽管陷入困境的华伦斯坦被迫退至波希米亚，新教事业却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战死而遭到了重大挫折。

出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华伦斯坦开启了与萨克森还有法国、瑞典和一些捷克流亡者的秘密协商，很有可能是希望获得他自己的独立领地，也可能是为了追逐波希米亚王位。帝国当权者对华伦斯坦的野心和动机渐生怀疑，皇帝再一次解除他的统帅职务，同时叛国罪的指控也开始流传。1634 年 2 月 25 日，在海布要塞，华伦斯坦被他自己手下的一名军官谋杀，这么做是出于对统帅叛国的愤怒。

对于波希米亚王国来说，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以瑞典 1639—1642 年在波希米亚和 1642 年在摩拉维亚的军事行动为标记。哈布斯堡家族与特兰西瓦尼亚协商了一份和约，瑞典人离开了摩拉维亚。1648 年，瑞典军队回到布拉格，围攻这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掠夺布拉格城堡和鲁道夫二世的艺术收藏。学生志愿兵把守横跨伏尔塔瓦河的石桥，抵抗瑞典人，而犹太人团体保卫了部分城墙，并且最终为抵抗努力提供了帮助。腓特烈三世用临时减轻税负和兑付被拖延的军需物资款项来奖赏布拉格的犹太人，不过这些福利被 1648 年的犹太人特许证抵消，该特许证对犹太人的权利和特权设置了限制。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正式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格斯堡条约》(1555 年)的条款被恢复并扩展以包含加尔文教派。在“谁的统治，谁的信仰”(*cur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指导下，宗教和平允许单个统治者决定整个人口的宗教信仰。尽管农民没有权利去选择，其他国民可以皈依官方信仰或者离开。对捷克流亡者来说，将 1634 年定为基准年意味着他们将不能回到他们的祖国。天主教在波希米亚的胜利推动了这个王国反宗教改革的成功，不过凭借与萨克森的协议，西里西亚的路德教派信徒保住了礼拜的权利。

82

对于波希米亚来说，三十年的战事带来了经济混乱，同时因为冲突、饥荒、疾病和移民或流亡，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由于土耳其战争期

间匈牙利的分裂,波希米亚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中最大的一个,即使是在 1635 年失去上下西里西亚的情况下。在城镇里，由于战争对城市及其经济活动的挫伤,许多市民面临着贫困或财务困境。对于波希米亚农村来说,土地向教会或者高等贵族的转让使得低等贵族占有的土地减少到 10%,而仅仅一个世纪前,他们还在占有土地总和上胜过大贵族。差不多 90%的人口以从属农民的身份生活在天主教会和贵族阶层占有的土地上,同时“二等农奴”在中欧的延续意味着在西欧已经消失或者即将被废弃的封建习俗的留存。作为 1680 年失败的农民起义的结果,利奥波德一世(1657—1705 年在位)再次确认了长期存在的劳役(*robota*)需求,那就是要求农民每周按惯例有三天为地主服务,或者在农忙期间干满七天。

在文化背景上,波希米亚与欧洲天主教国家的重新连接使得巴洛克风格和其他影响渗入捷克国土。在反宗教改革的精神里,复兴的天主教堂推动了 17 世纪晚期的巴洛克风格,通过一种甚至可以触及普罗大众的强大而有活力的途径,把它作为激励宗教热情的手段。波希米亚的巴洛克建筑展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大师的格调,不过也有本地建筑师的灵感,比如克里斯托弗・丁岑霍菲和他的儿子基连・伊格纳兹・丁岑霍菲,其中位于布拉格小城由后者设计的圣尼古拉教堂被认为是波希米亚巴洛克杰作。哈布斯堡统治者利奥波德一世和约瑟夫一世(1705—1711 年在位)统治下的巴洛克时期在艺术上是多产的,不过主要的贡献在艺术和建筑领域,而不是文学领域。



## 斯洛伐克的宗教改革

胡斯信徒的改革运动在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孟同时作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在位期间首次在斯洛伐克土地上出现。塔博尔派军队攻入这一地区,而胡斯信徒武装在特尔纳瓦、斯卡利察和日利纳等城镇建立。逃离发生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战斗的胡斯信徒流亡者也抵达了上匈牙利。然而,胡斯主义从没有遵循与波希米亚王国相同的扩张路径,部分是因为斯洛伐克国土上没有能发挥类似于布拉

格的作用的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心。在斯洛伐克,对胡斯信徒事业的支持主要来自低等贵族阶层,而且这种信仰在胡斯信徒保持军事存在的地区是最强烈的。然而,与波希米亚的情况相同的是,胡斯信徒对宗教改革的推动将为后来实行宗教改革建立基础。

当继承权的斗争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阿尔布雷希特(1437—1439年在位)之死而到来时,阿尔布雷希特的遗孀伊丽莎白筹划她襁褓中的儿子拉迪斯劳斯五世(拉斯洛;遗腹子拉迪斯拉夫)对圣斯蒂芬王冠的候选资格。然而,王冠被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亚盖洛一世(乌拉斯洛;1440—1444 年在位)获得,匈牙利主要贵族将其选为匈牙利国王,他于 1444 年在瓦尔纳与土耳其人的战役中阵亡。王位接着传给了拉迪斯劳斯五世(1444—1457 年在位),其中自 1446 年至 1453 年间,亚诺什·匈雅提担任年幼国王的摄政人。

土耳其扩张的军事威胁导致匈牙利地方议会任命了七名王国不同地区的长官,上匈牙利的长官职位被布兰迪萨的扬·伊斯克拉获得,他在继承权危机期间是阿尔布雷希特的遗孀伊丽莎白的盟友。扬·伊斯克拉是一名摩拉维亚胡斯信徒,他在 15 世纪 20 年代随胡斯信徒军队来到斯洛伐克。伊斯克拉还是一名雇佣军士兵,在 1434 年的利帕尼之战激进派胡斯信徒被击败之后,他与其他胡斯信徒一起受雇于西吉斯孟,对抗土耳其人。从 1438 年至 1453 年,伊斯克拉从他在兹沃伦和科希策的基地控制着大部分斯洛伐克南部地区。

亚诺什·匈雅提得到了下匈牙利的长官职位,他时常与扬·伊斯克拉意见不合,后者于 1453 年在沮丧中离开了斯洛伐克,一年后接到击败捷克兄弟会的请求时才回来。然而,兄弟会并没有最终屈服,直到他们在 1467 年被亚诺什·匈雅提的儿子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国王打败。科尔维努斯随后在胡斯信徒贵族的请求下于 1468 年入侵摩拉维亚,并在一年后宣布自己为波希米亚国王。

## 马提亚·科尔维努斯

当地方议会于 1458 年 1 月推选马提亚·科尔维努斯(马加什·措


84

尔温,1458—1490年在位)为国王的时候,他只有15岁。与波希米亚的波杰布拉德的伊日一样,马提亚由同谋的贵族推选,缺少支持他被选为国王的任何王朝关系。同样与波杰布拉德的伊日一样的是,马提亚提出了对波希米亚王冠的请求,不过他只是作为反国王在1469年至1490年统治了这个王国。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具有浓厚兴趣的马提亚成了匈牙利的艺术品庇护人,他在一所规模上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里聚集了欧洲最大的世俗作品收藏。

1465年,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了一所大学——伊斯特罗波利塔纳学院(伊斯特罗是多瑙河的希腊语名字),由此对斯洛伐克国土上的教育和知识事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年后这所大学开课,具有法学、医学、神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不过国王贫乏的财政支持和低效率的管理导致其于1490年被关闭。

当1490年马提亚去世的时候,他只留下了一个私生子亚诺什作为可能的继承人。然而,贵族阶层拒绝亚诺什成为王位的候选人,由此使得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具有了与波杰布拉德的伊日相同的命运,成为他的王国中最后的本土统治者。他在大众文化中将以"公正的马提亚"而被铭记。

## 土耳其战争

马提亚·科尔维努斯由两位波兰雅盖隆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弗拉迪斯劳斯二世(弗拉迪斯拉夫或乌拉斯洛,1490—1516年在位)和路易二世(路德维克或拉约什,1516—1526年在位)继任。弗拉迪斯劳斯由于他在被要求对某个请求作出响应的时候点头并表示"好"或者"行"的习惯,以及他几乎总是默许贵族,获得了"点头拉迪斯劳斯"的称号。总体上说,这两位雅盖隆王朝的统治者在建设性领导力方面鲜有建树,结果,1521年塞尔维亚城市贝尔格莱德的陷落令匈牙利人失去了一个关键的防守阵地之后,使匈牙利面对土耳其的扩张处于弱势地位。

在苏丹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的率领下,一支庞大的土耳其军 85

队在 1526 年到达多瑙河，于 8 月 29 日在匈牙利南部村庄摩哈赤附近与一支由超过 2.4 万名骑兵和雇佣兵组成的匈牙利部队相遇。在路易二世的指挥下，匈牙利人和捷克、日耳曼及波兰雇佣兵选择在一片沼泽边上的平原进行战斗，他们遵循的这个策略尽管在封建意识上具有骑士精神，却被直接指责为是“介于愚蠢和自杀行为之间”[3]。土耳其人用他们的火炮打开了战场，击溃了数量远胜于自己但伤亡惨重的骑士们，赶尽杀绝抵抗的军队，只留下很少的活口。路易二世逃离了战场，三天后死去，可能是在一次渡河时意外溺水，抑或是受害于他的随从中一名复仇的贵族。

在摩哈赤的决定性溃败和路易二世战死后，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索取圣斯蒂芬王冠，不过许多匈牙利贵族支持特兰西瓦尼亚总督亚诺什・佐波尧，以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主要发生在斯洛伐克土地上的武装冲突最终导致签订了 1538 年的《大瓦劳德和约》，和约中佐波尧和斐迪南同意分享匈牙利，而特兰西瓦尼亚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获得了相对自治。当土耳其人于 1541 年进入布达，斐迪南被迫接受了和约条款，给予土耳其人对中部大平原的控制和承认斐迪南一世(1526—1564 年在位)为次等“王室匈牙利”的国王，国土从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之下，匈牙利地方议会迁至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那里成为新的匈牙利行政机构中心，并由此成为匈牙利国王的加冕城市。匈牙利的一分为三直到 1568 年才得到完全承认，那是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米克绍，1564—1576 年在位)继承斐迪南一世成为匈牙利国王之后。对抗土耳其人的扩张保卫欧洲，这时成为中部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关键任务。

1529 年，土耳其军队已经穿过匈牙利向维也纳进发，那是土耳其入侵欧洲心脏地带的最后屏障，不过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的围攻以失败告终。随后的一年，土耳其对上匈牙利的进攻造成了尼特拉、瓦赫和赫龙河谷的严重破坏，由于未能得到警告导致了大量伤亡，并且造成大量人口逃入难以进入的森林和山丘。

土耳其人的逼近和中部平原上的战争威胁驱使接近三分之二的马扎尔贵族迁入看上去更安全的斯洛伐克城镇和乡间。贵族们在城镇建造住宅,同时这些城镇里建筑起新文艺复兴时期的防御工事和密闭的军事基地。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土耳其战争带来了民族构成和城镇语言的改变,马扎尔贵族的到来引致更多匈牙利元素进入这一地区,同时使匈牙利语成为在成长中的城市地区里继斯洛伐克语和德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

86

在十五年战争期间(1591—1606年),土耳其人试图进一步挺进中欧的努力使得斯洛伐克领土易受攻击,同样情况的还有归入土耳其管理之下的那些受制于重税和限制性行政法规的地区。逃避税负曾经是战争的诱因之一,所以土耳其人对抵抗税收的反击是袭击违规的城镇和地区。这场战争于1606年结束,没有明确的胜利者,交战双方在财政和资源、人力还有其他方面都已耗尽。

## 宗教改革、叛乱和反宗教改革

土耳其战争的前几十年中还见证了宗教改革来到斯洛伐克,尽管宗教改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以胡斯主义的形式出现。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胡斯信徒的汇入,在斯洛伐克人和他们西面的斯拉夫邻居之间产生了更强的文化和宗教关联。16世纪,神学批判和马丁·路德的教义抵达上匈牙利,并且被生活在斯洛伐克东部矿业城镇的日耳曼人所信奉。从这些城镇开始,路德教义传播到士绅和农民之间。

为了培训路德教牧师以服务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其他地方的教会,斯洛伐克学生开始在路德担任神学教授的维滕贝格大学出现。捷克兄弟会抵达斯洛伐克时,他们引入了捷克圣经——《克拉利采圣经》(*Biblia Kralická*),这本圣经出版于16世纪晚期,并且对于斯洛伐克路德教徒的礼拜仪式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结果,随着捷克语出现在新教徒的布道和作品中,它开始对斯洛伐克语的发展施加强大影响力。1581年,斯洛伐克版的《马丁·路德教理问答手册》用捷克语出版,而且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之后,捷克移民推动了捷克语作为斯洛伐克的

新教学者和作家的文学语言的运用,一直到19世纪为止。

87 1604年1月,天主教徒夺取了斯洛伐克东部城镇科希策的一座路德教堂。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地方议会中的新教徒出来反对这次行动,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鲁道夫二世(1576—1608年在位)对此的回应是加强反新教的法律和禁止在地方议会中讨论宗教议题。一次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新教叛乱随之而来,叛乱领袖是一名加尔文教派的贵族什特凡(伊斯特万)·博奇考伊,他于1605年被选为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博奇考伊调遣他的军队穿过喀尔巴阡山口,进入上匈牙利,迅速赢得了除普雷斯堡之外的斯洛伐克大部分的控制权。第一次巨头叛乱在1606年6月结束,当时在维也纳签订了一项协议,给予所有人宗教自由并且保证匈牙利王国的高官将由匈牙利人担任,无论他的宗教派别。这项条约还承诺对博奇考伊在叛乱中的支持者进行特赦。博奇考伊随后在撮合哈布斯堡家族和土耳其人在1606年签订《吉托瓦托洛克和约》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和约结束了十五年战争并且定义了此后几十年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

到1614年,由于宗教自由的准予,路德教会教区通过在斯洛伐克土地上建立行政区域为这一新的教派带来了组织机构。路德教徒到17世纪末开办了超过100所学校,尽管除了10所之外其余所有的学校都在数十年内迫于压力而被关闭。在某一时期,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曾经从他们传统上依附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回归到路德教会。然而,几股更加激进的加尔文教徒出现在斯洛伐克,主要是在南部和东部,与此同时,诸如捷克兄弟会、茨温利派教徒、再洗礼派教徒以及其他教派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小型教会。

当十五年战争于1606年渐近结束时,鲁道夫二世可以将他的注意力从土耳其人转移到他帝国中的新教居民上。前加尔文派教徒彼得·帕兹马里于1616年被任命为奥斯特里洪主教反映了上匈牙利教会政策中的转变,远离强迫改宗转而支持利用教育来保卫宗教信仰。由帕兹马里指导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神学院在特尔纳瓦的恢复以及1635年特尔纳瓦大学的创建,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匈牙利王室的耶稣

会活动中心。1655年,特尔纳瓦大学内的印刷机印出了耶稣会教士贝内迪克特·瑟勒西的《天主教圣歌》(*Cantus Catholici*),这是一本用斯洛伐克语写的天主教赞美诗集,重塑了与西里尔和美多德的早期作品的关联。

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统治期间,第二次巨头叛乱恰好发生在波希米亚起义开启三十年战争之前。叛乱在1619年8月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加博尔·贝特伦占据斯洛伐克城市科希策之时开始,接着他驱兵直指维也纳市郊,一路上侵吞城镇和乡村。这次叛乱的主要目的是允许新教贵族夺取天主教会不久之前获得或重新获得的财产。三名耶稣会教士在科希策被贝特伦支持者谋杀成为后来被教会追封的殉道行为。1620年9月,贝特伦同意结束敌对行动,与斐迪南二世签署一份协议,不过在白山战役(1620年)之后战斗再一次爆发,并且一直持续到1622年1月恢复和平为止。斐迪南二世同意遵守1606年在维也纳签订的协议,贝特伦从斯洛伐克撤兵返乡。

第三次巨头叛乱于1644年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期间开始,当时特兰西瓦尼亚的吉奥尔吉·拉科奇开启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瑞典和法国——的协商。拉科奇占领了斯洛伐克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双方都没有获得胜利的能力,于是在1645年夏天拉科奇和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在位)之间签订了《林茨和约》。这个协议重申了1606年的条约,规定天主教会归还曾经被移交给教会的新教手中的土地和教堂。

1663年,由大维齐尔穆罕默德·柯普律吕率领的土耳其军队攻入匈牙利,并且贯穿了斯洛伐克中部,给斯洛伐克人造成了高昂代价和毁灭性的后果。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利奥波德一世(利波特,1657—1705年在位)召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盟友,在奥地利边境与土耳其人会战,于1664年8月1日在圣哥达附近击败了奥斯曼部队。利奥波德并没有乘胜追击,他磋商了一个在许多天主教和新教贵族中产生强烈反哈布斯堡情绪的和平解决方案。17世纪70年代期间,许多新教教堂被侵占,而且反哈布斯堡阴谋的指控将很多新教

牧师和教育工作者置于必须在放弃他们的信仰或者面临入狱之间进行选择的境地，新教徒的怒火随之不断增长。

在斯洛伐克发生的零星叛乱成为伊姆雷·特克伊领导的第四次巨头叛乱的序曲，他的十字军帮从 1678 年至 1681 年给上匈牙利全境留下了一条毁灭之路。当利奥波德的解决方案未能阻止新教徒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时，特克伊向把他当做上匈牙利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发出请求。特克伊随后协助了奥斯曼人在 1683 年 3 月末沿多瑙河上攻维也纳。

89

土耳其人以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指挥下的大队人马围困维也纳，不过在 9 月 12 日遭到了关键性的失败，当时洛林的夏尔突然出现，增援城内的哈布斯堡军队。赶来的萨克森、巴伐利亚、弗兰克尼亚和其他日耳曼人部队协同由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率领的骑兵一起袭击了战壕中的土耳其入侵者。一支以索别斯基的波兰轻骑兵为主的骑兵冲破了奥斯曼人的防线，与奥地利—德国军队的纵向进攻一起，在历时 15 小时的战役之后，将奥斯曼人赶出了维也纳。一支同盟的立陶宛军队随后在奥拉瓦河击溃了匈牙利叛乱者，之后又沿斯洛伐克的瓦赫河谷而下进行一次毁灭性的行军。特克伊叛乱失败了，而奥斯曼人也从上匈牙利的国土上撤离。到这个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的进攻迫使土耳其人放弃了匈牙利的其余部分，还有特兰西瓦尼亚。1699 年，土耳其苏丹同意了《卡尔洛夫奇和约》的条款，和约要求奥斯曼帝国从所有匈牙利国土上撤军，只有一些沿边境地区是例外。

1687 年，哈布斯堡家族利用他们对奥斯曼人的军事胜利，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地方议会施压，要求其接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男性家系对匈牙利王室的世袭继承权。哈布斯堡家族还说服地方议会接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首要地位，并且解除 1222 年《金玺诏书》给予贵族阶层抵制君主统治的权利。新教徒获得了对在 1681 年和解中获得的财产权的重新确认，不过那些权利执行中的障碍助长了反哈布斯堡情绪，并且最终推动了最后一次巨头叛乱。

1703 年，由上匈牙利东北部地区的沙罗什伯爵费伦茨·拉科齐领导的十字军起义利用奥地利军队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期间撤兵的机

会,将目标直指哈布斯堡家族的专制主义行为。拉科齐的起义曾被叫做"人民战争"或者民族解放战争,因为反抗运动的支持者包括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还包括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宗教派别。拉科齐废黜约瑟夫一世(1705—1711 年在位)和终止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努力导致了 1707 年各贵族阶层的分裂,尤其是当约瑟夫承诺维持他们的税赋豁免的时候。1708 年在特伦钦附近的失败和三年后科希策的投降迫使拉科齐经过谈判接受和约,在 1711 年终结了最后一次巨头叛乱。

1711 年,一名前哈布斯堡军队士兵尤罗·亚诺希克由于其作为一伙上匈牙利土匪的头目的恶行,被冠以"斯洛伐克罗宾汉"的恶名。在 1713 年亚诺希克被逮捕和处决之前,亚诺希克的团伙游走在斯洛伐克国土的河谷和高地,不断骚扰地方权力机构并且帮助受压迫者。经过在口述文化中的传颂,亚诺希克后来出现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中,并且作为一部歌剧和多部电影的主人公现身 20 世纪。

90

## 查理六世作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者

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1711—1740 年在位)在他的哥哥约瑟夫一世于 1711 年死于天花之后,继承了圣瓦茨拉夫和圣斯蒂芬王冠。由于只有他的女儿玛丽娅·特蕾莎和后来的玛丽娅·安娜活到成年,查理颁布了 1713 年的国事诏书,宣布他的国土是不可分割的,并且留给哈布斯堡王朝内的女性继承人,该文件的受益人将是玛丽娅·特蕾莎。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地方议会在 1720 年接受了国事诏书,3 年之后匈牙利议会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指望赢得天主教会圣统制的支持,查理在波希米亚王国对新教徒实行了强制措施。焚书和对有异教嫌疑者的迫害重新增强了捷克国土上的天主教权威,而 1731 年的《卡罗莱娜决议》(*Resolutio Carolina*)重申了利奥波德一世的宗教政策。制约条件限制了礼拜的权利,改宗被禁止,而公职的接受要求天主教誓言的宣誓。此外,路德教会教育不能发展到超越语言学校的等级。

为了终结拉科齐叛乱并赢得反叛的匈牙利贵族的支持，查理于1711年4月30日签署了《索特马尔和约》。通过这项协议的条款，查理承认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地位，并且接受了这两片地域作为独立地区的状态。查理还同意不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统治匈牙利，而是作为匈牙利宪法和法律背景下的匈牙利国王。作为这次妥协的结果，1.2万名前拉科齐叛乱支持者在索特马尔发誓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索特马尔和约》使得查理六世赢得了匈牙利地方议会对国事诏书的支持，确保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世袭君主体制的存在——只要这个王朝可以产生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作为重建的匈牙利王国的统治者，查理重新组织了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产生匈牙利第一个现代化、集权化的权力体系。他建立了一支基地在匈牙利的常设军队，主要由非贵族的匈牙利和外国士兵组成，其中前者只代表了三分之一的武装力量。在维也纳的帝国军事委员会保持对军队的权威，并且政府从匈牙利臣民手中征收赋税，为军队提供财政支持。在查理六世统治下，匈牙利的宗教政策与在波希米亚实行的政策类似，禁止改宗新教信仰并且要求公职人员是天主教徒。

查理六世于1740年去世，他的女儿玛丽娅·特蕾莎(1740—1780年在位)获得了哈布斯堡王位，继承查理成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的统治者。她在启蒙运动的世纪中的统治具有专制主义政策和改革相混合的特征。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迈向了近代时期，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也进入了民族主义年代。

**注释：**

1 František Šmahel, "The Hussite Movement: An Anomaly of European History?" in *Bohemia in History*, ed. Mikulaš T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1.

2 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homas Garrigue Masaryk)《一个国家的形成，回忆录和观察 1914—1918

年》(*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1914 -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7)的引言中引用。

3 Lonnie R. Johnson, *Central Europe: Enemies, Neighbors, Frien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6.

# 第五章　进入近代时期：改革、革命和民族觉醒（1740—1914年）

93

18 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欧洲进入了启蒙运动时期，见证了批判性和探究性精神的传播，那是由源于前一个世纪的科学普及和知识突破为前提的信仰所激发。到 18 世纪中叶，启蒙运动达到了成熟阶段，批判精神激发了有关社会和政治生活理性重构的新思想。取代了褊狭、非理性和专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发扬理性、幸福、自由的世俗主义和人性。人们普遍认同，趋向个人和公民自由的发展要求国家依据社会契约和理性的自然法则进行治理，尽管主要的哲学家对于国家应该采用何种形式仍旧有分歧。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信条助长了一个明显与类似的现状批判格格不入的知识环境，这与普鲁士和俄罗斯的情况相似，虽然原因不尽相同。这使得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控制在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手中，他们尽管也受到法国人作品的激励，倾向于将创建一个由仁慈的统治者领导的、理性的、有秩序的和专业治理的国家视为人民的福祉。反映在约瑟夫二世改革之中的这种理论导致了“开明专制主义”，或者说受管理的“来自上面的启蒙”，这与即将在法国发生的自由和民主的“来自下面的革命”截然相反。

94

## 玛丽娅·特蕾莎的当权

在 1740 年 10 月继承父亲查理六世的王权时，玛丽娅·特蕾莎(1740—1780 年在位)23 岁，她父亲 1713 年的国事诏书使得这个王朝的女性成员统治哈布斯堡领土成为可能。在巴洛克宫廷中长大的玛丽娅·特蕾莎，对罗马天主教信仰极其虔诚，对于启蒙运动的哲学作品不具有自然亲和感。然而，战争和治国方略的现实刺激她在“开明专制主义”的精神指引下实行改革，目的是创建一个组织更加合理的国家和经济体系，以此作为面对外部威胁和内部问题的手段。

玛丽娅·特蕾莎面临着来自查理·阿尔贝特的直接挑战，他是巴伐利亚选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波希米亚国王约瑟夫一世的女婿。查理·阿尔贝特拒绝接受国事诏书，并为自己索取奥地利和捷克国土，为了这个目的，他还于 1741 年与法国缔结联盟。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新近加冕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试图夺取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富饶地区和波希米亚西南部分地区的时候。继起的奥地利继承权战争(1740—1748 年)包括了对奥地利、捷克领土、意大利和奥属尼德兰等地区的争夺，以及英法之间在北美和其他海外领土上的敌对行动。同萨克森对摩拉维亚和上西里西亚的要求一起，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索求几乎成功地分割了捷克王权领土。

查理·阿尔贝特入侵波希米亚，并于 1741 年 5 月长驱直入布拉格，于是波希米亚多数政治集团选择承认他为波希米亚国王。玛丽娅·特蕾莎在匈牙利赢得了圣斯蒂芬王冠，并且请求匈牙利人的支援，她如愿以偿并将为此在后来报答匈牙利人。查理·阿尔贝特于 1742 年离开波希米亚首都，出席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礼，不过随后的一年，玛丽娅·特蕾莎的军队发起的一次成功进攻将巴伐利亚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军赶出了波希米亚。玛丽娅·特蕾莎于 1743 年 5 月在圣维图斯教堂接受了波希米亚王位。1745 年，查理·阿尔贝特去世，由于作为一名女性，玛丽娅·特蕾莎不能为她自己获得皇权的选举资格，经过协商，由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获得帝国皇位的选举资格，



95

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

奥地利继承权战争随着1748年《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的签订而渐近结束，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丢失了大部分他们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西里西亚及其在纺织和冶金方面的资源。对于玛丽娅·特蕾莎和她的大臣们来说，战争清楚地展示了普鲁士对奥地利人的军事优势。她对此的反应是在奥地利和捷克领土上开始一次重组和集权的进程，以此现代化和强化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机构。作为战争期间给予玛丽娅·特蕾莎援助的结果，匈牙利人获得了许多好处，虽然他们被鼓励增加农业产量，却终究幸免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集权化过程。这被证明是1867年二元君主国创建之前，标志哈布斯堡家族东西部领地的不同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西里西亚的丧失驱使玛丽娅·特蕾莎和她的大臣们接受改善这个国家财政状况的措施，并且鼓励波希米亚的工业化以补偿西里西亚工业产品的损失。到1754年，捷克王室领土上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得波希米亚的居民数量达到210万，而摩拉维亚是90万。将波希米亚和其他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地域的疆土纳入一个集权化的和管理良好的国家成为玛丽娅·特蕾莎政策的首要目标，此外她的目标还有推动经济增长和创建一个更加稳定和有效率的国家财政体系。

1749年，玛丽娅·特蕾莎解除了分离的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法务大臣职位，随后引入共同的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联合法务大臣职位和一个新的最高法院负责司法事务。此外在1753年，地区性事务纳入来自维也纳的更加直接的控制中，此时官员们成为地区性官僚机构领薪水的公务员，代替了传统习惯上由政治集团成员组成的管理机构。十年之后，分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权力从捷克各政治集团转移到被称为“地方行政长官”(*gubernia*)的王室官员手中，他们由维也纳任命并被授予税务和军事的权威。1775年在奥地利和捷克领土之间建立的关税联盟将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拉得更近，并且推动了波希米亚王国独立性的进一步丧失。

96

未解决的紧张局势和地区争端导致七年战争(1756—1763年)于

1756 年爆发。普鲁士对奥地利盟国萨克森的入侵引发了冲突，继而普鲁士人进军波希米亚北部，并于 1757 年围困布拉格，之后奥地利反击将普鲁士人赶出这座城市，并使其陷入科林战役的溃败中。哈布斯堡、法国和俄国联军在 1759 年和 1760 年的几次战役中击败了腓特烈二世，不过法国对奥地利的支持因其在海外受挫于英国人而减损，而伊丽莎白女王死后的王朝斗争导致俄国于 1762 年退出战斗。结果，玛丽娅・特蕾莎被迫于 1763 年再次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有，由此国土减少到前普舍美斯王朝的版图：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几个公国。

在她的丈夫于 1765 年去世之后，玛丽娅・特蕾莎的儿子被推选继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玛丽娅・特蕾莎任命约瑟夫担任哈布斯堡领土的联合摄政者，不过她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的儿子篡夺自己的权力。与玛丽娅・特蕾莎不同，约瑟夫(1765—1780 年联合执政;1780—1790 年独立执政)不相信天主教会，对启蒙运动的科学和哲学欣然接受，他是在欧洲大陆旅行中吸收这些的，其间他阅读诸如伏尔泰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并且在两次旅居法国期间与主要的启蒙运动人物会面。

约瑟夫持有开明的信仰，相信国家必须沿着理性路线进行组织，才能使得政府和社会的所有元素和谐地运转，满足一个受教育的、健康的和有能力过上丰富多彩生活的人民的利益。创建一个有组织的、集权的、繁荣的和强大的国家将经历一个官僚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通过实用的改革，并在启蒙理性主义的精神指导之下，重新组织国家和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七年战争，国债增长，要实现哈布斯堡治下的财政健康必须施行新的社会和财政措施。在波希米亚的国土上，农民继续承担劳役(*robota*)的重负，还要上缴有限收入中的 70%给地主、教会和国家。广泛的饥荒导致 1771 年的悲惨状况，在波希米亚有 50 万人死亡，人口减少了差不多 12%。在 1771—1772 年私下调查波希米亚的形势之后，约瑟夫对他所观察到的状况深感不安，为此他设置了一个调查团来保

97

证政府对农民和地主的需求予以更公正的分配。1775 年,波希米亚东北部的一次农民起义强调了农村改革的需要,那将在某种程度上减缓农村地区的贫困,并且避免将来的社会剧变。

##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在 1780 年玛丽娅·特蕾莎去世之后,约瑟夫二世通过实行规范帝国生活许多领域的改革来使自己与他母亲的保守主义疏离。1781 年的宽容特许证给予新教徒、正教徒和犹太人宗教自由,并由此解除了自 1620 年的白山起就已在波希米亚存在的对新教的限制。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和其他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土地财产,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职务,开办学校并且进入以前被禁止的行业。然而,天主教仍旧是被允许在公众环境中公开运作的唯一信仰,其他礼拜堂被禁止具有入口、尖顶或其他标记其宗教目的的建筑或设计元素。1784 年,约瑟夫下令关闭了数座教堂、修道院和修女院,使用这些财产作为对穷人的教育和救济的支持。

尽管完全的法律解放在 19 世纪晚期之前不会到来,约瑟夫二世的宽容法令为犹太人扩展了经济和职业机会,以此作为增加他们对国家的价值并使他们忠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手段,不过土地财产的所有权仍旧是被规避的权利。随着大学接收犹太学生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社区接受政府支持开办由国家管理的学校或者在投资教育显得困难的地区输送孩子们前往德意志—犹太人小学,教育机会得以增长。然而,政府有关语言使用的政策妨碍了犹太人用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保留商业和集会的记录。随着犹太公民获得个人自由,现代化带来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上更大的公民社会融合,不过这也侵蚀了犹太人社区在地方治理和文化不同领域的传统自治。

约瑟夫二世最激进的改革体现在 1781 年的农奴特许证中,废除了个人农奴并准予农民婚姻、旅行、追求教育、参与贸易或者在不需要地主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定居的自由。农民还获得了对地主提出投诉和诉讼的权利,尽管该特许证并未废除劳役(*robota*)范围内对地主和国家

的劳动或财务责任。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重建了更加公平和国家调节的税务分配制度，农民从中受益，由此获得的土地可以用现金补偿地主。改革没有消除农民的财务问题或者给予他们土地的所有权，不过它们提供了解放以及教育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次机会。然而在约瑟夫二世死后，贵族阶层的坚决反对导致了农奴特许证的废除和新政策的逆转。

约瑟夫更进一步的改革放松了对出版和出版物的限制，解除了教会对审查制度和禁书“书目”的监督。刑法统一法典的颁布将所有公民置于一个平等的法律基础上，作为合法审查而使用已久的处决方式、惩罚手段以及拷问被废除。随着德语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多民族国土上行政和高等教育的正式语言，语言成为行政和教育统一性的工具。1784 年，布拉格大学正式用德语替代拉丁语作为教学的语言。

到 1789 年，约瑟夫二世的健康状况已极其糟糕，并且遭受其政策受挫和对他的改革和集权化政策的抵抗——这种抵抗在反叛的贵族阶层、农民和匈牙利知识分子中尤为明显——的沉重打击。1790 年 2 月约瑟夫死后，由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 年在位)继位，后者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外交危机并且努力恢复哈布斯堡国土上的稳定局面。与捷克人积极的关系使得利奥波德二世于 1791 年 9 月 6 日接受了圣瓦茨拉夫王冠，此前他曾从维也纳归还了这顶王冠。然而，由于利奥波德二世在协商给各政治集团的特许权的过程中废除了许多他哥哥的政策，他的短暂统治给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开了倒车。

## 18 世纪的斯洛伐克

99

斯洛伐克国土在开明专制的年代支撑了 200 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民是斯洛伐克裔。斯洛伐克的城镇和城市保持小规模，其中最大的城市地区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有 1 万人口。作为匈牙利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保持相对未受玛丽娅・特蕾莎的税收改革以及哈布斯堡国土上的军事行动的影响，而且也不是 1775 年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之间建立的关税联盟的一方，不过斯洛伐克依旧是对匈牙利经济至关重要

的一个地区。

集权化政策和国家的重组被证明在匈牙利更加难以成功实施,原因是匈牙利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约瑟夫二世对匈牙利人抵抗的回击是拒绝接受圣斯蒂芬王冠并且在 1789 年之后的十年中未再召集地方议会开会。约瑟夫对匈牙利各县的持续反对和主管贵族对他的政策无效率的执行作出了反应,他于 1785 年废除了在匈牙利长期存在的行政体系,用国家任命的公务员替换了传统上管理这些县的贵族。匈牙利此时由十个地区组成,每个地区有四或五个县,其中有三个——科希策、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尼特拉——位于斯洛伐克境内。与波希米亚和其他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地区一样,德语早已在前一年成为匈牙利行政机构的官方语言。

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其他改革也影响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教育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延伸识字能力和学校教育到每个人来塑造更优等的公民,无论其背景如何。维也纳大学为特尔纳瓦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起了模范作用,该教育机构于 1777 年搬迁至布达,由此使斯洛伐克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知识和文化中心。1777 年,玛丽娅·特蕾莎教育体系(*Ratio Educationis*)从小学到大学重新组织了天主教教育体系,使得非天主教徒有权进入所有等级的学校接受教育。1786 年,德语成为匈牙利小学等级以上的教学语言。

与其他地方一样,约瑟夫二世最激进的改革处理了匈牙利的社会和宗教问题。1781 年的《宽容法令》给予非天主教徒公平,并且允许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应用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有关公众信教的相同限制条件内进行礼拜。1785 年,农奴特许证废除了农奴制并且重新定义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

100 到 1789 年,匈牙利的大部分县都在表达对义务提供士兵和补给给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交战的约瑟夫军队的抱怨。县议会的拒绝合作已经到了武装起义在匈牙利看来迫在眉睫的程度。约瑟夫的顾问建议将特许权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抵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正是这一年见证了 1789 年 7 月 14 日发生在巴黎的巴士底狱的风暴。1790 年 1 月

28 日，约瑟夫二世宣布他将撤回他的所有改革，除了《宽容法令》和废除农奴制之外。他还将匈牙利所有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恢复到他统治开始时的状态，并且承诺于 1791 年召开匈牙利地方议会。然而，随着他的匈牙利政策的破产，约瑟夫二世在不久后去世。

凭借约瑟夫在 1790 年的行动，匈牙利重新赢得它作为一个王国的独立性，具有独特的民族权利，服从于匈牙利法律并且由合法占有圣斯蒂芬王冠的君主统治。受到这种民族权利被承认的激励，匈牙利的精英分子信奉一种新马扎尔民族主义，这是在一个真正马扎尔国家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在那里，非马扎尔多数民族的人口将通过“马扎尔化”的过程被同化。旧匈牙利及其多文化概念的爱国主义走向终点，匈牙利现在面临着两条可能的发展途径：作为一个统一的马扎尔文化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或者作为一个包含多民族——马扎尔、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鲁塞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国家。

##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出现

大摩拉维亚帝国消失后的几个世纪里，斯洛伐克人从未处在一个发展自己独立历史的位置上。生活在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人明白，语言和种族特点将他们与马扎尔人、日耳曼人，甚至他们的斯拉夫兄弟——捷克人、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区分开来。作为一个早期的发展阶段，大摩拉维亚时期提供了诸如西里尔和美多德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过这些历史人物也被其他斯拉夫人分享。斯洛伐克人缺乏神话起源，正如捷克人在切赫、莉布舍和其他传奇人物的故事中创造的那样。作为结果，民族特性趋向于跟语言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导致了有关斯洛伐克语言何时第一次作为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斯拉夫地方语言出现的争论。

在宗教改革期间，《克拉利采圣经》的普及使得圣经捷克语(比布利奇蒂纳，*biblĭčtina*)在斯洛伐克获得了语言立足点，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被“斯洛伐克化”或者说可以被改编为口头斯洛伐克语的书面语言。在斯洛伐克的新教徒用“比布利奇蒂纳”写作，并且在他们的礼拜

101

仪式中使用，转而在 1620 年的白山挫败之后帮助保存了捷克新教徒的作品。

当反宗教改革开始重新天主教化斯洛伐克的过程时，在特尔纳瓦的耶稣会教士利用他们的印刷机来传播用被称为“耶稣会斯洛伐克语”的语言所写的作品，这是新教徒的“比布利奇蒂纳”的一个替代品，是通过基于受过教育的斯洛伐克西部居民口音的书面语言传递给斯洛伐克人民的一种方式。新教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路德教派的——偏向于用“比布利奇蒂纳”写作，而斯洛伐克高等贵族阶层适应于与他们同等的马扎尔人的语言和文化，低等贵族阶层和农民则用斯洛伐克语的地区性方言交流。

1787 年，天主教牧师安通·贝尔诺拉克出版了一部有关哲学的作品，在书中他试图为一种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建立基础。在布拉迪斯拉发上神学院的时候，贝尔诺拉克曾与神学院的其他学生一同工作，创作斯洛伐克语译本的圣经。1790 年，贝尔诺拉克开始他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编纂，他出版了《斯拉夫语语法》(*Grammatica slavica*)一书，这借鉴了更早的一本有关捷克语语法的书。

1792 年，贝尔诺拉克在特尔纳瓦组织了斯洛伐克语学社，推广他的书面语言——贝尔诺拉奇纳(*bernoláčina*)，或者说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的使用。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将中部和西部方言的元素与耶稣会斯洛伐克语和方言的特征结合在一起。“贝尔诺拉奇纳”在形式和结构(词法)上非常接近捷克书面语言，不过发音的模式(音韵)明显不同。第一部用“贝尔诺拉奇纳”写的作品出现在 1789 年。贝尔诺拉克在 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着手一本斯洛伐克语的捷克语—拉丁语—德语—匈牙利语词典的工作，他却在这六卷本在 1825—1827 年出版之前于 1813 年去世了。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贝尔诺拉克的工作和相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的贡献将斯洛伐克语言与捷克语分离，不过贝尔诺拉奇纳从未获得斯洛伐克新教徒的支持，他们继续用书面捷克语写作，或者使用更偏向于他们本地口音的斯洛伐克语。

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两位路德教牧师之子扬·科拉尔和帕维尔·

约瑟夫·沙法里克开始推广一种通用的“捷克—斯洛伐克”书面语言，以此作为通过一种共同的文化团结相邻的斯拉夫人民的手段。在德国求学时，科拉尔接受了由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等浪漫主义时期哲学家和作家所定义的“民族”概念。赫尔德、费希特和浪漫民族主义的宣扬者将一个民族看做是本质上有组织的，是由语言、传统、地理和血统定义的。在科拉尔的泛斯拉夫版本中，存在一个由四种语言代表的宽泛的斯拉夫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波兰和南斯拉夫。鉴于贝尔诺拉克曾把斯洛伐克人看做是在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统治范畴之内的，科拉尔及其同伴沙法里克根据后者在他对斯拉夫古代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中发现的证据，将斯洛伐克人定义为更宽泛的古代斯拉夫文化和传统框架内的一个民族。作为结果，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势在必行的是抵制马扎尔化的民族同化主义政策，并且转向捷克人和一个斯拉夫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是建立在旧的圣经捷克语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捷克—斯洛伐克语言的基础上。

102

尽管科拉尔和沙法里克的泛斯拉夫理论得到了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共鸣，其他人却拒绝将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觉醒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与捷克人没有多少共同的历史。由于沙法里克用捷克语写作并于 1833 年移居布拉格，他与科拉尔成为捷克民族觉醒的关键人物，这同样也发生在这几十年里。

赫尔德曾警告马扎尔语言和文化将很快被斯拉夫人民压倒，这似乎在为马扎尔化的文化同化政策辩解，该政策在匈牙利国土上将斯洛伐克文化和语言归入主导的马扎尔文化之下。马扎尔化对斯洛伐克文化和语言的直接威胁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团结一致，他们相信一种共同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创建对于斯洛伐克身份的保留极为重要。

一名路德教学者卢多维特·什图尔对泛斯拉夫主义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尽管日耳曼人表现为以他们共同语言为基础的一个独特的民族，但斯拉夫人民和他们语言的多样性阻止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斯拉

夫民族。相反的,斯洛伐克人表现为斯拉夫民族之内的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对他们自己的政治事务的一些控制方式都具有天赋权利。

1846 年,什图尔出版了一部作品,抵制科拉尔和沙法里克对捷克—斯洛伐克语言的召唤,转而提议就斯洛伐克书面语言达成一项协议。什图尔早已在数年前完成他自己新教式的斯洛伐克语言的整理,由此他的"什图罗夫奇纳"(*štúrovčina*)——或称为什图尔斯洛伐克语——成为语言研审的焦点。"什图罗夫奇纳"借鉴了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的元素,但是使用了斯洛伐克中部的塔特林方言,原因是其对那些生活在斯洛伐克国土东部和西部的人来说都浅显易懂。天主教徒普遍拒绝使用"什图罗夫奇纳",直到 1851 年的一次妥协导致天主教徒对"贝尔诺拉奇纳"和新教徒对"比布利蒂奇纳"逐渐疏远。[1]

103

##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1789 年,正在法国蔓延的政治危机进入一个大变革阶段,7 月 14 日巴黎群众攻陷皇家要塞巴士底狱。法国平民以"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名义占领街头,寻求天赋人权和对一个以专制主义统治和精英阶层的控制为特征的政治体系的参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利奥波德二世早先曾显示出一些对开明改革的赞同,不过法国大革命的开场事件促使他考虑目标直指在他自己国土上避免剧变的政策。然而,当路易十六于 1791 年接受新宪法,利奥波德认为,随着法兰西发展进入君主立宪制的新时代,变革的威胁将会减弱。

在 1792 年 3 月利奥波德死后不久,弗朗茨二世(1792—1835 年在位)继承他父亲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统治者,并于 7 月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然而与他父亲不同,弗朗茨拒绝接受哪怕是温和改革的要求。相反的,这位新皇帝转变了近几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路线,公开支持保守的价值观,并且推动欧洲针对改革扩散的防卫。1792 年 4 月 20 日,法兰西立法会议向作为哈布斯堡国土统治者的弗朗茨宣战,接着普鲁士很快与奥地利一起加入数个反法同盟中的第一

个。弗朗茨二世的统治终结了任何进步的希望，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支配着哈布斯堡事务进入 19 世纪早期。

随着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完成了对波兰的分割，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得以增加，不过 1796—1797 年间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战役中对法军战果寥寥。哈布斯堡军队在马伦戈和霍亨林登败给了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国军队，随后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于 1797 年结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799 年的冬季，俄国部队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穿越了波希米亚，接着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回国途中又回到那里。于是，波希米亚直接暴露在斯拉夫土地上最强大的战士面前，而这恰恰发生在捷克人的民族复兴之时，提醒他们关注地处东方的俄罗斯帝国的文化和军事力量。

104

1804 年，弗朗茨利用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宣布自己为奥地利帝国皇帝，这是一个由包括波希米亚及其圣瓦茨拉夫王冠的所有哈布斯堡国土组成的帝国。从 1804 年到 1835 年，他将作为弗朗茨一世，首位奥地利皇帝统治奥地利，并且是 1806 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前仅有的一位持有那两顶皇冠的统治者。

在自己加冕为拿破仑一世皇帝之后，拿破仑·波拿巴再一次将矛头转向奥地利人，这是他们拒绝在法国与英国的冲突中宣布中立的结果。拿破仑于 1805 年 11 月进军维也纳，随后的 12 月 2 日，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城外的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赢得了对奥地利和俄国联军的大胜。奥地利接受《普雷斯堡和约》暂时结束了战斗，1806 年 8 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退位，在这之前，拿破仑创建了由 16 个成员国组成的莱茵联邦，宣布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合时宜。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进一步侵蚀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地位，该王国曾长期持有选举皇帝的权利，并且派遣代表就任于帝国议会和其他帝国机关。拿破仑的军队于 1805 年占领以及 1809 年再次占领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特尔纳瓦和斯洛伐克西部地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最初希望在拿破仑那里找到盟友。然而，后一次对布拉迪斯拉发的围困造成了这座城市的重大破坏，还包括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焚毁和邻近的位于多瑙河和

摩拉瓦河三角地带上的德温城堡的破坏。

1812 年,奥地利军队与拿破仑大军一起入侵俄国,不过随着战局的推进,奥地利人同意与俄国休战,接着在 1813 年加入四国同盟成为俄国、普鲁士和英国的盟友。1813 年 10 月,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翌年 4 月退位,弗朗茨一世和他的外交首脑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主持了维也纳会议,会议在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复辟以 1815 年 6 月他在滑铁卢的最终失败而告终后不久完成其使命。

由于维也纳会议,奥地利丧失了对奥属尼德兰的索取权,以此作为对一些失地和获得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回报。奥地利还赢得了为取代不再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成立的有 39 个成员的德意志联邦的主席地位,该联邦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地区都包括在内。列强——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英国——同意在恢复合法统治者、创建一套稳定的国家体制和镇压欧洲革命等方面进行合作。奥地利的梅特涅成为这套新的保守秩序的拥护者,并且在 1821 年被任命为首相之后,利用集权化的官僚机构、警察和审查员压制奥地利帝国内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威胁。

105

## 捷克民族复兴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早期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认同感在捷克民族复兴中也有一个相对应的版本。捷克民族复兴始于启蒙运动的最后几年,并导致了近代捷克国家的发展。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集权化改革直接影响波希米亚王国并且造成这个王国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其独立性,此时,捷克人还未曾完全丧失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地位的历史性权利。在民族主义时期,保留历史性权利的努力使捷克人区分于斯洛伐克人,后者由于缺少一个历史性的国家,转向了在定义他们在马扎尔人统治下的地位中天赋人权的概念。

18 世纪初期,波希米亚仍是一个以大块地产和小规模农耕为特征的王国。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哈布斯堡的政策鼓励工业化,经济扩张始于诸如纺织、铁和玻璃等领域。1781 年农奴的废除将农民从封建限制

中解放，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人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人口的迁移不仅扩大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也使城市地区说捷克语的居民比例得以增加。

1620 年在白山战败之后，捷克语的地位下降为一种书面语言，正如它被斯洛伐克新教徒通过使用圣经捷克语(或称为“比布利奇蒂纳”)保留在他们的祷告文和作品中那样。德语已经取代捷克语成为贵族阶层和高级教士的语言，不过捷克语仍旧是平民——农民和教区牧师，后者的活动要求熟悉本地话——的口头语言。在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统治下，新的职业官僚机构采用德语作为行政语言，不过公务员被要求与说当地方言的人口进行交流。

用捷克语言进行教育的需求，加上一个捷克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导致了在维也纳的捷克语言和文学的教授职位的创建，后来在波希米亚，利奥波德二世于 1791 年在布拉格大学创建了一个类似的职位。捷克学者和作家研究捷克语言和过往的文学作品，还将外国作品翻译成捷克语。剧院演出捷克戏剧或者翻译为捷克语的外国戏剧。甚至在 1781 年约瑟夫二世对审查限制放松之前，民族文化已在启蒙运动期间遍地开花。18 世纪期间，德语、拉丁语和捷克语图书普及开来，其数量在这个世纪末得到引人注目的增长。 106

捷克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属于波希米亚贵族阶层和学者们，例如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同代人，他们复兴了对波希米亚历史的兴趣，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在他们的波希米亚“乡土爱国主义”(*Landespatriotismus*)中，波希米亚贵族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定义“民族”为在社会上引领这个王国政治生活的团体，意指贵族自己。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的改革威胁了贵族阶层的传统角色和权利，波希米亚贵族指望过往的历史和唯一的波希米亚王国的独立地位可以保卫那些权利。启蒙运动给波希米亚爱国主义演变添上的是个人生活地区的鉴别元素——就忠于波希米亚王权国土的捷克人而言——和说德语贵族的波希米亚日耳曼人的自我鉴别。

由于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鉴别，爱国的贵族趋向于强调历史材料、

历史神话和民族英雄——诸如圣扬·内波穆基(内波穆克的圣约翰),其 1729 年被追封并且以查理大桥上的雕塑为纪念——的收集。贵族的赞助导致了爱国主义社团的创建,并且为 1818 年 4 月布拉格国家博物馆的开馆提供资金支持。

与他的同道人格拉休斯·多布内尔一起,语言和历史学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从事于捷克历史研究工作,目标是驳斥围绕在圣扬·内波穆基周围的神话,他被认为于 1393 年被人受瓦茨拉夫四世的指使,从石桥(现在的查理大桥)抛入伏尔塔瓦河。对这名教士惩罚的所谓理由是他拒绝就王后的告解亵渎告解室的圣洁。然而,历史记录的一次调查支持这样的推测,这位圣人实际上是基于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被耶稣会教士合并在一起,以此用他们自己的天主教英雄来反击新教英雄扬·胡斯的名望。

多布罗夫斯基的历史研究赞美了捷克语言和文化独一无二的个性,这使得正在试图将自己与哈布斯堡改革疏离的捷克贵族感到满意。1783 年,多布罗夫斯基与弗兰蒂舍克·马丁·佩尔茨尔合作出版了捷克语作品的第一卷,其中包括了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的历史记事。多布罗夫斯基对捷克语言的整理以及他的《捷克语言和文学的历史》和《捷德词典》的出版,使他成为捷克民族复兴中的主要人物。处在多布罗夫斯基工作核心的是他的信仰,正如他在 1791 年的演讲中表达的,1620 年的白山之战代表了捷克人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他们从失败中走来,是一个仍要从民族悲剧中恢复过来的破碎民族。

107

对英雄过往的搜寻和定义捷克民族独特特征的学术努力,随着 1817 年所谓的《王宫手稿》(*Rukopis královédvorský*)以及一年之后的《绿山手稿》(*Rukopis zelenahorský*)的发现似乎获得了重要的证据。作家瓦茨拉夫·汉卡将《王宫手稿》公之于众,此前他宣称在一座教堂的塔楼里发现了它。这份包含捷克人打败外国入侵者的歌词和文字的 13 世纪手稿据称是最古老的用捷克语言写的文件。一年之后,第二份手稿在绿山(Zelená Hora)被发现,似乎是在 10 世纪写下的,这意味着它在时间上早于中世纪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lied*)。

这些为人所知的 RMZ 手稿成为捷克爱国者的自尊心的重要源头，因为它们提供证据表明，捷克语言和文化与那些日耳曼人及其他主要欧洲民族的一样古老和有价值。然而，尽管这些手稿将在数十年里影响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它们在 19 世纪末被揭穿是伪造品。

19 世纪初，捷克民族的概念普遍包含所有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居民，对于很多人来说，由于已存在的紧密语言关系，还应包括斯洛伐克人。不过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创建和斯洛伐克民族身份的萌动渐渐破坏了创建一个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或“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和文化的努力。在经济发展方面，由于工业化在波希米亚持续高速迈进，捷克人也比斯洛伐克人走得更远。随着现代化持续改变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捷克中产阶级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得到增长，在捷克民族复兴的第二阶段中，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并扮演活跃角色。

19 世纪上半叶，波希米亚人口从 1815 年的 480 万增长到 1847 年的 670 万，尽管在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霍乱以及在 1836—1837 年和 1843 年又有两次较小规模的复发。那时，在波希米亚说捷克语者的比例大约在 60%，而在摩拉维亚是 70%，不过口音略有不同。在奥属西里西亚，由于日耳曼裔和波兰人的大量存在，说捷克语者只占人口的 20%。 108

浪漫民族主义和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为 1815 年之后的下一阶段民族觉醒提供了动力，尽管审查制度作为警察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行省的一项功能，依旧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借鉴了赫尔德、费希特及其他浪漫民族主义哲学家之后，捷克爱国者把他们的演变看做是从绵延数世纪的反抗外国压迫——尤其是对于日耳曼人——的自由斗争角度上的“历史性民族”。在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斯拉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民族，与霸道的日耳曼人相反，他们对捷克人的侵略培育了后者的民族和文化自卑感。此类场景可以在《名望之女》(*Slávy dcera*，1824 年)中被发现，这是斯洛伐克新教作家扬·科拉尔极具影响力的诗作，他用捷克语民歌和作品集来推动捷

克民族复兴。

然而，与赫尔德和其他人把“民族”等同于语言、文化和血统相反，法国大革命曾定义“民族”为人民，或者具有天赋人权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愿望的公民。对于许多捷克爱国者来说，文化和身份的重新觉醒与合法自由、政治代表以及波希米亚王国历史权利恢复等自由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当捷克人寻求转变他们作为没有国家的民族的状态时，民族意识变得直接与民族权利相关联。

浪漫民族主义在波希米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语言学家及教师约瑟夫·荣格曼，他于 1840 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荣格曼对捷克语言的兴趣根源于他的爱国主义和创建一种不仅仅是商铺和乡间的方言的捷克语言的愿望。他相信，只有在他或她把捷克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形式来讲的时候，一个人才真正是捷克人。荣格曼因此着手发展捷克语成为一门适合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语言，一开始是通过把诸如歌德、席勒和弥尔顿(《失乐园》)等外国作家和学者的作品翻译为捷克语。在 19 世纪 20 年代前期，荣格曼出版了捷克语读物《文学(诗论：附有关于文体的短评的范文集)》(*Slovesnost*)和第一本捷克文学当代史，此后一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致力于完成五卷本捷德词典的工作。与摩拉维亚新教历史学家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及其他人一起，荣格曼成立了多个科学和学术社团，其中的一个在 1831 年承办了文学组织“捷克之母”(*Matice česká*)的创建，该组织出版了荣格曼的词典。

19 世纪前几十年见证了对作为捷克民族英雄的扬·胡斯和胡斯信徒以及诸如夸美纽斯的《世界的迷宫》等在白山之后曾被查禁作品的兴趣的复活。在他的多卷本《捷克民族史》中，帕拉茨基从斯拉夫人在与扩张主义的德意志人的法律和文化的长期斗争中的浪漫化视野着手，阐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历史。在帕拉茨基对捷克历史的诠释中，正如胡斯信徒及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民主意识的斯拉夫人曾经投身于反抗德意志封建主义的武装斗争，抑或是选择合作的途径，作为保留他们的斯拉夫文化身份的手段。这部作品的前三卷于 1836—1842 年由“捷克之母”用德语出版，而第一卷捷克语本出现在

1848 年 3 月。

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与民族运动有关联的组织开始出现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地的城镇中。女性的参与曾经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而受到限制，现在她们可以参加以文化活动、爱国歌曲和其他民族自豪感的公众展示来歌颂捷克民族主义的团体。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数量持续增长，它们推动捷克文学和音乐并且引领有组织的访问成员前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作家博热娜·内姆措娃由于她对民间传说的搜集和她为人们深爱的小说《祖母》(*Babička*，1855 年)，还有与其他主要捷克爱国者合作的作品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女创始人。[2]

1840 年 2 月，歌词作者约瑟夫·卡耶坦·蒂尔组织了一次舞会，庆祝布拉格首座捷克剧院的开张，而当门票、节目单和其他文件都用捷克语印刷之时，这个活动赢得了巨大的反响。蒂尔早就因为他的歌剧《菲德洛娃奇卡》(*Fidlovačka*)获得了个人声誉，该剧于 1834 年年末首演，其中包括了歌曲《家在何处?》(*Kde domov můj?*)，后来被采纳为捷克国歌。

19 世纪 30 年代末，波希米亚各政治集团获得维也纳的许可，任命帕拉茨基作为他们的史官，并且在 1843 年邀请这位学者支持一次有关白山之后的政治集团构成的演讲计划。帕拉茨基对最近的几位哈布斯堡统治者公开表示不满，而他把胡斯信徒当做捷克民族英雄的热情推崇，丝毫没有拉近他与奥地利当局的关系。帕拉茨基有关政治集团固有权利的演讲充当了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暗示，那些自从哈布斯堡王朝的集权化措施之后就已消失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地方议会的政治权力。1847 年 2 月，政治集团发起了一次对他们权利的正式要求，不过随后被维也纳的帝国政府拒绝。由帕拉茨基担任顾问的波希米亚议会在 5 月以《捷克政治集团固有权利的合法延续性的扣减》一文进行回击，并将文件提交给斐迪南一世(1835—1848 年在位)。在 8 月的会议中，各政治集团通过拒绝接受政府的税务提案发起进一步的挑战，不过他们的行动未能阻止所需税赋的征集。

110

从这个世纪开始之初到 1848 年革命的开端，捷克人在发展与波希

米亚贵族阶层的乡土爱国主义以及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日耳曼自由主义的日耳曼波希米亚意识形态都不尽相同的民族意识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根据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关系来定义捷克民族,进而导致许多人接受泛斯拉夫主义或者推崇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后者是认为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合作会使所有的斯拉夫人达成他们目标的一种信仰。对于捷克人来说,这意味着在帝国之内更大的自治和历史性权利,以及波希米亚王权国土之内的日耳曼裔和捷克人之间的平等。[3]

## 1815 年之后的斯洛伐克人

拿破仑垮台之后的那段时期,对斯洛伐克人来说,以下滑的粮食价格和 1817—1818 年斯洛伐克东部的饥荒作为糟糕的开始。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期间,封建主义在农村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存留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分别在 1820 年和 1831 年两次激起农民起义。

出于相信帝国政府中有人同情匈牙利的斯拉夫民族,斯洛伐克人领袖于 1842 年递交了一份申冤请愿书给梅特涅首相,要求在佩斯大学创建一个斯拉夫语言教授职位、保护教堂和学校以免进一步的马扎尔化以及继续在学校中教授斯洛伐克语言。当请愿书由一个代表团呈送时,帝国当局表现出对此丝毫没有兴趣,而诸如拉约什·科舒特等匈牙利自由主义者批评斯洛伐克的行动是叛国。1844 年,匈牙利议会强制将马扎尔语作为在匈牙利的行政和教育语言,结束了在那些背景下拉丁语的传统使用。

111

作为重要的自由民族主义者,科舒特推动了改革和民族团结,不过他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彻底是马扎尔人的。科舒特相信匈牙利的非马扎尔民族应该被同化为匈牙利民族,而且既然斯洛伐克人对历史性的国家权利没有任何主张,他们在分离的地区标识和行政管理方面不应得到考虑。1847 年,科舒特进入匈牙利议会,在那儿他与斯洛伐克民族复兴派卢多维特·什图尔共事,后者的《由于马扎尔人滥用权力导致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不满和抱怨,由一位匈牙利斯拉夫人收集》(1843

年)一书被匈牙利出版商拒绝之后，曾在莱比锡出版。在他作为政治家的身份上，什图尔为了社会和经济改革而据理力争，其中包括农奴制的废除，不过他对捷克民族利益的推动未能在议会同僚中形成支持。

## 1848—1849 年的捷克人和革命

1848 年 2 月末，随着骚乱迫使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退位，路障出现在巴黎街头。这次革命暴力行动的爆发引发了 3 月席卷欧洲的起义，当时群众占据街头，希望改变社会和政治现状。由于社会巨变同时出现在许多欧洲国家首都，1848 年的革命之年似乎提供了“民族春天”的承诺，那将达成从巴黎到维也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变革目标。

3 月 11 日，民族组织“波希米亚呼吁”中的激进派成员计划在布拉格新城的圣瓦茨拉夫浴场主持一个大型集会。“波希米亚呼吁”由中产阶级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创建，目标是从帝国政府的集中化权力中解放波希米亚国土，不过这个团体中的一个小集团宣扬更加激进和民主的理想。在帕拉茨基和青年记者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的领导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于 3 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重申了波希米亚领土的统一并且要求通过波希米亚地方议会和代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奥属西里西亚的共同议会获得更大的自治。请愿者要求废除所有残留的劳役规定，达成捷克人和日耳曼人的公民平等以及准予基本自由。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维也纳，向帝国政府呈送请愿书，不过 3 月 13—15 日由学生主导的街头示威活动早已改变了首都的政治环境，当时梅特涅的辞职与皇帝对宪法、选举大会和停止审查制度的承诺相伴而来。

112

3 月 3 日，拉约什·科舒特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匈牙利议会发言，他提出的要求不久后成为呈送给斐迪南皇帝的《三月法案》的核心。科舒特要求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比如劳役的废除，不过他演讲的主要焦点是一个自治的匈牙利的创建，其与奥地利帝国的联系仅仅是通过作为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那位统治者。正如在《三月法案》中所制定

的，科舒特和议会中的其他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由男性财产持有者选举的议会和一个大臣直接向选举出的主体汇报的内阁。匈牙利将管理它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军队。受维也纳革命困扰的帝国政府没有选择，只能让皇帝于 4 月访问普雷斯堡的议会并通过《三月法案》。匈牙利新政府立即行动为持有土地的农民废除劳役责任，并且实行一系列的公民自由。然而，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问题是科舒特和其他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兴趣给予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类似的权利。

与匈牙利的要求相比，捷克人递交的请愿书显得远较最初设想的温和。代表团于 3 月 27 日回到布拉格，其努力鲜有收获，两天之后，代表团又拿出了新的请愿书，要求一个代表波希米亚王权统一国土的政府，该政府通过选举产生，每位独立的大臣都以布拉格为基地。代表团递交修订的请愿书至维也纳，帝国政府拖延对统一王权国土的讨论，直到 7 月帝国议会的下一次会议，不过在其他方面同意了捷克对共同议会、分离的波希米亚行政机构以及捷克人与日耳曼人的平等等要求。然而对于许多日耳曼裔波希米亚人来说，这个目标并不是波希米亚的政治统一，而是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包含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之内。

到 5 月中旬，当政府正在就宪法进行商议之时，游行示威再度在维也纳街头爆发。结果，政府宣布一个民选议会将承担起草这份文件的职责，而帝国政府将于 5 月 17 日离开维也纳迁往因斯布鲁克。

113

在波希米亚，关于选举和临时政府——全国委员会——的谈判导致了由帕拉茨基领导的温和派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同情在维也纳街头的激进分子的同样激进的学生和工匠之间的分裂。全国委员会中的中产阶级日耳曼人和其他组织支持对改革的要求，但是对要求波希米亚自治的狭隘的捷克人本性渐生不满，与此同时，摩拉维亚议会中的很多人反对合并波希米亚王权国土的提议。不顾在所有地方投票的不尽如人意的局面，284 名代表被推选进入主体，他们中的 178 人是捷克人，其余是日耳曼人。帕拉茨基、帕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弗兰蒂舍克・拉迪斯拉夫・列格尔及其他人代表了新的波希米亚议会中的自

由主义事业。

随着日耳曼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开展有关统一德意志的协商，帕拉茨基受到邀请在法兰克福议会的筹备委员会上代表波希米亚，这个选举出的主体被分派统一德意志邦联国土的任务。4 月 11 日，帕拉茨基在一份长篇的声明中拒绝了这个邀请，在声明中他表明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忠诚，宣布作为波希米亚人然后是斯拉夫人，他不能接受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国土之间的任何联系，除非是作为统治者之间个人联系的结果。帕拉茨基承认在前神圣罗马帝国中波希米亚的角色，但是坚决主张作为一个与日耳曼人分离的民族，捷克人不应该成为德意志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不可以在统一的德意志名义下被分解。捷克人随后试图阻止法兰克福议会在波希米亚的选举，日耳曼人离开了全国委员会并且在德语人口占优势的地区主持选举。

帕拉茨基和其他捷克领导人决定反抗日耳曼人的利益和法兰克福议会，他们在布拉格主办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希望能推动奥地利帝国内的斯拉夫民族间的合作。当大会于 6 月召开之时，沙法里克在聚集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前发表主旨演讲。大会上起草的宣言主要是帕拉茨基的工作，宣言呈送给欧洲各民族，要求将这个帝国重组为一个所有民族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尊重的联邦。这份文件谴责了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压迫，并以针对各个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友爱的法国式要求作为结尾。送呈奥地利皇帝的正式请愿书提议帝国内的斯拉夫民族自治，不过大会证明了斯拉夫人离统一他们的目标还有很远，并且经常不愿意克服他们自己的不同以及对捷克领导层及其要求的怀疑。然而在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完成特定提案的工作之前，在布拉格发生的事件导致了 1848 年 6 月该主体的解散。

114

6 月 12 日，革命在布拉格街头爆发，在文采斯拉斯广场的一次特别庆祝集会之后，大学生、工人和工匠设立路障并与军队发生冲突。由于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和激进的演讲者及宣传册的煽动，学生和他们的盟友要求以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名义进行革命。然而，波希米亚的军事

长官阿尔弗雷德·冯·温迪施格雷茨亲王早已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他调集军队和火炮进入布拉格周围的要地，试图在一次行动中驱散在 6 月 12 日之前主持群众会议和示威的激进分子。大约 1 200 名布拉格市民和 500 名民兵队员与温迪施格雷茨指挥下的 1 万名士兵对峙。在旧城和新城街头接连数日的小规模战斗之后，温迪施格雷茨从城里撤出军队，并开始从赫拉德恰尼高地炮轰旧城。与此同时，帕拉茨基及温和派阻止暴力行动的努力未获成功，激进派则显然无法鼓动农民参与民族起义。6 月 17 日，在几天的炮击之后这座城市投降，温迪施格雷茨实施了戒严令进行镇压，命令逮捕起义领袖。随着布拉格的陷落，波希米亚的革命走向终结，国民委员会和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不复存在。

1848 年 8 月，斐迪南一世和帝国政府在 7 月 22 日召开的帝国议会的邀请下重回维也纳，因为温迪施格雷茨在波希米亚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北部的胜利已经将趋势转向有利于反革命的一边。随后的一个月，奥地利人在约西普·耶拉契奇男爵率领的克罗地亚军队的协作下入侵匈牙利，试图镇压科舒特和匈牙利人的“合法革命”。当匈牙利人尝试将他们的案例带到帝国议会之时，捷克人领导多数派拒绝听证会的请求。然而，维也纳的激进派支持匈牙利自治甚至是独立事业，在 10 月 6 日当局试图派遣维也纳军事卫队与匈牙利人作战时，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随着这座城市陷入混乱，皇帝和他的朝廷逃出了维也纳，此时温迪施格雷茨和军队正在街头与激进分子作战，并于这个月底重新获得帝国首都的控制权。

由于维也纳不确定的形势，斐迪南重新安置帝国议会到摩拉维亚的克罗梅日什，在那里宪法的审议在 11 月继续。然而最终，帝国议会和宪法都成为一次失败革命的牺牲品，因为新的行政机构试图撤销革命的几个月期间所准予的改革。1848 年 11 月 27 日，温迪施格雷茨的妹夫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承担了首相的职责，鲁道夫·施塔迪翁担任内务大臣，亚历山大·巴赫担任司法大臣。帝国随后在 12 月 2 日经历了一次君主权力的转移，斐迪南一世让位给了他的侄子弗朗

茨·约瑟夫一世(1848—1916年在位)。

对于捷克人来说,1848—1849年的“民族之春”以激进派的被捕和受审为终结,他们也已了解,与帝国当局合作的政策未能产生任何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有意义的结果。只有诸如卡雷尔·哈夫利切克之类的人物是例外,他继续为公民自由和自由主义改革而斗争,帕拉茨基、列格尔等民族运动的关键领导人暂时隐退,投身学术或其他活动。哈夫利切克继续出版《国民新闻》(*Národní noviny*),直到政府于1850年1月正式暂停该报纸的发行。哈夫利切克于1851年12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奥地利提洛尔多年,于1855年回到布拉格,发现他的前同事们对于重新建立与他的联系已没有多少兴趣。罹患肺结核的哈夫利切克于1856年7月29日去世,他作为一名事业殉道者得到了许多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尊崇。

## 1848—1849年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人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动荡的局面在《三月法案》制定之后迅速扩散,什图尔、霍贾和胡尔班等斯洛伐克民族运动领导人试图动员对递交给匈牙利行政机构的请愿书的支持。1848年3月28日,一次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的会议产生了一份温和的请愿书,要求允许在位于斯洛伐克语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的小学里使用斯洛伐克语言教课。

在匈牙利人拒绝准予他们想要的许可之后,斯洛伐克领导人于5月10—11日在斯洛伐克北部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召集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经过更多时间的准备,胡尔班、什特凡·马尔科·达克斯内尔和其他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起草了一份14点要求的清单——《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要求废除农奴制、拥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建立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制度。这份请愿书还提议将匈牙利王国重组为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联邦,每个民族拥有一个通过成年人普选和平等投票而产生的地区性议会。统一的匈牙利议会将连接所有的民族,而自治的斯洛伐克民族将获得以下权利:使用斯洛伐克语作为教育和行政的语言,保留带有斯洛伐克军官编制的民兵以及在匈牙 116

利国旗边上增加斯洛伐克民族的红色和白色。

匈牙利大臣们对斯洛伐克请愿书的反应是下令逮捕什图尔、霍贾和胡尔班，于是胡尔班离开匈牙利北部试图与其他斯拉夫人协商。什图尔是担任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斯洛伐克民族非正式代表，然而什图尔在代表大会上发现，斯洛伐克在匈牙利之内平等的愿望，与帕拉茨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以及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看做是推进他们自己议程的可行选项的其他捷克领导人相冲突。

由于斯洛伐克人指望南斯拉夫人协助推进他们的民族目标，随着哈布斯堡王朝任命的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于 1848 年 9 月采取行动反对匈牙利人，一场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增加了。然而在 7 月中旬，科舒特和匈牙利议会拨出军饷给一支新的匈牙利军队——洪韦德(Honvéd)，这支部队在抵挡耶拉契奇的军队方面取得初步的胜利。随着冲突的延续，什图尔、霍贾、胡尔班等人创建了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着手建立一支由大约 600 名志愿兵组成的战斗力量，他们的主体是学生，并由两名捷克军官指挥。

9 月 19 日，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宣布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独立，并要求发动民族起义支援此时正在与匈牙利人作战的志愿部队。尽管装备简陋而且缺乏有组织的支援和补给，斯洛伐克志愿兵和他们的外国同志仍于 9 月 22 日在布雷佐瓦击败了匈牙利人，接着准备在帝国政府派遣的军队抵达之后与他们进行协作。匈牙利当局将斯洛伐克领导人归为叛国者，并且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同时对他们实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报复政策。

在这些新的局势发展以及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率领的部队到来之后，斯洛伐克领导人于 3 月 20 日在奥洛莫乌茨与皇帝会面，并且要求创建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具有议会和直接与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联系的行政机构。内务大臣施塔迪翁在这个方案中看到了一些价值，可以以此作为削弱匈牙利人的手段。不过在 4 月 4 日，科舒特和地方议会宣布终止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的统治，科舒特成为独立匈牙利

117

国家的元首。斯洛伐克忠于皇帝的声明现在带来了奥地利的援助，新创建的斯洛伐克国民军投入了与洪韦德和在斯洛伐克土地上活动的游击队的战斗。6 月初，反对改革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 10 万名俄国士兵进入匈牙利，另有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由此使得战斗对于匈牙利人而言已是取胜无望。

匈牙利于 8 月 11 日在维洛戈什向俄国人投降，结束了革命和战争时期，并且导致了匈牙利宪法的废除和受限的施塔迪翁宪法的制定，后者一直持续到 1851 年 12 月末。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这部宪法带来了一些收获，尽管那只是 1848—1849 年国民计划中陈述的要求中很小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人被准予拥有行政管理机构和在小学及行政事务中使用斯洛伐克语言的权利，但是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辜负了很多人为那个目标战斗的愿望。正如斯洛伐克领导人开始了解的，保守的马扎尔化的贵族阶层和农民都不曾支持 1848—1849 年的民族斗争。对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幻想破灭之后，斯洛伐克领导人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追求斯洛伐克国民计划中相信帝国管理机构。

## 捷克国土(1849—1880 年)

1848—1849 年革命的失败使得反革命者在随后的十年间制定了一套新专制主义的体系。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继续领导政府直到 1852 年他去世为止，不过帝国的行政机构刻上了内务大臣亚历山大・巴赫的印记。作为后革命保守主义的产物，“巴赫体系”将高度集权化的官僚机构与对抗地区性利益和当局反对者的军队、警察和告密者的广泛使用相结合。德语成为政府的正式语言，而天主教会通过 1855 年的宗教事务协约成为行政机构的盟友，该协约授予教会对审查制度和教育与受保护的教会财产和被认可的教会法庭一样的广泛影响。1851 年 12 月 31 日的希尔维斯特特许状废除了在革命期间赢得的超越农奴制废除、宗教自由和公民平等的任何权利。 118

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外交政策中的挫折削弱了帝国政府的新专

制主义政策的基础。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年)期间的中立使得哈布斯堡帝国孤立于大国之外,此时欧洲的外交平衡时期走向终结。法国出于皮埃蒙特人及其他意大利人的利益介入了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导致奥地利丧失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及在国内引起一次经济危机。巴赫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的败仗后辞去他的大臣职务,由此宣告巴赫时代的终结,并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改变行政管理的新专制主义路线方面的艰难努力开辟了道路。

1860 年 10 月 20 日的《帝国公文》建立了一个中央议会——帝国议会,它将与得到恢复的地方议会合作,并且可以在没有匈牙利人参与的情况下开会。这份“十月公文”将联邦制元素引入帝国的行政管理,尤其是针对匈牙利人,他们得到了对他们特殊历史地位的承认,以此作为恢复立法自治、县级行政管理和 1848 年以前的政府机构的基础。然而在 1861 年的“二月特许状”中,对公文的修订在帝国议会中创建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使其成为两院制议会,由此削弱了匈牙利议会,并将地区性议会从立法主体转型为集权化行政管理的工具。匈牙利人的反应是联合抵制帝国议会,宣布 1848 年的《三月法案》代表了他们的正当宪法。捷克自由主义者站在贵族阶层这一边,要求对波希米亚的历史性国家权利予以承认,不过他们最初决定反对联合抵制,因为帕拉茨基收到了帝国议会上议院的任命,而列格尔则担任了下议院中捷克代表的领袖。然而从 1863 年到 1879 年,在未能在联邦制目标上有所进展之后,列格尔和捷克人限制了对帝国议会的参与。

1866 年,随着与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竞争导致了那一年 6 月普奥战争的爆发,奥地利人遭遇到另一次关键性的军事挫败。在威廉一世和他的首相奥拓·冯·俾斯麦的率领下,普鲁士人在击败了奥地利在德意志各州中的主要盟友之后,入侵了波希米亚。7 月 3 日,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附近的萨多瓦(柯尼希格雷茨)遭遇决定性失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政府发现他们已与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分离,并且难以避开匈牙利对更大自治权的要求。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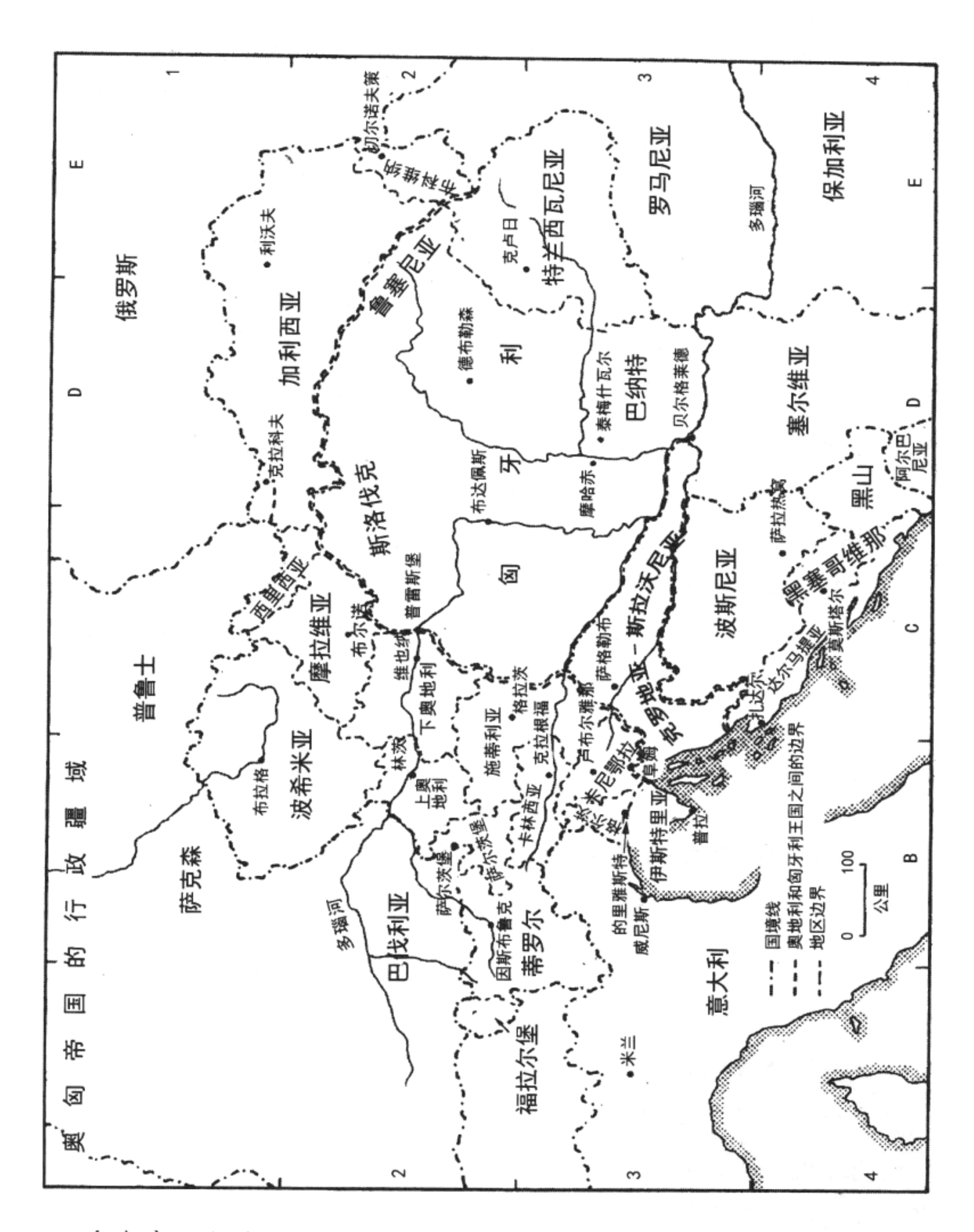
1866 年的失败产生了重大的财政赤字,并且暴露了帝国内部的

虚弱，导致通过 1867 年的和解(*Ausgleich*)建立了一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二元体系。帝国议会通过的 1867 年《十二月宪法》分割帝国为匈牙利王国和“内莱塔尼亚”地区，即非匈牙利地区，比如从匈牙利横跨莱塔河的下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统治者，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皇帝，将担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同时帝国的这两部分保留他们自己的立法和法律主权，然而分享外交事务、财政和军事等共同部门。

尽管捷克民族主义者分为“老捷克人”和“青年捷克人”两个派别，但都在一起反对《十二月宪法》，因为它未能满足波希米亚的历史性国家权利，抑或是给予这个帝国中最发达和工业化部分的特权。出于对宪法的回应，捷克人联合抵制了帝国议会和各地方议会，同时帕拉茨基、列格尔等领导人开始寻求来自法国或俄国的外部支援。然而，1867 年 5 月帕拉茨基和列格尔对圣彼得堡的访问未能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方面任何的承诺，而 1869 年送交给拿破仑三世的代表帝国中斯拉夫人利益的备忘录也没有激起法国人多少兴趣。法国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为俾斯麦创造了时机，在 1871 年 1 月宣告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 迈向一个现代的捷克国家(1880—1914 年)

在与首相爱德华·塔费伯爵谈判之后，捷克代表们回归了帝国议会，并遵循协作的政策以回报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 1880 年的语言条例，其确定了德语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政机构的内部语言，不过允许在与群众的外部联系中使用捷克语。附加的新措施划分布拉格大学为分离的捷克语和德语学院，并通过降低在城镇和农村区域的投票权的缴税要求，增加了说捷克语的投票者的数量。1882 年之后，很多主要的捷克知识分子和民族领袖从大学中的捷克语部门脱颖而出。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改革，一些青年捷克人党的党员还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与帝国议会中的捷克社团决裂，并且放弃协作，反对帝国政策。 120




奥匈帝国行政区划图。(*An Atla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Richard Crampton and Ben Crampton, 1997. 经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图书公司许可进行复制。)

早已不满于向捷克人让步的波希米亚日耳曼人于 1887 年发起了他们自己对波希米亚议会的联合抵制，这是在那个主体中产生捷克多数派的重组之后两年。为了使日耳曼人回归议会，塔费于 1890 年开启了与老捷克人党和日耳曼人的谈判。商议的结果是波希米亚被实际划分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区域，相应的还有遵循民族路线而组成的司法机构、教育委员会以及商业和经济组织。列格尔对协议的辩护未能阻止老捷克人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的没落，1891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选送了 37 名青年捷克人党党员和仅有的两名老捷克人党党员去维也纳。

1897 年，当巴德尼法令将捷克语言在波希米亚置于同德语平等的地位之时，青年捷克人党结束了他们的反对。卡西米尔・巴德尼于 1895 年被任命为奥地利首相，他引入了新的条例，决定哪些案例以哪种语言提交就用哪种语言处理，并且要求捷克国土上的官员和雇工能操两种语言。害怕奥地利文化优势和德语在帝国事务中首要地位终结的日耳曼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帝国议会中进行煽动，游行示威随之出现在维也纳及其他地方。在广泛的反对把巴德尼赶下台之后，条例于 1899 年被撤销，而帝国议会中的捷克人投身于他们自己的反对策略。然而在 1906 年，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引入了男性普选权，这为帝国议会中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捷克留有了余地。

这个世纪中期革命之后的几十年见证了捷克国土上的持续人口增长和工业部门的扩张。从 1850 年有大约 674 万居民，到 1910 年人口增长到 1 015 万，其中包含 640 万捷克人和 350 万日耳曼人。工业化从 1848 年持续到 1873 年，接着在一段萧条时期之后，从 1880 年到 1914 年经历了另一次强劲增长。钢铁、化工、纺织、煤炭和造纸同工程、食品加工和酿造一起成为捷克经济的多产区域。

1842 年比尔森市民啤酒厂的开办向全世界引介了一个新品种的底层发酵啤酒，它被冠以它起源的波希米亚城市的名字——“比尔森啤酒”。1869 年，比尔森成为一家著名的工业企业的诞生地，工程师和企业家埃米尔・斯柯达买下了他曾工作过的机械工厂，并将其扩张为一家庞大而且广受尊敬的企业——斯柯达工厂。在经济方面，捷克各

地区到20世纪早期为止变得对帝国的奥地利部分至关重要,因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工业产出占到奥匈帝国非匈牙利领土上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二。



到1914年,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已经在捷克国土上创建了一个更加现代的、受教育的和城市化的社区,其中传统的贵族阶层已经失去它的经济优势,而新兴的中产阶级信奉捷克民族主义并且寻求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随着说捷克语的人从农村地区不断涌入,城市日益变得捷克化,捷克和日耳曼民族社群之间的紧张局面不断提升。

捷克民族社群在19世纪期间的演变伴随着捷克国土上,日耳曼人的民族认同感的浮现。这两个民族社群各自对对方的活动和挑衅进行回击,使用相似的策略,并且时常以徘徊在信仰、社会阶级以及本地或地区性传统和习俗边界的方式发生冲突。城市地区偶尔会出现街头冲突,正是这种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成为寻求通过政治化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占据上风的捷克和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战场。建筑物、纪念物、节日、公众庆典和文化事件充当了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象征性暗示,捷克人渐渐地在布拉格取得了优势地位。

1848年,自从14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马市的大广场更名为以波希米亚的庇护人圣瓦茨拉夫的名字命名的文采斯拉斯广场(Václavské náměsti)。横跨伏尔塔瓦河的石桥在1870年成为查理大桥,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布拉格的街道和广场带上了胡斯、日兹卡、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和帕拉茨基的名字。曾经德语路名在其捷克语名称之上的路标在1861年颠倒了次序,此时捷克语成为布拉格官员的行政语言。19世纪90年代,德语名称同时从路标上消失了,而捷克人的红白色彩取代了黑色和黄色的传统帝国色彩。

发起于1862年的索科尔("猎鹰")运动通过体操、体育和艺术活动推动捷克爱国主义和身心发展,以此来支持民族事业。安托宁·德沃夏克、莱奥什·亚纳切克和贝德日赫·斯美塔那等作曲家创作音乐赞颂民族理想、历史人物和捷克国土的自然之美,这当中就有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Ma Vlast*)。

1881 年布拉格国家大剧院(Národní Divadlo)的开幕代表了生活在长期由德语剧院主导的城市中的捷克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所剧院通过数名生活在城镇和乡村的捷克人的捐赠而获得资金，建造在从各地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地点采集来的石头地基之上。“国父”帕拉茨基和斯美塔那在 1868 年奠基了第一批石头。国家大剧院有意设计得比附近的两座德语剧院更大。剧院在开幕后不久毁于火灾，不过在 1883 年得到重建并再次开始主办演出。19 世纪 90 年代，布拉格还成为捷克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捷克爱乐乐团的所在地。

123

捷克政治生活也在 19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发生变化，近代政治派别开始代表阶级和宗派的利益，不再像过往几十年里那样开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1893 年，随着选举改革继续扩展公民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在捷克国土上成立。创建于 1898 年的捷克国家社会主义党替工人、工匠和店主讲话，反对波希米亚日耳曼人的民族议程和青年捷克人党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计划。随着老捷克人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慢慢隐没，青年捷克人党从 1891 年至 1906 年主导了捷克的政治。然而到 1911 年，社会民主党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捷克政治派别。

1899 年，农民党的成立为农村人口提供了社会主义或者传统主义天主教党派的宗派议程之外的一个政治选择。1914 年，波希米亚议会和帝国议会中的一名农民党议员弗兰蒂舍克·乌德日扎尔担任该党领袖，随后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这个世纪末出现在捷克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他于 1850 年出生在摩拉维亚，父亲是斯洛伐克人，母亲是说德语的摩拉维亚人。马萨里克出身于工人阶级，却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一名哲学教授，而正是在他创办的期刊《雅典文艺》(*Atheneum*)中，所谓的 RMZ 中世纪手稿在 1886 年被曝光为伪造品。持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观点的马萨里克最初相信奥匈帝国可以被改革并重组为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所有的民族有完整的权利。他

还支持妇女的权利，将他妻子夏洛特的姓氏作为他自己的中间名，并且提倡两性的道德和政治平等。马萨里克具有强烈和独立的宗教精神，他偏离了他的天主教根源，长期反对教士对政治事务施加影响。

124 从1891年到1893年，马萨里克在波希米亚议会和帝国议会中代表青年捷克人党，此后在1893年布拉格的游行示威之后的强制戒严期间辞去他的职务。尽管围绕RMZ手稿的争论为马萨里克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名声，1899年他卷入的希尔斯纳审判使他成为争论的焦点。1899年9月，一个名叫利奥波德·希尔斯纳的犹太流浪者因为谋杀一名年轻的天主教妇女阿内日卡·赫鲁佐娃而被送上法庭。谋杀案的血腥性质使很多人确信死刑事实上已是例行公事。正当民族主义报纸努力煽动反犹太情绪之时，马萨里克选择依据他自己的个人原则发表了一份希尔斯纳的辩护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将死刑减刑为终身监禁，但马萨里克替希尔斯纳作辩护引来了许多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尽管他声称应用于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同样适用于个人行为。

在对老捷克人党和青年捷克人党日益不满之后，马萨里克与卡雷尔·克拉马日及其他人合作成立了捷克现实主义党，该党于1900年与激进进步党的部分成员合并，组成的党派在1905年更名为捷克进步党，不过其成员仍旧被普遍认为是现实主义者。马萨里克从1907年至1914年以现实主义议员的身份回归帝国议会。

##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民族(1849—1914年)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世纪中叶革命之后的时期最初包含了帝国当局处理1849年事件之后的斯洛伐克事务的努力。科拉尔移居维也纳，成为政府有关斯洛伐克问题的顾问，不过什图尔和胡尔班在拒绝政府的任命后成为警方监视的目标。然而什图尔依旧活跃于语言工作中，并且在1851年10月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在基于捷克文范例的新斯洛伐克文字体系上达成一项协议。什图尔还推动泛斯拉夫主义，以此作为匈牙利的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如在他1853年的宣言《斯拉夫民族和未来世界》中所主张的。

1861 年 6 月 6 日，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在《斯洛伐克民族备忘录》中描述他们的要求，目标是呈送这些提议给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当局。在这篇受什特凡・马尔科・达克斯内尔的《来自斯洛伐克的声音》影响的批评性文件中，作者们主张，尽管历史性国家权利的概念不能应用于未建国的民族，斯洛伐克人仍旧有基于他们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天赋权利的政治自治权。斯洛伐克人领袖要求通过在匈牙利北部创建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地区来实现匈牙利的联邦化，这个地区具有清晰定义的边界，并且其中的斯洛伐克人在教育和行政事务中有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这份备忘录还要求享有与马扎尔人一样的公民平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在斯洛伐克法律研究机构和佩斯大学中设立斯拉夫文学教授职位。一个代表团向匈牙利议会呈送了这份文件，议会讨论了权利的议题，然而对联邦化的提议不予理会。

125

受到捷克的“捷克之母”和一所类似的塞尔维亚机构的启发，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选择图列茨河畔圣马丁作为文化组织“斯洛伐克之源”的所在地，因为这个城镇无偿提供了土地使用权。成立于 1863 年的“斯洛伐克之源”通过位于图列茨河畔圣马丁的中央机构和遍布斯洛伐克的分支机构成为推动斯洛伐克文学和文化的工具。

在建立二元君主制并准予匈牙利王国在帝国内享有自治地位的和解后一年，1868 年 12 月 1 日的民族法削弱了非马扎尔民族的地位，把它们的地位降低为不可分割的匈牙利政治民族之内的种族群体。斯洛伐克人将被允许保留文化和其他组织，还可以在小学和较低层次的行政机关中使用斯洛伐克语言，不过马扎尔语仍旧是统治管理和高等教育的语言。其他特许权涉及个人自由，但不涉及认可在共同背景下的独特民族或民族权利和身份。随着匈牙利摆脱来自维也纳的直接干预，马扎尔化的进程得以继续，斯洛伐克人直接受制于马扎尔当局和匈牙利法律。

出于对匈牙利议会行动的反应，由威廉・保利尼—托特及其他人领导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动员起来捍卫 1861 年的备忘录。保利

尼—托特是议会中的斯洛伐克议员和“斯洛伐克之源”的副会长，他成为 1871 年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成立的新斯洛伐克民族党的联合创始人和领导人。随着民族主义者分裂为“守旧派”和“新派”，保利尼—托特在其位于图列茨河畔圣马丁的基地领导前者支持 1861 年的计划。以佩斯为中央的新派推动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议程，放弃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的构想，赞同与马扎尔人合作和磋商，尤其是在 1872 年斯洛伐克民族党选举议会代表的努力被证明是失败的之后。守旧派谴责新派接受和解和民族法，同时斯洛伐克民族党选择遵循政治不协作的路径。

126

1875 年 4 月，匈牙利总理卡尔曼·蒂绍命令关闭“斯洛伐克之源”并没收其财产，依据是没有合法的斯洛伐克民族来证明一个斯洛伐克文化中心的合法性。到 1877 年，政府关闭了开放给斯洛伐克人的剩余的国立中学，并减少了允许教授儿童斯洛伐克语言的宗教学校的数量。1883 年，马扎尔语成为教育的规定语言，而在 1907 年，当局强加效忠誓言给教师，并且威胁如果教学者不能用马扎尔语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上教授他们的学生，他们将被解雇。对于需求大学教育的斯洛伐克学生来说，由于布拉迪斯拉发的伊丽莎白大学只准匈牙利人和马扎尔化的斯洛伐克人入学，在外国大学求学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新一代的斯洛伐克领导人包括诗人帕沃尔·奥尔萨吉—赫维兹多斯拉夫、斯洛伐克民族党的新领袖帕沃尔·穆德伦和胡尔班的儿子——作家斯韦托扎尔·胡尔班·瓦扬斯基。随着马扎尔化在斯洛伐克土地上继续进行，斯洛伐克民族党保持在议会中弃权的政策直到这个世纪末。然而对于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关教育机构和民族组织的限制以及匈牙利人未能兑现扩大选举权的承诺阻碍了政治活动和民族文化的觉醒，在这方面无法与 1914 年为止捷克土地上的发展相比。

1890 年之后，捷克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合作的一些兴趣，尤其是在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的作品中。受马萨里克的影响，瓦夫罗·什罗巴尔和帕维尔·布拉霍创办了

月刊《声音》(*Hlas*,1898—1904 年),该刊主张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合作。与报人米兰·霍贾一起,什罗巴尔和布拉霍代表了在新世纪之初新兴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霍贾的报纸《斯洛伐克周刊》(*Slovenský týždenník*)首次在 1903 年出版,反映了他的民主理想和教育将帮助农民靠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的信念。

在 1905 年 2 月的选举中,霍贾是仅有的两名被选入议会的斯洛伐克人之一,与他一起的是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弗兰蒂舍克·斯基恰克,该党宣布于 1905 年民粹主义牧师安德莱·赫林卡修道士及其他来自匈牙利人民党的成员脱离教职之后,不过直到 1913 年才正式成立。霍贾属于斯洛伐克民族党,该党已于 1901 年重新参与选举进程,并且重组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的联盟,其中包括像霍贾一样的农民党人,也有如什罗巴尔和布拉霍这类的自由主义声音派。1905 年 6 月,在获得来自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支援,出版了一份工人报纸之后,民族主义工人组成了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 127

1906 年 5 月的选举将 7 名斯洛伐克人带入议会,其中包括霍贾和布拉霍,不过这一年也因为 12 月赫林卡的被捕而显得重要。6 月被他的主教怀疑其政治活动之后,赫林卡后来以煽动反马扎尔罪而被指控,并于 12 月被宣判入狱两年和罚款。1907 年 10 月 27 日,赫林卡出生地切尔诺瓦的村民请求释放赫林卡,这样他可以出席一所当地教堂的供奉典礼。当局拒绝了这个请求,而当村民反抗斯皮斯主教代表的到达时,匈牙利宪兵向人群开火,导致 15 人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切尔诺瓦大屠杀"。一从监狱中获释,赫林卡就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并且在 1913 年 7 月被选为斯洛伐克人民党主席。

对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1867 年和解之后的几年在二元君主制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带来了民族文化和身份的持续发展。然而到 1914 年,这个二元体系早已受到来自内部不可挽回的腐蚀,并将不能从 1914—1918 年的毁灭欧洲的世界大战中幸免。尽管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路径,奥匈帝国的瓦解将把它们带入一个共同的国家,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解决方案的支持者在战争岁月

中游说成功,使得这个提议在1918年秋天成为现实。

**注释:**

1 参见: Peter Brock, *The Slovak National Awakening: An Essay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2 有关近代捷克女性历史和重要人物描写的更多读物,参见: Wilma A. Iggers, *Women of Prague*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1995).

3 参见: 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 Peter Brock and H. Gordon Skilling, eds., *The Czech Renascenc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1914—1938年）

129

## T. G. 马萨里克和捷克民族

作为战前捷克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是一位资深议员和查理大学哲学教授，他被描述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和"对波希米亚和整个奥匈帝国的传统观念、现行制度、惯例和习惯等严厉的批评者"。[1] 马萨里克关注 19 世纪 80—90 年代不断增长的政治不稳定和捷克人在奥匈帝国中的未来，他在其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著作《捷克问题》中论述了捷克国土上的政治和历史形势。尽管一些事件不久将削弱马萨里克对哈布斯堡王朝执政的支持，在那时他主张基于奥地利国家发展一种积极的计划和民族特性，并且在帝国之内保持捷克的存在是捷克人的最优利益所在。

130

马萨里克挑战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早先的主张——反抗日耳曼影响的文化斗争代表了捷克历史的典型元素，他主张尽管冲突是捷克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捷克民族特性不应该从那种斗争的角度来定义。马萨里克也质疑一些泛斯拉夫和亲斯拉夫传统，这些传统使许多他的前辈和同事把沙皇俄国当做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合适替代

品。马萨里克的信仰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观念,捷克人与俄罗斯人及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联系远少于那些西方的民族,尤其是法国人和日耳曼人,几个世纪以来捷克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将现行的基督教伦理与当代社会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反映了马萨里克的信念,捷克历史的真实意义蕴含在“捷克人文主义”的概念中,同时也体现在胡斯信徒运动和捷克宗教改革的捷克兄弟会的教义上。捷克土地上的历史演变由此具有了一种固有的宗教色彩,恰如启蒙运动唯理主义和民族复兴引发 1848 年一系列革命活动以及捷克社会的现代化和捷克民族特性的发展那样。

马萨里克还认识到胡斯运动的传统为捷克人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悖论,因为它在同一目标的名义下同时囊括了和平主义(胡斯及后来的夸美纽斯)和暴力行为(日兹卡)。尽管马萨里克曾经长期反对追求民族目标中的暴力解决办法,1905 年的俄国革命和不断增长的战争可能性使得马萨里克相信,帝国政府不能应付捷克问题很有可能为作为一种获取更大自治权甚至可能是民族解放方式的革命或军事失败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在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马萨里克关于奥地利国家继续存在的信仰转变为反抗那个国家以及统治它的那个王朝。马萨里克后来那样写道:“尤其是在 1907 年以后,我越是了解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对它。这个王朝……看上去如此强大,道德上和物质上却在退化。于是对我来说奥地利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2] 然而对于大多数捷克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捷克国家看似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尤其是在大部分人都假设奥匈帝国的垮台将导致捷克国土被吞并入德意志帝国的情况下。于是,对于 1914 年之前的捷克人来说,最佳的行动方针似乎是在一个联邦制的帝国内继续追逐更大的自治权。

131

## 战争前夕

作为在 1909 年帝国议会中捷克现实主义党的代表,马萨里克发表

了演讲,其中他批评了针对 53 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联盟成员发起的法律程序,包括对他们受雇于塞尔维亚的指控、导致 1909 年萨格勒布叛国罪审判的法律诉讼以及随后由被告们提请的诽谤诉讼。马萨里克通过曝光由奥匈帝国外交部提供的伪造的重要文件作为为指控辩护的证据,促进产生对南斯拉夫人的公众支持。

1908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 1912—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增加了那个地区的紧张形势,部分是由于奥匈帝国对该地区的干预使得创建一个更大的塞尔维亚存在疑问。这些冲突也增加了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兴趣,尽管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开始相信冲突被限制在巴尔干半岛之内可以证明,地区战争不一定会发展为主要势力之间或者同盟三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与协约三国(英国、法国、俄国)之间的冲突。然而到了 1914 年,一方面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摩擦,另一方面是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争执,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条件成熟,地区冲突可能会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至少将两个欧洲主要势力卷入其中。

1914 年 6 月 28 日,一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学生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对波斯尼亚的官方国事访问。奥匈帝国于 7 月 28 日对塞尔维亚宣战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他事件还包括在德国对俄国和法国宣战之后俄国出于塞尔维亚利益的军事介入,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以及英国于 8 月 4 日对德国宣战。随着国际体系崩溃并激化为协约国和同盟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敌对,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保持在巴尔干范围之内的希望落空了。

## 捷克人与战争的爆发

132

正当奥匈帝国为战争动员之时,这个帝国内的不同民族却用不同的方式对军事斗争进行响应。马扎尔人和克罗地亚人对战争努力显出热心支持,帝国内部的塞尔维亚人自然是少有理由支持入侵邻近的塞尔维亚。与此同时,鲁塞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普遍以缺乏爱国

热情的方式执行他们的军事义务。事实上,许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必须与他们的斯拉夫同胞——塞尔维亚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作战感到厌恶。然而,表达反对战争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一个受武力影响的战时政权的出现带来了审查制度和镇压,并且最终取缔政党和暂停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

一些捷克人出于他们对战争的反对,逃避兵役或者当了逃兵,这个问题随着战事的展开逐渐从个人发展到整个部队。1915 年 4 月,布拉格第 28 步兵团——所谓的“布拉格之子”——在喀尔巴阡山前线的杜克拉全体投诚俄军,并且被重新部署到乌克兰的基辅。

对于捷克土地上操德语的居民来说,战争提供了参与爱国活动并且热忱加入代表同盟国一方的奥地利武装部队的一次机会。激进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把捷克人看做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最不可信赖的民族,而且一些人希望战争将导致中欧统一在日耳曼人的领导下。

战争中的境遇有助于割断许多捷克人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的情感联系,这种方式正如马萨里克自己多年以前的转变。捷克主要的政治家早已在 1914 年年初开始关注俄国,战争使得亲俄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将捷克人的命运之签投向他们在东方的斯拉夫兄弟的愿望愈加强烈。1914 年 1 月,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瓦茨拉夫·克洛法奇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扎诺夫就捷克人内部对奥匈帝国的反抗问题进行会晤。5 月,一场可能的战争即将来临,卡雷尔·克拉马日提议一个由俄国沙皇领导的斯拉夫人同盟。克洛法奇和克拉马日对俄国人向布拉格进发显得相当确信,他们在战争早期留在了城市里准备 133 欢迎俄国军队的抵达。由于这些行为的缘故,他们俩都被逮捕并宣判死刑,只是后来受益于 1917 年 7 月的大赦令才免于死刑。

对于马萨里克来说,与俄国的关系显得疑问重重,他对沙皇当局、俄国军队和俄国政府对捷克人以及他们文化的理解缺乏信心。马萨里克和克拉马日赞同奥匈帝国的战败对捷克民族的未来是必要的,但是马萨里克想要一个独立的捷克国家而不是俄国统治的斯拉夫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于 8 月 2 日颁布一项法令,下令从俄罗斯帝国

驱逐敌对国的侨民时,大部分生活在俄国的捷克人立刻寻求俄国公民身份或者试图自愿进入俄国军队服役。沙皇同意与捷克代表会晤,这次磋商达成了给予奥匈帝国内各民族自由的共识,并且引起俄国统治者对斯洛伐克领土和民情以及捷克建议确立圣瓦茨拉夫自由王权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权从属关系的兴趣。

8 月,在俄国的捷克人获得许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团,到 10 月底,捷克军团——或称为德鲁日纳(*Družina*)——可以征召 800 名志愿兵随时准备进入与同盟国的战斗。捷克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些军团士兵发展未来的捷克军队,并且以此为由征召捷克战俘,不过俄国人显然对将德鲁日纳用于宣传目的更感兴趣,而不是将其作为一支实际的作战部队。

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马萨里克受到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遇挫以及俄国进军克拉科夫和通向斯洛伐克的喀尔巴阡山口等消息的鼓舞。然而德军在前线阻止了俄军的进攻,俄军于 8 月末和 9 月中在坦能堡和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区遭遇到的惨痛失败浇灭了这种热情。

马萨里克在祖国感觉被孤立,已经 64 岁的他携带塞尔维亚护照于 10 月离开奥匈帝国,以期评估国际形势和提升其他地方的捷克利益。这次旅行首先将他带到了中立国瑞士和意大利,最终到达了伦敦,并于 1915 年接受了伦敦国王学院的斯拉夫语研究教授的任命。马萨里克相信协约国能帮助完成中欧的完全转型,因此通过参与对奥匈帝国的军事胜利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对于捷克人来说也是必要的。马萨里克与斯洛伐克的长期联系促使他提出建议,捷克人的解放将不仅仅导致形成一片独立的捷克国土,更会促成一个更大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家。接着到 1915 年年初,马萨里克和他的同僚已经将他们政治计划的焦点转向了一个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享的独立国家。

134

## 斯洛伐克对战争的反应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战争初期是以马扎尔人的爱国热情和斯洛伐克人的漠不关心为标记的。随着战时当局迅速对内部反对派进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和反战派面临审查和逮捕,有时候甚至是在公

众场合的暴力袭击。民族领袖和诗人帕沃尔·奥尔萨吉—赫维兹多斯拉夫在组诗《血腥的十四行诗》中表达了他的反战情绪,组诗写作于1914年8月,不过由于战时的环境直到1919年才出版。

美洲斯洛伐克人联盟是一个于1907年在克利夫兰成立的联盟组织,它的行动提示了在欧洲和北美的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社区所能提供游说能力和组织资源。从1860年到1900年,大约27.6万名斯洛伐克人离开他们的祖国定居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之后的18年里,又有69.5万人移民海外。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美洲斯洛伐克人联盟的秘书长是伊万·达克斯内尔,他的父亲是什特凡·马尔科·达克斯内尔,其《来自斯洛伐克的声音》曾经激发了1861年《斯洛伐克民族备忘录》的创作。尽管斯洛伐克人联盟最初支持在匈牙利王国内的斯洛伐克人自治,战争使其策略发生了转变,这反映在1914年10月由联盟主席撰写的一篇文章上,文章要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组成联盟,作为斯洛伐克人的最佳选择。

随着早期的俄国攻势转移到靠近斯洛伐克的前线,俄国占领斯洛伐克领土并且进军布达佩斯在未来的几个月里看来是势不可挡的。在这种环境下,斯洛伐克政治领袖开始考虑同盟国战败的后果,包括从在匈牙利王国内的自治到与俄国联合甚至可能与波兰结成联盟的种种选择。然而有一个选项慢慢地积聚了来自国内和海外的支持,那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一体化,这取决于一个信仰,与捷克人协作给了在帝国战败并很有可能解体之后的斯洛伐克民族自决最好的期待。

135

到了11月中旬,俄军通过喀尔巴阡山口进入斯洛伐克东部,并且占领了胡门内和巴尔代约夫等城镇,其后又遭到奥匈帝国的反击而被赶走。战斗在这个地区的山区持续到了1915年5月,这时德军从邻近克拉科夫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地区发起的一波攻势导致俄军在加利西亚前线全线崩溃并且撤退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俄国人得到解放的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来说,1914—1915年灾难性的作战结果没有给持续的热情提供多少动力。

## 迈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

1915 年 2 月,马萨里克希望回到布拉格,不过可能由于叛国罪而被逮捕的警告迫使他重新考虑,并转而与他的捷克同僚爱德华·贝奈斯在日内瓦会面。贝奈斯与马萨里克协商,随后返回布拉格将马萨里克的计划转交给与马萨里克保持紧密联系的捷克政治家。3 月上旬,在马萨里克的指导下,贝奈斯在国内协助创建了一个秘密抵抗委员会,通过与马萨里克及海外捷克人组织的工作合作来促进捷克人的目标。这个委员会被人们称作“黑手党”,其成员包括贝奈斯、青年捷克人党的卡雷尔·克拉马日和阿洛伊斯·拉欣、索科尔主席约瑟夫·舍内尔和由马萨里克于 12 月份任命掌管他自己的现实主义党的律师普舍美斯·沙马尔。

1915 年 7 月 6 日,马萨里克在日内瓦发表演讲来纪念扬·胡斯殉难 400 周年,他赞扬胡斯信徒的精神是重振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事业支持的一种方式。马萨里克第一次公开宣布他对奥匈帝国的反抗,要求结束这个帝国,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创建一个独立的捷克人国家。同时,在当局拒绝为始建于 1900 年的扬·胡斯纪念碑举行官方纪念活动的同一天,在布拉格的旧城广场举行了一次非官方的揭幕仪式。捷克人用鲜花覆盖了这座纪念碑,向他们的民族英雄致敬。

9 月,贝奈斯成功地避开了当局离开布拉格前往巴黎,他携带着递交给法国军政部的信息和文件抵达那儿。在巴黎,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与米兰·拉斯蒂斯拉夫·什特凡尼克合作,后者是一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于 1904 年离开他的祖国,最终在巴黎天文台谋得了天文观测员的职位。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什特凡尼克志愿加入法国空军服役,晋升到上将军衔并获得法国国籍。1915 年后期在塞尔维亚前线受伤之后,什特凡尼克回到巴黎,加入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游说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家的活动,并协助他们更好地与法国政府沟通。这个三人组的关键目标之一就是协调位于北美、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委员会的活动。

136

在美国，诸如支持捷克国家独立的捷克裔美国人委员会和捷克民族联盟等捷克人组织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形成，并着手促进捷克人的海外事宜，同时，斯洛伐克人联盟代表斯洛伐克人的利益进行游说。1915 年 10 月 22 日，斯洛伐克人联盟和在美国的捷克人组织的成员签署了《克利夫兰协定》，支持建立一个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捷克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组成的联邦国家，具有普遍和直接的选举权，并且官方承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独立地区。斯洛伐克人的要求获得准许，被承诺可以召开他们自己的议会，此外还有一个以斯洛伐克语为官方语言的分离的行政机构。

11 月 14 日，马萨里克在巴黎宣布捷克海外委员会成立，以便与各协约国政府进行磋商。委员会于 1916 年 2 月更名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其领导人包括马萨里克、什特凡尼克、贝奈斯以及农民党代表约瑟夫・迪里赫。然而迪里赫在俄国的作用方面与马萨里克意见不合，1917 年 1 月，他担任了竞争性的彼得格勒(圣彼得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之后不久的二月革命致使这个亲沙皇组织失去效力。随着尼古拉二世的离开，俄国新的临时政府对迪里赫和他在委员会的亲俄同事显得毫无兴趣。

## 战时协议

1916 年 2 月，马萨里克渐渐变得担心奥匈帝国为了避免解体或者分割将会寻求局部和平的可能性。在与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会面中，马萨里克提议沿着民族分界线分割奥匈帝国，作为帝国内各民族的权利主张，他的话在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报道。贝奈斯也在一本名为《摧毁奥匈帝国!》的小册子里表示赞成奥匈帝国的解散，小册子是用法语写的，试图赢得法国人对创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家、自治的波兰和由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的支持，以此作为抵御未来德国和奥地利侵犯的一种方式。

137

国内前线政治活动的增强导致大部分捷克政党于 11 月建立了一个国民委员会，以此作为通过在布拉格的中央组织致力于针对哈布斯

堡王朝和捷克境内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共同议程。当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 11 月 21 日以 86 岁高龄离世后,一系列事件削弱了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和继承人卡尔一世的战时帝国管理,随之,捷克政治家们对共同事业的投入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1916 年 12 月下旬,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请求一份来自主要参战国的战争目标声明,几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并且于 1917 年 4 月作为协约国一方投入战斗,不过美国对奥匈帝国宣战被推迟到了那一年的 12 月 7 日。协约国于 1 月 10 日对威尔逊的请求进行响应,其中包括了一份从帝国控制下解放的民族——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详细参考清单,不过并没有坚定支持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

卡尔一世的新任外交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伯爵寻求使所有政党宣布忠诚于奥匈帝国来回击协约国。对于马萨里克和他的伙伴来说一个主要的挫折是,两个月前由战前最后一届帝国议会中的捷克代表创建的捷克议员联盟于 1 月 31 日致函切尔宁,表示捷克人将会继续在帝国范围内以及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当权下改善捷克人的地位。

1917 年年初,切尔宁整理了一份秘密情报,建议皇帝卡尔在夏末寻求与协约国的和平,以避免军事灾难和可能的帝国毁灭。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在春天触发了罢工,帝国行政机构用武力进行回击。4 月,23 名抗议工人在普罗斯捷约夫被枪杀,8 月,另外 13 名工人死于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发。随着对帝国政府的反抗变得激烈并且更有组织,卡尔宣布暂停三年的帝国议会将于 5 月 30 日召开,以便为奥匈帝国的各民族提供基于 1911 年上次战前选举结果的政治代表。

138

5 月 17 日在联邦议会的开幕式之前,一组接近 25 人的捷克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批评捷克议员联盟忠于帝国的声明。这个文件的作者们要求创建一个由自由的人民和自治的国家组成的民主欧洲,同时提醒联邦议会中的捷克议员他们对捷克民族的责任,质问他们是促进捷克人的权利还是保证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议员们选择了前一条行动路线,在联邦议会的开幕会议上,弗兰蒂舍克·斯坦涅克以

捷克联盟的名义宣读了一项声明,其中他要求创建一个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分享的民主国家,建立在民族自决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对捷克人来说还要加上是在捷克土地历史性权利的基础上。

对于马萨里克、贝奈斯和其他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海外代表来说,1917 年二月革命和沙皇政权在俄国终结的结果要求其与新的临时政府直接谈判,以及根据俄国领导层的变化而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事业的重新评估。为了那个目标,马萨里克于 5 月 15 日抵达彼得格勒,这次旅行用的是英国护照,姓名是托马斯·乔治·马斯登。

刚抵达俄国,马萨里克就与什特凡尼克一起游说总理格奥尔吉·李沃夫和军政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意图创建一支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而不是依靠一支被俄国人看做是宣传工具的军队。在对抗奥匈帝国和德国联军的克伦斯基攻势期间,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在乌克兰的兹博罗夫第一次共同作战,促成了这次以最初的进军和最终的挫败、撤退及逃亡为标记的攻势中仅有的重大胜利。由于马萨里克在彼得格勒,7 月 2 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在兹博罗夫的胜利使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战俘加入到军团中,到 9 月德鲁日纳扩充了另外 21 760名新兵。在兹博罗夫之后,克伦斯基和俄国最高指挥部认识到马萨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对俄国境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军事力量的权威,在马萨里克访问兵团部队和战俘的时候,他受到了国家领导人般的欢迎。

当十月革命使得 V. I.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登上权力顶峰后,马萨里克开启了与布尔什维克军事指挥部的协商,并且在 1918 年 2 月,为军团赢得了武装中立的状态,它们在即将发生的内战中不会被任何一方调用,但是如果受到攻击,有权进行自卫反击。德鲁日纳将从乌克兰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被送往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之后船运到西欧,在那儿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加盟法国军队,投入到法国北部战壕中的战斗中。

139

马萨里克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后待在俄国的 6 个月期间,第一时间目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影响,他并没有在布

尔什维克政策中发现多少对他支持的保证。在离开俄国西部后不久，马萨里克稍早于军团抵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他前往美国，在那儿与多个捷克和斯洛伐克组织会面，并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领导人。对于军团来说，在 1918 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从俄国离开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项协议终止了俄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斗，阻止了俄罗斯人在俄国土地上进行敌对奥匈帝国的活动。

在他们“远征”的过程中，军团遭受到来自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和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两方面的袭击，因为他们当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排成了一线。第一次重要的交战在 5 月中旬发生在车里雅宾斯克附近，当时涉及一列装载着德国和匈牙利战俘的火车的小规模投掷石块事件导致了 10 名军团士兵因谋杀涉嫌袭击的战俘而被逮捕。这次事件最终导致军团在与当地苏维埃的激战中对这座城镇的部分占领。铁路沿线其他地方的战斗结果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军团在它们向东朝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发的过程中，赢得了西伯利亚铁路很长一段的控制权。最终，军团的转移从 1919 年 1 月延续到 1920 年 11 月 30 日，据估计有 56 451 名士兵和超过 1 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离开俄罗斯回到祖国。

在其他地方，马萨里克、贝奈斯和什特凡尼克等人扩大捷克和斯洛伐克军事作用的努力，在 1917 年 12 月获得了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政治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正式承认。1918 年年初，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与贝奈斯联合签署了一份协议，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和会的代表权。在什特凡尼克对大西洋彼岸的征兵工作的监督之下，大约 3 000 名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美国人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志愿服役于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在美国投入战斗并且开始派遣士兵前往欧洲之后，在美军服役的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美国人的数量上升到大约 4 万人。

140

1917 年秋天在卡波雷托的军事灾难之后，意大利当局转变了他们的立场，允许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在现役部队中服役，并且在 1918 年 4 月中旬，什特凡尼克与维托里奥·奥兰多总理签署了一项协议，在意

大利土地上建立一支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意大利人还放弃了对独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家的反对,原先的反对是出于意大利自己对南部斯拉夫土地的企图和与之相应的对讨论独立的规避。

## 战争结束和共和国诞生

1918 年 1 月 6 日,捷克帝国议会议员和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捷克西里西亚的政客在主显节圣日期间聚集在布拉格,发表了一份受到在各协约国首都和革命后的俄国不断增长的对民族自决的支持启发的宣言。这份《主显节宣言》要求创建一个把传统的斯洛伐克地区和波希米亚王国包括在内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独立国家,此外还要求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正式代表。

然而在两天之后的 1 月 8 日,伍德罗 · 威尔逊向美国国会发表他的“十四点”演讲,其中他只是谈及美国支持奥匈帝国人民追求帝国内的自治。英国首相大卫 · 劳合 · 乔治遵循类似的途径,他知会奥匈帝国,英国的战争目标不包括肢解这个帝国。

然而在内部和军事上,战争最后一年的年初对奥匈帝国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太顺利。1918 年 1 月末,一股罢工的浪潮从下奥地利席卷捷克国土,捷克工人投身于一次总罢工,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工人同伴。2 月 1 日,捷克和南斯拉夫水手参与在亚得里亚海科托尔湾的一次叛乱,升起革命的红色旗帜,要求结束战争并且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叛乱者号召奥匈帝国海军中的同志加入这个事业,不过当局在三星期后终止了暴动,在军中蔓延的仅仅是不满情绪。2 月,叛变出现在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一些捷克部队中,继之以在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的士兵的类似行动。到战争的这一时刻还未曾参与大规模逃亡的斯洛伐克士兵,到 1918 年,也变得更愿意投身反叛的行动。那一年的 6 月,44 名斯洛伐克士兵在参与发生在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叛乱后,面临处决。

正当外交部长切尔宁继续批评马萨里克及创建独立国家的努力之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们于 4 月 10 日出席在罗马召开

的被压迫民族大会，并且主张支持民族自决。斯洛伐克政治领袖瓦夫罗·什罗巴尔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机召集社会民主党人到利普托夫斯基圣米库拉什，在那儿他宣布支持奥匈帝国内各民族的自决，并且要求创建一个将联合相同斯拉夫家族的两个分支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什罗巴尔的行动使很多海外的斯洛伐克人确信，马萨里克为一个新国家制订的计划已经获得帝国内部的斯洛伐克人的支持，尽管由于什罗巴尔被匈牙利当局逮捕和什特凡尼克拥有法国国籍，有关斯洛伐克领导人的问题浮出水面。

5 月 24 日，斯洛伐克民族党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聆听安德莱·赫林卡宣布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绵延千年的失败关系的终结。就像什罗巴尔一样，赫林卡鼓励斯洛伐克人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合作、创建一个新国家的观念，这是所有主要斯洛伐克政治党派领导人共有的观点。5 月 30 日，在美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组织成员与马萨里克一起签署了《匹兹堡协定》，该协定由马萨里克起草，作为一种手段为一个包含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土地的共同和独立的国家提供联合认可。通过协定，斯洛伐克人将拥有语言权利以及他们自己在共同国家之内的自治管理机构、议会和司法体系。

马萨里克于 6 月 19 日会见伍德罗·威尔逊，此后不久，法国承认在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为一个新国家政府的前身。美国在 7 月 2 日作出了它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地位的承认，而英国在 8 月 9 日同样作出确认。在布拉格，一个复活的国民委员会不顾奥匈当局的反对，在 7 月 3 日出现，由克拉马日、什韦赫拉和克洛法奇领导。

142

出于察觉到协约国政府对奥匈帝国不确定政策的顾虑，贝奈斯于 10 月 14 日宣布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政府，该公告催促来自协约国的正式支持声明。马萨里克担任新政府的总统职位，贝奈斯担任外交和内务部长，而什特凡尼克为国防部长。

10 月 16 日，卡尔皇帝做了一次迟到的尝试，通过提议将帝国的奥

地利部分进行联邦化来保留奥匈帝国，该计划将不能改善匈牙利行政管理之下的斯洛伐克人的命运。卡尔还请求威尔逊和协约国同意基于这位美国总统的"十四点"进行和平谈判，保留奥匈帝国原封不动作为一个帝国。这位皇帝的提议使马萨里克改变了他的计划，于 10 月 18 日在华盛顿特区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独立宣言——《华盛顿宣言》。

奥匈帝国政府愿意为了进行停火谈判而接受威尔逊条款的公开披露导致了 10 月 28 日在布拉格的独立宣言。克拉马日、克洛法奇、什韦赫拉、拉欣、斯洛伐克的代表什罗巴尔以及其他国民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一些刚从两天前在日内瓦与贝奈斯的会议中赶回来——解读了这条新闻，意指君主政体的溃败和投降已为时不远。结果，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宣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独立，以及一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诞生，本质上这是出于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宣言的签署发生在市政厅，随后在文采斯拉斯广场的圣瓦茨拉夫纪念碑前公开宣布，这时庆祝活动已在布拉格街头开始。在与贝奈斯谈判期间——以及作为马萨里克的《华盛顿宣言》的结果，新政府将会是一个共和国的协议已经达成。

对于新宣布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中的日耳曼人来说，捷克和斯洛伐克政治家之间的协议与他们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协议中包括了保留与奥地利的联系和创建多个自治日耳曼省的计划。10 月 29 日，来自捷克国土的日耳曼代表在帝国议会宣布，日耳曼波希米亚(*Deutschböhmen*)地区将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一天之后，来自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代表为日耳曼人居住的苏台德地区要求类似的地位。这些决定中许多是在奥地利将被允许与它的同盟国盟友以"大德国"的名义进行合并(*Anschluss*)的假设下作出的。尽管帝国议会于 11 月 12 日投票支持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协约国却阻止德奥合并，大部分是因为中欧重组将使战败的德国收获一些重要地区。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支持法国的请求，有关修正历史性捷克国土的任何决定都将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议上作出。1919 年 3 月 4 日，新近选出的奥地利国民大会首

143

次开会,当时许多拒绝参与奥地利选举进程的权利的捷克国土上的日耳曼人投身于愤怒的示威活动。

捷克军队和宪兵的粗暴反击造成 52 名日耳曼人死亡,另有 84 人受伤。随着战争渐近灾难性的终结,匈牙利当局寻求确认斯洛伐克人保留他们与匈牙利的政治和疆域联系。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允许斯洛伐克民族党于 10 月 30 日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安排一次公众集会,在此期间与会者转而宣布他们对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支持,尽管由于在匈牙利的报纸上缺乏类似的消息,他们并不知道两天前在布拉格发生的事件。代表们选举出一个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在磋商作为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的权利中代表斯洛伐克。

11 月 1 日,匈牙利人宣布从奥匈帝国独立,骚乱在斯洛伐克爆发,留给斯洛伐克人有关匈牙利意图的不确定性。什罗巴尔带着建立秩序的目的在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和武装分遣队的陪伴下从布拉格抵达。匈牙利军队的入侵逼迫什罗巴尔的部队退回到摩拉维亚边界,这时贝奈斯与法国人协商,试图要求协约国就与现在独立的匈牙利之间的停战条款来澄清斯洛伐克的地位。霍贾试图与匈牙利当局展开他自己的谈判,以便说服匈牙利人撤出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和平会议之前勾画出领土界线。然而,在布拉格的临时政府否定了霍贾的谈判,并且以贝奈斯与法国人商议的结果,获得了一条更有利的分界线,贝奈斯要求匈牙利军队在 12 月 19 日从斯洛伐克撤退。几个星期之内,以前的军团士兵现在成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初创军队,为了保卫新的国家而占领了斯洛伐克领土。

144

在奥匈帝国与协约国签署休战协议两天之后的 11 月 5 日,贝奈斯及其他捷克海外使团的领导人回到布拉格,就在同一天,卡拉马日宣布一个独立和民主的共和国诞生。仅隔一周之后的 11 月 13 日,国民委员会批准了一部临时宪法,该宪法要求成立全国革命委员会,由马萨里克担任总统,并由单院制的议会选举产生,该议会还承担起草永久性宪法的责任。国民大会的 268 个席位以 1911 年帝国议会选举为基础进行任命,尽管捷克国土上的少数民族和斯洛伐克彻底没有代表权。随

后的一天，革命进入最后阶段，新的国民大会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在捷克国土上统治的终结，并正式选举马萨里克为总统，接受克拉马日任总理和贝奈斯任外长。马萨里克于 11 月 18 日离开纽约，在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正式访问之后，于 12 月 21 日回到布拉格，担起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责。

在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出现了有关切申公国的次级领土纷争，波兰人以历史性权利和高比重的波兰人口为依据索求这片西里西亚领土。作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捷克人对这片领土的索求主要以历史性权利的论据为基础，不过也因为切申的煤炭资源、富庶和提供重要经济收益的到斯洛伐克的铁路连线。尽管在波兰人向和平会议求助之后，捷克人接到了从该地区撤出部队的命令，他们还是在 1 月占领了切申。1920 年 1 月 28 日，大使委员会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被允许占有煤炭资源和铁路，不过既然没有一方对这个决定感到满意，切申将继续成为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论焦点。

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于 1 月 18 日，会议和协商一直持续到 6 月。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主要议题到 4 月中旬都被讨论及办理，而与德国(《凡尔赛条约》)、奥地利(《圣日耳曼条约》)和匈牙利(《特里亚农条约》)的正式条约随后才能达成。由克拉马日和贝奈斯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获得了领土索求的确认，其中包括历史性的捷克国土、斯洛伐克、卢萨蒂亚、切申和东部的下喀尔巴仟—鲁塞尼亚。当匈牙利人用他们自己的历史性权利反驳斯洛伐克的索求之时，贝奈斯成功地论证了将这些地区列入斯洛伐克国土的战略和经济必要性。然而，协商排除了贝奈斯有关连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国土的跨匈牙利走廊的提案。作为协商解决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一份少数民族条约，保证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并且接受了解放补偿的要求，后者也强加给了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独立的前奥匈帝国领土。

145

1919 年 3 月末，布尔什维克新闻工作者贝拉·库恩作为激进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赢得了权力，该国试图通过匈牙利红军在 5 月初的军事入侵重新获得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占领了三分之二的斯

洛伐克,并且在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的一些地区实行了地区苏维埃。一个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于6月16日出现在普雷绍夫,其领导人宣布他们支持在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到6月中旬,来自列强的军事行动威胁迫使匈牙利人放弃斯洛伐克领土,并导致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重新获得了斯洛伐克。

大多数斯洛伐克人选择支持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导向的政党以寻求实现斯洛伐克的目标,但对斯洛伐克在新国家内自治的要求促使了斯洛伐克人民党的恢复。该党成立于1913年,不过在战争岁月中其政治活动被暂停。该党的联合创始人安德莱·赫林卡主教是1918年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曾与其他斯洛伐克主要政治人物一起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签署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宣言。然而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于1919年12月重新出现后,赫林卡和一些民粹主义者(*l'udáci* 或 Ludaks)对捷克人的反教权主义和路德教徒在关键政治职务的选择过程中正在显示出比天主教徒更受偏袒的观念变得充满愤恨。

由于对国民大会的斯洛伐克团体中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要求斯洛伐克自治不抱什么希望,赫林卡接受了一名支持自治的代表弗兰蒂舍克·耶赫利奇卡博士的建议,在8月底带着向巴黎和会提交自治议题的目标前往巴黎。赫林卡和耶赫利奇卡向协约国代表们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不过会议早已趋于尾声,在条约和协定中作出修改几无希望。当被告知赫林卡和耶赫利奇卡的活动时,在布拉格的斯洛伐克团体谴责他们的提案,并且剥夺了他们的大会资格。耶赫利奇卡动身去布达佩斯,在那儿他依附于寻求重新获得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修正主义者。赫林卡经历了被捕和暂时入狱,不过在政府未能对叛国活动构成诉讼之后,他获得了受政治迫害者的身份。 146

##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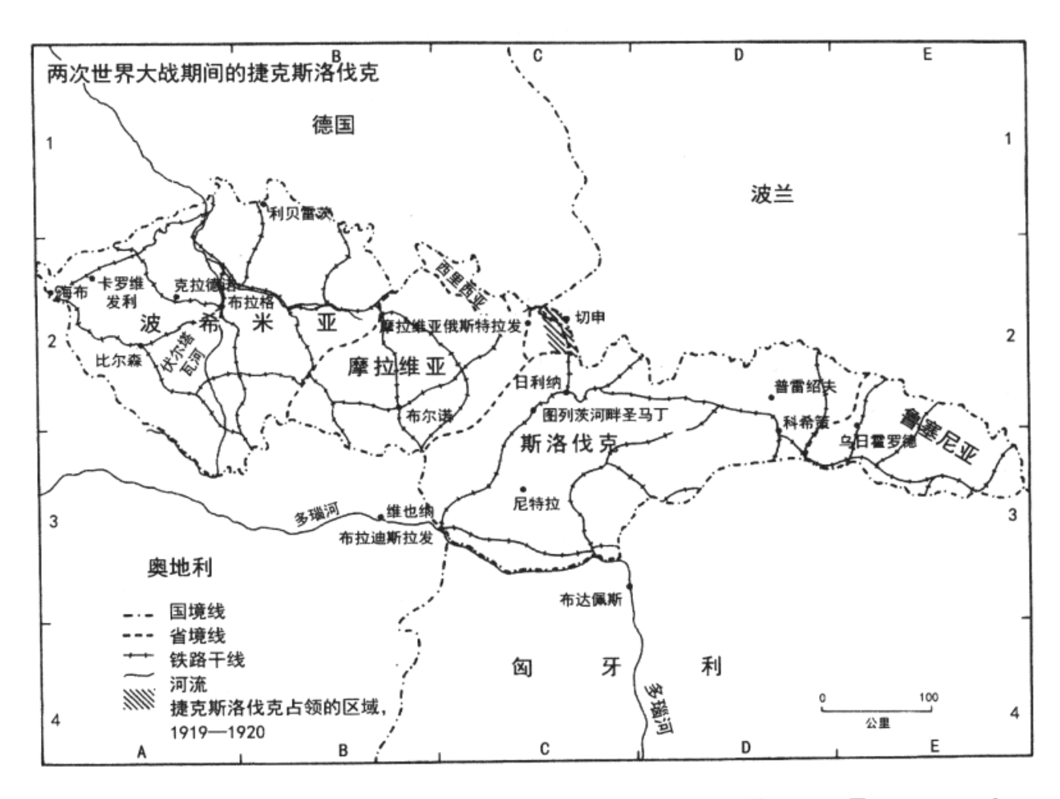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作为军事冲突、国际环境、奥匈帝国的战败和瓦解以及国内和海外的捷克人和

斯洛伐克人实现从帝国独立的努力的结果。这个新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国家包括前奥匈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工业基地。西富东穷的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了大约700万捷克人、200万斯洛伐克人、300多万日耳曼人、75万匈牙利人、50万鲁塞尼亚人以及8万波兰人，1921年其总人口估计为13 374 364人。根据那一年的数据，捷克斯洛伐克49%的人口居住在波希米亚，22%在斯洛伐克，19.6%在摩拉维亚，其余的在西里西亚和鲁塞尼亚。大约76%的公民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同时路德教、希腊正教（东仪天主教）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信仰各占4%。到1930年，犹太人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达到了大约1%，在斯洛伐克是4.1%，而在鲁塞尼亚是14.2%。

1920年2月29日，在布拉格的临时国民大会正式批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民主宪政为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两院制的国民大会包括由150名任期八年的议员组成的上议院和300名任期六年的议员组成的下议院。普选权和比例代表制决定了国民大会的构成。由国民大会选举任期七年的总统并且批准总理的部长提名。宪法并未包含斯洛伐克人的自治，不过指定“捷克斯洛伐克语”为官方语言，意图反映在共和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平等。

宪法为少数民族权利提供了强大保护，在第106条中包括了没有基于性别、职业或出身的歧视的声明。正如马萨里克在1918年的《华盛顿宣言》中所承诺的，女性与男性共享法律平等，还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范围内的平等地位。女性现在赢得了议会中的席位，进入所有级别的行政管理岗位，并且在1930年之后可以被任命为法官。然而，女权主义者对第126条表达了顾虑，该条将婚姻、孕产和家庭置于法律保护之下，由此看来该法律支持基于性别所划分的公民的传统性别角色。1923年，由弗兰蒂什卡·普拉明科娃创建的妇女国民委员会为女性团体提供了一个共同组织，维护法律平等并且为了离婚和工作权等妇女权利和议题进行游说。

147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An Atla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Richard Crampton and Ben Crampton*, 1997. 经英国泰勒和弗朗西斯图书公司许可进行复制。)

在 1920 年 5 月共和国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全国总投票数的 26%，这使得该党领袖弗拉斯蒂米尔·图萨尔继续在与农民党的“红绿”联盟中担任总理。在其他主要政党当中，日耳曼社会民主党获得 11%的选票，领先稍稍少于 10%的农民党。在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赢得了 38%的选票，斯洛伐克民主党和农民党获得 18%的选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获得 17.55%的选票。左倾政党在斯洛伐克的胜利或多或少反映了对战后经济情况的忧虑，同时也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前期占领的后果。

148

5 月 27 日，国民大会选举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为总统，作为大会后来重选的结果，他将一直占据这个职位直到 1935 年。马萨里克的品格和领导能力将有助于为 1918 至 1939 年这段时期中包含 17 届内阁的政治体系提供稳定性。在那段时期里，内阁中的变化普遍缘

起于政治安排，因为没有执政联盟曾经解散，除非是因为联盟党派的领导人选举操控的结果，并且也没有政府因不受信任的选举结果而倒台。唯一主要的政治暗杀受害者是阿洛伊斯·拉欣，1923 年，他被一名精神错乱的青年激进分子谋杀。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作为一个由哲学家总统领导的和平、温和与稳定的民主国家的传统形象是强大而又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其政治体制也包含一些非民主元素，虽然没有腐蚀民主，却也多少玷污了战争年代理想化的愿景。新国家的集权化本质导致了少数民族以及认为自己曾在战时协定中得到自治承诺的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的愤恨情绪。一份长长的多种多样的政治派别花名册在遍及政坛的国家选举中竞争，不过随着这个体系的演变，那些政党中的五个逐步控制了政府中的政策制定。

作为总统，马萨里克以一种德高望重且广受尊敬的领导人身份服务这个国家，不过有人乐意利用他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塑造政府的政策和外交。总统职位的广泛权力包括解散和任命政府，除此之外，马萨里克还持有宪法权利，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期内，实行直接的总统法令。在位于布拉格城堡的办公室里，马萨里克主持着一个由政客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的和有影响力的小集团，它被称为“赫拉德”（*Hrad*，捷克语中“城堡”的意思），由于该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它成为来自政治右派的大部分批评的目标。

149

在内耗导致社会民主党分裂和弱势之后，中右翼农民党成为第一大党。1920 年 9 月，社会民主党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左派脱离该党并且退出执政联盟。在随后的图萨尔政府辞职之后，马萨里克任命了由扬·切尔尼领导的专家组成的无党派政府，切尔尼担任总理直到 1921 年 9 月末被爱德华·贝奈斯接替为止。五个主要党派随后同意在通过立法程序指导切尔尼政府的政策方面进行协作，由此将一个非正式的、不符合宪法的然而却是稳定的“皮耶特卡”（*Pětka*，捷克语中“五”的意思）的概念引入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之中。由什韦赫拉和农民党领导的“皮耶特卡”包括社会民主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被称为国家社会党

直到1918年)、国家民主党(前青年捷克人党)以及扬·什拉梅克主教领导下的天主教和民粹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五个参政党的领导人将党员安置入政府,并要求他们在国民大会和政府岗位的党员执行共同的“皮耶特卡”政策。

农民党在政府联盟中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发展了牢固的关系,后者获得了代表工业和财政利益并且希望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的国家民主党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商人—商业专家党加入这个联盟,该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政治方向类似于农民党。变得越来越中立的社会党可以把贝奈斯算做其成员,尽管他与该党的联系更多是马萨里克要求他参与到某个政党而不是任何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去的结果。

1921年5月,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是博胡米尔·什梅拉尔。共产党发展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Comintern)的联系,最终当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作为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选择于1927年担任党领袖之时,受到了亲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共产党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却不足以被视做是一种威胁,因此使得政府宣布该党为非法的措施没有足够理由——不像该地区其他共产党的情况那样。作为脱党的后果,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支持率从1920年的38.1%跌落到未来几次选举中的11%以下。

马萨里克曾指望日耳曼人参加政府,但是日耳曼政党反对新国家并且最初拒绝与布拉格的政府合作。尽管日耳曼国家社会党和右翼的日耳曼民族党一贯保持反对和反国家立场,其他如日耳曼农民党、日耳曼社会民主党、日耳曼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和共产党等党派最终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党发生联系,追求类似的政治目标。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以及极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日耳曼国家社会党按照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党塑造自己,并且与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党绝无共同点,贝奈斯出于对该党早期历史的承认,于1926年采用了那个党名。

150

作为在布达佩斯的霍尔蒂政府反革命和民族统一政策的结果,匈牙利人政党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最初的抵制方面,遵循了类似那些

日耳曼人政党的路线。最终,一些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党接受了政治现状,并开启与相近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党的联系。

对于依赖自治的期望而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来说,一个受布拉格管理的集权化国家的创建带来了失望,虽然这一新的政治安排显示出得到普遍的支持。由于捷克人在试图现代化那些因马扎尔化而保持不发达的地区时,经常显示出对曾在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地区发展的民族传统缺乏理解,怨恨情绪因此进一步增长。许多捷克人谈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权,但是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依旧是捷克立场的。作为结果,大部分捷克人不能理解自治对斯洛伐克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把斯洛伐克人看做是一个与他们不同的民族。甚至马萨里克也曾在 1921 年宣称:"世界上没有斯洛伐克民族;那只是匈牙利人出于宣传的发明。"[3]

政治经验的缺乏阻碍了斯洛伐克人,不过如果米兰·拉斯蒂斯拉夫·什特凡尼克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回归他的祖国途中,没有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发生的空难中丧生,事件的发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他以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为目标的军事生涯和活动使他成为一位广受尊敬的斯洛伐克领导人,他也许能在斯洛伐克人中提供一种关键的统一力量。

1918 年年末,瓦夫罗·什罗巴尔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来到斯洛伐克,他此行的目的是终止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标志着从匈牙利人的行政管理机构到新国家机关转型的开始。作为马萨里克的支持者和声音派的领导人物,什罗巴尔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议程,不过当他表现出对新教徒的政治偏向,并以多数天主教徒为代价之时,他成功地驱使许多斯洛伐克人倾向自治。什罗巴尔的政治终结随着与匈牙利分离后经济重新定位导致的困境,以及警方于 1920 年在鲁曼诺瓦射杀起义的农业工人之后到来。斯洛伐克农民党在 1920 年选举中的糟糕结果导致什罗巴尔被罢黜,取代他成为党领袖的是米兰·霍贾。

151

考虑到国民大会中席位的分布,斯洛伐克人发现很难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对政治事务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1920 年,斯洛伐克人持有上议院 150 个席位中的 31 个,下议院 300 个席位中的 63 个,他们寻求斯

洛伐克议会和区域性政府的创建,不过在 1922 年提交正式提议之后,这个请求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1925 年的选举结果揭示了自从 5 年前的首次议会选举以来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坛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 1920 年 25.65%下降到 1925 年的 8.88%,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对经济困难的不满中赢取了政治资本,得票率为 12.86%。农民党随着不断增长的选举支持而兴起,同样的还有民粹主义政党。斯洛伐克人民党——在 1925 年更名为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HSL'S)——在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 6.88%的选票,不过在斯洛伐克选民中赢得了重大胜利,以 34.3%的表现领先于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的 17.4%和共产党的 13.9%。

1926 年 3 月 18 日,健康问题导致农民党领袖什韦赫拉辞去从 1922 年 10 月起占据的总理职位。马萨里克选择扬·切尔尼领导的第二届无党派政府替换什韦赫拉的政府,一直持续到 1926 年 10 月什韦赫拉回来重新履行总理职责。什韦赫拉的新中右翼联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商人党和关键性的日耳曼农民党及日耳曼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并且任命了两名日耳曼裔部长。

国家民主党的加入导致了从 1927 年到 1929 年 2 月的“绅士”或“绿黑”执政联盟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国民大会重新选举马萨里克为总统,而且政府制定了农业关税和牧师工资来满足不同的选民。1928 年 7 月 1 日,公法第 125 号用旨在将决策制定权延伸到四个新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地区的体系替换现存的行政系统。每个省份将归于一位省主席的权力之下,并且拥有具备有限权力的地区议会,不过布拉格政府负有最终决定的职责。由于这种省级体系的制定被解析为斯洛伐克迈向自治的步骤,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进入什韦赫拉的“绅士联盟”,该党的扬·德罗布尼成为斯洛伐克首任省主席。在 1928 年 12 月 2 日斯洛伐克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赫林卡的党赢得 15 个席位,农民党 16 席,共产党 5 席,其余 18 个席位由其他政党分得。

152

1928 年早期，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报纸《斯洛伐克》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马丁宣言〉后的十年》，文中沃伊特赫·图卡主张，正如在 1918 年的《马丁宣言》中陈述的秘密条件所支持的，到这一年年底不能准予斯洛伐克完全自治，将导致对捷克斯洛伐克法律的否定。在战后曾秘密担任匈牙利民族统一主义者特工的图卡成为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激进派的领导人，1921 年，他曾起草一份有关斯洛伐克自治的提议，随后在 1922 年，接受赫林卡的邀请，担任《斯洛伐克》的主编。一年之后，图卡创建了准军事组织“罗多布拉纳”(*Rodobrana*)，这个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极端分子的团体具有他对捷克人、新教徒和犹太人的负面观点。到 1925 年，图卡到达了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领导层的高层，并且从 1925 至 192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中为该党尽职。

当图卡的文章在 1928 年出现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党的斯洛伐克领袖开展了对他早期代表匈牙利和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活动的调查，导致对他反共和国的叛国罪和阴谋罪的指控。一旦被剥夺了议会豁免权，图卡成为第一共和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审判的焦点，并于 1929 年 10 月被宣判入狱 15 年。作为图卡事件的后果，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放弃了政府联盟，随后在 1929 年 10 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下降，在斯洛伐克下滑到 28.3%，在全国下滑到 5.8%。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在斯洛伐克得票率为 19.5%，匈牙利地区性基督教—社会党为 15.9%，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 10.7%，不过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仍旧占优势地位。

153

在全国层面上，农民党依旧强势。什韦赫拉由于持续的身体不佳于 1929 年 2 月辞职，弗兰蒂舍克·乌德日扎尔执掌农民党领导权，并在一个八党执政联盟中担任总理直到 1934 年 10 月。不过，这个联盟几乎没有时间设定政治路线，经济危机在选举后不久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世界。

## 20 世纪 2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

随着巴黎和会而来的是，初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作为一个处在

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但却在列强中没有强大敌人的小国,进入了欧洲国家的群落。从军事失败中升起的民主的新德国并没有引起即刻的威胁,尤其是鉴于《凡尔赛条约》强制德国缩减军事力量的情况。奥地利和匈牙利仍然对版图调整及和约的条款感到不满,不过两者都因奥匈帝国的解体和战争的后果而遭到削弱。此外,同盟国激励了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个帝国的覆灭导致多个国家诞生或重生以及不稳定可能性的地区的发展。

尽管战时捷克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获取同盟国支持时曾有过大量活动和坚持,贝奈斯和其他人相信,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巴黎和会上非常成功的协商主要是各同盟国政府所作决定的成果,并非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身努力的回报。作为结果,贝奈斯和两次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策划者们倾向于以附属国的意识来处理外交关系,对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诸如英国和法国之类的庇护国支持下的行动能力没有完全的自信。随着美国从欧洲事务中退出,而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在各同盟国政府的眼中仍是贱民,领导权落入英国和法国手中,其中前者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慢慢地脱身而去。与此同时,法国逐渐显示出不愿意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行动。

作为马萨里克的外交部首脑的选择,贝奈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中主控了外交事务,在一些关键方式上显示出与这位哲学家总统截然不同的个人和政策特性。贝奈斯在1921—1922年完成了一个简短的总理任期,他把外交事务当做是一个情感服从于理性分析的赛场来对待,并且用一种近乎科学的途径来决定策略。在贝奈斯的观点中,捷克斯洛伐克将主要受益于《凡尔赛条约》中确定的协商边界和条件的保留,并且应避免将共和国暴露于危险或竞争的外交或军事关系中。安全存在于适应性和均衡之中,继而产生于欧洲——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和同英法之间的持续合作之中。与马萨里克一样,贝奈斯认为将苏联与欧洲事务隔离不会有什么收获,并基于这一点,想要捷克斯洛伐克起到传统上属于波希米亚王权领土的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的作用。贝奈斯为这个策略不知疲倦地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无

154

数次海外旅行，推动对联盟的支持，在这期间六次担任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并曾担任大会主席。

在同盟国各政府阻止将奥地利领土与德国合并的“德奥合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1921 年 12 月，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拉尼条约》，这是一项为改善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稳定的双边协定做好铺垫的友好条约。1925 年 11 月，一项商业条约紧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而来，尽管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者在意大利的政治胜利为墨索里尼将其意大利的影响扩张至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计划所引起的忧虑提供了理由。

改善与匈牙利关系的努力在战后显得更加困难，当时摄政的海军少将米克洛什・霍尔蒂和匈牙利政府采用了一种民族统一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特里亚农条约》和在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匈牙利人认为是马扎尔人传统领地的丢失。贝奈斯未能与修正主义的匈牙利恢复邦交，不过匈牙利的政策却使得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更加密切，并且被证明对小协约国——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联盟——在 1920—1921 年的创建起到作用，该联盟的目标主要是共同防卫匈牙利的野心。贝奈斯希望利用这个联盟作为对德国的平衡，尤其是在得到与法国的军事同盟的支持之时，不过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觊觎看来远远多于对其他小协约国的成员。

155 在 1923 年的危机期间，恶性通货膨胀和德国鲁尔地区被占领给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创造了困难，这个结果是由法国对德国人的持续强硬政策造成的。贝奈斯相信法德之间的协作对保持欧洲的长期稳定是必要的，不过他斡旋解决方案的屡次尝试未能阻止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对鲁尔工业区的占领。

1924 年 1 月 25 日，有关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联盟的协议促成了在保持现存军事联系、保留现状和阻止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旧统治王朝复辟等方面的协作。捷克斯洛伐克还在 1924 年 7 月与意大利以及 1925 年 4 月与波兰订立了友好条约，尽管在贝奈斯看来，与波兰的潜

在同盟因为波兰新近恢复的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易受攻击的位置而太过冒险。波兰是法国的盟友,不过波兰也享有同匈牙利的良好关系,而匈牙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趋势仍旧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主要顾虑来源。

贝奈斯对仲裁作为一种处理不满的手段的信心,当他于1924年主持负责起草《日内瓦议定书》的委员会时,看来处在有利的地位。该协议的支持者希望提升国际联盟的作用,并且用一套为国际争端提供仲裁的体系取代传统的外交惯例。捷克斯洛伐克批准了协议,不过英国和法国拒绝这么做,转而选择在1925年10月瑞士洛迦诺的会议上进行新的协议谈判。贝奈斯和他的波兰同僚亚历山大·斯克尔曾斯基在这次会议上得不到任何关注,与此同时,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官起草了《洛迦诺公约》。谈判引入了一种新的对德国的调解精神,法国和德国同意保持在《凡尔赛条约》中定义的他们的领土边界,如果任何一国通过军事行动侵犯了边界,英国和意大利将立即介入。然而,协定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保证德国的东部边境,尽管德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仲裁条约,并且在1925年的一项协定中,法国加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在万一受到德国军事威胁情况下的武力承诺。德国进入国际联盟以及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这样的希望,即集体安全的延伸可能会补偿在保证那个国家东部边界的持久性方面的失败。

156 在这十年的中点,贝奈斯对民主和集体安全的追求信心似乎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希望。然而在1929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政治极端主义不断增长对凡尔赛体系构成威胁,并将民主置于守势,欧洲事务开始剧烈地转变。由于1929年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之死,源自洛迦诺会议的合作精神似乎随着欧洲进入危机的十年而走向终结。

## 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捷克斯洛伐克调整了对欧洲其他国

家和世界的贸易,该国经济克服了奥匈帝国时期的传统市场和经济关系的损失。捷克斯洛伐克经受住了从1921年至1923年席卷这个大陆的经济衰退,尽管阿洛伊斯·拉欣作为财政部长于1922年颁布的严厉通货紧缩政策可能削弱了1923年困扰德国和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政策并没有避免他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1923年1月5日,拉欣在日渐不得人心以及左翼批评家在报纸上持续不断的攻击中,被一个精神错乱的青年激进分子射杀。

随着创建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过程完成,经济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超越了战前的水平,到这十年末,这个国家享受到较大程度的经济稳定和繁荣。1918年12月引入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而两年之后是童工法,此外还有1924年颁布的疾病和意外防护政策以及1926年的白领工人养老制度。

到1928年,情况开始恶化,首先是国际贸易的衰退,随后在1929年农业产品的价格严重下滑。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引起了全球经济危机,这在随后的一年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立刻进入衰退,其中对轻工业的打击尤其猛烈,特别是在操德语人口聚集的边境地区。到1932年,工业企业的生产仅仅达到1929年之前水平的60%,而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到了接近极限的水准。根据政府的正式报告,1929年曾达到战后低位的失业人数在1933年上升到接近100万。在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危机甚至变得更加严重,高失业与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一起导致大量人口得不到任何方式的支援。

157

恶化中的危机和政府迟缓的反应引发了公众示威活动和罢工,这些常常得到该国知识阶层和文化领袖的支持。对恶化的经济条件措手不及的执政联盟在应对工资、价格和货币时反应温和,然而对公众不满的表达却予以强势回应。在1930—1933年间的几年里,警察和宪兵在应对示威者和罢工工人时导致29人死亡和超过100人受伤。政治生活的日趋激进使对左翼共产党和右翼法西斯分子与极端分子的支持不断增长。

1932 年 10 月 29 日,由弗兰蒂舍克·乌德日扎尔的继承者——农民党人扬·马利佩特尔领导的新政府被任命,首先产生了对公众抗议的法律限制,随后在 1933 年 6 月,一项议会特别权力法授予政府干涉经济事务并通过政令设定政策的权力。到 1934 年,生产开始缓慢回升,尽管经济转入一个萧条阶段,而信用危机和农业的惨淡状态也阻碍了经济健康的回归。在那一年里,政府努力稳定粮食价格、调低利息、增加对外贸易并且使捷克斯洛伐克货币克朗贬值。在 1935—1936 年,作为投资增长的结果,生产继续上升,尤其是在军备部门。

### 1935 年选举和民族主义政治

马萨里克重新当选总统一年之后,1935 年 4 月议会选举的结果证实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激化了民族问题,并且增长了对布拉格政府的不满。德语地区源自工业生产衰退的社会问题以及斯洛伐克农业的恶化导致很多人质疑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效率,并且支持主张自治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成为中央集权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党的替代选择。

农民党以 14.3%的得票率从选举中脱颖而出,而左翼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得票 12.6%,共产党得票 10.3%。在反民主党派中,由拉多拉·盖达将军领导的国家法西斯联盟仅赢得 2%的选票,不过大大出人意料的是,敌对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党(SdP)以全部选票的 15.2%和三分之二日耳曼裔投出的选票脱颖而出。日耳曼社会民主党丢失了他们超过半数的席位,同时其他日耳曼政党也失势于这个激进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政党。该党由康拉德·亨莱恩于 1935 年创立,脱胎于他的苏台德祖国阵线(SdP)和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查禁的纳粹及极端主义日耳曼人组织。亨莱恩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胜利导致日耳曼人从布拉格的政府中撤离,该党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也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158

11 月初,当时已经 85 岁高龄的马萨里克任命米兰·霍贾成为该国首位斯洛伐克人总理,随后他在 11 月 21 日辞去总统一职,这是根源于他在 1934 年 5 月罹患中风的结果。隐退之后,这位“总统解放者”要

求贝奈斯被允许继承他成为总统，在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与霍贾的农民党一起支持贝奈斯的候选资格之后，贝奈斯于 1935 年 12 月 15 日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任总统。马萨里克于 1937 年 9 月 14 日去世，完成了到第一共和国新阶段的过渡，尽管这个阶段是短暂的。

在斯洛伐克，由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形势以及像卡罗尔·西多尔和约瑟夫·蒂索一样出自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和“前进”(*Nástup*)集团的更年轻的成员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对自治的支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斯洛伐克民粹主义者中得以增长。1932 年 6 月末，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中新兴一代的代表们在特伦钦附近特雷普利采小镇召开斯洛伐克青年一代代表大会。聚会很快发展成支持斯洛伐克自治的集会，许多代表公开抨击中央集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斯洛伐克政治领袖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被认为对斯洛伐克经济的糟糕状态负有责任。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增进了公众对赫林卡的政党的自治议程的兴趣，而该党甚至没有参与到代表大会的筹划中。

1932 年 12 月末，赫林卡在特伦钦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演讲中他重申了他在保护斯洛伐克利益中的姿态，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不愿意放弃“民族主权的权利，甚至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为代价”。[4] 1938 年 6 月 5 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赫林卡选择《匹兹堡协定》20 周年之际，宣布准备递交给布拉格政府的第三份有关斯洛伐克自治的提案。提案包括要求一个分离的斯洛伐克政府和议会，与捷克共同承担在国防、外交和财政等方面的职责，并且具有斯洛伐克代表可以否决由捷克斯洛伐克议会和政府提出的措施的权利。贝奈斯正忙于处理涉及苏台德日耳曼人和德国入侵威胁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非集权化得到了他的批准。1938 年 8 月 16 日，虚弱和不健康夺走了赫林卡的生命，随后蒂索被选举担任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领导人。

159

## 大萧条时期的对外政策

由于经济危机的发作，摩擦在捷克斯洛伐克与该国在小协约国中的盟友之间产生，当时来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农业品进口招致了

国内生产者的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最终允许德国作为工业产品的供应国进入那些市场,以此作为对农业产品的回报。建立德奥关税联盟的努力作为可能是迈向"德奥合并"的一步而在 1931 年提供了警报的理由,不过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出于对其违反早期条约的反对,阻止了这个联盟。

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尽管施特雷泽曼意欲修订《凡尔赛条约》,随着德国于 1926 年进入国际联盟并且保留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稳定条款,对德国侵略的恐惧暂时平息。然而随着 1933 年 1 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开始着手一项挑战欧洲民主并对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界的修订造成威胁的进程。1933 年,希特勒的最初外交政策动作包括退出联盟并且从一个由贝奈斯担任秘书长的国际裁军会议中撤离。

贝奈斯明白切申和解仍旧是与波兰人摩擦的源头,他试图与他的波兰对手约瑟夫・贝克将军进行谈判,不过当波兰在 1934 年与纳粹德国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时,他遭受了重大挫折。贝奈斯后来谴责波兰的决定是"欠考虑的、傲慢的挑衅标志",在一个法国在中欧的兴趣早已开始消退的时刻,使其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关系紧张起来。[5]

在 1933 年最初的几个月期间,苏联曾向法国和小协约国发出提议,于是在 1934 年,法国外长路易・巴尔杜用一个将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同法国联系在一起的东方策略来回应德波协定。贝奈斯和马萨里克想要苏联起更大的作用,以此作为对德国的平衡,不过苏联人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直到第二年,他们进入国际联盟并且开始推进集体安全以面对由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所形成的威胁。 160

1934 年,巴尔杜被暗杀导致法国政策在皮埃尔・勒伐尔治下重新定向,勒伐尔支持两项分开的互助条约——法苏和苏捷,取代巴尔杜的三方合作计划。1935 年 5 月的苏捷条约在德国已宣布重整军备计划的那一年签署,事前得到正式外交承认,该条约保证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万一受到直接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苏联支援——尽管前提是法

国首先履行他们自己对 1925 年的条约的承诺。

当贝奈斯在马萨里克离开后担起总统职责之时，他的位置由米兰·霍贾取代，并最终于 1936 年 2 月选择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卡米尔·克罗夫塔担任外交部长。之后一个月，德国军队重新占领莱茵兰，对《凡尔赛条约》发起挑战，贝奈斯与波兰和苏联一起向法国人提供支援，法国反而指望英国人的援助。缺乏强硬的回应使贝奈斯担心不已，提出了之前无法想象的选项——与纳粹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法国与贝奈斯接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协助保卫波兰的意愿，但是波兰不顾贝奈斯的正面回应，拒绝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互换。当 1936 年 8 月贝奈斯通过法国调解人提议，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开始进行对抗德国的联合军事准备，波兰人再次拒绝合作。贝奈斯和克罗夫塔在 11 月和 12 月期间与德国外交官进行秘密会谈，但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地位的争论以及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对贝奈斯条款的解释的反对关闭了达成最终协定的任何可能性。

希特勒轻视捷克斯洛伐克，把它当做是注定成为大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容纳日耳曼裔人口的一个人为创造国家。康拉德·亨莱恩和他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党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帝国政府的资助，他们为希特勒提供了德意志帝国获得操德语的苏台德地区占有权的途径。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相对于纳粹德国和苏台德日耳曼人的位置变得越发危险，1938 年 9 月的《慕尼黑协定》使得希特勒达成了他吞并苏台德地区的目标，此时英国和法国选择放弃捷克斯洛伐克，而不去冒爆发另一次重大欧洲战争的风险。

161

**注释：**

1 H. G. Skilling, *T. G. Masaryk: Against the Current, 1882 –1914*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xii.

2 Dr.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ris and Observations 1914 – 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27), 47.

3　引自：R. J. W. Evans, "Hungarians, Czechs, and Slovaks: Some Mutual Perceptions, 1900 - 1950," in *Czechoslovakia in a National and Fascist Europe 1918 - 1948*, ed. Mark Cornwall and R. J. W. Ev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4.

4　James Ramon Felak, "*At the Price of the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29 - 1938*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4), 96.

5　Edvard Benes, *Memoirs of Dr. Eduard Benes: 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c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10.

# 第七章　慕尼黑协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1945年)

163

## 康拉德·亨莱恩和苏台德日耳曼人

到了1936年,布拉格政府不仅面临着来自侵略性的纳粹德国不断增长的威胁,还有来自正在变得更加激进和期盼转向希特勒政权寻求支持的内部日耳曼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边远的德语区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导致了高失业率以及根源于倒闭企业和失去工资的社会混乱。由于这次经济危机,康拉德·亨莱恩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以自封的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权利捍卫者的形象出现了。

1933年10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体操组织的领导人亨莱恩成立了苏台德日耳曼人爱国阵线,在迅速获得被禁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民族党的补充后,在1935年4月的选举前改组为苏台德日耳曼人党(SdP)。亨莱恩希望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德裔居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资本,此后又获得了弗朗茨·卡尔马辛的喀尔巴阡日耳曼人党(KpD)的联盟,该党声称其代表大部分生活在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说话。

164

亨莱恩的党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组织,符合其追求德国的扩张主义和泛德主义,并且最终实现创建一个欧洲中部的大日耳曼帝

国的目标。亨莱恩的党在 1935 年选举期间得到了纳粹德国的资金支持,1937 年 11 月,亨莱恩表达了其重新定位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以协助希特勒夺取捷克领土的努力的愿望。亨莱恩给希特勒的信夸大了苏台德日耳曼人与捷克人和布拉格政府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怂恿德国人占据边境地区以实现被亨莱恩称为苏台德日耳曼人党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希特勒于 1936 年在莱茵兰重新部署重兵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大会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活动以及在边界地区发生的摩擦作出反应,通过一项法律授予军队在边界以内延伸 15.5 英里范围的区域内广泛的权力,其中包括了相当高比例的波希米亚日耳曼人。德国大大增加了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资金流,希望利用该党信徒不断增长的愤怒和激进化。

总理米兰·霍贾相信他的斯洛伐克背景使得他在与德国人协商时,不会遇到他的捷克同僚面临的障碍。1937 年 2 月,霍贾政府提出计划处理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相关事务,并且在政府行政机构以更公正和更符合比例的方式提供职位,以此来应对各民族中的不满情绪。然而在那年秋天,霍贾与亨莱恩协商的努力完全失败,随后在 1938 年早期,农民党领导人鲁道夫·贝兰要求妥协,使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可以进入政府,又遭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愤怒反对。

1937 年 6 月,德国的军事策划者们制订了一项被称为“绿色行动”的秘密计划,计划要求迅速夺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建立军事管制政府控制被占区域。这个计划既没有包括对斯洛伐克的占领,也没有将捷克民族纳入到大日耳曼帝国的公民中。在吞并奥地利的德奥合并后,帝国一举获得了 500 万—600 万人口、武器生产的新资源以及就防御目的来说得到改善的边界。希特勒已经开始相信,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将不会在它的边境展开军事行动进行回击,同时英国和法国也不太可能投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卫,因为这样也许意味着将一个地区性问题升级为一场更大的战争。由此,苏台德日耳曼人成为德国为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有计划行动所做准备的焦点。 165

当纳粹德国于 1938 年 3 月 12 日的德奥合并中成功地将奥地利并

吞入大日耳曼帝国的时候,希特勒的策划者们递交了一份修订版的“绿色行动”计划,不顾希特勒的高级军事将领中的反对声音,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3 月 28 日,亨莱恩拜访希特勒,得到首肯,保证其在苏台德日耳曼人党领导地位的稳固,并且该党应该继续表现出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协商的意愿,不过同时将要求提升到无法满足的级别。一个月以后的 4 月 24 日,亨莱恩在卡罗维发利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要求苏台德日耳曼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完全平等。此外,亨莱恩要求在明确定义的日耳曼人区域要有日耳曼人主导的地方管理机构,并且处于苏台德日耳曼人党控制之下,还要求日耳曼人有权赞成实际上接近纳粹的种族和政治观点。

随着亨莱恩的追随者在边境地区通过对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共和国支持者的恐吓和暴行来为市政选举作准备,布拉格政府撤销了德奥合并后颁布的关于公开集会的禁令,这样,一些支持民主的政党可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表示在捍卫共和国方面的团结一致。5 月 20 日,有关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活动的谣言导致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局部动员的“五月危机”,这被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会保卫它的国土抵抗德国人入侵的一个信号。

## 慕尼黑之路

随着苏台德危机的恶化,贝奈斯和布拉格政府开始相信战后的条约和协议事实上并不能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满足期望的外国援助来对抗德国。斯大林在苏联的摆样子公审和整肃导致苏联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卫贡献军事力量的能力方面有所保留。在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领导下,英国奉行一种绥靖政策,希望通过协商解决来避免战争,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和法国的条约制造了复杂性,尤其是后者可以将英国拖入与德国的战争。张伯伦已经派遣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德国,向德国领导人保证,如果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英国政府将会考虑德国东部边界的重新修订。在张伯伦看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位置使得英国、法国和苏联对这个国家的防卫

166

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结果,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选择,只有与德国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协商。亨莱恩利用了英国人的不确定性,通过一次设计好的宣传活动让英国人确信,问题的根源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愿意面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利害关系。

法国人曾经于 1925 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一份协议,此时发现自己处于英国人的压力之下,被要求逐步撤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援助,否则就会有削弱英法合作的风险。英国人希望使布拉格政府明白,同日耳曼少数民族达成一个长期协议将会缓和紧张局势,从而允许法国逃脱危险的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事务的纠缠。然而贝奈斯和霍贾对授予苏台德日耳曼人特权将会导致其他少数民族的类似要求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的不稳定表示了担忧。英国和法国对此的反应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一个外来的调停者,监督其与亨莱恩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协商。

被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调停人是沃尔特・伦西曼爵士,他是一位英国航运大亨,不具有关乎此项任命任何实际的资格。伦西曼从 8 月 3 日至 9 月 16 日一直待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伦西曼任务”在有意安排的游行、各种社交场合以及报告和备忘录的洪流包围下,难以实现任何目标。伦西曼和他的妻子由日耳曼贵族阶层的成员陪同享乐,听到了数不胜数的其被捷克人和布拉格政府苛待的故事,而民主的日耳曼人政党领袖想要与伦西曼商议的努力却遭到了阻挠。

贝奈斯参与了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协商,并于 9 月 7 日接受了亨莱恩于 4 月提出的卡罗维发利(或称卡尔斯巴德)计划的条款。由于对这些让步感到惊讶,亨莱恩停止了沟通,直到 9 月 12 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集会上演讲之后。在演讲中这位德国领导人热切地强调了德国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支持。第二天早上,暴力示威在苏台德和其他边境地区爆发,导致多名捷克警察死亡,捷克人、犹太人和民主的日耳曼人所拥有的商铺被砸毁。当局于 9 月 13—14 日在边境地区实施了紧急措施,向警察局和法院授予应急权力,并且向警察、军事和安全部队发布命令,除非受到攻击不能开火。到了 9 月 15 日,形势稍稍得到控

制，政府宣布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为非法组织，并且批准逮捕亨莱恩。为了避免被抓，亨莱恩越过边界逃往德国。

在提前几天请求与希特勒会面后，张伯伦于 9 月 15 日在慕尼黑着陆，随后乘坐火车前往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顶居所。从卧车隔间的窗户，他可以观察到德国武装部队通过铁路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进发。在会晤中，希特勒严词谴责了针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所谓暴行，并且要求英国和法国政府允许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这是张伯伦早已认定的为避免战争所必需的让步，即使这已经超越了亨莱恩的更大自治权的要求。

9 月 21 日凌晨 2 点，英国和法国向贝奈斯和他的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声明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选择藐视希特勒的要求，该国将会被撇下独自面对其行动的后果。执政党在官方回应上产生分歧，国家民主党和人民党要求反抗，而其余党派不情愿地建议接受。贝奈斯坚持到下午 5 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接受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要求。在布拉格，街头挤满了示威者，要求将霍贾驱逐出推动对最后通牒的公开反抗的共和国防卫委员会。

第二天，当张伯伦正在哥德斯堡与希特勒会晤时，扬·西罗维将军接管了总理职责，并且告知公众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国家会起来保卫自己。然而在哥德斯堡，希特勒增加了新的要求，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立刻从边境地区撤军，还要接受波兰和匈牙利在前一天提出的领土要求。当爱德华·达拉第总理和法国对希特勒的新条件表示反对的同时，英国驻柏林的大使通知希特勒，张伯伦接受这些条款。9 月 23 日，贝奈斯接到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消息，称他们不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动员，随后一天，人数达到 150 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驻沿着边境的防御工事和防守位置。



随着希特勒于 9 月 26 日在柏林的演讲中公然抨击贝奈斯作为个人在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犯下的所谓暴行中起的作用，张伯伦再次试图劝阻希特勒不要发动可能引向战争的行动。作为结果，希特勒最终同意 9 月 29 日在慕尼黑召开一次会议。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将会出

168

席这次会议,受邀者还有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不过出于害怕可能会阻碍协商,没有苏联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出席。

在慕尼黑会议上,四位首脑接受了一份由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拟定并由墨索里尼提交讨论的草案。这份《慕尼黑协定》支持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占领,结果是大约282.5万日耳曼人、接近80万捷克人以及1.1万平方英里从未成为现代德国一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损失。被吞并的地区包括80%的捷克斯洛伐克纺织品、玻璃制品和化学制品企业,还有超过70%的钢铁制造以及大量褐煤和黑煤的储备。日耳曼人口占多数的所有地区将立即被转让,那些日耳曼人口占少数的地区将会举行公民表决,而事实上却从未实行。作为回报,希特勒同意尊重余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主权。

在第二天的早些时间,张伯伦召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通知他们苏台德地区的命运已经得到裁决,他们在这方面的任何回应都将是没有价值的。带着通过《慕尼黑协定》成功避免战争的信心,张伯伦和达拉第随后在大众的一片赞誉声中回到各自的祖国,尽管这次和解最后既没有阻止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也没有避免战争的爆发。

## 第二共和国(1938年10月—1939年3月)

1938年10月3日,主要的将军们威胁贝奈斯,如果他不自愿放弃职务,就将他赶下总统职位,两天之后的10月5日,当德国强烈要求更加顺从的领导人来执行《慕尼黑协定》的条款时,贝奈斯放弃了他的职位。贝奈斯于10月22日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在伦敦短暂停留后前往北美。贝奈斯迅速与美国政府以及诸如斯洛伐克民族联盟和捷克民族联盟的移民团体建立了联系。

169

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前驻意大利大使弗兰蒂舍克·赫瓦尔科夫斯基取代克罗夫塔成为外交部长,协助履行国际条约要求的条件。由于反对容忍的政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鼓励工人联合起来支持抵抗德国的行动,不过党领袖博胡米尔·什梅拉尔、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和鲁道夫·斯兰斯基最终离开去了苏联,尤其是在政府于12月底颁

布了一项针对共产党的禁令之后。

在与亨莱恩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初期协商毫无成果后，贝奈斯和霍贾已经开启了与蒂索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会谈，试图团结斯洛伐克保卫共和国。贝奈斯对斯洛伐克议会和新语言版本的法律给予支持，不过尽管主张自治者在《慕尼黑协定》以前普遍未放弃共和国，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中的许多人此时转而抵制现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推动斯洛伐克自治。10 月 6 日，贝奈斯辞职后的第一天，主张自治的和主张中央集权的政党诸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日利纳进行商讨，产生了一份由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提议的斯洛伐克自治宣言，致使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维准予斯洛伐克完全自治权，提名约瑟夫·蒂索主教为斯洛伐克总理。

随着蒂索政府的创建，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成为斯洛伐克唯一合法的政党，原先支持前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组织在新的政治条件下沦为受害者。当 12 月 18 日斯洛伐克首次议会选举举行的时候，仅有的候选人名单都是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主导的联盟成员。

由于第一次《维也纳裁定》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了进一步的领土损失，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外长于 11 月 2 日会面，并且同意变更斯洛伐克边界的要求，准许匈牙利部分的鲁塞尼亚延伸到匈牙利居民占多数的斯洛伐克南部和东部。已经于 10 月早期派遣军队进入有争议的切申地区的波兰，得到了指定的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部分区域。

170

到 11 月中旬，捷克各政党结成两个联盟，右翼各政党和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组成了国家统一党，社会民主党和左倾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加入了对立的国家工人党。11 月 19 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第 299 号，正式通过斯洛伐克自治，并且将国家名称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第二个议案为鲁塞尼亚自治提供了法律基础，只有共产党人反对这两项法律。大会随后于 11 月 30 日推选埃米尔·哈查担任总统。哈查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律师和最高行政法院的主席，是一名受尊敬的法律专家，不过另一方面却完全缺乏政治经验。农民党的鲁道夫·贝兰被提名为总理，同时卡罗尔·西多尔被选为副总

理和分管斯洛伐克事务的部长。

在慕尼黑峰会之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开始确信,一份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及其导致的捷克斯洛伐克瓦解将会允许德国夺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而又不会把英国和法国拖入捷克领土上的军事冲突。既然《慕尼黑协定》的条款对不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没有效用,英国人和法国人将会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担保,由此不太可能反对德国对捷克领土的占领。

2 月下旬,贝兰对斯洛伐克意图的担心导致其要求斯洛伐克人放弃一个独立国家的想法,转而提出一份忠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宣言。斯洛伐克的回应令人沮丧,贝兰和哈查派遣警察和武装部队进入斯洛伐克,发表声明称蒂索和法西斯主义的赫林卡卫队正在精心策划以独立为目标的行动,并免去蒂索的总理一职。卡罗尔·西多尔于 3 月 11 日开始组建新的斯洛伐克政府,蒂索变得更容易得到来自希特勒的通信。对希特勒而言,在他的代表们不能说服蒂索和西多尔宣布独立之时,布拉格政府的军事响应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在得到希特勒的召唤后,蒂索抵达柏林,并且被告知不能走向独立将会导致斯洛伐克更容易遭到匈牙利扩张主义的攻击。在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面之后,蒂索从柏林与哈查联系,并请求于 3 月 14 日召开一次斯洛伐克议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议会采纳了蒂索的建议,颁布了一项以建立一个在蒂索领导之下的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为目标的法律。

随着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瓦解,哈查请求亲自与希特勒会面,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哈尔科夫斯基于 3 月 14—15 日晚间得到接见。经受了三个小时的威胁和恐吓之后,最终心力交瘁的哈查屈从于强大的压力,签署了一份请求德国武力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文件。而与此同时,德国对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入侵已经开始。

171

德国军队从奥地利由北向南进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 3 月 15 日清晨发表了一次电台演讲,他宣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历来是德国的领土,并且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解体归咎于斯洛伐克独立以及捷克人对少数民族的苛待。当天早晨直

到午后，德国空军控制了布拉格的卢茨内战场，四支德国军事纵队贯穿了这个国家，只遭遇到零星的抵抗，一直进军到斯洛伐克的瓦赫河。鲁塞尼亚的领导人宣布独立，并且要求德国协助以免被占领，不过独立只维持了短短一天，匈牙利就根据与德国的协议占领了鲁塞尼亚地区和一小部分斯洛伐克领土。

3 月 16 日，获胜的阿道夫 · 希特勒抵达布拉格，并且从布拉格城堡颁布一项法令，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授权给纳粹德国保护者康斯坦丁 · 冯 · 纽赖特男爵。纽赖特将于 1 个月后赴任，与其搭档的是国务秘书卡尔 · 赫尔曼 · 弗兰克，他是一名狂热反捷克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在保护国内，纳粹德国的公民地位被延伸到所有生活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日耳曼人，而捷克人被当成保护国的公民对待。保护国宣布 5 天之后，哈查总统解散国民大会，解除现有政党，并且取缔社会、文化、教育和体育组织，比如索科尔和童子军。

德国入侵的当天，贝奈斯通过电报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联系，抗议德国的行动并且告知这些政府他意图重新在政治事务中担当角色以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贝奈斯声明德国的占领和斯洛伐克的独立宣言都是非法的，宣称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侵犯使《慕尼黑协定》失效，并且由此要求恢复该国在《慕尼黑协定》之前的疆界和第一共和国的政府。同一天，内维尔 · 张伯伦通知议会，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解是基于内部的问题，英国对保证该国边界的责任已经终止。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占领意味着 3 月 23 日一项协议的签署，协议给予斯洛伐克保护国的状态，由斯洛伐克人掌握行政机构而由德国人掌握对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的权力。蒂索将作为总理领导新的斯洛伐克政府，西多尔担任内务部长，费迪南 · 朱尔钱斯基掌管外交事务，1938 年获释的沃伊特赫 · 图卡担任副总理。德国还将被允许在斯洛伐克保留军事力量，并且有权得到斯洛伐克的资源，这对德国是非常有利的。7 月 21 日，新宪法开始生效，接着在 10 月 26 日，斯洛伐克议会选举蒂索担任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职位。

172

到4月中旬,在美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组织宣布他们支持贝奈斯作为生活在保护国和斯洛伐克之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领袖。创建流亡政府的努力或许带来了罗斯福在5月与贝奈斯多次会谈期间的允诺——中立的美国对其的承认,两个月之后贝奈斯回到英国,定居在伦敦并且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尽管英国政府要求贝奈斯避免公开的政治投入,贝奈斯依旧是捷克斯洛伐克海外利益的首席代表。[1]

## 保护国的生活

在从1939年3月至当年秋天的保护国初始阶段期间,捷克人和日耳曼人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以适应新的体系。由哈查作为总统,阿洛伊斯·埃利亚什将军作为总理领导政府,捷克人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警察以及小型的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军队。外交事务、防卫和其他职责落到了日耳曼人和纳粹德国保护者手里,其可以否决任何被视做有损于纳粹德国政策的政府决定。哈查总统尽管远不是一位强势或者有魅力的人物,却由于保护国政府的危险处境赢得了某种程度的同情性质的公众支持,人们理解除了一些狂热的投敌者之外,捷克政府的成员继续把国家利益置于同德国人协作之上。

保护国的经济生活由于德国的需要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的爆发而发生改变。关系到物价的决定来自在纳粹德国保护者手下工作的专家,而保护国的捷克政府在冲突早期实行了食物、服装和其他项目的配给。1940年10月,保护国加入了纳粹德国的关税同盟,超过70%的捷克出口被送往了纳粹德国,同时接受其80%的进口。保护国的人口还提供给纳粹德国一个重要的劳工来源,主要是在战争期间以及扩张中的德意志帝国的需求方面。

173

在保护国的最初几个月期间,捷克公众转向消极抵抗,并且用小型抗议活动表达对独立丧失的不满。许多捷克人选择文化场所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绪,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之类的爱国文艺作品的演出吸引了热情的听众,并且经常唤起自发的国歌合唱。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演出最终激怒了纳粹官员,他们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饭店、剧院

和其他公共场所演唱爱国歌曲。

1939 年 6 月，一名德国警察在工业城镇克拉德诺被谋杀导致超过 200 名捷克群众被处决，这是随着战争爆发而更多暴力政策被推行的一个序曲。随着德国军队于 9 月 1 日入侵波兰，德国当局运送数千名捷克军民到达豪一类的集中营，以此来避免骚乱或者公开的反抗。10 月 28 日，警察向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人群开火。医科学生扬·奥普莱塔尔后来死于警方造成的创伤，而 11 月 15 日举行的葬礼为更多反对占领的示威活动提供了时机。在国务秘书弗兰克的命令下，安全部队于 11 月 16—17 日晚间向布拉格的学生宿舍实施了突袭，逮捕了超过 1 800 名学生，并且遣送其他至少 1 000 人到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纳粹党人采取关闭所有学院和大学并且压制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方式扼杀捷克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抗和批评。

对于保护国的犹太人，纳粹的“雅利安化”计划将 1935 年的德国《纽伦堡法案》在 1939 年 6 月延伸到保护国。新制定的措施解除了对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在旅行、教育、文化事务以及职业和商业活动中设置限制。法令还要求犹太人佩戴黄色大卫之星，并且减少对他们的食物的配给数量。

174

## 贝奈斯和海外捷克斯洛伐克

1939 年秋天，贝奈斯在巴黎创建国民委员会的努力最初遭到来自法国方面的阻力，在之前一年的一系列事件后，他们对同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协作缺乏兴趣。然而，贝奈斯最终赢得了法国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承认，尽管还不算是一个流亡政府。

正如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马萨里克领导下曾经做的那样，海外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 9 月波兰被袭之前的日子里开始组织武装队伍。当波兰政府还在犹豫是否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许可的时候，许多志愿者动身去了巴黎。德国军队突破边境至少两天之后，一支由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上校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出现在波兰，此后许多军团成员落入苏联手中，被当做俘虏关押。

6 月,保护国总理埃利亚什将军派遣一名捷克抵抗力量的代表与法国政府沟通,并且前去组织那里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分队。在 1939 年最后几个月内,贝奈斯先后说服了法国和英国承认在巴黎的捷克国民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力量的权威。当德国军队于 1940 年 5 月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时,两支武装团与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和法国空军一起参与到法国的防卫中。随着法国显露败相,大约 4 000 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被撤离到英国,1943 年 9 月,重整的步兵团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装甲旅,其于 1944 年秋天回到了欧洲大陆。在 1940 年仲夏始于德国空军袭击军事目标接着是城市的不列颠之战期间,大约 110 名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服役于英国和波兰空军中队。

在战争的第一年间,两个不同的组织宣称代表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业,分别是先后在巴黎和伦敦设立总部的贝奈斯及他的同僚,以及与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协作运营的共产党主导的分遣队。1939 年 9 月 8 日,扬·马萨里克代表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从伦敦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每周向欧洲广播。在法国战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委员会转移到伦敦之后,英国承认贝奈斯的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不过是临时性的。这个临时政府包括贝奈斯作为总统,前人民党的什拉梅克主教为主席,还有一些党代表和独立人士,诸如马萨里克、谢尔盖·因格尔将军、鲁道夫·维斯特将军、前斯洛伐克国会议员尤拉伊·斯拉维克及其他人。

175

作为伦敦团队领头的政治人物,贝奈斯在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恢复到《慕尼黑协定》前的边界这一愿景以及使这个重生的共和国在形式和实践上转变以适应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贝奈斯还把慕尼黑的灾祸归咎于未能将苏联纳入到欧洲事务中作为一种保持外交稳定的方式。作为结果,他设想了一种以集体安全名义下的东西方协作为基础的战后秩序。一个重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与苏联发展积极的关系,同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外交联系。

哥特瓦尔德和莫斯科分遣队同样相信共和国的恢复,不过是基于

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重大变革和从精英统治阶层到工人阶级的权力转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将不是权力平衡的结果,而是在苏联提供的保护之下的。直到 1940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拒绝与伦敦的委员会合作,莫斯科团队的一些成员倡导对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发动起义,并且建议贝奈斯前往苏联首都与斯大林政府协商解放计划。

两项主要的战时发展有助于贝奈斯使《慕尼黑协定》废除并且使他的临时政府被承认为《慕尼黑协定》前的共和国合法继承者。第一项是 1940 年达拉第辞去法国总理以及两个月之后张伯伦的英国首相职位由温斯顿·丘吉尔取代。第二项是希特勒于 1941 年 6 月入侵苏联,将苏联带入战争,这使贝奈斯争取到一项签署于 7 月 18 日的协议,协议认可了贝奈斯政府并且许诺反抗德国的双边协作。同一天,英国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临时性质,接受了贝奈斯的组织作为合法政府与同盟国的直接联系。然而,直到 1942 年 7 月,英国政府才愿意放弃《慕尼黑协定》,从而接受贝奈斯的论点,即他代表了与第一共和国的直接和合法的联系。

176

## 种族政策和最终解决方案

在保护国内,德国当局试图实行种族政策,将捷克国土日耳曼化,并且建立一套与纳粹意识形态和目标一致的新的种族等级划分。那些被视为有价值的个人会经受日耳曼化,而那些按人种被定为下等的人将会面临搬迁至东部或者关押进集中营。1942 年 3 月,纳粹要求所有出生在指定年份的保护国居民接受有关种族和政治的询问。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小学生被迫接受伪装成青年人肺结核防护的 X 光机检测。

对于数量大约占战前捷克总人口 1% 的保护国内的犹太人口来说,形势从 1941 年 10 月纳粹开始转移犹太人到灭绝集中营起变得愈加可怕。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并且与其他公民隔离,大约 11.83 万保护国的犹太人成为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接着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政策,这是由阿道夫·艾希曼和纳粹党卫军军官及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的万塞会议上与安全官

员、官僚和纳粹党官员就“犹太问题”会晤后制定的。住房紧张以及德国和保护国内的其他问题使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成为目标,意图将所有犹太人转移到灭绝集中营,比如波兰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和东部的其他集中营。

在决定实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前,德国当局和捷克宪兵于1941年11月开始从布拉格、布尔诺和其他捷克城市运送犹太人到波希米亚要塞城镇泰雷津(特莱西恩施塔特),在那儿设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充当了来自保护国以及少部分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犹太人的临时集中营。海德里希在那年秋天被任命为纳粹德国副保护者之后,建立了泰雷津的集中营。到1942年年底,德国人运送了接近5万名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到泰雷津,同时还有另外2万名被直接转移到其他集中营。随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不断抵达,18世纪堡垒狭窄的城墙造成了严重的拥挤,这个城镇以前只有7 000名居民。希特勒意图使泰雷津成为一个理想的和“独立的”犹太人社区,拥有欣欣向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可以给红十字会之类的到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后者于1944年访问了这座城镇。犹太人聚居区的居民组织并参加音乐会、讲座、诗歌朗诵会、歌舞短剧和有代表性的捷克、德国及犹太演出,不过泰雷津终究只是为等待被运送到灭绝集中营的犹太人准备的临时居所。当苏联军队于1945年5月到达并解放这个犹太人聚居区时,他们发现只有大约8 000名来自保护国的犹太人幸存。

177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约7.5万名保护国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绝大部分死在集中营里,也另有人在战斗中遇难或者在其他情形下被杀害。最终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政策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是毁灭性的。[2]

保护国内的吉卜赛人(或者说罗姆人)也受到德国政策的影响,这是由于他们在纳粹种族等级划分中处于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某个位置。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时期,1927年通过的法规要求每个年龄超过14岁的“流浪吉卜赛人”申请正式的身份,并且在到达一个城镇或地区时联系当地的官员。这些记录会使当局以后对吉卜赛人的

身份验证成为一个更加简单的过程。

1939 年 5 月,纳粹着手实施了针对保护国吉卜赛人的第一次主要行动,禁止其大规模在捷克国土上集体迁徙。1940 年期间,保护国的警察开始逮捕没有固定居所的个人,并且把他们遣送到诸如莱蒂和霍多宁的劳改营,许多"流浪吉卜赛人"和流动散工死在那里。到 1942 年春天,纳粹继续进行种族分类和前往灭绝集中营的流放时,吉卜赛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带着一个"Z"字,代表其德语单词。在超过数千名吉卜赛人被害的奥斯威辛—比克瑙,佩戴着黑三角标识的这个团体与集中营其他居民区分开。在斯洛伐克,蒂索政权为罗姆人开设了特殊劳改营,1944 年被德国占领之后,大规模杀戮吉卜赛人的事件在斯洛伐克土地上多次发生。

## 保护国的抵抗活动

捷克抵抗组织甚至在 1939 年战争开始前就逐步形成了,不过直到 1940 年前几个月,国内抵抗中央委员会(ÚVOD)联盟才成为被贝奈斯的海外委员会承认的中央抵抗主体。作为保护国政府的总理,埃利亚什将军从一开始就与地下抵抗组织合作,不过在 1940 年 5 月德国人进入巴黎之后,他们发现了埃利亚什从他在布拉格的办公室从事代表抵抗组织利益活动的确凿证据。然而正当埃利亚什表现出愿意冒生命危险与反对派共事时,哈查总统却随着年龄增长和脑硬化症损害他的精神状态,而逐渐变得对纳粹更加顺从。1940 年春天,哈查推翻了他早先的抵抗,在 K. H. 弗兰克威胁杀害 2 000 名早已运送到集中营的捷克学生之后,他签署了一份效忠希特勒的誓约。

178

共产党(KSČ)很早就发展了一个地下组织,不过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分离以及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后,脱离了捷克组织。捷共通过居住在莫斯科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与苏联当局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许多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希望斯洛伐克并入苏联。然而随着德国入侵苏联,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重新开始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1941 年夏天,捷共和国内抵抗中央委员会同意在中央

民族革命委员会(ÚNRV)的领导下,协调他们的抵抗活动。

到1941年9月,希特勒早已对纽赖特在保护国的温和政策失去信心,准许纳粹德国保护者休假,而不是接受纽赖特的辞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于9月27日担任代理纳粹德国保护者一职,他得到命令对捷克政府、公众的反对和抵抗组织采取强硬路线。在到达布拉格后不久,海德里希实行一项戒严令进行镇压,逮捕埃利亚什,接着将他的处决推延到稍后的时间。然而其他人为他们的活动付出了更直接的代价,到海德里希于12月1日结束戒严令时,已有大约400人被处以死刑。

随着议会制度失去权力,埃利亚什的被捕使得所有部长中只有三名愿意与德国人共事者得以保留,保护国政府成了海德里希政策的受害者。海德里希计划通过提供更高的薪水和更多配给商品的购买权来保持捷克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此作为恐怖和暴力政策的平衡,不过贝奈斯政府已然决定,相对于冒风险与纳粹进行更多的公开合作来说,暗杀海德里希是更可取的。

1941年12月28日,一架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从英国运送捷克斯洛伐克抵抗战士到保护国,空投他们到布拉格城外的捷克土地上。这些伞兵曾经接受过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的训练,从事反德活动以及执行刺杀海德里希或者埃马努埃尔·摩拉韦茨的任务,后者以前是贝奈斯的同僚,现在他完全拥护纳粹对捷克人的相关事宜,并且充当公共启蒙部的傀儡部长。

179

1942年1月捷克人扬·库比什和斯洛伐克人约泽伊·加布奇克设法进入布拉格,开始准备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代号为“类人猿行动”,其中包括刺杀“布拉格刽子手”海德里希。5月24日早晨,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在霍莱绍维采郊外等待海德里希的汽车抵达,他们占据了一个位置,在那儿弯曲的道路会降低汽车的速度,使得海德里希易受攻击。一辆煤车使海德里希的汽车停下来,加布奇克试图用一架斯特恩式轻机枪向其开火,但是枪卡壳了,海德里希趁机用自己的手枪瞄向了加布奇克,不过他也没能开火。库比什得到机会从车的另一边发起攻击,他扔出的手榴弹击中了右后挡泥板,引爆了车身,碎片击中了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试图追击加布奇克，不过却倒在地上，随后被厢式货车送往布洛夫卡医院。6 月 4 日，由于医生们不能阻止败血症的扩散，海德里希死于伤口感染。[3]

纳粹对暗杀代理纳粹德国保护者的反应是迅即而残暴的。保护国回到了戒严令的状态，安全部队开始逮捕任何与袭击有联系或者对此有了解的人。由于确信加布奇克和库比什曾待在利迪策，在希特勒和弗兰克的命令下，整个村庄于 6 月 10 日被血洗。国防军战地警察和党卫军保安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杀害了 173 名男性居民和部分妇女，幸存的妇女和儿童被送往德国和波兰的集中营。德国人夷平了村庄以掩盖罪证。在利迪策大屠杀两星期之后，德国人抵达小乡村莱扎基，在帕尔杜比采城堡将所有成年男性和女性斩首，然后将儿童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布拉格，暗杀者及其伙伴被出卖给了德国人。德国人袭击了加布奇克、库比什和抵抗组织成员躲藏的圣西里尔和美多德东正教堂，在经过猛烈的交火之后，所有的防卫者都被打死或者为了逃脱被捕和审讯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德国人接着处决了戈拉兹德主教和所有曾为抵抗组织提供援助的神职人员。当恐怖时期渐近结束的时候，对谋杀海德里希的反击夺走了 1 000 条生命，并且严重挫伤了中央民族革命委员会，使其放弃了任何可能引致德国人类似反应的策略。作为报复行为的一部分，当局于 6 月 19 日执行了阿洛伊斯 · 埃利亚什将军的死刑。

在海德里希死后，权力传递给了国务秘书弗兰克，他在希特勒政府的压力下提高生产力以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尤其是在同盟国开始对德国境内的城市和工业目标进行战略轰炸之后。由于保护国直到 1944 年晚期都没有遭受到大规模的轰炸，捷克土地对武器生产变得重要，而且也是从德国转移出来的工业设施的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以此为目的，在比尔森的斯柯达工厂为纳粹德国生产坦克和飞机引擎，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的工业企业在保护国扮演了被委派的经济角色。纳粹德国政府依靠弗兰克来管理捷克对战争的经济贡献和动员满足德国

工业产值的要求所需要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许多捷克工人被强迫送到在德国的工厂工作,到1943年秋天,他们的数量已经达到3万,随着纳粹德国空军对飞机生产的要求,于1944年春天引入了另外1万名工人,而更多的人正在源源不断地到来。

##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对于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来说,军事形势的变化使其获得了来自同盟国战友和共产党两方面的更大支持。他们宣布承认贝奈斯政府,随后同意允许多个党派成员加入在伦敦的国务院。1942年6月,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知会贝奈斯,他的政府愿意解除作为《慕尼黑协定》的结果而产生的所有政治和领土改变的合法性。

美国于1941年12月加入战争引发了更多说服美国人接受贝奈斯政府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组织的努力。与罗斯福的会晤中,扬·马萨里克要求解除临时状态,他的论点是在欧洲战场上倒下的捷克飞行员可不仅仅是临时性的死亡。随后罗斯福于1942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日给贝奈斯发了封电报,其中他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来称呼贝奈斯,并且宣布对临时政府的各种引用将会终止。第二年,贝奈斯前往美国,获得的印象是,美国也愿意无视《慕尼黑协定》,并且接受他的政府和《慕尼黑协定》前的共和国的连续性。

181

1943年12月,贝奈斯抵达莫斯科磋商一份相互协助对抗纳粹德国的正式协议,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首脑被接待,并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官员交谈。《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贝奈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复国和战后安全问题上将东西方一同纳入的外交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不过在更加直接的意义上,这个条约看起来提供了民族独立和避免另一次慕尼黑出卖的关键保障。

随着苏联军队以1943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突围为开始持续向西进发,计划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和战争结束的需求变得急切。1944年5月,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协议,保

证那些被视做无军事行动的地区的权力将会从红军手中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那些仍有争议的地区，政府将委派代表与苏联官员合作。

## 斯洛伐克共和国(1939—1942 年)

1939 年 7 月末，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宪法创立了一个单一政党的国家，具有与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类似的独裁主义特征，并且该国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拥有特权。约瑟夫·蒂索在 10 月的选举中没有面临任何反对，他成为共和国的总统，此外还担任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唯一合法政党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12 月初，蒂索受到了梵蒂冈的正式承认，由此逾越了一个关键的政治障碍，梵蒂冈最初对由一位神职人员担任斯洛伐克国家首脑表达了保留意见。

然而从一开始，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并没有达成统一战线。蒂索可以依靠党内保守派别还有日耳曼人的支持，不过卡罗尔·西多尔、亚历山大·"萨诺"·马赫、费迪南·朱尔钱斯基和沃伊特赫·图卡等人领导下的激进派别显得更乐意挑战蒂索的政策和权威。诸如马赫和图卡的激进分子对于希特勒的政策具有强烈的共鸣，在赫林卡卫队的支持下，他们寻求动员斯洛伐克的反闪米特和反捷克力量。朱尔钱斯基是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中"进攻"(*Nástup*)小组的领导人，该小组尽管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是极右翼的，却是反对赫林卡卫队并且反对以斯洛伐克切身利益为代价盲目追随德国的领导的。

182

赫林卡卫队成立于 1938 年，由体育组织、童子军和民族主义团体组成，在 1939 年年初共有 25 万名成员，领导人是西多尔，而马赫是最高司令官。然而，西多尔为他拒绝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付出了政治代价，接受了任命去梵蒂冈担任斯洛伐克大使。赫林卡卫队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其他激进民族主义或者法西斯组织，比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运动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他们身穿黑色军式设计制服，头戴镶金边的流苏装饰帽子。成员们相互打招呼时说"警惕(*Na straz*)!"1939 年 9 月，政

府颁布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年龄在 16—60 岁的男性入伍或者参加像赫林卡卫队这类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卫队及赫林卡青年团的成员数由此得以增加。德国的武装党卫队同样忙于在斯洛伐克的招募攻势,不过到 1941 年年底只有大约 6 000 名日耳曼少数民族成员志愿参加。从 1942 年 11 月开始,政策上的改变允许斯洛伐克男性在不放弃他们的斯洛伐克国籍的情况下通过在武装党卫军中服役履行兵役的要求。

可是对于蒂索政权来说,独立显得比预期更加难以捉摸,德国当局继续扩展他们的影响力,进入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一心想要使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与德国政策相一致。为了避免斯洛伐克的完全纳粹化,蒂索和他的部长们以一种将自己推向几乎接近于傀儡政权的方式,试图向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妥协。

斯洛伐克参与了 1939 年 9 月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不过外交部长朱尔钱斯基在其他方面试图追求一条对斯洛伐克有益而不仅仅是服从德国需求的外交路线。1940 年 7 月,希特勒召唤蒂索前往萨尔茨堡参加一次会议,在那儿里宾特洛甫把一个替换政府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中特定人选的要求摆在斯洛伐克领导人的面前。希特勒接着跟进要求朱尔钱斯基离职并由更加激进和亲德的图卡取代。德国人提醒蒂索斯洛伐克的独立事业是有限制的,并且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斯洛伐克,意图将他们安插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重要政府岗位上。

183

作为萨尔茨堡会议的结果,激进派的图卡和马赫分别接替了朱尔钱斯基在外务和内务方面的职位。蒂索通过阻碍政府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修订宪法来回击激进派的威胁,而修宪原先的目的是增加图卡的权力并使党内的极端分子受益。对纳粹化的恐惧为蒂索带来了公众支持,1940 年 8 月 6 日,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团投票拥护蒂索作为党的领袖,并且接受他在调和内部争端中的领导作用。

作为 1940 年 11 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结果,斯洛伐克成了轴心国的一部分,并且由此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和外交计划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这导致斯洛伐克政府于 1941 年 6 月向苏联宣战,并且指派大约 5 万名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成员参加巴巴罗萨行动,不过随着德

国领导的部队进入苏联,大量的逃兵减少了那个数字。1941 年 12 月 12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5 天以及德国向美国宣战 1 天之后,斯洛伐克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尽管对作战普遍缺乏热忱,斯洛伐克部队还是于 1942 年进发到远至高加索的地区,不过在 1944 年的前几个月里,这支分队被重新部署到特兰西瓦尼亚和意大利,在那儿安全部队后来被分配从事建筑事宜。

## 种族政策和斯洛伐克大屠杀

尽管在 1940 年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口数量仅为 8.9 万,占人口总数的 2%,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很早就开始在共和国实施针对犹太人的措施。1939 年 4 月实行了一系列针对犹太公民权利的限制措施,其中从政府、学校和武装部队的军官兵团中剔除犹太人排在前列,当时蒂索和图卡颁布了旨在识别犹太人并且将他们从公众和职业生活中隔离的政策。

1941 年 9 月,一项由内务部长萨诺·马赫在纳粹党卫队的协助下炮制的犹太人法令引入了遵循纳粹规则的种族等级划分,在 1942 年 3 月德国和斯洛伐克之间签署了一份协议之后,开启了运送斯洛伐克犹太人前往集中营的途径。从 3 月到 10 月,斯洛伐克宪兵、军事人员以及赫林卡卫队和志愿党卫队的成员共运输接近 6 万名犹太人前往纳粹德国和德国控制的波兰地区,他们中除了几百人外全部死在了集中营。驱逐行径在不顾梵蒂冈和斯洛伐克主教的反对下发生,后者在一封于 1942 年 4 月 12 日在斯洛伐克的多个布道坛上诵读的主教公函中表达了对虐待同胞的反对。5 月 15 日,新的立法剥夺了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公民权,为进一步的驱逐提供了基础,不过也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的总统赦令。

184

到 1942 年秋天,蒂索收到了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奥斯威辛、索比堡和其他在波兰的集中营中被杀害的报告,结果,斯洛伐克总统拒绝驱逐留在斯洛伐克的 2.4 万名犹太人。犹太人被控制在斯洛伐克的劳改营里,通常在赫林卡卫队的监视下,他们找到了以他们的囚犯为代价从他

们的职责中获益的各种方式。然而,希特勒依旧不满于蒂索政府拒绝实施更加严厉的对待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措施。

1943年春天,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会见了蒂索,要求一个更加猛烈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不过运送犹太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直到1944年德军进入斯洛伐克,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接近1.3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大约6 000名犹太人设法逃到了匈牙利,不过几千人在隐匿或者从事游击活动时被杀害在斯洛伐克土地上。到战争结束,集中营和战争岁月中的种族灭绝暴力行为夺走了超过6万名曾经生活在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的生命。

## 斯洛伐克(1943—1945年)

从战争初期开始,许多斯洛伐克人选择公开斗争或者作为抵抗组织的成员来反对蒂索的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主导的政权。一些斯洛伐克人离开他们的祖国,加入由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与苏联红军一起战斗,与此同时,其他人加入由鲁道夫·维斯特将军率领的在法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或者为英国的皇家空军飞行。

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41年6月创立了首个抵抗组织,当时希特勒的部队在斯洛伐克的参与下进入苏联。共产党还提议并试图形成对"苏维埃斯洛伐克"计划的支持,这将导致斯洛伐克合并入苏联。

185

尽管政府广泛使用警察和密探,斯洛伐克卷入对苏联的入侵以及政府的种族政策和驱逐犹太人等种种行为的不得人心增强了公众对当局的反对,推动了抵抗活动的蔓延。在伦敦,贝奈斯希望动员对蒂索政府的反抗,并且鼓励斯洛伐克人对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复国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贝奈斯和他的英国同僚使用电台广播和其他方式激化斯洛伐克人中的不满情绪,并且将使斯洛伐克独立描绘成对斯洛伐克人民最高利益毫无兴趣的叛徒和罪犯的行为。

到1943年的前几个月,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受挫以及限制很多基本必需品获取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削弱了对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政府的

支持，而贝奈斯由于要求抵抗和捷克斯洛伐克复国而增加了他的名望。许多斯洛伐克人表现出愿意接受贝奈斯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互助协议的签署带来了苏联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承认之后，后者由此停止了推动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合并。1943 年 12 月，古斯塔夫·胡萨克、卡罗尔·斯米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与包括约瑟夫·莱特里赫和扬·乌尔西尼在内的拥护民主的公民集团代表一起创立了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SNR)，作为协调斯洛伐克境内的抵抗活动的中央主体。签约各方还同意在目的是解除蒂索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政权权力的计划中进行合作。

随着红军继续向西挺进，前线离斯洛伐克越来越近，游击活动在频度和强度上都有所增加，赫林卡卫队的成员经常成为他们的对手和敌人的目标。1944 年 8 月 27 日，一个从罗马尼亚坐火车返回的德国军事代表团落入了在图列茨河畔圣马丁的一个斯洛伐克抵抗组织驻军的手中。一名在场的中尉无视陆军中校扬·戈里安转移俘虏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进行审问的命令，反而执行了当地游击队指挥官的指令，在第二天清晨射杀了德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政府对平民和军事人员严厉的报复行为迫使抵抗组织和游击队领袖把起义的日期提前，并且早于计划的时间发出信号。

戈里安和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曾经计划在红军从波兰和苏联抵达斯洛伐克的同时发动起义，不过在与苏联协调时间和计划时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苏联在没有咨询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情况下，派遣游击战士从乌克兰进入斯洛伐克。随着游击队袭击军事设施并且打击军事和安全目标，他们引起了蒂索政府和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取得了蒂索对军事援助的认可，并且开始调动部队进入斯洛伐克的战略要点。德国人还紧急解除了斯洛伐克方面两个师的武装，这两个师的职责是在起义期间保卫杜克拉关口和其他山口，这么做的目的是诱使苏联部队进驻。

186

在政府国防部于 8 月 29 日宣布德国占领斯洛伐克后不久，戈里安发出暗号“开始撤离”，由此发动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SNP)，为傍晚

抵抗组织和德国人之间的第一次交战做了铺垫。翌日,自由斯洛伐克电台发送爱国广播支持起义,号召斯洛伐克人协助抵抗组织推翻斯洛伐克人民党的独裁统治,从德国人手中解放这个国家。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召开会议,会上向全国宣布他们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加入同盟国从纳粹及其盟友手中解放欧洲的目标。

在斗争最初的日子里,斯洛伐克抵抗组织在战场上只拥有 1.8 万名士兵和军官,对抗蒂索当局领导下的 8.5 万人,不过 9 月 5 日和 26 日的新动员将抵抗武装的规模扩展到 6 万人,分为 6 个作战部队和 1 个空军大队。接近 8 000 名参与起义的游击队员接受来自基辅的指令,这增加了协调起义中面临的困难。此外,抵抗组织的军事单位缺乏反坦克武器和重装甲,只有 6 辆坦克可供派遣以对抗先进的德国部队。斯洛伐克起义空军只拥有少量老式飞机。9 月中旬,德国人在与抵抗组织的战斗中投入大约 4.8 万名士兵,包括 4 个纳粹党卫军师、2 个其他德国师和 1 个联盟的斯洛伐克军团。然而,贝奈斯于 1943 年 12 月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里获得的援助承诺仍没有兑现。苏联军队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遭受重创,从 9 月 8 日到 10 月底始终未能突破波兰边界上的杜克拉关口。

9 月 5 日,扬·戈里安被晋升为将军,并且被授予掌管所有参与起义的斯洛伐克军队的权力。同一天,最高法院院长什特凡·蒂索接替图卡成为总理,而且还接手了对外交和法务部的控制。德国占领有效地消除了斯洛伐克政府的相对自治,留下的空间与一个傀儡政权无异。



随着苏联和西方同盟在关于向斯洛伐克抵抗力量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论,苏联警告同盟国不要介入苏联势力范围,起义在补给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方面遭到了严重的阻碍。武器、弹药和医用必需品分别在 9 月和 10 月中旬从同盟国控制的意大利南部运达,不过同盟国领导人在他们的苏联盟友提出抗议之后,迅速下令停止补给任务。

由于戈里安将军未能平息抵抗力量、游击队和贝奈斯政府之间的争吵,鲁道夫·维斯特将军从伦敦飞往斯洛伐克,并于 10 月 7 日到达,奉命接替戈里安掌管抵抗武装。10 月 16 日,德国人对反抗者发起了

187

一次决定性的进攻，从北面的匈牙利调动 3.5 万名士兵和重装甲，要求斯洛伐克军队无条件投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红军撤出了斯洛伐克东部，把精力重新集中在将德国人从匈牙利和波兰赶走。

在德国领导的部队重新赢得多数曾经落入敌对势力手中的地区之后，维斯特和戈里安将军率领的抵抗部队于 10 月 27 日放弃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希望在北方的多诺发利附近的多山地带找到安全落脚点。由于维斯特的部队受德国空军的空袭所扰，迅速陷入无秩序和混乱之中，他命令剩余的起义部队转入游击战，接着向同盟国发送消息称有组织的抵抗活动已经结束。维斯特和戈里安向东移动，穿越赫龙河谷到达村庄波赫龙斯基—布科韦茨，在那儿他们于 11 月 3 日被德国特种部队抓获。两名指挥官随后被作为战俘转移到德国，随后于 1945 年在福洛森堡集中营被处决。

为了报复起义以及游击队和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力量残余部队的持续袭击，德国特别行动队发起了一次恐怖活动，处决了很多市民和有嫌疑的叛乱支持者，此外还摧毁了接近 100 个被认为涉嫌叛乱的村庄。发生在报复行为期间的杀戮增加了超过 5 000 名受害者，另有大约 5 000人死于起义期间的战斗。对于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社区来说，起义及其余波带来了游击队和突击队的突袭和杀戮，尤其是在什皮什区域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的各城镇。大量日耳曼族人向北逃亡至波兰，或者于 1944 年 11 月中旬在纳粹德国政府的安排下被送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188

德国在粉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中的胜利最终未能保住布拉迪斯拉发政府或者德国对斯洛伐克的占领。12 月末，前进中的苏联和罗马尼亚陆军从纳粹控制中解放了斯洛伐克南部，接着在 1945 年 1 月，苏联红军进驻斯洛伐克东部重镇普雷绍夫、科希策和巴尔代约夫。3 月 25 日，苏联部队夺取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随后在 4 月 4 日，红军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并进入首都。蒂索和他的部长们离开前往上奥地利的克雷姆斯明斯特，接着在 5 月 8 日，正式向同盟国的美国代表 W. A. 科利尔将军投降。就在同一天，德国向苏联投降，前一天，德国向西方同盟

国投降。投降之后,蒂索成为美国的俘虏,并于 1945 年 10 月被送回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

## 布拉格起义和战争结束

对于已经成功地得到同盟国和苏联的支持恢复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来说,战争的最终阶段带来了超出他预期的苏联影响和军事状况。作为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贝奈斯相信他的作用在确保向战后共和国的稳定转变中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捷共正在依靠苏联支持,确保在战后政治生活中具有比以前预期的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斯大林和苏联已经同意恢复《慕尼黑协定》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将要求纳入下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当红军于 1944 年 10 月进驻鲁塞尼亚,苏联当局安置了当地的苏维埃以推进苏联的利益,尤其是就鲁塞尼亚地区战后的命运而言。斯大林随后于 11 月 7 日发表广播演讲,他宣称与邻近的乌克兰统一是鲁塞尼亚人长期持有的梦想,这将意味着鲁塞尼亚并入苏联,由此违背了与贝奈斯的协议,贝奈斯最终接受变化中的战时环境的真实产物而失去鲁塞尼亚。

189

贝奈斯于 1945 年 3 月前往莫斯科,商讨国民阵线政府的建立,它将在战争结束后接管布拉格的权力。由于伦敦的政府没有提供自己的方案,提议来自哥特瓦尔德和共产党,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主义党和人民党的代表主持了讨论。通过协议,每个政党将被允许在政府中有 3 名代表,不过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属于不同的组织,各自持有 3 个职位。社会民主党的兹德涅克・费尔林格尔成为总理,这主要由于他愿意与莫斯科协作。共产党将获得两个副总理职位,分别委派给捷共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维里安・希罗基,此外还有内务、农业、劳工、社会事务和情报等部长职位。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指挥官,在战争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将担任国防部长。

3 月 22—29 日的协商期间,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SNR)的代表很少受到重视,他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除了那些有关重建的

捷克斯洛伐克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没能参与到任何主要的讨论中。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代表支持联邦制作为保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平等的一种方式，他们包括民主党的瓦夫罗·什罗巴尔、农民党的扬·乌尔西尼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成员，诸如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拉措·诺沃梅斯基。然而，捷共反对联邦国家的主意和平等状态的承诺，说服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代表放弃他们的提议，以期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土完全得到解放后再提出这个议案。与会者接受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之间作为未来关系基础的协议的有效性，同意以撤销公民权以及对通敌者和叛国者采取战后法律诉讼的方式来大规模追究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罪行。只有那些在战争期间受到迫害或者可以证明参与反法西斯活动的人将免于惩罚的政策。

3 月 31 日，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离开莫斯科，抵达已解放的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希策，贝奈斯于 4 月 5 日在那儿宣布成立国民阵线政府。到这个月底，红军已经解放了斯洛伐克和大部分摩拉维亚，他们干涉斯洛伐克事务并且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运送到苏联土地上的劳改营。在西方，乔治·S. 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进驻波希米亚，进军至卡罗维发利一带后接到命令停止前进，把布拉格的解放留给了红军。

190

奥洛莫乌茨附近的城镇普热罗夫于 5 月 1 日发生了一次自发的起义，随后引发了捷克各地类似的骚乱。4 天之后，布拉格起义以在首都的电台信号语广播作为开始，此时捷克警察正在调集警力从占据维诺赫拉德斯卡的建筑物的抵抗力量战士手中夺取广播电台。要求援助的呼声整天都在电台中广播，示威者占据街头反抗德国人以及保护国的捷克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旗帜出现在布拉格各处的建筑物上，捷克代表与 K. H. 弗兰克及德国警察和安全组织进行会晤。捷克国民委员会(ČNR)在宣布它是在贝奈斯和在科希策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名义下进行行动之后，接管了协调起义的责任，尽管捷克国民委员会并没有参加与弗兰克的初期会晤。

5 月 5 日晚间至第二天，首都街头的战斗变得激烈，数不胜数的路

障在街头竖立,延缓德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行进。电台广播号召英国人和美国人与纳粹德国空军作战,并且轰炸通往这座城市的主干道,此时纳粹德国国防军和党卫队正在从布拉格城外向市中心行进。到了早晨,纳粹德国空军忙于轰炸布拉格市中心,而战斗已经扩展到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弗兰克和他的智囊团继续与捷克国民委员会沟通。德国人未能占领广播电台,并且许多德国部队被包围,这时抵抗力量已经控制了差不多半座城市。

5 月 6 日白天的几个小时内,美国军队进驻距首都大概 50 英里的比尔森,随时响应来自布拉格的起义者的援助请求。然而,美国人由于与苏联人达成协议的缘故未得到命令不得前进,而苏联人自己未能对捷克人的请求予以响应。布拉格的起义确实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来源的援助——安德烈·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加入了对抗德军的战斗。弗拉索夫的反共部队曾经与纳粹德国国防军联合,在摩拉维亚从事袭击犹太人和共产党游击队的任务,随后在面临苏联的进军时向西转移。他们的期望是向美国人投降,并且面对被关押在西方的结局,而不是落入苏联的手中,不过他们只打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参与起义。

191

布拉格起义的几天内,捷克人派出了大约 3 万名武装起义者,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对抗接近 4 万人的驻扎在首都或附近地区的德国军队。随着街头战斗不断激烈,纳粹党卫队采取使用市民作为人体盾牌的手段掩护他们的坦克,与此同时,捷克人开始抓捕德国官员和平民作为报复。两方面都频繁而自发地执行对已确认的或者有嫌疑的敌人的处决。

德国人继续于 5 月 7 日转移军队和武器装备进入布拉格,这时主要的战斗集中在火车站和电台广播中心周围。在随后的一天里,弗拉索夫的部队离开前往美军战线,而德国人则向市中心挺进,伴随着轰炸和炮火点燃了布拉格历史核心区域的建筑物,夺取了旧城广场。

5 月 8 日,捷克国民委员会与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时显而易见,同盟国和苏联的援助将不会到达,如果战斗继续,这座城市本身将

面临被摧毁。根据协议的条款，如果抵抗力量停止战斗，并且允许德国军队和平民安全地离开或者通过城市，德国人将会放弃这座城市。尽管大多数德国人立刻离开了城市，一些党卫军分队继续殿后行动，直到5月9日，红军的第一乌克兰阵线的武装部队在布拉格捷克居民的热烈欢迎中抵达了首都。[4] 弗兰克和保护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们逃离并试图向在比尔森的美军投降，不过后来他们被引渡回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手中来面对法律诉讼。

随着德国人的离开以及纳粹德国政府于5月7—8日分别向西方同盟国和苏联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捷克人来说已经结束了，德国人的溃败带来了解放以及一个重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望。5月8日，贝奈斯离开科希策，计划乘汽车和火车前往布拉格，以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出现在尽可能多的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社区。热情的群众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布拉迪斯拉发和布尔诺等城市向贝奈斯和他的同伴们致敬，最后他于5月10日抵达布拉格。随着贝奈斯和他的流亡同事的回归，捷克国民委员会被解散，国民阵线政府被设置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届政府。

192

**注释：**

1 有关爱德华·贝奈斯对《慕尼黑协定》和战时外交的观察，参见：Edvard Beneš, *Memoirs of Dr. Eduard Beneš: 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c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有关美国对《慕尼黑协定》及其后果的观点，参见：George F. Kennan, *From Prague after Munich: Diplomatic Papers 1938 – 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有关贝奈斯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事务背景下的政策和外交活动的精细分析，参见：Igor Lukes, *Czechoslovakia Between Stalin and Hitler: The Diplomacy of Edvard Beneš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有关大屠杀期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犹太人口的命运，参见：Livia Rothkirchen, *The Jews of Bohemia and Moravia: Facing the Holocaus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3　参见：Callum MacDonald, *The Killing of SS Obergruppenführer Reinhard Heydri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4　保护国内的布拉格生活是两个新近作品的主题：Chad Bryant,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Peter Demetz, *Prague in Danger: The Years of German Occupation, 1939 - 1945: Memories and History, Terror and Resistance, Theatre and Jazz, Film and Poetry, Politics and W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第八章　战后时期和共产党政权（1945—1989年）

193

随着战争走向终结，贝奈斯回到布拉格成为恢复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慕尼黑协定》之后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结果在领土和人口的损失方面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的破坏和政治局面的一系列改变。大约40万人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造成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相对战前减少了2.7%。鲁塞尼亚转让给苏联缩减了国家的面积，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了一小块布拉迪斯拉发城外多瑙河以南的地区。

## 版图变化和人口迁移

给早已混乱不堪的1945年形势火上加油的是，战后时期以所谓的“野蛮迁移”开篇，指的是在纳粹德国战败之后，时常发生的从捷克土地上暴力驱逐日耳曼民族的事件。1945年5月，一项总统法令为大规模掠夺原先属于通敌者以及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的财产提供了基础。这类民族清醒伴随着1945年5—8月的“野蛮迁移”一起发生，这期间日耳曼人和通敌者成为发生在布拉格和遍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前苏台德地区的自发和有组织暴力行为的目标。据报道苏联士兵参与了强奸日耳曼妇女和大规模抢夺财产，有时候还加入捷克士兵的

194

暴行。德国军事人员和党卫队军官遭受当地人的折磨和处决,尤其是在那些他们曾经用类似方式迫害保护国公民的地方。

5 月,大约 2 万人从布尔诺出发,同行的还有当地工人、士兵和其他打算在奥地利边境驱逐他们出捷克的人。在奥地利当局阻止他们行进并且要求他们折回之前,大约 8 000 多日耳曼人被迫参加游行。结果,几千人被安置在收容所,并且可能有接近 2 000 人死于这次游行或者游行路上的暴力行为。7 月 31 日,一次对定居的日耳曼人的大屠杀发生在波希米亚北部的拉贝河畔乌斯季,此前,一次不明原因的弹药库爆炸导致超过 25 人死亡。尽管当地居民试图帮助这些受害者,但主要由捷克和苏联士兵组成的一群人还是淹死、射杀和打死了大约 2 000 到 3 000 名日耳曼人。

尽管贝奈斯最初曾支持通过自愿离开和强迫驱逐结合的方式迁移苏台德日耳曼人,他却几乎没有谴责或者遏制"野蛮迁移"的暴行,而早已谈及"清算"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联合国家的利益"[1] 的必要性。他的政府除了一些徒劳的抗议之外也未能采取什么行动,而外交部长扬 · 马萨里克宣称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可以共存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波希米亚全境,驱逐日耳曼人成为牢牢掌握在捷克人手中的政治事务,甚至地名都失去了它们的德语名称。

1945 年 6 月 29 日和 10 月 27 日,贝奈斯签署了惩罚法令,撤销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公民权,并设立特别法庭用于对叛国者、通敌者和其他与保护国内纳粹行政机构有联系的人的惩罚。更进一步的总统法令关闭了首都的德语大学,取缔日耳曼人协会,并且支持没收属于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和那些曾为纳粹当局工作的人的财产。新的法规要求日耳曼人到警察局注册,并且在他们的衣服上戴上一块补丁,上面有个大写字母"N"(代表 *němec*,捷克语日耳曼人的意思)。

195

7 月 7 日至 8 月 2 日在柏林城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政府对于从捷克斯洛伐克人道的"有组织的迁移"日耳曼人口予以认可,不过马扎尔人的类似迁移将需要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的协

商。然而，激进的“野蛮迁移”暴力行为仍在继续，直到更加有组织的驱逐日耳曼人的方式能够得以实现。1946 年 1 月，随着铁路被用来重新安置日耳曼人口到德国境内的同盟国或者苏联控制的军事区域，“有组织的迁移”得以重新开始。

到迁移渐近结束的时候，据估计有 60 万至 90 万日耳曼人已经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或者选择自行离开，其中不区分苏台德日耳曼人、喀尔巴阡日耳曼人还是来自纳粹德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在紧接着解放和战争结束的几个月里，有 1.9 万—3 万名日耳曼人死亡，其中至少 6 000 人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或者是在泰雷津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的被拘留者。根据 195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战争结束时驱逐行动和人口迁移的结果，只有 16.5 万名日耳曼人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来说，《科希策协定》批准了对公民权的撤销，还有强制劳工计划的重新安置或委派。1946 年早期，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协商的结果是一项协议，该协议导致 7.4 万名马扎尔人从斯洛伐克迁移至匈牙利，同时几乎同样多的斯洛伐克人从匈牙利的领土迁移到斯洛伐克。始于 1947 年 4 月的交换导致 4.4 万名马扎尔人从斯洛伐克转移到苏台德地区。

诸多马扎尔人的离开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几乎所有日耳曼人的被驱逐，给战争期间由如此众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死亡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又添上了一笔。生活着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马扎尔、犹太和罗姆等多种族的马萨里克时代生机勃勃的社会没能在冲突、纳粹种族政策和战后人口迁移这段相对短暂却极具毁灭性的时期保存下来。

196

至于一些与纳粹行政机构和保护国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在战争之后的那几年被审判、惩罚和要求自裁。康拉德·亨莱恩于 1945 年 5 月在作为美军俘虏期间自杀身亡，与此同时“捷克的吉斯林”埃曼努埃尔·摩拉韦茨也选择自杀而不愿面对叛国罪的审判和处决。在美国引渡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回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于 1946 年春天接受审

判,那一年的5月末被执行绞刑。纳粹德国保护者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出现在1946年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被认定有四项罪名,此后被宣判15年监禁。他被关押在柏林的斯潘道监狱直到1954年,此后由于他的健康恶化而被释放。前总统埃米尔·哈查于1945年6月26日死于监狱医院,此时他正在等待被起诉。

## 攫取权力的先决条件

在政治领域中,1945年4月的科希策计划决定了战争结束时安置在布拉格的国民阵线政府的组成。由于右翼政党被禁止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政府中主要的发言权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由什拉梅克主教领导)、斯洛伐克民主党(由约瑟夫·莱特里赫领导)、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两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共产党代表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国家社会主义党作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作为潜在的同盟者,不过后一个政党受制于党内忠实成员和支持苏维埃及共产党的总理兹德内克·费尔林格尔之间的内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抵抗组织被彻底忽视,不过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SNR)继续存在并且努力争取建立联邦制而无果。斯洛伐克倒是得到了它自己的议会和行政委员会,作为一个不对称体制的部分准许斯洛伐克有一些影响它们事务的手段,但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贝奈斯和国民阵线从5月8日到10月28日在没有公选议会的情况下管理捷克斯洛伐克,通过总统法令的方式设定政策并构建战后政府的基础。新创建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公众支持,同时,共产党受益于随着民族解放而来的对苏联的正面情绪。共产党人耐心避免会使他们显得激进的活动,《慕尼黑协定》之时已经远离这个国家的稳定才是民众最想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苏联曾拒绝接受慕尼黑叛卖的事情也使这两者得到益处。苏联和美国军队分别于10月和11月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为稳定和迅速回归常态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希望。

197

社会和经济重建真正开始于1945年10月14日贝奈斯的法令,该法令涉及金融机构、工业设施和农业的国有化,基本上有接近三分之二

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部门置于国家的监督下。不到两周之后，临时议会颁布了一项经济恢复计划，旨在超越战前等级的工业生产并且扩大对斯洛伐克工业的投资，目的是提高斯洛伐克相对于捷克的经济地位。

苏联在战争结束时的行动给重建努力带来了直接的问题，当时在斯洛伐克的苏联军事将领命令夺取为农业产品生产和储存准备的牲畜、磨坊、啤酒厂和货栈。1945 年 10 月，一项秘密协议将位于亚希莫夫的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铀矿让渡给苏联当局，他们立刻开始封闭这个地区，并且运送苏联和东德采矿专家和研究人员进入。

1945 年 5 月 26 日，投票人参加一次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制宪国民大会的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KSČ)以全国 38.12%的得票率脱颖而出，其中在捷克地区刚刚超过 40%，同时他们的同盟斯洛伐克共产党(KSS)在斯洛伐克得票 30.3%。国家社会主义党(ČSNS)赢得了全国 18.37%的选票，占捷克投票人的 23.6%，而人民党(ČSL)得票占全部的 15.71%，社会民主党(ČSD)是 15.51%。斯洛伐克民主党尽管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只获得 13.13%的选票，却在斯洛伐克的得票率上以 62%超过了共产党，这个结果大大激怒了共产党领导人。选举结果允许共产党在新组成的由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国民阵线政府中占有 9 个席位，斯洛伐克民主党持有 3 个席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各 4 席。两位无党派人士——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和扬·马萨里克——分别被推选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共产党说服国民阵线的合作伙伴在限制斯洛伐克自治和扩大布拉格政府对斯洛伐克事务的控制上进行协作，以此来回击其在斯洛伐克人中的选举表现。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拥护斯洛伐克民主党时的强烈表现触动了共产党，他们将对约瑟夫·蒂索主教的审判放在了一个斯洛伐克法庭，其罪名包括叛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以及与纳粹德国协作。国家法院不顾宽恕的请求裁定蒂索有罪，在贝奈斯出于他的利益拒绝干涉之后，这位民族主义教士于 1947 年 4 月 18 日穿着他的教服被绞死。有关蒂索的战时领导和政策的争论还将持续数

198

十年。

在内务部长瓦茨拉夫·诺塞克的掌管下,安全部队、国家治安队(SNB)和国家安全局(StB)成为共产党可以用来对抗政治敌人的武器。共产党领导人通过伪造谋反活动的证据来破坏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可信度的计划,由于司法部长普罗科普在进一步的行动开展之前泄露了秘密而破产。然而,随着共产党开始将权力延伸到斯洛伐克的行政委员会,诺塞克和警方的政策导致 10 月有大约 400 人被捕。

1947 年间,随着共产党承受了大量对经济问题的指责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挫折,他们的公众支持遭到了侵蚀。国有化经济缺少活力的表现加上农业歉收、食品短缺、官员无能和不断成长的黑色市场,渐渐破坏了控制着对糟糕经济表现负有责任的部门的共产党的信心。共产党的反应是推动平民主义的措施,比如额外的国有化和土地的重新分配、金融机构的重建以及所谓的对富人的“百万富翁税”。早已对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出于审查和文化干扰的目的而利用情报部的行为有所提防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相互协作,抵制共产党的提议,并且在他们阻止共产党新攻势的努力上取得初步的成功。

在国际事务中,由于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的战时联盟让路给冷战,贝奈斯为捷克斯洛伐克准备的充当东方和西方在一个集体安全环境中的桥梁的计划被证明太过理想化。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外交事件中继续支持苏联,甚至是当苏联在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变得更具侵略性的时候,马萨里克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对个人而言难以为继的位置。1947 年 6 月,马歇尔复兴计划的颁布最初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兴趣,它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大会。然而,在马萨里克和哥特瓦尔德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后,捷克斯洛伐克撤销了对美国资金的考虑,斯大林公然抨击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将欧洲国家置于美国影响力之下的阴谋。1947 年 9 月,捷克斯洛伐克反而转向东方,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这是苏联主导的作为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战前共产国际的继承者。

199

同一个月，德尔蒂纳、马萨里克和曾克尔等部长收到了藏有伪装成香水瓶的爆炸装置的包裹，尽管没有人在粗糙的谋划中受伤，德尔蒂纳声称证据直指共产党在奥洛莫乌茨的成员。两个月后，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将费尔林格尔从他的领导岗位撤下，而博胡米尔·劳斯曼的接替减轻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忧虑，因为劳斯曼显示出合作的意愿。

公众对共产党的信心渐渐低落的结果是，劳工动员作为影响国民大会对新宪法协商的手段被有效地制止，同时德尔蒂纳的司法部继续阻止共产党利用内务部和治安部门对付其他政党的政治敌人的尝试。1948 年 1 月，当公众支持的下降似乎确保了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春季选举中的排名倒退时，德尔蒂纳的部门将共产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与另两个案件联系在了一起。作为结果，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于 1 月 20 日向其共产党员承诺，尽快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

## 1948 年的二月事件

2 月 13 日，德尔蒂纳向内阁汇报，在波希米亚的国家安全部队司令员在内务部长诺塞克的支持下，命令剩余的 8 名非共产党的地区警察局长转移出布拉格。内阁的非共产党成员同意命令并未在会议现场的诺塞克转变立场并且阻止转移。

四天之后的 2 月 17 日，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部长同意，如果诺塞克拒绝合作，包括希望参加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非共产党部长将提出辞呈并且使政府解散。贝奈斯总统要么任命一个短期的政府并安排新的选举，要么拒绝辞呈并且迫使共产党人与其他联盟党派协商或者承担政府解散的责任。三天之后 12 名部长正式提交了他们的辞呈，而预想的团结演出并未实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拒绝辞职，同时这么做的还有马萨里克和斯沃博达，其中后者明确表示他对共产党的支持。

2 月 21 日，25 万名群众聚集在布拉格的旧城广场，这次集会是在



200

共产党的指示下进行的,他们继续指望工会和群众组织来给予政治支持和有可能的民兵组织的动员。总理及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要求贝奈斯接受那些辞呈,并且准许哥特瓦尔德组成一届新政府,其中将会包括马萨里克,不过在其他方面会反映共产党更强的影响力。贝奈斯选择不仓促对危机进行反应,不过随着农民和工人的群众集会以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站在群众这一边,压力在此后的两天内骤增。

2 月 24 日中午,250 万人参加了一次一小时总罢工以支持共产党。贝奈斯向斯洛伐克民主党主席莱特里赫征询意见之后,宣布只要这些卷入的政党之间有协议存在,他将乐意接受辞呈。这将是这位总统最后一次与民主党派沟通,随后一个共产党代表团于 2 月 25 日早晨拜会了他,他们建议立刻接受辞呈并且根据哥特瓦尔德的建议重组政府。精疲力竭、身体虚弱并且相信自己别无选择的贝奈斯向共产党让步,并且准许哥特瓦尔德提名一个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来自其他联盟党派的左翼联盟组成的国民阵线内阁。哥特瓦尔德选择在文采斯拉斯广场的一个阳台上宣布新政府的成立,在公众面前他显得极度兴奋、志得意满。

2 月 26 日,在共产党政变和自己被剥夺了司法部长职位之后,普罗科普·德尔蒂纳据说选择从三楼窗户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 月 10 日的清晨时分,扬·马萨里克成为“抛出窗外”的另一个受害者,他身着睡衣的尸体在外交部所在地切尔宁宫他的公寓窗户下被发现。共产党立刻向全国宣布,马萨里克的死是自杀,不过他的朋友和同事回击谴责共产党在掩盖一次谋杀。马萨里克的死在 1948 年之后长期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其中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一次调查表明是自杀,而 2004 年布拉格警方的法医研究支持谋杀的指控。

1948 年 6 月 7 日,爱德华·贝奈斯辞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9 月 3 日,深受挫折的他死在了他位于塞济莫沃乌斯季的别墅里。哥特瓦尔德在国民大会通过后担任总统一职,而他的共产党同僚安托宁·扎波托茨基接替哥特瓦尔德成为总理。


201

## 共产党权力的巩固

共产党对权力的巩固在政变后不久就开始了，这时非共产党的政党实际上停止了运作，捷共命令逮捕各政党领袖，并且从国民大会和政府机构清洗民主政治家。5 月，重新组建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新宪法，接下来的一个月，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联合组建国民阵线联盟，成为与单纯共产党政权稍有不同的政权。5 月 30 日的重新选举显示国民阵线获得 89.2%的选票，不过投票人只有两个选项，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一列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或者提交空白票拒绝官方名单。由于国民大会此时完全在共产党手中，捷共中央委员会承担了政策制定和指导国家事务的责任。在学校、法律体系和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实行的清洗允许共产党根据他们自己的视野重新定位捷克斯洛伐克。

在斯洛伐克，战争结束时建立的非对称体系随着斯洛伐克共产党(KSS)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控制国家机关、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而终止。在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主席卡罗尔·斯米德克的领导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那个政治主体中剔除了所有政治对手，斯洛伐克民主党被迫就范成为复兴党——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导的斯洛伐克国民阵线的一部分。

202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转型旋即按照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展开。迅速而广泛的国有化使得所有雇工超过 50 人的企业成为国家所有。到这十年的末期，国家管理扩展到超过 95%的从事于工业范围的企业。新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照搬苏联的五年计划，根据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政府专家制订的时间表设置生产指标和调配资源。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3 年)定位于工业产值 57%的增长，以及在诸如冶金、化工、煤矿和发电等领域稳健而广泛的增长。

农业的集体化始于 1949 年，在这个国家 80%的农村，私有农场被统一农业合作社(JZDs)取代。最初对自愿集体化的号召未能产生预期的回应，于是高压以及随后作为阶级敌人关入劳改营的恐吓成为政府选择的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指定为阶级敌人的人还要遭

受针对他们孩子的惩罚,形式是有限的职业选择或者失去高等教育的机会。

随着1949年1月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创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与东欧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作为苏联主导的对马歇尔计划的回应,经互会提供了一个主要使苏联受益的一般经济框架。由于每个成员被指派一个单独和特定的角色,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期望要求重点关注重工业和集团的机械生产。捷克斯洛伐克此时发现贸易被重定向至苏联和这个地区的欠发达国家。斯大林对军事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倾斜,原因是给予军队在工业支持和原材料方面的优先地位。从1950年至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扩张为原先规模的两倍以上,并且将工业生产和矿藏从原本可能对贸易和生活水准更有益处的活动中转移。1955年,随着一项有关共同防御和协调军事指挥结构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在波兰首都建立的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军事联盟。

对内部反对派的镇压和作为政治控制武器的恐怖措施于二月事件后不久开始,这时哥特瓦尔德和捷共第一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对批评采取了强硬路线。6月,一项表面上保卫"人民民主"的新措施为大规模逮捕行动和清除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党派和组织提供了合法理由。随着1949年"B行动"计划的开展,当局提升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开展了大规模逮捕和将斗争对象运送至劳改营的行动,其中包括位于波希米亚的亚希莫夫和普里班的令人恐惧的铀矿。资产阶级的目标成员经受从城市地区的迁移,面对受雇用的限制,尤其是在他们以前从事的职业领域。1950年6月,更进一步的法律为劳改营的扩大作出规定,几十万人将在那里接受判决或指派。

203

当局于1949年6月开始对军队展开行动,目标是希里奥多尔·皮卡将军,他曾是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的战时首长,被认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都忠诚于贝奈斯。贝奈斯曾提升皮卡为总参谋部副部长,不过在1948年5月,他以为英国充当间谍的罪名被逮捕,随后以叛国罪被处决。皮卡死后,大约5 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军官作为"人

民民主”的资产阶级敌人面临审判和清洗。

压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以及割断与梵蒂冈的外交联系导致了牧师和修女的入狱、宗教仪式的消除、男女修道院的关闭、神职人员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依附和针对主教和教会领袖的法律诉讼。1949 年 7 月,梵蒂冈下令将共产党员和支持他们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与此同时,布拉格大主教约瑟夫·贝兰协同该国的高级神职人员谴责共产党的政策,防止教士被共产党强迫宣誓效忠。作为回应,当局先是把他软禁,随后把他关押在不同的地点,直到 1965 年他被允许前往梵蒂冈接受枢机主教的任命,前提是他不能再回来。

在斯洛伐克,当局开展反对宗教仪式的活动,并对主教扬·沃伊塔萨克和米哈尔·布扎尔卡进行审判,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在普雷绍夫的希腊正教会主教帕沃尔·佩特尔·戈伊迪奇。戈伊迪奇的入狱严重削弱了斯洛伐克的希腊正教会,而戈伊迪奇自己于 1960 年死在了一所监狱医院。梵蒂冈于 2001 年向戈伊迪奇主教行宣福礼,他于 2008 年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认为“国际义士”之一,理由是大屠杀期间他为犹太人民的利益而作出的努力。



正当南斯拉夫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领导下追求它自己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斯大林政权和苏联集团的各个政府通过对偏离正统苏维埃路线的党干部清洗来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的异端。借鉴自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主义清洗的政治清洗充当了剔除政治对手、前民主党派领导人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以错误的方式引起别人注意的那些人的掩护。与政治戏院一样,摆样子公审及其预先确定的结论是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级别的罪与罚的最大冲击而设计的。

1950 年 6 月下旬,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米拉达·霍拉科娃被以叛国和共谋的罪名判处绞刑,这是一次摆样子公审的结论,在法庭上她不顾拟好的诉讼程序捍卫自己的立场。摆样子公审接连上演,政府和治安机构的成员,最后甚至是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都成为了清洗的受害者。由于相信他们需要一个更加高度可见的和有权势的替罪羊来增加对清洗的政治和心理印象,哥特瓦尔德和党的其他领导

人于 1951 年 11 月派人逮捕了斯兰斯基,在对他进行了一年的身体折磨和精神虐待后,于 1952 年 11 月 20 日把他与 13 名共同被告一起审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兰斯基曾批准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审判,甚至草拟了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专家的信件,而这些专家此刻正在对付他。

斯兰斯基的共同被告大部分是犹太人,面临着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指控,共产党希望他们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承认相应的罪名。斯大林在提供针对共产党国家的阴谋的证据上的兴趣影响了审判,此外还有苏联领导人不断增长的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恐惧。最后,斯兰斯基承认自己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和铁托分子,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勾结,并且“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工作……这些目标是资本主义的复位和一场新的战争的准备”。[2] 尽管斯兰斯基曾与战时抵抗力量一同工作,他还是承认了曾与纳粹合作对付他自己的人民。斯兰斯基和 11 名其他共同被告受到了死刑宣判,并且于 1952 年 12 月 3 日被绞死在布拉格的潘克拉茨监狱。其他共同被告被判无期徒刑。

在斯洛伐克,扬·乌尔西尼和其他此时被取缔的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领导人于 1948 年 4 月基于治安部门提供的错误证据被判长期监禁。斯洛伐克政府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官员同样触犯了害怕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推动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捷共。结果,所谓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于 1950—1951 年间被逮捕,接着于 1954 年 4 月接受审判。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基米尔·克莱门蒂斯早已作为一名斯兰斯基审判结论中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同谋而被处决,于是 1954 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审判中的被告还包括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胡萨克和诗人及前斯洛伐克教育部长拉迪斯拉夫·诺沃梅斯基。胡萨克和诺沃梅斯基承认罪名,胡萨克被判无期徒刑,而诺沃梅斯基是 10 年监禁。

205

## 斯大林之后,哥特瓦尔德之后

随着 1953 年 3 月 5 日约瑟夫·斯大林的死,以及九天后在莫斯科

参加斯大林葬礼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猝死，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与斯大林之后“集体领导”的苏联策略一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选择安托宁·扎波托茨基接替哥特瓦尔德成为总统，维里安·希罗基担任总理，而安托宁·诺沃提尼出任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开始了“新路程”，旨在转变或抑制斯大林主义体制中一些过于严厉的方面，并且通过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来提高生活水平。对警察和安全机构的限制有助于带来后斯大林时期的“解冻”和背离清洗与恐怖的政策。对于曾经主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苏联当局态度的转变代表了一种对他们自己地位和影响力的威胁。1953 年 5 月实施的有关货币和储蓄的新政策使市民们失去了他们的存款，他们占据街头进行大范围的游行示威和城市暴动，这进一步削弱了强硬派。罢工在超过 100 家企业出现，其中包括 V. I. 列宁工厂，在那儿警察和民兵与大约 2 万名罢工工人对峙，这些罢工工人手持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关心比尔森的前斯柯达公司的肖像。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继续抵抗要求改变的压力，直到 7 月扎波托茨基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官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其卖力地把重点维持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要求的重工业而不是消费品上。9 月，扎波托茨基和捷共终于引入了他们自己的“新路程”，标志着通过一个更加温和的通向集体化的途径把重点逐渐放到消费者导向的生产和更大的农业生产力上。然而，尽管新的政策提高了生活水平并且于 1954 年终止了政治清洗，它们并没有改变集中计划和重点在重工业和机械生产的经济基础结构。领导人拒绝抛开斯大林时代，这反映在 1955 年 5 月一座斯大林的巨大雕像的正式揭幕上，此外还任命了一个调查团来调查清洗审判，不过是以避免任何对被告案例的重大挑战为考量的。

206

1956 年 2 月 25 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秘密演讲”。在他的发言中，赫鲁晓夫通过批评秘密警察的活动和揭露夺走无数无辜平民生命的斯大林清洗的大范围和不人道，推动“去斯大林化”的目标。赫鲁晓夫引用

了列宁 1922—1923 年的政治遗嘱,作为对斯大林的独裁倾向的一个警告,他批评斯大林作为领导人鼓励自私自利的“个人崇拜”,以及听任苏联在 1941 年纳粹入侵前的无准备和易受攻击状态。

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斥责公开以后,捷共的强硬派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行为的消息传遍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48 年政变之后不久的严密审查制度和官方新闻处限制了国内报纸和广播电台传播信息,不过国外广播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民众可以通过电台广播接触西方新闻来源和偷偷获取信息。

对于捷共来说,无论 1957 年的官方调查团以怎样的决定来支持摆样子公审上强加的判决,苏联的“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的进程代表了对直接与清洗有联系的党领袖的一个威胁。更多改革思维的共产党人的出现——比如邻国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给强硬派额外的威胁,那些推动不太僵硬的政策的人似乎反映了有限度但普遍的“去斯大林化”精神。由于清洗的缘故,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像哥穆尔卡一样的本地改革者,于是强硬派希望扼杀对赫鲁晓夫揭露的讨论,并且等待他们臆断的短暂政治风暴的过去。1956 年 10 月,公众骚乱帮助哥穆尔卡在苏联的支持下上台,不过当改革者伊姆雷・纳吉在同一个月晚些时候匈牙利事件期间试图恢复多党派政治体制的时候,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捷共领导人要求苏联介入,并派遣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行协助。11 月 4 日,苏联发动了对匈牙利的入侵,坦克辗过布达佩斯的街头,带给这次叛乱一个迅速而血腥的结尾。

207

当扎波托茨基于 11 月 13 日去世,诺沃提尼当选为总统允许了个人权力的延伸,他继续保留第一书记一职。然而,经济方面持续不断的问题亟须在集中化体制上进行关键性改革,以此来增加生产力。1958 年 6 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商议了允许企业管理者越过必要的配额来决定产量的决策分权建议。在对企业追加政府投资的支持下,有限的改革最初取得了成功,但是到 1962 年,强烈要求回归全面集中计划的改革反对者逐渐削弱了改革的基础。

到20世纪50年代末,借助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引入和食品及多种消费品更大的供应,生活水准得以提高,尽管特定的商品对于没有权力进入只对某些特定人群开放的西方产品专卖店的人来说还是稀缺的。女性受益于性别平等和就业机会的官方政策,尽管平等未能延伸到工资以及政府和经济体中拥有实权的职位方面。女性在数量方面很好地代表了劳动力,不过在家里还要作为妻子和母亲负有额外的责任。

1960年批准了新宪法,这使诺沃提尼和强硬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所有方面宣告成功保住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个文件基于1936年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宣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此后将正式被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ČSSR)。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这部宪法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逆转,它解除了行政委员会和其他自治机构,代之以更加直接的来自布拉格的控制。以一个安抚的姿态,当局宣布对幸存的清洗审判的受害者进行大赦,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古斯塔夫·胡萨克,然而并没有作出更改裁决或者恢复被告名誉的任何努力。

在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对斯大林的批判之后,捷共领导层将拖延"去斯大林化"与看似符合赫鲁晓夫政策的装点门面的改变结合在一起。1962年,当局拆毁了布拉格莱特纳公园巨大的花岗岩斯大林纪念像,并且从街道、地名以及以他的名义命名的工业企业中去除了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的名字。曾经摆放在布拉格日日科夫街区的一座专属陵墓的哥特瓦尔德遗体,也被移走并在同一年被火化。

208

几易其稿之后,调查团关于清洗审判的最终报告在1963年发表,并且引发了党领导层的变化,这时诺沃提尼显示出愿意通过使与清洗有关系的其他人承担报告中记述的滥刑责任来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在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位受欢迎和忠诚的共产党人——成为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预示着与曾经捆住诺沃提尼和斯大林主义过去的老近卫军的清洗没有直接联系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官员的崛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推进了党内有关经济改革和直面捷克

斯洛伐克真实及现存问题的需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分歧。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 年)实行之后短短两年内,于 1958 年制定的计划和经济变革措施很显然已经不能阻止经济下滑,诺沃提尼将此归咎于决策过程的非集权化。诺沃提尼对危机的反应是要求推翻非集权化,并且援引了外部因素,比如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摩擦导致的贸易中断,以及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冷战结果。

共产党转向了奥塔·希克,一位集中计划的批评者,由他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经济改革计划,后来作为经济管理的新体制于 1965 年被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计划要求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元素,在以诸如需求和消费等要素为基础的企业中形成竞争,而不是严格遵循一个计划。尽管希克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了将市场动态融入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由于未能在工业和批发价格方面取得初步进展之后实施全面的改革,计划遭到了破坏,并且导致了直到 1967 年的糟糕结果。对于真正的经济改革支持者来说,恢复严格经济控制的压力反而激化了改变体制的渴望,并且造成了党内更深的分歧。对真正自由化的推进将会在 1967—1968 年正式开始。

209

在斯洛伐克,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主要是在东部地区——早已通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从农业转移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触发了斯洛伐克社会的转变。在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大约半数斯洛伐克人口工作在农业部门,不过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百分比已经降到了 13%。在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支持为农民提供了新住所,通过农业电气化和基础设施改进带来的农村生活现代化,使他们的生活水准得以大大改善。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家经济问题为斯洛伐克人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他们怨恨诺沃提尼对斯洛伐克的负面态度和早期对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迫害。随着像杜布切克这类新的更年轻的斯洛伐克领导人赢得影响力,斯洛伐克的议题和政治要求再度作为共产党内部分歧的源头而引人注目。对恢复斯洛伐克政治机构的支持不仅来自斯洛伐克民众,也来自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官员。诺沃提尼

对平息紧张状态无所作为，在他于 1967 年夏天在当地旅行期间，似乎还故意冒犯了斯洛伐克人。

## 文化复兴和自由化

随着改革的压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增长，新的文化趋势允许批判共产主义早期岁月中错位的理想主义和当局政策的社会与艺术后果的文学作品的出版。1963 年，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教授在利布利采城堡主办了一次有关作家弗朗兹·卡夫卡的讨论会，使这位被共产党批评家低视的 20 世纪早期关键文学人物恢复了名誉。书店把多年难以获得其作品的外国作家或者像俄罗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之类的重要作家的书摆在显要位置，索尔仁尼琴 1962 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揭示了斯大林的劳改营中生活的残酷。1965 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影片奖授予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大街上的商店》。影片背景设置在纳粹占领和雅利安化政策实行期间，整部影片都在斯洛伐克拍摄，并在布拉格的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制作。

210 1966 年，两部批判近期共产主义往事的小说通过审查并且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读者群，主要因为它们对近期共产主义往事中错误的强调与官方对那段往事的重新检讨之间的对比。卢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描写了一个农村社区，在那里传统正在被一种不能提供任何积极面却侵蚀长期存在的社区观念的思想意识逐渐破坏。在小说中，一名新闻记者回到他在摩拉维亚的乡村，被迫面对他与已故父亲的关系，他的父亲曾经不切实际地拥护共产主义思想的目标，如今看来却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现实脱节。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聚焦在整整一代人迷失的理想主义主题上，他们意识到了乌托邦式的梦想和政权的僵化之间的悬殊，那个政权让一个涂写在明信片上的简短玩笑改变了一个年轻而专注的共产党员卢德维克的生活，并且通过他的复仇努力，改变了一些他从前的同志的生活。昆德拉自己与很多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复兴的领军人物一

样，曾经经历了这样一次转变，从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化支持者到梦想已破灭的对政权的批评者。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哈韦尔创作的戏剧，如《游园会》和《备忘录》等，为官僚、权威和权力等级的非人道提供了荒诞主义的注解。在《备忘录》中，一种人工语言“普蒂德普”(Ptydepe)的推广促进了一个组织内部的交流，不过借助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中使用最多的单词是与“袋熊”对应的——来建立官僚秩序的努力，与人类天性和对事物的世俗追求发生了抵触。

当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于 1967 年 6 月底召开该组织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出席者谴责当局对文化活动的限制，并且要求终止审查制度和扼杀创造性表达的政策。瓦楚里克、昆德拉和哈韦尔参与了讨论和汇报，其他主要的作家还包括帕维尔・科豪特和伊万・克利马。一封来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信件的公开朗读导致共产党官员的离席，接下来就是针对一些作家和出席者的官方行动。

到 1967 年 10 月底，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利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挑战诺沃提尼及其同僚们回归集中计划和回避极其需要的改革的努力。由于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在改革阵营中，代表与 1948 年的事件隔离的一代的大学学生，为了课程改革和更广泛层面上的国家议题而变得活跃起来。在新近完工的位于斯特拉霍夫山的学生宿舍发生一系列停电事故之后，布拉格的学生于 1967 年 10 月 30 日发起公开游行表达不满。学生们手持蜡烛穿过街道，准备下山进入布拉格市区，这时他们遭到了警方的袭击和逮捕。其他地方的学生举行会议，并且讨论总罢课的可能性，不过最终放弃了这个主意。媒体报道加强了对诺沃提尼当局的批评，不过党内的分歧和保住苏联支援的需要却限制了诺沃提尼在回应对他的领导不断激化的挑战方面的选择。在很多共产党员看来，很显然诺沃提尼几乎没有机会在他的权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经受住这场风暴。这种形势也引起了苏联的关注，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 12 月 8—9 日到访布拉格，并且意识到捷共内部的裂隙使得诺沃提尼想要继续下去

211

几乎是苛求。

1968 年 1 月 5 日，捷共中央委员会推选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第一书记。尽管他对共产主义愿景的专注有着很深的根基，杜布切克开始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建设性的改革。杜布切克的品格和真诚使他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和肯定与诺沃提尼截然不同的领导人，这反过来引领杜布切克与勃列日涅夫及其他华约国家领导人协商，以便使他们确信改革不会威胁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角色。在确认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者没有意图破坏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地位或该国与苏联的外交及军事联系之后，勃列日涅夫给予杜布切克以支持。

对于杜布切克及其政治伙伴来说，真实社会主义的成功演进需要重新引入自 1948 年起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无法找到的民主元素。杜布切克的伙伴之一，改革派共产党人兹德内克·姆利纳日主张，来自社会主义体制的冷漠和疏远可以通过将自由民主的元素——包括政治多元化引入那个体制，很好地被抑制。为了恢复公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杜布切克愿意允许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织更广泛的参与，并且将它们从严格审查和警察监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12

## 布拉格之春

1968 年 3 月初，杜布切克和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放松审查制度，解除了新闻审查办公室对媒体的管辖权，并把职责移交给编辑自己。这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 6 月初为止，审查制度逐步取消，那些长期被命令禁止、如今开放给公众讨论的议题和消息得以向公众曝光。布拉格之春已然开始。

3 月 14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正式通过一项有关为那些被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审判不公正地迫害的人平反的政策。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团随后建议为共产党前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成为清洗审判对象的捷共党员彻底平反。平反名单上活着的成员包括杜布切克的改革伙伴之一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他很快于 4 月中旬

被选为国民大会主席。

受到这些事件发展的激励后,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于3月中旬提议了宪法法案,法案将准予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完整的立法权力,对此的期待是建立一个在联邦制国家内的斯洛伐克政府。几星期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决定支持为捷克斯洛伐克创建一个联邦体制的努力。不久将被提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的古斯塔夫·胡萨克,要求先建立联邦,随后再进行民主改革,不过许多斯洛伐克人表示民主改革必须先于联邦化进行,重新配置国家才能取得成功。

不断增长的要求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位的公众呼声终于得到满足,3月22日诺沃提尼由于一个牵涉到他私人朋友扬·舍伊纳将军的丑闻而下台。由于被指控挪用国家财产满足私利,舍伊纳匆忙逃离捷克斯洛伐克,不过在离开前,他拍摄了机密的军事文件,在舍伊纳叛逃后,这些照片最终落入美国人的手中。曾经受清洗牵连而遭遇事业逆转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以国民大会282比6的选票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总统,随后在5月晚些时候,诺沃提尼被开除出捷共。

4月初,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改革"行动计划",一个月之后计划获得了国民大会的支持。"行动计划"部分由当时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成员的姆利纳日编撰,寻求定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政治上,计划要求恢复国民阵线联盟,尽管其中四个较小的政党和不同关联组织长期受捷共的支配。"行动计划"承诺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以及在这十年末一部新宪法的制定,不过共产党保持了其作为国民生计主导力量的领导作用。对于斯洛伐克,计划提议了一个联邦体制,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拥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法律平等。

213

"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各项经济改革包括有利于私营企业的决策非集权化、在国际贸易上较少的限制、一个在世界市场上可兑换的货币以及对工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尽管公民将被允许拥有小规模的企业,以此作为对市场力量的特许,政府将继续拥有和管理所有大型企业。随着经济改革家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接替约瑟夫·莱纳尔特成

为总理,以及国防和内务部长的职位落入改革同盟的手中,捷共带着改变现状的各项计划向前发展。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次尝试,在与旧体制渐行渐远的改革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实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随着审查制度的放宽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伙伴们的公众支持,像索科尔和十字军之类的旧组织再度出现,各类工会和非共产党组织重新获得他们的话语权,新的独立的团体在文化复兴和进一步民主化的支持下涌现。政府停止了对电台广播的干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青年人能更多地获得西方摇滚音乐和青年文化,其中很多人选择模仿这个时代的嬉皮士生活方式。当公众放弃冷漠和被动,转而对国家大事、文化活动、报纸及其他媒体,甚至包括海外旅游感到兴味盎然的时候,公民社会重新出现了。利用新开放的时机,访问者和记者从西方到来,在第一线观察"人道社会主义"——杜布切克描绘的布拉格之春的政治实验。

5 月初,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发展引发了来自勃列日涅夫的新的警告,此外还包括来自捷共的一些更加强硬和右翼的成员,其中就有瓦西尔·比拉克——杜布切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接替者。5 月 4—5 日,杜布切克与比拉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领导人的新一轮会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向勃列

214

日涅夫和柯西金担保,捷共对事态持有坚实的控制,这个国家将不会经历一次反革命、资本主义的复辟或者回到 1948 年以前的状态。然而,杜布切克及其同僚同意于 6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5 月 17—22 日,柯西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据称是为了在这个温泉城镇进行健康治疗,不过苏联总理也与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表示自己对该国的当前局势感到满意。

6 月末,国民大会接受了创建一个由两个人民共和国——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的计划,在保留各自的政府和议会的同时,共享一个联邦管理机构和新的两院制的联邦议会。人民院和国家院的席位分配在通过宪法法案和其他

法律方面有利于斯洛伐克人,不过捷共主席团的政策制定权威限制了议会的力量。

然而,正是卢德维克・瓦楚里克的“两千字”宣言在《文学名单》和其他报纸上的刊登,使得苏联领导人对布拉格之春的忍耐接近极限。瓦楚里克谴责共产党造成了必须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局面,不过也对那些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的党内人士给予赞赏。宣言要求公众为了民主化而投身于游行示威和政治活动,并且乐于保卫改革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只要有需要,甚至不惜使用武器。宣言的 70 位签名者不仅包括作家和知识分子,也有运动员、科学家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两千字”宣言遭到了捷共的强烈批评,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那些在宣言上签字的人。对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人来说,宣言似乎为他们早已怀疑的东西提供了证据,即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者已经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

6 月 19 日,代号“舒马瓦”的夏季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与所在国的军队一同参与的有大约 2.7 万名苏联士兵和来自波兰、匈牙利及东德的较小的部队。尽管这次演习在 7 月上半月已经结束,苏联军队却一直持续到 8 月才撤出,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华约盟国就反革命的威胁争论不休。由于美国不愿意通过干涉苏联集团国家的事务来加剧冷战的紧张局势,西德也拒绝介入不断升级的危机,布拉格之春的命运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及其华约伙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215

当罗马尼亚选择不参加而捷克斯洛伐克为双边会谈而不是集体磋商进行游说时,五个余下的华约盟友于 7 月 14—15 日聚会在华沙,一致同意递交一封给杜布切克的信,对由苏联领导层表达的忧虑表示普遍的支持。七天之后,来自“五国”的信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新闻界,一起出现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对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反革命国家这类断言的反驳。杜布切克出现在电视上,大声回击“五国”的谴责,不过在其他华约国家,媒体上只出现了最初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信,并没有随后的反驳。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将领通知华约

国家和南斯拉夫，军队无条件支持作为捷共首脑的杜布切克。

在捷共主席团同意苏联的会议邀请后，杜布切克和他的代表团抵达了靠近苏联乌克兰边境的斯洛伐克城镇蒂萨河畔切尔纳，参加于7月29日开始的为期四天的会谈。会议在镇上的火车站举行，其进程令人沮丧，乌克兰共产党主席皮奥特尔·谢利斯特的粗暴批评使杜布切克禁不住流泪。

所有的华约国家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聚会并同意一项联合声明——《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支持各个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路径，不过警告一个国家挑战社会主义秩序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威胁。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知情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中添上了一段，宣称整个华约组织有责任对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对社会主义的威胁进行反击，这个政策后来成为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这次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捷共强硬派分子德拉霍米尔·霍尔德尔的一名助手递给谢利斯特一封秘密的"邀请信"，在信中，比拉克、霍尔德尔、阿洛伊斯·因德拉以及其他两名共产党保守派要求苏联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反革命形势进行回击。

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决定在捷共第十四次大会开幕和更早一点于8月26日召开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会议之前，采取行动。在苏联领导人告知杜布切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对新近协议的反应上的不满之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于8月15—17日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在比拉克和反改革团体的协助下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反改革团体的成员将会保证对媒体、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内务部的控制。

216

## 入侵

当捷共主席团于8月20日开会时，比拉克和其他强硬派试图举行一次不信任投票来推翻杜布切克，并且用一个服从苏联的临时政府取代他。然而，杜布切克成功地搁置了比拉克的动议，继续按照会议日程的计划开展党务工作。随着争论持续到深夜，主席团成员得到消息称，在没有通知杜布切克或者主要政府官员的情况下，华约已经发动了对

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主席团发出了对武装干涉的谴责，称其侵犯了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主权，并且要求公众保持冷静，避免任何直接挑衅或武力回应。陆军和空军收到指令，不投入保卫国家的武力抵抗，也不对正在前进的华约部队采取行动。

这次代号“多瑙河行动”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包括了来自苏联、波兰、匈牙利、东德和保加利亚的武装部队，以16.5万名苏联士兵和4 600辆坦克作为先驱部队。华约军队于8月20日晚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随后的一天里，又从匈牙利、东德和波兰跨过边界。苏联军事人员防卫布拉格的鲁齐涅机场，保障第一天期间120架次的AN—12型飞机的降落。到第一周结束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士兵的数量已经上升到50万，并有超过6 000辆坦克提供支援。布拉格之春正在走向尽头，与之同行的还有杜布切克在“人道社会主义”中的试验。杜布切克后来写道，这次入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水晶球来预见俄国的入侵。无论是在1月到8月20日间的任何时候，事实上，我都不相信那将会发生。”[3]

8月21日，国民大会与劳工组织、记者、科学家、广播媒体以及党和政府官员一起对入侵进行谴责。苏联广播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盟友曾经收到捷共和政府中一些人的邀请，请他们提供援助以结束反革命的威胁。苏联人迅即劫持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弗兰蒂舍克·克列格尔(国民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两人，在克格勃的监督下转移他们到华沙、乌克兰以及莫斯科。



随着大街上的群众数量剧增并且投身于愤怒的示威活动、总罢工和非暴力的阻碍行动，强硬派未能迅速行动组织一个新的支持苏联的政府，部分原因是比拉克的小组缺少填补杜布切克被解职后造成的真空的那种类型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市民拆掉路牌、标志和门牌号码，给坦克兵制造混乱，并且试图说服外国应招士兵，这次入侵是一个不幸的误会，华约军队应当回家去。要求军队撤退并释放被拘押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请愿书在布拉格传播。紧要关头，公众避免了曾经在

1956 年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期间导致重大流血事件的那种类型的抵抗活动。市民被劝告遵循刊登在《布拉格晚报》上的抵抗“十诫”：“1. 不知道；2. 不关心；3. 不相告；4. 不从事；5. 不知怎么做；6. 不给予；7. 不逃离；8. 不出卖；9. 不张扬；10. 什么都不做。”[4]

8 月 22 日，超过 1 200 名捷共代表公然反抗苏联及捷共通敌者，他们出席在布拉格维索恰尼区的ČKD 工厂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特别大会。由于策划时间紧急，那些出席大会的人绝大部分是捷克人，不过代表们决定，快速行动对于否定据称是引发这次入侵的“邀请”来说是必要的。大会要求进行一次一小时停工，表示对杜布切克作为党领导人的强力支持，并且任命了一个新的支持改革的中央委员会。

随后的一天，杜布切克和他的团队抵达莫斯科，在此之前斯沃博达及其同行者早就到了苏联首都。杜布切克拒绝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合作，不同意接受军事干预的合法性，不过斯沃博达有能力说服苏联把杜布切克及其他人归还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还要求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否认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及其活动。8 月 26 日，苏联政府与斯沃博达、杜布切克的团队和强硬派会面，会上苏联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莫斯科协议》上达成一致，协议是一份 15 点文件，否定最近的党代表大会上的决定和宣言，并且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社会主义、谴责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恢复审查制度以及从党和政府的关键岗位上排除支持改革的官员。杜布切克及其同僚保住了他们的职位，不过尽管缺少将 1 月后的政策与反革命联系的例证，协议从其他方面命令撤销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并且将杜布切克和改革者置于易受未来行动伤害的境地。

8 月 26—29 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会议上，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的斯共代表听取了古斯塔夫·胡萨克有关莫斯科会议的报告，接着选举胡萨克接替比拉克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斯洛伐克代表大会起初宣布支持在维索恰尼举行的捷共代表大会，不过在胡萨克抵达后不久，基于缺少足够的斯洛伐克代表的情况，他质疑了布拉格会议的有效性。



218

8 月 27 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返回布拉格,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后来发表了一次电台广播,告知公众在莫斯科进行的商议在一般意义上的结果。同一天,苏联军队开始从市中心和布拉格城堡附近的区域撤出。一份 9 月份发表的报告宣布对布拉格的占领共造成 2 人死亡和 431 例重伤,此外还有对这座城市中许多建筑物的损毁。

## 余波和“正常化”

在 8 月的最后几天到 9 月初的这段日子里,克列格尔、希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和政府中主要的改革派或辞职或被替换。杜布切克推选改革派进入捷共主席团的努力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批评,后者支持比拉克和保守派。1 月 7 日,斯姆尔科夫斯基未能赢得足够的支持保住他作为国民大会主席的职位,改革派又失去了另一个关键岗位。曾经赞成布拉格之春的胡萨克,此时被证明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指望从改革的结束和政治气候的转变中获取利益。

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于 10 月 3—4 日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讨论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正常化”和苏联军队在该国的继续存在议题。随着进一步的磋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迫于压力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大约 8 万名苏联士兵“临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国民大会以 228 比 4 的投票批准了这个协议,不过有大约 50 名代表选择不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个月月底,当捷克斯洛伐克庆祝 10 月 28 日的独立 50 周年纪念日时,夏天期间曾被提出的联邦化计划被加入宪法,两天后由斯沃博达总统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签署生效。

1969 年 1 月 16 日,一个名叫扬・帕拉赫的查理大学学生在布拉格文采斯拉斯广场顶端的国家博物馆前脱掉他的外衣,然后用易燃的液体淋湿自己,试图进行一次命名为“火炬一号”的自焚行为。钉在帕拉赫外衣口袋里的便条解释了他是通过抽签被选来进行这次牺牲行为,以此来反抗苏联领导的对他祖国的入侵和镇压。帕拉赫超过 85%的身体被严重烧伤,并于三天后去世。对他去世的举国哀悼从布拉格开始,而 1 月

25 日的葬礼成为全面"正常化"开始之前最后一次主要的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从 1 月 20 日至 25 日，19 名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的学生参与了一次绝食抗议，以示与帕拉赫的反抗行为团结一致。

1969 年 3 月末，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冰球世界锦标赛，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很好的庆祝理由，他们的国家队在两次与苏联队相遇的时候均取得了胜利。对苏联的胜利促使大约 50 万人在第二场比赛之后参加全国范围的游行活动，同时在布拉格，几千人袭击了苏联国有航空公司(Aeroflot)的办公室。在爱国情绪和愤怒的流露中，杜布切克的批评者们开始行动起来反对他，当时苏联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布拉格，捎带着骚乱必须得到控制和杜布切克必须被解除职务的要求。潜藏在苏联的回应背后的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威胁，8 000 名士兵从东德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

在 4 月 17 日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期间，杜布切克辞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且提议胡萨克作为他的接任者，不过杜布切克继续是主席团中的一员。把保留一些布拉格之春的改革的信任寄托在胡萨克身上是极其错误的，换来的是"正常化"引发的镇压和改革的倒退。审查制度的重新引入带来对报纸、广播和电视更严密的政府控制，改革者发起的出版物也被禁止。

220 然而，公众并没有完全忘记 1968 年 8 月的事件，1969 年 8 月 19—21 日，在苏联领导的入侵一周年时，示威活动出现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城市的街头。军队和民兵恢复秩序的努力造成 5 人死亡、超过 30 人受伤以及接近 300 人被逮捕。作家和知识分子，如哈韦尔、瓦楚里克和科豪特，选择在入侵一周年时发表一份《十点宣言》，谴责镇压的恢复和"正常化"政策。政府对批评的反应是颁布法律，旨在维持秩序和有助于针对批评者及参与未经许可的公众集会的人的法律诉讼。

在 1969 年秋天的几个月里，对改革者的清洗仍在继续，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失去了他们在国民大会中的职务，捷共开始全党铲除支持改革的成员和技术专家，恢复它的工人阶级基础。斯沃博达总

统在1970年新年向全国的致辞中,概述了正常化的首要目标,同时强调了捷共在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和该国与苏联的外交及军事联系的重要性。同一个月里,对党和政府的进一步清洗导致杜布切克辞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的大使。切尔尼克被从主席团除名,总理职位由副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接替,他将保有那个职位直到1988年10月。

1970年5月,政府从土耳其召回杜布切克,捷共将他开除党籍,这个行动还针对其他一些看来不配做捷共成员的人。改革行动计划的关键撰稿人兹德内克·姆利纳日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且失去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职位,在随后的七年里,一直在国家博物馆的词源部门工作。到这一年末,根据胡萨克和捷共官员的汇报,被筛选的党员中只有78%被允许保留党籍。1971年5月,官方认可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开否定了1968年8月在维索恰尼举行的第十四次特别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作为党和社会清洗的一部分,未经许可的学生团体或组织,如索科尔和十字军,再一次被禁止。数千名教育工作者、学者、科学家、记者、广播媒体的成员和其他人失去了工作,艺术家和作家面临展览、演出和出版的禁令。许多曾经支持1968年改革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成为惩罚的受害者,这个惩罚来自那些为了极端保守地保护旧状态而寻求消除布拉格之春所有痕迹的人。其他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到1971年年底,大约13万至14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离开去其他新的地方。



在经济范围内,正常化意味着集中计划的回归和义务配额及严格价格控制的重新引入。希克早先对体制的改变和农业部门超过预期的表现,使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在一些领域继续向前发展,不过生产力、工资和消费尽管在政府对许多企业的大力投资下仍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平,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也影响了捷克斯洛伐克产品在全球范围的销量。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对作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成功演进证据的收入均等和生活水平改善歌功颂德。

然而，到这十年末，由于严重的住房短缺和不能满足在城市地区建造单调而拥挤的预制混凝土公寓大楼(*panelåks*)的需求，各类问题开始加剧。1974 年的欧佩克石油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物价飞涨，苏联石油不断增长的成本比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内支付的翻了一番，并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继续增长。随着其他原材料的成本也开始提升，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产品销量跟不上这些增长的速度，经济相应地予以回应。

对斯洛伐克的大型工业和军备企业的依赖致使斯洛伐克易受市场衰退、技术日益过时和华约的军事需求的影响。当局可以自鸣得意于斯洛伐克由于同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往来而产生的充分就业，不过在很多领域，生产远远超出了需求。此外，大型冶金、化工和电力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从受污染的空气和水源以及遭到严重损害的林地中都可以看到。

1970 年 5 月 5—6 日，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之间的磋商产生了一项友谊和互助协议，反映了苏联对胡萨克当局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正常化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于 1970 年 12 月接受了《党和社会在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危机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给了苏联领导人进一步感到满足的理由。在语气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新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教训"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到一条苏联支持的道路上，拒绝行动计划提出的改革和 1968 年的事件，将它们视为反革命。捷共用一本全国发行的意识形态入门书作为替代，要求管理岗位的工人和涉及教育、科学和文化事务的个人进行学习。通过将它的领导角色与"经验教训"中包含的原则和主义相联系，捷共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向公众让步，即使出现要求政策的灵活性超过约束性的情况。1975 年，胡萨克开始扩张他个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在一次说服年事已高的斯沃博达辞职的斗争之后，他登上了总统宝座。

## 异见者和人权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十年中，实行"正常化"未能培育出那种对公



222

众广泛接受由“经验教训”定义的体制来说必要的领导人或者意识形态的激情。一致、顺从和约束并不能产生一个可以消除 1968 年记忆的有活力的体制,反而导致公众在面对官僚化和长期停滞时普遍的冷漠。没有什么可以在布拉格之春后留存下来,不过“正常化”看来也拿不出什么代替失去的改革。

对于一些人来说,“正常化”最终会让路于一个更加人道的体制的希望所带来的反抗行动,很有可能招致来自满足于受恐吓的群众并且不愿意考虑改变体制的政权的逮捕和法律迫害。作家和知识分子用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保持联系,转向地下出版物(*samizdat*,来自俄语,有“非官方出版”或“自行出版”的意思)的方式来避开审查并传播被查禁的文件、期刊和图书。诸如卢德维克・瓦楚里克、瓦茨拉夫・哈韦尔、帕维尔・科豪特和伊万・克利马等作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并且私下交换他们作品的打印稿。其他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成为移民并选择长期或者永久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昆德拉于 1975 年移居巴黎,后来取得了法国国籍,并且通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笑忘书》等小说赢得了国际声望。

为了便于交换想法以及帮助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通过官方以外的渠道传播他们的作品,瓦楚里克于 1972 年出版了他的《挂锁版》(*Edice Petlice*)系列,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共出版了将近 400 篇被禁的作品。在 1975 年至 1981 年期间,哈韦尔出版了 122 册捷克异见者的作品,作为他的《探险版》(*Edice Expedice*)系列的一部分,当他后来由于异见活动而入狱时,他的妻子奥尔嘉和弟弟伊万・M. 哈韦尔继续了他的工作。作家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与他的妻子——作家和演员兹德娜・萨利瓦罗娃——一起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加拿大,他们于 1971 年在多伦多创立了六八出版社,出版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作家的作品,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作品是不能出版的。

223

哈韦尔选择一个更加直接的途径来批评“正常化”的政策,他于 1975 年 4 月寄送了一封公开信给古斯塔夫・胡萨克。在信件中,哈韦尔讨论了突然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道德危机和普遍冷漠,他认为这

是由无所不在的安全警察和一个“正常化”社会的表面一致所造成的丧失希望和敬畏环境的结果。哈韦尔断言“正常化”并没有通向任何真正形式的常态，反而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失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一致，一致导致习以为常——这随后被引用为‘大众政治参与’的例证”。[5]尽管无法得知胡萨克是否真的读过哈韦尔的信，这位剧作家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还有来自胡萨克办公室的警告，警告他如果把信的副本提供给外国媒体，他将把自己等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接近公函还是受限制的和私下的，不过国外媒体报道了哈韦尔对当局的挑战，同时翻译版本在西方也变得随处可见。

几个月之后的 1975 年 8 月 1 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华约成员国、美国、加拿大和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协作会议(CSCE)的最后决议。这个最后决议又被称为《赫尔辛基协定》，协定的签署国同意保障人权和它们公民的基本自由。一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两项有关人权的联合国公约的批准，这使对相关权利保护的引用成为该国法律条款的一部分。

当局对人权问题的伪善立场，该国的异见者和 1976 年由于未经官方允许表演音乐而被捕的音乐家们是不会忘记的。在 1968 年入侵后不久，米兰·赫拉夫萨召集音乐伙伴，组建反主流文化乐队宇宙塑料人，他们涉猎的歌曲来自非主流美国音乐家，如地下丝绒乐队、污浊空气乐队、牛心上尉以及弗兰克·扎帕和发明之母乐队。乐队取名自扎帕的歌曲《塑料人》，并与另一个团体 DG307 发展了紧密的关系，这个团体由贝斯手赫拉夫萨和诗人帕维尔·扎伊切克于 1973 年成立，名字来自精神分裂症的精神诊断。由于在音乐会中包含戏剧化的场景设置和服装，还有灯光秀和迷幻活动的装备，“塑料人”最终激起了当局的回应，他们宣布这些音乐家是不遵守惯例的人，剥夺了他们的专业身份，并且吊销了他们举行公开音乐会的执照。

乐队的转折点于 1976 年 2 月 21 日到来，当时乐队经理和艺术指导伊万·伊劳斯在博亚诺维采举行的婚礼为第二文化的第二届音乐节

提供了环境。3 月 17 日,当局逮捕了超过 20 个参与这个事件的人,其中包括伊劳斯、"塑料人"的全队成员和扎伊切克。在被哈韦尔描述为卡夫卡式的法律诉讼得到应有的预先决定的裁决和被告们更像罪犯而不是政权批评者的对待之后,牵涉到的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不过,伊劳斯被判入狱 18 个月,扎伊切克被判 1 年,萨克斯风手弗拉蒂斯拉夫·布拉贝内茨是 8 个月。布拉贝内茨最终被迫流亡,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去了加拿大,而扎伊切克移居瑞典,接着去了美国。

审判促使哈韦尔与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起反对当局对音乐家的诉讼。1977 年 1 月初,哈韦尔和他的同伴们提出了《七七宪章》倡议,这个文件(或者说宪章)要求胡萨克当局按照该国法律和宪法的定义来维护人权,此外还应符合《赫尔辛基协定》和其他国际条约,这些协议捷克斯洛伐克都曾是签署国。1 月 6 日,哈韦尔与瓦楚里克和演员兼剧作家帕维尔·兰多夫斯基一起,不但将宣言副本邮寄给那些在宣言上签名的人,还尝试着递送宪章副本给政府、议会和官方通讯社捷通社的记者们。不过,安全警察阻止了这三人组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拦停了汽车并拘捕了所有三个人,此后又进行了审讯、抄家和直接针对若干联署人的其他形式的骚扰。哈韦尔从 1 月中旬起一直被拘押,直到 5 月末基于他早先给胡萨克的公开信被指控颠覆罪。兹德内克·姆利纳日由于在宪章上签名失去了他在布拉格国家博物馆的职位,随后他去了维也纳,并且整个夏天都处在流亡状态。



"七七宪章"组织最初的三位发言人包括哈韦尔、哲学家扬·帕托茨卡和历史学家及政治科学家伊日·哈耶克。在一系列不间断的审讯之后,帕托茨卡于 3 月 13 日罹患脑出血,当时他正在警方手中。当局于 1977 年 10 月将哈韦尔和其他三名宪章运动者送上审判席,对哈韦尔的判决是 14 个月的缓刑。1978 年 1 月末,哈韦尔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再次被逮捕,此后被拘留直到 3 月中旬被释放。

"七七宪章"的领导人期待公民社会的恢复,并且选择投身于"反政治"和对胡萨克以及"正常化"政治运动的道德反对,而不是从事反对国家的政治活动。匈牙利作家乔治·孔拉德在他 1984 年的著作《反政

治》中，将“反政治”描述为在一个政治体制外运转的，而这个体制因为是政治的，所以本质上是腐败的。对于“七七宪章”来说，选择道德路径必须保持远离腐败，不过严格限制对政治体制的接近致使异见者在这方面罕有选择权。“七七宪章”早年主要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活动，而包括哲学家及教育家米罗斯拉夫・库西和哲学家及作家米兰・希梅茨卡在内的一小批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为了共同的事业也与他们的捷克伙伴一同工作。

1978 年 4 月，“七七宪章”的成员另外创建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旨在监控警方对市民的骚扰以及对法定权利的否认和滥用。组织的名称是为受到不公正起诉者辩护委员会（VONS），该组织搜集证据并调查关于审判和司法裁决、警察行动、环境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相关事务中滥用职权的指控。执行 VONS 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经历了与《七七宪章》签署人相同类型的官方迫害，从警方监控到丢失工作，甚至是毁掉整个职业生涯，只能获得有限的工作机会而且经常是地位低下的工作。

1978 年，哈韦尔以散文《无权者的权力》向体制发起了另一次意义深远的挑战，他将这篇散文献给已故的扬・帕托茨卡。在散文中，哈韦尔描写了一个菜贩的种种行为，他被要求张贴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他的橱窗上。哈韦尔明示，这个菜贩把纸条贴在窗上，不带任何激情，只为符合预期的惯例和服从规定，而不是表示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忠诚。“正常化”已经使个别市民道德败坏，他们变得疏离于自身，所以愿意生活在谎言中。对于哈韦尔来说，可供各行各业市民选择作为替代的生活方式是开始“在真实中生活”，这种方式可以是从事小小的自我解放行为，比如简单地写写诗或者拒绝按照预期的规矩行事。在更大的范围内，市民的积极性和反对团体可以产生第二类（平行）文化，与官方组织和文化相对应。这种平行文化将有助于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公民社会。

1979 年 5 月，当局逮捕了 15 名 VONS 和“七七宪章”的成员，指控他们与外国间谍合作颠覆国家。6 名被告于 10 月接受审判，并被判入狱，其中包括哈韦尔，他的刑期是四年半，不过由于长期强迫劳役引起


226

的身体欠佳,他于 1983 年 3 月获得释放。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音乐家协会的爵士乐分会已经开始关注音乐家的事业,探索出一条看上去不符合惯例并且当局无法接受的艺术途径。拥有超过 7 000 名成员的爵士乐分会,通过推动公开表演和出版代表爵士乐及其他流派的音乐,帮助年轻的音乐家们。在宣布爵士乐分会从事的是反革命活动后,当局最终于 1985 年 3 月取缔了这个组织,并且在随后的一年逮捕了其主要成员。

## 20 世纪 8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

1980 年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波兰当局接受《格但斯克协议》,并且承认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对共产党政府的公开反对在布拉格之春后第一次表现出如此大规模的行动。然而,深化改革的希望在 1981 年 12 月破灭,当时的新任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颁布戒严令,并逮捕莱赫·瓦文萨及其他团结工会领导人,以此作为全国性镇压的一部分。

在捷克斯洛伐克,1980 年的事件给了胡萨克当局在长期停滞和镇压后一个忧虑的理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层对波兰的反革命活动直接采取行动,不过戒严令的实施使得行动显得不必要。随着波兰的危机得到控制,胡萨克和捷共继续逃避改革并维持 1968 年以后的状态。勃列日涅夫于 1982 年去世,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短暂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两位领导人分别于 1984 年和 1985 年去世之前,鲜有改变发生。勃列日涅夫主义给了胡萨克一种安全感,于是他坚守"经验教训"并且在比拉克之类的强硬派支持下,拒绝考虑对体制的根本改变。

227

缺少结构性改革和一定程度的市场激励,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个体制慢慢地被各类问题压垮,从技术老化和机械磨损到原材料和资源的浪费使用、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以及过度依赖苏联提供的石油和天然气等。尝试通过在核能和褐煤的国内供应上投资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又导致了空气污染的加剧,煤的燃烧在诸如布拉格之类

的城市产生了大量有害健康的烟雾。

政府通过默许非官方的“灰色”经济回应对经济情况的不满，公民可以在有限规模上实践企业家精神。通过对不能公开宽恕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平息了部分社会不安和政治批评，不过这却是以腐败、贿赂、盗窃、愤世嫉俗和哈韦尔及异见者们所指的这个国家不断发展的道德危机为代价的。

在苏联，政治局于 1985 年 3 月选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已故的契尔年科成为总书记，为那个国家开启真正的改革做了铺垫，并最终遍及了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戈尔巴乔夫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某种类似于布拉格之春的事件会发生在莫斯科，而且不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角色。为了那个目的，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化(*glasnost*)的政策，这是一种通过放松审查制度和提供参与共产主义复兴的机会，使政府官员和公众之间形成对该国问题的讨论的方式。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说法，直到斯大林主义最后的痕迹消失，共产主义才能在苏联发挥潜力。到 1988 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允许苏共中央内部的批评者，甚至是非共产党的政治家，被推选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为迈向政治多元化的关键一步。

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perestroika*)政策，试图通过提高效率和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来应付苏联经济的短处。戈尔巴乔夫相信，集中计划的缩减和市场力量及有节制私有化的推进将从数十年的管理不善中解救苏联经济。有关农业生产的各类长期问题可以通过缩减集中化以及更加着重于市场因素和当地决策来克服。经济改革的影响不仅在苏联可以被感受到，作为经互会及参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结果，也遍及了整个东欧地区。

在捷克斯洛伐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经验教训”的意识形态原则背道而驰，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希望减少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了保证稳定和发展，他想要该集团的国家采纳类似于他自己的改革。有限制的改革的实施最终向前迈进，当时捷共在经济中引入若干市场元素，并且试图在决策过程中下放权力。然而，捷共领导人对限制

228

改革范围的指望，与曾经发生在 1967—1968 年的在追求经济的建设性改变的同时避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如出一辙。

当戈尔巴乔夫于 1987 年访问布拉格时，人群亲切地呼唤他“戈尔比，戈尔比”，以支持他在国内的改革政策，并且希望类似改革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很多人还相信，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中允许某种程度多样性的愿望，意味着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抛弃。戈尔巴乔夫选择不直接对勃列日涅夫主义发表意见，不过在访问布拉格期间，他表示评定 1968 年事件的责任应该还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己。对于胡萨克当局的高官来说，合法性依赖于对 1968 年 8 月的入侵作为一次正当军事干预的接受，对入侵的重新评估将威胁到胡萨克和捷共自那时起的政策。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力继续扩张，以及捷共较年轻的党员如米洛什·雅克什和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等，为在党的领导层中起更大的作用而游说，胡萨克于 1987 年 12 月宣布辞去总书记一职。虽然将继续担任该国总统，但是胡萨克的党内职位被雅克什取代，后者提到了实行捷克斯洛伐克版本的体制改革(*přestavha*)，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着手重大改革的倾向。然而在 1988 年，发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与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结合，将捷克斯洛伐克推向了终局，最终导致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统治在 1989 年秋天期间的终结。

229

**注释：**

1　引自：Chad Bryant,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9. 有关战后对战犯和通敌者惩罚的进一步信息，参见：Benjamin Frommer, *National Cleansing: 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来自鲁道夫·斯兰斯基审判的文字记录，引自：Alfred French, *Czech Writers and Politics 1945 - 19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80.

3 Alexander Dubcek, *Hope Dies Last: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Leader of the Prague Spring*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3), 128.

4 引自: Ivan Sviták, *The Czechoslovak Experiment 1968 – 19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1.

5 Václav Havel, "Letter to Dr. Gustáv Husák," in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 11.

# 第九章　天鹅绒革命、“天鹅绒分离”和两个共和国（1989—2009 年）

231

1988 年 1 月，一篇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访谈出现在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基层报》上。作为一名受监视的斯洛伐克林业局职员，经过多年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隐匿生活之后，杜布切克回到了公众视线中。这是伴随着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而出现的限制放松的结果。在他与意大利报刊的访谈中，杜布切克表达了他对苏联领导人“公开化”政策的支持，这是基于他长期保持的信念，改革共产主义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杜布切克也强调了布拉格之春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间的相似性，声称如果在 1968 年的苏联由某个类似于戈尔巴乔夫的人掌权的话，事件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军事干预有可能被避免。

232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公众开始显示出一种表达有限度但却是公开的对当前政权某些政策不满的意愿。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从“反政治”转变为直接和积极的反对政府和捷共。数量不断增长的独立团体出现并与“七七宪章”及其他反对组织建立联系，反过来又使他们为了改革和公民社会目的的活动得到扩张。

主要的宗教人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也在国家事务中变得

更为积极。年长的布拉格大主教"枢机"弗兰蒂舍克·托马舍克早年曾支持 1968 年的改革,不过却从未在"正常化"期间直言不讳其对捷共政权的批评。在反对共产党的约翰·保罗二世于 1978 年被推选为教皇之后,托马舍克成为一名"七七宪章"和人权组织的支持者。1988 年在托马舍克的激励下,接近 60 万名罗马天主教徒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名为《天主教徒信仰定位解决方案的提议》,要求政府允许更大的宗教自由。

在斯洛伐克,不满于宗教自由受压制的罗马天主教徒和被禁止履行宗教职责的教士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教会组织,其与主教"金口"扬·科雷茨有关联,他是一名耶稣会信徒和异见者,1960 年至 1968 年在监狱中服刑,其后致力于出版传播他作品的地下出版物。1988 年 3 月 25 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一次主要由年长的女性天主教徒组成的和平游行导致了警方动用武力来解散集会。学生的参与反映了新一代对投身于反对政府的公众行动不断增长的愿望。

到 1988 年,与"布拉格之春"事件没有直接个人联系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生代带给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生活新的能量。学生组织参与到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街头游行中,被证明是 1989 年秋天导致共产主义垮台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决定性一击。掌权者用装甲车、高压水枪和警犬对抗年轻人,政权的公信力进一步被侵蚀,示威游行的次数在 1988 年中期开始增加。

1988 年 8 月 21 日,主要由学生组成的人数上万的群众走向布拉格街头,纪念华约入侵 20 周年,并且表达他们要求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革的愿望。在游行队伍通过布拉格中心城区前往旧城广场之前,学生领袖们宣读了一份要求民主化和结束管制的请愿书。当游行接近尾声时,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 1 000 名左右的剩余示威者,然而当局惊奇地发现了"七七宪章"和其他组织领导成员的缺席,他们为了避免被逮捕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

233

到 1988 年年底,恶化的经济形势将胡萨克—雅克什政权置于一个就改革而言进退维谷的位置。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预测研究所发布了一

份报告,预言持续的经济衰退以及对于一个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滑落到第 70 位的国家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采纳了研究所关于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建议,不过在 10 月中旬,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和他的保守派同僚行动起来反对什特劳加尔及其他看来支持体制内变革的人。长期的捷共党员和最近的捷克总理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替换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此前什特劳加尔已在这个岗位上 18 年。

在 10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成立 70 周年的活动期间,1 万名群众不顾政府的公开警告聚集在文采斯拉斯广场进行一次非官方游行,最终使纪念日恢复成为公众假日。出于对示威游行的预先防备,当局拘留了"七七宪章"和由学生运作的独立和平联盟的著名成员,后者在 8 月份的示威中已经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 10 月集会期间,群众高喊马萨里克的名字和"自由！自由!",随后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和警棍介入,拘留了一些示威者和旁观者。

1988 年最后一次重要的示威游行发生在 12 月 10 日,当时有5 000 名群众聚集在布拉格庆祝人权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国事访问或许迫使政府给予这次集会官方许可,不过由于"七七宪章"和为受到不公正起诉者辩护委员会的加入、瓦茨拉夫·哈韦尔在指挥台的出现以及要求当局的政治犯得到自由的传单和请愿书的散布,紧张局势逐步升级。在得到来自捷共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米罗斯拉夫·什捷潘的命令后,警方再一次以武力应对,不顾冬天寒冷的气候,用高压水枪冲散人群。

234

## 终局(1989 年)

由于抵抗改革的阻力妨碍了恢复经济的努力,形势进一步恶化。到 1989 年 8 月,国家计划局将亏损企业的官方数量增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 30%,与此同时,非官方的环境组织继续对工业化和发电设施造成的生态破坏提出警告,尤其是在污染严重的波希米亚北部地区,在那里下降的预期寿命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已经达到了危机水平。

当 1989 年 1 月中旬临近扬·帕拉赫自焚 20 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政府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所有的示威活动，以此试图阻止学生和其他人在“帕拉赫周”假借纪念这位学生领袖的自我牺牲之名，投入到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中。1 月 15 日，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在布拉格各处展开，恰巧在这一天，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和协作会议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签署了一份有关人权的文件，反对派领袖选择在实际的纪念日之前一天走上街头是为了吸引关注。按照他们如今惯常的反应，警方在试图镇压反抗者的过程中，袭击示威者并且逮捕了领头的积极分子。作为参与这些活动的后果，哈韦尔被判入狱 9 个月，不过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他于 5 月份被提前释放。

邻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形势发展一方面对胡萨克—雅克什政权是一个警告，另一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不断壮大的反对派是一个激励。在匈牙利，亚诺什·卡达尔于 1988 年 5 月被免除党总书记的职务，成为向市场经济和 1989 年 1 月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允许引入多元化立法的前奏曲。选举在 8 月份得出结果，匈牙利民主论坛脱颖而出，并且参与了这个国家共产党政权的瓦解。

1988 年 8 月期间席卷波兰的罢工迫使政府召开“圆桌会议”，与莱赫·瓦文萨和其他团结工会的代表协商，会议开始于 1989 年 2 月。协商的结果是修宪以设立总统职位和参议院，前者削弱了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力。1989 年 6 月选举的结果将新参议院中 99%的席位给予了团结工会，尽管下议院（波兰语称为“色姆”）中 35%的席位已经承诺给了

235

共产党人，他们却没有获得选举的支持，一些没有竞争对手的共产党候选人被选票上未列名的团结工会候选人打败。共产党人任命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新政府的总统，不过在 8 月，陷入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提名团结工会的塔特乌斯·马佐维耶茨基担任 40 年以来第一位非共产党员的政府总理。

1989 年 6 月，哈韦尔和其他反对派领袖发表了“只有几句话”宣言，抨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处理争端时过于严厉并且经常使用暴力战略，同时当局对于人权和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只提供虚伪和空洞的支

持。这个文件在此后的三个月内征集了4万个签名,它要求实现民主化的直接步骤;释放政治犯;废除表达、集会和宗教方面的审查制度和限制;重新评估"布拉格之春";以及对环境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宣言提及"公民社会正在将自己从昏睡中摇醒",并且警示朝向更大的公众行动的发展"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与权力惰性进行斗争的过程;社会张力正在增大并且已经有开始一次公开危机的威胁,这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1]

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见者从7月份到来的波兰团结工会代表团得到激励,当时国会成员和从前的异见者亚当·米赫尼克、亚采克·库龙和兹比格涅夫·布亚克来到布拉格,与哈韦尔和其他反对派的领袖会晤。秘密警察拍下了这次会议的过程,不过除了在官方新闻抱怨团结工会代表团的出席外没有另外的行动。8月11日,波兰议会否定了1968年的华约入侵,并且就波兰军队的介入向捷克斯洛伐克平民道歉。

当8月20日的入侵纪念日到来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调集大约1.3万名士兵和155辆坦克与防暴警察一起协力控制任何可能的示威活动。示威游行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启动后,当局用惯有的武力和镇压手段予以回应。在布拉迪斯拉发,"七七宪章"成员扬·恰尔诺古尔斯基、米罗斯拉夫·库西和其他异见者试图向一名在1968年入侵期间被苏联士兵杀害的十岁女孩敬献花束,不过随即就被镇压反对者的政府逮捕。

236

到9月末10月初的时候,其他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助于向胡萨克—雅克什政权施加压力,使其向着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一致的方向推进。由于埃里希·昂纳克和民主德国的其他领导人也反对改变现有的共产党体系,并且警告要采取武力的解决办法,大量东德平民开始逃离进入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那些通过汽车或者火车离开他们祖国的人声称是去度假,不过真实的目标是去奥地利和西德避难。早已在春季拆除边境上的铁丝网和防御工事的匈牙利政府,于9月10日正式宣布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在此后的几天里,大约1万名东德人选择跟随5万名早已通过合法移民离境的同胞的脚

步。难民的涌出持续整个 10 月,布拉格街头到处停放着东德人遗弃的特拉贝特和其他车辆,超过 1.1 万人在西德大使馆前的广场上露营,等待避难的官方批准。

作为示威活动和日益增长的不满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警告东德领导人,不能应对公众的忧虑很有可能会危害政权的继续存在。10 月 18 日,统一社会党(SED)施压昂纳克辞去总书记一职,并由埃贡·克伦茨接任。当东德政府宣布于 11 月 9 日开放与西德和西柏林的边界时,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误会使得在之后两天有超过 400 万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鉴于柏林墙此时变得无关紧要,当局任由东西柏林的市民在墙上跳舞,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拆毁部分建筑结构。12 月,统一社会党丧失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领导地位,导致了集权国家的解体和民主的转型,成为迈向 1990 年 10 月两德重新统一的关键一步。

随着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和东德丧失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共政权发现自己在这个地区越来越孤立,同时面临着来自要求民主化的学生、知识分子和不同非官方组织的日益壮大的反对力量,还有人权保护和对环境问题更多的关注。10 月中旬,民主倡议党申请官方地位,由此成为 1948 年 2 月共产党政变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独立政党。这个月晚些时候的 10 月 25 日,瓦茨拉夫·纽曼和捷克爱乐乐团加入记者队伍,抵制国有电视台,回敬其从 6 月起对在“只有几句话”宣言上签名的人不间断的骚扰。三天之后,群众再次聚集庆祝国家独立,不过由于其他地方改革的进展所激起的希望,公开游行显得不那么急迫了。

237

## 天鹅绒革命

触发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的事件发生在 198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的布拉格,当时学生们在首都街头聚集,纪念扬·奥普莱塔尔的葬礼以及纳粹关闭捷克大学 50 周年。在官方和独立学生组织的协作组织下,纪念游行吸引了远远超过预期的群众,在活动开始时有 1.5 万人抵达,开场由演讲者要求实行改革。游行者然后从学生宿舍前往维

舍赫拉德,在19世纪诗人卡雷尔·希内克·马哈的墓地举行仪式,最后走向文采斯拉斯广场。学生们携带着横幅、鲜花和蜡烛,许多人向警察摇晃他们的钥匙,以示其关押了太多同道学生和异见者。

当游行队伍抵达民族大街(*Národni třída*)并且转向文采斯拉斯广场时,游行者数量壮大到大约5.5万人,他们唱着捷克民族圣歌,要求民主改革。一名国家安全局(StB)的年轻成员——“鲁齐茨卡”——佯装学生领袖,协助警方将剩余5 000名游行者的前列转向后来被证实的警方和反恐“红色贝雷”部队的埋伏中。在游行者被阻止前进或者返回伏尔塔瓦河岸的紧张和漫长的阻滞后,安全部队攻击了学生,不顾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作出非暴力的手势,袭击了数百人并逮捕了许多游行者。“鲁齐茨卡”表面上假装是暴力受害者,国安局散布谣言称一名学生——“马尔廷·什米德”——在试图警告游行者他们行为的后果时被害了。

安全部队对和平的学生游行者的袭击引起了一次直指政府的公众怒潮,反对派领袖召集会议,讨论迅速遍及全国的罢工罢课。11月18日,学生们发动了他们自己的罢课,占领大学建筑,号召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参加11月27日的总罢工。布拉格的戏剧界拒绝举行演出,反而开放剧院给学生们,参与他们的讨论,并且随着其他演员开始从外地赶来计划集会事宜。在斯洛伐克,学生们表示与他们的捷克同志团结一致,他们占领了大学,提出类似的要求。

238

政府试图将学生们描绘成不负责任且懒散的,不过公众对学生的支持继续在增强,尤其是家长们开始质疑当局怎么可以对年轻人使用暴力。随着苏联领导人反对暴力策略,胡萨克—雅克什政权认定接受高级将领们投入武装力量对抗反对派的提议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的行动会造成流血和伤亡。

在11月19日于戏剧俱乐部(*Činoherní Klub*)召开的会议上,“七七宪章”、为受到不公正起诉者辩护委员会和民主倡议党的代表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支持改革的复兴组(*Obroda*)前捷共成员、社会党和人民党的独立成员、独立学生联盟领袖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一起组建

了公民论坛(*Obcanské Fórum*),这是一个由要求胡萨克、雅克什、什捷潘及其他对两天前针对学生的袭击负有责任的人免职的反对派和反对组织构成的广泛联盟。出席会议的有瓦茨拉夫·哈韦尔、伊日·迪恩斯特比尔、瓦茨拉夫·克劳斯以及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展开的事件中注定要起到关键作用的异见者。在最初的会议之后,公民论坛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幻灯剧院(*Laterna magica*)设立了活动总部。[2] 公民论坛成立一天后,演员米兰·克尼亚日科、异见者扬·布达伊、社会学家费多尔·加尔以及一批类似的反对派人物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间美术馆聚会,成立了"反抗暴力公众"(VPN)社团,作为公民论坛的斯洛伐克联盟一起保卫公民社会。

在布拉格,2 万名群众于 11 月 19 日集会要求雅克什辞去捷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不过这次安全部队没有任何直接反应。第二天,文采斯拉斯广场上的示威者人数扩大到 20 万人,包括许多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要求领导人辞职、政治多元主义以及终结愈演愈烈的审查制度。类似的示威游行出现在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和其他城市,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的代表走访了学校、工厂和各类事业机构,以期获得对全国罢工罢课的支持。学生们通过传播 11 月 17 日安全部队袭击学生的录像片段为全国范围的运动助力。

239

11 月 21 日星期二,为了协调遍布全国的活动,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展开了直接沟通。在文采斯拉斯广场,20 万名群众聆听瓦茨拉夫·哈韦尔在梅兰特里赫大楼阳台上的演讲,大楼内驻扎着社会党报纸《自由之言》(*Svobodné Slovo*)。哈韦尔警告当局,除非行政当局对 11 月 17 日的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满足释放政治犯和建立诸如新闻自由的公民自由制度的要求,否则 11 月 27 日的总罢工将无法避免。在示威活动期间,"杜布切克进入城堡!"的呼声从人群中升起,这是出于对这位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曾经寻求发展"人道社会主义"的认可。然而,群众也表现出对哈韦尔充满敬意,鉴于他为人权而进行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多次入狱,他成为了一位谦逊和富有同情心的全国知名人士。

4月,杜布切克曾经参加与为匈牙利电视台服务的记者翁德拉什·舒加尔的一次长时间访谈,在访谈中他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辩护,并且谴责捷克斯洛伐克华约盟友的军事干涉。11月22日,杜布切克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在公众集会上发言,当时在布拉迪斯拉发,他在接近10万的热心群众前致词。后来,杜布切克离开布拉格,与哈韦尔和公民论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坐公车巡回演讲。

随着反对派领导人们聚在了一起,学生们于11月27日前往工厂推动工人们支持有计划的罢工,自愿代替他们使这些工人可以加入大规模的停工。随后的一天,1万名来自布拉格的ČKD企业的工人参加了另一次大型游行活动,原因是他们的突出分子之一佩特尔·米莱尔接受邀请担任公民论坛领导人中的工人代表。当天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次示威活动吸引了上万人抗议政府的政策。

杜布切克和哈韦尔于11月24日一同出现在文采斯拉斯广场的阳台上,接受20万名到场群众声势浩大的热情致意,当时杜布切克做了自从20年前离开政坛后第一次在布拉格的公众演讲。演讲之前,音乐架起了跨越这20多年的桥梁,玛尔塔·库比绍娃——"七七宪章"成员和广受欢迎的歌手,自1970年起被禁止公开表演——演唱了鲍勃·迪伦的《变革的时代》。

240

11月24日晚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免去米洛什·雅克什的总书记一职,并由强硬派卡雷尔·乌尔班内克接替他的位子。这导致雅克什和整个党主席团于11月25日集体辞职,同时,年轻的乌尔班内克作为一名长期的"正常化"支持者担起了捷共领袖职责。然而,共产党最高等级的人事洗牌并不能蒙蔽群众,使他们相信改革正在出现。相反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人出席"枢机"弗兰蒂舍克·托马舍克电视转播的弥撒,庆祝神圣的波希米亚的阿格尼丝的封圣。这天的晚些时候,大约75万人聚集在布拉格的莱特纳平地,倾听杜布切克和哈韦尔要求领导层真正改革的讲话。在布拉迪斯拉发,50万人集合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广场进行抗议示威。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乌尔班内克声明政府进行公开协商的愿望,同时,布拉格的共产党

领袖米罗斯拉夫·什捷潘和剩余的一些强硬派递交了辞呈。

公民论坛决定开始与联邦政府而不是捷共进行讨论,所以哈韦尔和公民论坛的代表们于 11 月 26 日在布拉格市政厅会见了阿达麦茨总理。在双方同意进一步磋商之后,阿达麦茨向聚集在莱特纳平地的 50 万民众致词,承诺政府将尽最大可能回应公众的要求。在布拉迪斯拉发,"反抗暴力公众"集结大批群众以支持计划于第二天展开的总罢工和这个团体编制的要求清单。在布拉格,公民论坛拿出了自己的协商议程,命名为"我们想要的"。除了政治多元化、公民自由、社会公正、合理的环境政策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之外,公民论坛要求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以及重新定位该国的外交政策,远离华约和经互会,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可以重新加入欧洲国家的共同体。

11 月 27 日中午,两个小时的总罢工使得整个国家进入停顿,这显示出的公众团结使得政府确信,仅剩的选择是同意反对派提交的各项要求。官员们估计接近 80%的人口参与了这次罢工,这推动了党和政府间的重大分裂,共产党报纸《红色权力》(*Rudé Právo*)批评了改革的速度,并且指责党内一些年轻的改革支持者通过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民主论坛与捷共疏离。

241

阿达麦茨于 11 月 28 日与公民论坛进行会谈,提出组成一个调查团调查 11 月 17 日的事件,不过反对派对总理在第二天之前解除捷共在政府和社会的领导地位以及在 12 月 3 日之前任命新的联合政府的承诺毫无信心。乌尔班内克接着通知捷共中央委员会,称该党在政治生活上的垄断已经变得难以维持,作为结果,联邦议会于 11 月 29 日采取行动解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保证,由此开启了通向多元化政治体系的道路。

11 月 30 日,公民论坛首次与瓦西尔·莫霍里塔率领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进行直接协商,当时政府宣布计划拆除分隔捷克斯洛伐克与邻国奥地利的围墙。与此同时在布拉迪斯拉发,"反抗暴力公众"参与同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讨论,试图推动类似于发生在联邦级别的那些辞职和改革。

12月的第一天,莫霍里塔和中央委员会宣布1968年8月的华约入侵是一个错误,这个立场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宣称布拉格之春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想要一个更加民主的体制的愿望。三天之后,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选择在一次由阿达麦茨和乌尔班内克出席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指责入侵为一次非法行动的联合声明。

12月3日阿达麦茨新临时政府的宣布遭到了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的批评,原因是内阁的20个部长职位中任命了15名共产党员,而且胡萨克也拒绝辞去总统职位。反对派领导人要求进一步的公众游行并且威胁于12月11日再次举行总罢工。随后的一天,数十万人在文采斯拉斯广场举行反政府抗议,公民论坛要求6月公开选举的时间表和立刻建立一个具有更多反对派代表的政府。

在与公民论坛、“反抗暴力公众”、复兴组和非共产党党派代表等进行两天磋商之后,阿达麦茨和他的部长们选择于12月7日辞职,而不是接受反对派要求的改变。当调查11月17日事件的调查团建议将雅克什和什捷潘从国民大会中除名时,捷共对这两人进行了处理,以政治决策中的错误为由和鉴于他们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将他们开除党籍。副总理马里安・恰尔法接替阿达麦茨成为总理,接着在第二天与反对派会面讨论创建一个新的联邦政府的宪法程序。

242

12月10日胡萨克的辞职和新的“国民理解的政府”的就职恰逢国际人权日的庆典,新政府中共产党在21个职位中占据10个,自1948年以来第一次处于少数派的状态。临时政府在选举前拥有治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职责,政府中包括来自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各两名部长,另有7人来自公民论坛,不过没有人来自“反抗暴力公众”。

在协商期间,两方面都同意在1月底之前选出一位非共产党的新总统,不过恰尔法在选举前将占据这个职位。主要的候选人包括阿达麦茨和杜布切克,尽管哈韦尔对接替胡萨克表达了保留意见,公众集会上“哈韦尔登上城堡!”的呼声为他广泛而且日益增强的名望提供了证据。为了避免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产生摩擦,杜布切克和哈韦尔同意哈韦尔将担任反对派的第一候选人,杜布切克作为政治盟友提

供支持和协作。

12 月 19 日在联邦议会发言时，恰尔法总理宣布改革面临困难的指令经济的努力将终止，政府将转而开始向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恰尔法还公布了解散国家安全局的计划，并且促使哈韦尔的总统候选人资格作为最明智的未来选择得以通过。

12 月 20 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支持多党派的政治体系，并且为发生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的种种事件中它所起的作用而道歉。捷共提出党内机构民主化的计划，并且取消总书记的职位，代之以将由阿达麦茨担任的党主席和由莫霍里塔占据的第一书记的新职位。

依据协议，被反对派指定的议员于 12 月 28 日提交辞呈，由此允许了一个包括来自各反对团体议员的重新组建的联邦议会。新的议会选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作为主席，并且在之后的一天，以 323 名议会代表一致同意的选票推选瓦茨拉夫・哈韦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当群众在布拉格城堡之外庆祝时，“枢机”弗兰蒂舍克・托马舍克以一次特别弥撒记录这一时刻。新政府在主要位置上包括了异见者和改革者，其中哈韦尔作为总统，杜布切克作为议会主席，而瓦茨拉夫・克劳斯成为财政部长。1 月，恰尔法总理脱离了共产党，并与斯洛伐克的“反抗暴力公众”结盟。

243

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以 11 月冲击学生的暴行为开始，以接下来一个月月末的节日期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为结束。“天鹅绒革命”的说法显然源自西方记者对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的报道，随后才被哈韦尔和他同道的反对派领导人接受。然而，鉴于 40 年的共产党控制在匈牙利和波兰以一次协商后的过渡作为终结，民主政治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迅速地出现，并且要求公民论坛、“反抗暴力公众”和其他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们立即开始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3] 为了这么做，新政府将需要面对受苏联影响的捷共政权的种种后果，对此瓦茨拉夫・哈韦尔 1990 年 2 月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是这样定义的：“一份无数死难者的遗产、一段人间苦难的无限光谱、深刻的经济衰退和超越所有人类的

耻辱。"[4]

## 后共产主义时期(1990—1992年)

在向全国的新年总统致词中,哈韦尔谈及在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民主所面临的艰难任务,认为在这个国家,40年的"共产主义"已经使腐败、冷漠和愤世嫉俗毒害了社会,损毁了道德和信任。哈韦尔提及这个国家的创建者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的名字,并且赞扬他对政治中高尚道德标准的期许。具有超凡魅力和高度自尊的哈韦尔,通过几乎与马萨里克一样的方式,珍视理想主义、道德和民主,并且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有意识地模仿马萨里克。不过,哈韦尔也有他作为总统创造性和非正统的一面,他偶尔被发现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骑着轻便摩托车,在布拉格城堡的廊道中穿梭。为了减少布拉格城堡的威严性,哈韦尔选择让特奥多尔·皮什捷克——电影《莫扎特传》的服装设计师,将城堡卫兵的卡其军装式样的旧款服装改为蓝白红三色相间饰有流苏的制服。[5]

244

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在1990年1月期间开始进行,联邦议会于1月23日制定的法律建立了一套自由的多元化政治体系,允许捷共和国民阵线中的前合作方的完全参与。一周之后,议会的政治构成发生变化,242名共产党议员中的122人辞职或者被无党派者或者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的成员取代。更进一步的议会法案恢复了公民自由,并且解除了审查制度、国外旅行的限制和死刑。

在与外交部长伊日·迪恩斯特比尔的合作中,哈韦尔寻求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归欧洲国家的共同体,这个方式与贝奈斯使该国充当东西方之间桥梁的努力相类似。哈韦尔想要重新建立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积极联系,为了那个目的,他于1月前往波兰、匈牙利和两德,随后的一个月,他又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和莫斯科。2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签订了一项有关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协议,开启了一段将持续到6月27日的过程。1990年6月,华约成员国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同意,这个军事联盟不再适合一个共同的目的,由此将被解散,集

体安全将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责任。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 1990 年 4 月末游历了捷克共和国的土地。11 月中旬,乔治·H. W. 布什作为第一位到访布拉格的美国总统抵达这座城市。哈罗德·品特、菲利普·罗斯和简·方达等作家和演员是访问布拉格的众多名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推动了布拉格作为一个文化奇境和旅游者向往的新地点的逐渐显露的名声。当音乐人地下丝绒乐队的娄·里德前来为一本音乐杂志采访哈韦尔的时候,哈韦尔向他展示了此前被查禁的里德歌词的捷克语副本,并且邀请他与宇宙塑料人乐队一起演唱地下丝绒的歌曲,他们曾经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专制岁月中表演过这些歌曲。[6]

在较黑暗的一面,前政权的倒台带来了犯罪率的提升,对此许多人指责哈韦尔宣布对 2 500 名罪犯实行特赦,而不论他们的罪行是否实际上属于政治范畴。由于共产党在容纳罗姆人进入国民生计方面几乎毫无作为,他们频频被冠以增多犯罪活动的骂名,并且成为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尤其是在光头党和种族主义团体利用新自由的机会叫嚣极端主义观点并且攻击来自亚裔和非裔社区的学生和工人的时候。



4 月,布拉格州检察官托马什·索科尔尝试起诉捷共,试图使该党被查禁,并且由此从政治版图中被除去。许多市民支持针对共产党的官方行动,那些参与 4 月 11 日罢工的人要求属于捷共的财产由新政府没收。随着哈韦尔和扬·乌尔班等前反对派人物对报复行为提出忠告,表示所有市民都曾以某种形式与前政权合作,论战进一步升级。内务部长理哈尔德·萨黑尔选择允许前国家安全局成员在安全机构中保留他们的职位,接着当他宣布超过 1 万份机密的安全警察档案要么被破坏要么在革命期间被遗失的时候,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强烈抗议。对于那些曾经要求在 6 月选举前曝光国家安全官员和告密者的人来说,这些文件的丢失不啻是一次重大挫折。

大约 96%的合格选民参加了 1990 年 6 月的选举,选举中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赢得了 47%的选票以及 300 个联邦议会席位中

的 170 个。公民论坛在捷克获得了 53.2%的选票,而“反抗暴力公众”在斯洛伐克获得了 32.5%的选票,其中后者可以将杜布切克、布达伊、克尼亚日科、库西和希梅茨卡等知名反对派人物纳入它的队伍。选举结果允许“反抗暴力公众”选择弗拉基米尔・梅恰尔担任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理。

由瓦西尔・莫霍里塔领导的共产党在联邦等级的政治事务中保留了话语权,在强过很多人预期的选举表现中赢得了 47 个席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斯洛伐克基督教民主运动组成的联盟)赢得了 40 个席位,代表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利益的一个地区性政党以捷克共和国的 7.89%的选票获得了适度的表现。

7 月,联邦议会重新选举瓦茨拉夫・哈韦尔为总统,与公民论坛的愿望相反,此时已是“反抗暴力公众”一员的马里安・恰尔法继续担任联邦总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主管斯洛伐克政府,而前异见者佩特尔・皮塔尔特执掌捷克内阁。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于 1990 年开始恶化,分歧在随后的两年中进一步扩大。斯洛伐克人再次吐露被捷克人利用并且对斯洛伐克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普遍缺少关心的心声。作为证据,他们指出外交部长迪恩斯特比尔在 1 月的声明中称捷克斯洛伐克将不再担当世界的军火商。考虑到军备生产对斯洛伐克经济的重要性,这样一项政策的后果将对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和就业率产生消极影响。

246

在 1990 年最初的几个月期间,国家名称回归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提议招来了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们批评哈韦尔、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再一次将斯洛伐克人置于次要的位置。为了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和防止斯洛伐克独立要求的增强,联邦政府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以反映在该国边境内两个共和国的存在。当这样未能缓解斯洛伐克批评者要求使用带有连字符号的名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当局试图结束“连字符之战”,于 4 月 19 日接受这个国名“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并且转移更大的权力和决策责任给这两个共和国的政府。

12 月,这个国家陷入一次宪法危机,当时对于已计划好的宪法部分款项的意见分歧促使一些斯洛伐克国会议员威胁应用斯洛伐克法律取代联邦法规。哈韦尔抨击了民族主义议程的负面结果,并且要求联邦议会创立一个宪法法院,同时批准总统扩大权力以处理制造不稳定的危机。

在 1990 年秋天期间,为了应对新的政治环境,或者说,作为内部摩擦或背离的议程的结果,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党和组织开始改变。11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克共和国变成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而在斯洛伐克是民主左翼党,其中后者沿着在欧洲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的左翼政党的路线向前发展。

然而对于公民论坛和“反抗暴力公众”来说,组织的联盟性质和政治经验的缺乏导致了分裂和反映联盟成员不同政治纲领的新政党的形成。10 月,在公民论坛的代表大会上,成员们选举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为党主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克劳斯的观点反映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市场的影响,他要求创建一个有序的政党结构和对政治目标的主动追求,不过对于党可能转向右倾的担忧致使一些左倾的党员开始逐渐疏远。到 1991 年 2 月,公民论坛已经分裂成两个党派,克劳斯领导的公民民主党(ODS)和副总理伊日·迪恩斯特比尔领导的公民运动(OH)。大多数政府部长与中左翼的公民运动保持一致。第三个小集团——公民民主联盟(ODA)——基于与公民运动的分歧而形成,不过所有三个组织在 1992 年之前继续在政府中共同工作。

247

共产主义时期经济的改革在 1990 年期间也开始进行,政府转向废除旧的集中指令体制,朝一个完全市场导向的经济靠拢。这个过程以政府支持的迅猛减少和 1 月份克朗的贬值为开端。接着在 11 月,联邦议会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普遍私有化,还有新的税收和组织资本制度。过于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储蓄流失和广泛的社会错置,很多人发出警告,而克劳斯赞成一种敏捷的转变系列,那将在短时期内产生困难,不过对比听任困难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扩

张的谨慎途径,将更快地导向稳定。最早的重大打击之一与 1991 年 1 月 1 日的价格自由化,以及大大超越任何工资变化的快速物价上涨的后果一同到来。

归还 1948 年 2 月以后从私营业主那里夺走的财富,代表了国有财产去国有化的一种途径。以前的业主或者他们的继承人递交要求归还农田、公寓和其他财产的申请,这些随后成为了协商解决的主题。然而,随着大规模财产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不断进行,当局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原因是选择 1948 年作为目标日期,由此将被德国人掠夺的犹太人财产和在战后驱逐期间丢失的日耳曼人财产摈除在外。

政府私有化小规模和更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计划包括几个连续的阶段,其中以 1991 年 1 月开始的饭店、商店和其他小企业转变为私人所有制为第一阶段,而在较晚的阶段中,更大型的企业将向公民股东开放。到 1993 年年底商店和饭店的拍卖渐渐结束的时候,在这个国家已经创立了超过 2.2 万个新商号。政府还期待外国投资者购买原先国有的工业企业,如同大众在 1991 年购买了斯柯达汽车。

248

民间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代金券的机制购买较大型企业的股份,公民能够以 1 035 克朗的费用获得代金券,这只相当于工人平均月工资的一半数额。当企业被拿出来拍卖的时候,代金券可以被用来购买这些企业的股份,也可以被用于同投资专家或基金的谈判。最初的代金券注册期开始于 1991 年 11 月 1 日,共有 650 万捷克人和 250 万斯洛伐克人参加。1992 年 5 月初,那些持有代金券的人成为有资格投资合用的企业或者与投资基金谈判的人。代金券私有化的过程需要 5 个轮次和几年时间,最后共有接近 2 500 个企业对公众开放,不过很多公民成为立即致富的不合理预期或者不法投资者和其他以不公平的价格从持有者那里购买代金券的人的受害者。作为私有化进程的后果,低效企业的清算直接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 35%的下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还终止了对经互会的参与,并且决定重新加入共产党政权在 1954 年从中退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新的后共产主义进程，哈韦尔、迪恩斯特比尔和其他领导人继续重新评估和重新定向该国与欧洲和世界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上，哈韦尔于1989年圣诞节迈出了与德国人和解的第一步，当时他致信西德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为战后对日耳曼人的驱逐表示道歉。尽管哈韦尔的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中产生了负面反应，魏茨泽克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51年后的1990年3月访问布拉格的时候作出了类似姿态的回应。在长期的协商之后，这两个邻国对一项由哈韦尔和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1992年2月27日签署的友好和合作协议达成一致。

1991年2月12日，哈韦尔在匈牙利城镇维谢格拉德与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和匈牙利总理约瑟夫·翁陶尔会面，讨论共同地区利益的事态。"维谢格拉德三巨头"议程的关键是签署一项在摆脱华约和获取扩充的欧盟成员资格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后者体现了哈韦尔的优先考虑，因为他对尽快使捷克斯洛伐克回归欧洲怀抱充满渴望。为了那个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于1991年2月成为了欧洲理事会的成员，接着于6月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签署了一项合作宣言，最后还有12月与欧盟的准成员国协定。

249

哈韦尔对集体安全最初想法的转变有利于贯彻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目标。1991年3月21日，这位总统在布鲁塞尔的北约部长会议上发表致词，其中他谈到，当欧洲向着成为一个独立、民主与和平国家的稳定共同体的复杂路径上逐步前进时，作为一个准成员国的安全需要和利益。该国的华约成员资格在1991年终止，此前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和匈牙利一起在1月宣布它们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支持将于7月1日结束，与此同期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中这个联盟也将正式解散。

到1991年6月底，苏联勉强赶上了约定的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截止时间。在一个自由得到恢复的环境里，捷克艺术家大卫·切尔尼挑起了争论，他将一辆坦克刷上一层粉红色油漆，充当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布拉格解放中丢失生命的苏联士兵的战争纪念，以此来庆祝苏联撤军。切尔尼此后将继续在国内外设计争议性的雕塑，他宣称布

拉格金斯基广场的"粉红坦克"代表了对战后出现的苏联式独裁政治的抗议声明。

另一次与不久之前往事的对质出现在1991年10月,当时联邦议会通过了一项争议性的去共产主义化措施——《肃清法案》,法案禁止前共产党官员、民兵队员、国家安全局成员和有嫌疑的通敌者在截至1996年1月30日的五年时间里,履行政府、军队、经济、学术和媒体职能。不顾哈韦尔对该法律的反对,议会后来又将禁令延长到2000年。这项法律涉及使用前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局——收集的档案,最终使数万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公民成为一次被许多国内外批评者视做是侵犯人权和采取连坐原则的诉讼程序的目标。不过,由于这项法律允许上诉,许多牵连到这项法令的人最终能够洗脱他们的罪名,甚至反诉内务部诽谤。

250

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内部政治推动了1991年和1992年期间不断增长的紧张情绪。一方面斯洛伐克人逐渐接受邦联制的主意,另一方面捷克人却继续相信联邦制仍然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最佳选择,尽管要给予各共和国更大的权力。哈韦尔在1991年早期通过主持与联邦政府及两个共和国代表们的会谈,试图保留联邦体制,不过这些磋商鲜有切实成果。

斯洛伐克总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在3月初与"反抗暴力公众"分道扬镳,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在梅恰尔政治议程和据说是独裁策略上与其意见不合。4月23日,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主席团接着依据政治问题的托辞,免去了梅恰尔的总理职位,并由基督教民主运动的扬·恰尔诺古尔斯基接替他。不到几天,"反抗暴力公众"分裂为两个党派,后来分别发展为梅恰尔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HZDS)和公民民主联盟—反抗暴力公众(ODÚ—VPN),后一个党派是在10月份被命名的,最终它删去了"反抗暴力公众"的名称,并转向了政治右派。然而尽管后一个政党时运不济,梅恰尔和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路线继续发展出一大批公开追随者,这在4月26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支持他的大规模游行中得到了显示。

7 月 8 日,联邦议会通过立法允许仅有在公民复决的情况下解散联邦体制,即两个共和国的多数公民投票摆脱共有的国家。当哈韦尔在 10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纪念日对布拉迪斯拉发进行正式访问时,支持独立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通过向总统扔鸡蛋和高呼政治口号来回应他的到场。大多数斯洛伐克政治家谴责了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不过 1989 年后的联邦政府未能给予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以最高的优先考虑,被证明是这些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问题部分在于起草宪法中的拖延,这导致了一项推迟进程直至 1992 年按计划进行的选举之后的协议。随着压力的增强,哈韦尔在 11 月 11 日的一次电视演讲中宣布,为了避免一次国家危机,他将要求对他的总统权力进行法律和宪法变更,那将允许他在不需要经过联邦议会同意的条件下安排公民复决并且在全国紧急状态的情况下通过政令进行治理。

251

## 迈向“天鹅绒分离”

由于全国选举安排在 1992 年 6 月初,斯洛伐克政客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和因经济条件及远远高出捷克 4%的 11%的失业率而造成的日益增长的挫折感。尽管只有右翼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党公开要求独立,梅恰尔和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寻求鼓动不满情绪以追求选举的胜利,他们凭借的是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邦联制的呼声、民粹主义的诉求和对克劳斯的经济改革及快速私有化的左翼反对的一个结合体。结果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获得了胜利,它在斯洛伐克获得了 37%的选票,并且梅恰尔被任命为斯洛伐克总理。

在捷克土地上,公民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中右翼联盟以 30%的选票脱颖而出,公民民主党的第一候选人瓦茨拉夫·克劳斯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作为该国经济转型的设计师,克劳斯对于联邦制国家的保留抱有强烈的信心,甚至宁可创建两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愿意选择任何有关邦联制的协议。对于克劳斯来说,斯洛伐克代表了经济的排水管,这归咎于对现在显得低效的重工业的旧有依赖和社会福利基金的传统分配。作为结果,丢掉斯洛伐克将会给捷克经济带来一次重

要的提升，这早就为输送到布拉格的外国投资所唆使。

6月7日，哈韦尔提名克劳斯作为联邦总理，并且要求他根据这次选举的结果组成一届政府。克劳斯拒绝了这个提议，目的是担任捷克共和国的总理。作为捷克政府的首脑，克劳斯开启了与梅恰尔关于这个国家未来的谈判，当时两位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会面探讨未来的选项。没有一位领导人最初寻求解散这个共同的国家，不过当梅恰尔开始在斯洛伐克自治上步步紧逼，他却未对克劳斯分割这个国家而不是接受斯洛伐克的要求的愿望有所准备。作为互相抵触观点的结果，6月20日作出的决定仅仅导致了一项有关弱化的联邦政府的协议，这个政府此后不久由公民民主党的扬·斯特拉斯基领导。

当瓦茨拉夫·哈韦尔参加7月3日的总统重新选举时，联邦议会中的斯洛伐克议员阻碍了在年底任期届满时再次选举哈韦尔的努力。哈韦尔下定决心完成他的总统任期，尽管他意识到他留存这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同国家的努力正在遭到暗中破坏。在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于7月17日以113比24的投票通过一项主权声明后几小时内，哈韦尔改变了他的决定，辞去总统而不是充当一个分离中联邦的看守人。哈韦尔在离开之前最后的行动之一是要求梅恰尔和克劳斯协商一个新联邦体制的建立。 252

然而在斯洛伐克议会宣布独立的六天后，梅恰尔和克劳斯在布拉迪斯拉发对分割这个国家和允许两个共和国的议会磋商解体的细节达成一致。双方在讨论中缺乏共同基础，这导致会谈陷入僵局并且在未诉诸对该问题进行公民复决的宪法要求前提下决定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假使公民复决得以举行，考虑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公民中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很有可能投票者会轻易地否决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1991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9%的捷克人和15%的斯洛伐克人赞成分裂为两个分离的和独立的国家，尽管到1992年夏天，在斯洛伐克的百分比有所提高。

8月26日在布尔诺召开的会议上，两个政府的代表们确定12月31日作为这个国家进行分离的时间。有关符合宪法的联邦财产分配

的协商持续了几个星期,其中捷克获得了双方共同议定的三分之二的份额。9 月 1 日,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采纳了一部新宪法,并于两天后在布拉迪斯拉发签署。联邦议会于 11 月 25 日开会对分离进行投票,对这个议案的批准以 183 比 117 的投票获得通过,仅仅超出所需的五分之三的多数票三票。新的捷克宪法在 11 月 10 日亮相,并于 12 月 16 日得到采纳,一天之后联邦议会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会议。

随着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迈向了他们的三岔路口,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一位受尊敬的老资格政治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于 11 月 7 日去世,享年 70 岁,他死于两个月前发生在 D1 高速公路的一次很多人看来可疑的汽车事故中所遭受的重伤。2000 年,斯洛伐克警方调查员结束了这个案件,裁决这次事故确实是一次意外。

1993 年 1 月 1 日,“天鹅绒分离”变成了现实,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终结,而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时代开启。253 天鹅绒革命已经通过和平的公众抗议终结了 40 年的共产党统治,而天鹅绒分离也一样凭借和平和立法的方式精心安排妥当。[7]

## 1992 年之后的捷克共和国

随着捷克人迈向他们历史中的一个新阶段,他们身边没有在捷克土地上与他们长期共存的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以及他们新近的伙伴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鲁塞尼亚人。捷克共和国的人口此时压倒性地由捷克人组成。

1993 年 1 月 26 日,瓦茨拉夫·哈韦尔被选为捷克总统,恢复了这位剧作家和前异见者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右翼的瓦茨拉夫·克劳斯和公民民主党联盟从 1992 年 7 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最后几个月直到 1997 年 12 月保持了在政府中的连续性。

一个未能原封不动地幸存下来的遗留政治组织就是捷克共产党,该党在 1993 年 6 月遭遇了一次修正主义叛党。原先的共产党既保留了官方名称也延续了对放弃其意识形态或历史基础的抵触。为了吸引选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采纳了一套推动沙文主义并且攻击

克劳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的计划。这个方法使得共产党在1992年之后的历次选举中吸引了稳定的10%到18%的投票者,不过该党的传统阻碍了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执政联盟中成为政治伙伴。

作为捷克总理,克劳斯保持了天鹅绒革命后引入的经济策略,该策略以他长期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准则为基础,符合他公开宣布的对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社会和经济策略的赞赏。结果,第二波的凭证式私有化出现在1993—1994年,涉及600万捷克公民和已知的676家国有企业。作为代金券及其他措施的结果,到1994年最后几个月为止,新的私营部分产生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80%。

然而,批评者们宣称,通过私有化、投资和吸引外国资产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忽视了建立和保护法律规则的改革需要。未能建立合适的规则规范金融活动和关系以及在关键经济领域实行政府监管,导致了国家银行的腐败和针对代金券计划的"牛仔资本主义"和谋私利的指责。政府对教育、健康和严重环境问题的忽视,再加上未能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都给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克劳斯的回应是以明显违反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方式并且以拖延已久的对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变为代价的保留大部分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可以提出低失业数字作为证明,不过这些数字主要不是基于成功的经济策略而是基于政府政策被延迟的后果。

254

捷克社会民主党(ČSSD)利用了按计划于1996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举行的议会选举前的几个月中选民的情绪,这也允许投票人在1995年秋季选择在克劳斯的反对下创建的新的上议院代表。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崭露头角,成为该国第二大政党,以26.4%的选票排在得票29.6%的公民民主党之后。执政联盟在下议院中失去13个席位意味着以两个席位失去了多数地位,由此必须找到另一个政党进入联盟以组成新一届政府。共产党或者极右翼的共和党都不是可行的选择,于是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协商,以期获得他们对由公民民主党领导的少数派政府的支持。作为回报,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政府中多个部长

职位,而下议院选择了捷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米洛什·泽曼作为主席。

在选举之后,随着克劳斯政府在随后一年受困于一系列指控和丑闻,社会民主党继续巩固他们的名声。克劳斯政府于 1997 年 4 月和 5 月引入了新的经济改革措施,不过未能校正早期政策中的关键缺陷,从而引发了资金管理和分配以及仍未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企业中的严重问题和腐败。因为克劳斯如此公开地反对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政府管控,捷克共和国缺少破产法、财政部门的规章或者执行条例并起诉体制中腐败的组织机构。

在政治领域,克劳斯政府在预防选举异议的努力中阻碍了有活力的政党体系的发展,不过公民民主党陷入了一件由竞选经费相关的舞弊行为指控引发的重大丑闻之中。公民民主党和他们的政治盟友面临通过有问题的贷款协议和包含并不存在的外国势力捐赠的私有化交易充实党库的指控。散布的流言称公民民主党在瑞士有一个秘密的银行账户,而息票私有化中心主任亚罗斯拉夫·利兹内尔被逮捕,他被指控从一名寻求购买一间乳品厂的商人手中领受了超过 800 万克朗的钱财。利兹内尔被判入狱,还因为接受贿赂而被处罚。各种丑闻及媒体的曝光最终导致克劳斯于 1997 年 12 月辞去总理一职,此前公民民主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KDU -ČSL)在上个月放弃了执政联盟。

255

作为克劳斯的代替者,哈韦尔总统选择了捷克国家银行的首脑约瑟夫·托绍夫斯基执掌政府,直到 1998 年 6 月的下届选举。哈韦尔还选择就与党相关的事务进行论述,对克劳斯及其作为总理的政策进行批评——这是他通常并不情愿做的。党内对克劳斯的反对驱使一些公民民主党成员脱党,并组成了由扬·鲁姆尔领导的自由联盟(US)。

1998 年 6 月 19—20 日的选举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的一次胜利,它以 32%的得票率领先于公民民主党获得的 28%,共产党以 11%位列第三,随后是得票 9%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和第五位得票 8.6%的新党派——自由联盟。当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的磋商未能使社会民主党获得一个联盟伙伴时,公民

民主党回报了上次选举中所得到的支持,接受了一项反对派协议,准许了米洛什・泽曼领导下的左翼捷克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的政府,作为对公民民主党在议会两院和若干重要委员会领导地位的报答。

种族主义和排外的共和党未能达到赢得议会代表所必需的 5%的选票,这个结果显示出自 1996 年以来 3%的下降和始于 1992 年的议会出席权的失去。由米罗斯拉夫・斯拉德克领导的共和党目标直指罗姆人和日耳曼裔,其曾经出于他们对包括割让给苏联的鲁塞尼亚地区的"大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仰而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该党公开要求驱逐生活在捷克土地上的 20 万—25 万名罗姆人。

对于罗姆人来说,捷克共和国国内的条件在公民权和生活水准方面持续造成问题。要求个人提供为期五年的清白的刑事记录作为证据的有关公民权的法律招致了国际上的批评,迫使捷克共和国政府于 1996 年缩短周期为两年。缺少劳动人口中必需的技能造成了罗姆人中的高失业率,同时由于政府提供给教育和社会课程的资金因普遍的经济条件而减少,还带来了犯罪和卖淫活动的增长。反罗姆人情绪在城市和城镇中增长,比如在拉贝河畔乌斯季,当局建造一座将罗姆人公寓大楼与相邻区域分隔开的围墙的尝试遭到失败。针对罗姆人的暴力行为也在增加,光头党和极右翼法西斯团体选中罗姆人社区作为他们怒火的发泄目标。

256

1998 年 1 月,瓦茨拉夫・哈韦尔再次当选总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议会两院的联合投票,不过哈韦尔的胜利是通过在第二轮中的领先 1 票获得。随着 1998 年的到来,捷克共和国进入一段不景气时期,失业率上升到 6%,其中女性占了失业人口的 60%,而且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年龄低于 25 岁。由于失业数字持续上升,泽曼政府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推延国有银行私有化来寻求抵御衰退。政府随后继续朝着创建一个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的环境而工作直至进入新千年的最初几年。

2002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使得社会民主党受益,以 30.2%的选票领先于 24.5%的公民民主党和 18.5%的共产党,后者是其自 1989 年以

来的最佳表现。在把一个原先弱势的社会民主党发展为领先的政治组织之后，米洛什·泽曼在选举前退休并选择弗拉基米尔·什皮德拉接替他成为党领袖。什皮德拉于7月12日开始总理任期，带领一个包括中间路线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联盟的执政联盟，他领导政府直到2004年7月19日，当时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斯坦尼斯拉夫·格罗斯取代了他的位置。在格罗斯继有关个人财务违规行为的指控而选择辞职之后，与他同一党派的伊日·帕劳贝克于2005年4月25日代替他担任捷克总理直到2006年8月16日。

泽曼继任哈韦尔成为总统的努力在2003年2月遭遇到失败，瓦茨拉夫·克劳斯赢得了那个荣誉，他在议会两院以总票数281票中的142票多数票胜选。早已在泽曼和捷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在主席伊日·帕劳贝克领导下进一步恶化，导致泽曼于2007年3月脱离该党。

当1997年夏天捷克共和国被邀请参加有关北约和欧盟成员身份的磋商时，这个国家的国际关系获得了一个新维度。1999年3月12日，捷克共和国与波兰和匈牙利一起正式进入北约，但是没有斯洛伐克，因为该国未能达到成员资格所规定的要求。捷克共和国早就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并于1995年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在1994年与欧盟签订了准成员国协定之后，捷克共和国于1996年正式申请成员资格，并于一年之后获得了“快速通道”状态。当捷克于2000年10月上线运行有争议的泰梅林核电站时，奥地利政府强烈反对捷克进入欧盟，不过2001年11月有关安全标准的协议缓解了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局面，同时移除了捷克在欧盟成员资格的一个潜在的重要障碍。在赢得2002年议会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在实施获得成员身份所需的改革中取得进展，2004年5月1日，捷克共和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欧盟。捷克共和国随后将从20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持有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身份。

2006年6月的全国大选未能立刻带来一个执政联盟的建立，下议

院的 200 个席位在右翼和左翼政客中被平分。当僵局延续到 9 月时，克劳斯总统介入并任命一个由米雷克·托波拉内克领导的中右翼政府，托波拉内克于 2002 年 11 月接替克劳斯成为公民民主党的领导人。在托波拉内克政府未能在下一月的议会不信任投票中获胜之后，克劳斯于 11 月再次任命托波拉内克成为总理，这时，有关组建一个包括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大联合政府协商已经开始。2007 年 1 月，克劳斯向三党执政联盟授予总统批准。

2008 年 2 月 8—9 日，由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五年任期已满，捷克议会再次召集选举总统。克劳斯再次当选了总统——在较早轮次未能产生一名绝对获胜者之后，克劳斯在 2 月 25 日的第三轮投票中勉强击败了密歇根大学教授和哈韦尔的顾问扬·什韦伊纳尔。由绿党提名的什韦伊纳尔是一名支持欧盟的候选人，他获得了哈韦尔、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支持，其对抗持欧洲怀疑主义的克劳斯，克劳斯相信欧盟的成员资格代表着捷克共和国主权的缩减。

258

另一次议会不信任投票于 2009 年 3 月推翻了托波拉内克的第二届政府，这是政府对该国经济危机的处理所导致的结果。该程序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下院策划，针对三党执政联盟的投票结果是 101 比 96。经济学家扬·费舍尔被邀请执掌政府直到早期选举可以在 11 月举行，不过议会随后投票反对进行早期选举，并决定维持现状直到定于 2010 年 6 月举行选举。

## 1992 年之后的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2 年 12 月 31 日午夜，群众聚集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广场，伴随着旗帜飘舞和乐队演奏斯洛伐克国歌庆祝独立。这座城市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的首都，尽管在联邦管理机构丧失它们的职能后，这个国家需要重建新的行政、政治和外交机构。

在总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民主斯洛伐克运动，HZDS)和新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委员会(前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拥有 540 万居民的多民族国家，进入了新的时期。梅恰

尔还担任代总统直到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米哈尔·科瓦奇于 1993 年 2 月被议会选为总统,3 月 2 日他正式接手这个职位。与梅恰尔一样,科瓦奇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和前共产党员,在"正常化"时期曾经经受一定程度的来自党的迫害。科瓦奇曾于 1989—1991 年担任斯洛伐克的财政部长。

梅恰尔严厉的领导风格导致了 1993 年 3 月财政部长卢多维特·切尔纳克的离任以及八名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代表从国民委员会中辞职,到了 6 月,斯洛伐克政府变成了由民主斯洛伐克运动领导的单党少数派政府。梅恰尔的独裁倾向成为令人担心的主要原因,并且不久就招致了科瓦奇总统对总理战略和政府改善斯洛伐克经济前景能力的批评。

259

从过度依赖武器生产到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转型,将军备从 1988 年占工业产量的 6.3%减少到 1992 年的 0.9%。此外,始于天鹅绒分离之前的私有化进程截至 1992 年年底分裂发生的时候只转移了 30% 符合条件的资产到私人手中。从 1993 年初之后,民主斯洛伐克运动面临着对其缺乏准备的批评,指责其使新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货币处于弱势,贸易利润下降,税收和保险系统亟须重组,以及国家预算不足以覆盖现有成本。

面对批评和对其领导权的挑战,梅恰尔对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及该党的部长们施加更强的控制,用约瑟夫·莫拉夫奇克替换外交部长米兰·克尼亚日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每次当梅恰尔倾向于向东指望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时,克尼亚日科却在推动往西的更紧密关系。与捷克共和国的关系自从联邦国家解体后就未曾回暖,其中斯洛伐克还对捷克人采用老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作为他们自己国旗的单边决定耿耿于怀。出于同斯洛伐克东部邻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是该国最大利益所在的信念,梅恰尔曾拒绝了斯洛伐克加入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的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机会。然而,梅恰尔很快转变了他的姿态,与科瓦奇一起为斯洛伐克进入北约和欧盟进行游说。在 1993 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后,斯洛伐克也成为了维谢格拉德四国中的一员。

作为从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延续下来的问题的后果，有关少数民族地位的争执在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有发生。根据 1991 年的人口普查，斯洛伐克人口中斯洛伐克人保持压倒性的 85.7%，不过匈牙利人也占了 11%，并且多半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斯洛伐克还包含更少数量的罗姆人、捷克人、日耳曼人、鲁塞尼亚—乌克兰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犹太人。作为结果，如新宪法的前言一样，宣布这个共和国是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在其他民族中引起了争议。

当匈牙利人带头寻求受保证的少数民族权利和更大程度的自治时，他们遭到了执政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反对，该党提出大量的少数民族权利早已存在，并不需要再扩展。主要生活在斯洛伐克南部的匈牙利人不仅面临着长期存在的敌意，还有匈牙利语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匮乏，1968 年之后那些教师的培训实际上就已经停止了。一场有关不同语言的斗争在 1990 年秋天已经开始，当时"斯洛伐克之源"寻求立法来限制斯洛伐克语之外的语言的使用。

260

对位列匈牙利人之后的第二大少数民族罗姆人来说，斯洛伐克的情况同样是困难的。主要生活在斯洛伐克东部农村的罗姆人面临失业、贫穷和有限的教育机会。受光头党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的报告未能引起政府的强烈反应，反而引发了知名民族主义政客明显支持针对罗姆人社区的种族主义行动的评论。到 1997—1998 年，许多罗姆人选择离开斯洛伐克，在其他地方寻求庇护。

在斯洛伐克的政治事务中，1994 年最初的几个月呈现出对梅恰尔的潮流逆转，这可以在 3 月科瓦奇总统给议会的国情咨文中得到见证，其中他批评了政府领导层现状中的消极方面。国民委员会解除了梅恰尔的总理职务，并邀请民主联盟的约瑟夫・莫拉夫奇克组成新一届政府，除了莫拉夫奇克自己的党派以外，还包括基督教民主运动和民主左派党。然而，反对党在政府政策上留下他们印记的机遇显然是短暂的，定于 10 月举行的选举结果是梅恰尔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和斯洛伐克农民党(RSS)联盟获得了胜利。该联盟获得的 35%的选票比原先预期的高出 10%，并且与最终以 10.41%的选票位列第二的左倾的共同选

择联盟拉开差距，而匈牙利联盟获得 10.18%的选票。为了组成一届政府，梅恰尔选择使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与激进的斯洛伐克工人协会(ZRS)和民族主义的斯洛伐克民族党(SNS)结盟。

11 月初，新的执政联盟转而对国民委员会和议会各委员会加强控制，以保证将其权威置于立法之上。为了在几乎不考虑民主进程的前提下推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议程，该联盟在政府部门中任命党员监管媒体，并将科瓦奇定位为政治敌人，在 1995 年撤销了总统在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中的党籍。

261

1995 年 8 月 31 日爆出一件政治丑闻，科瓦奇总统的儿子小米哈尔·科瓦奇在布拉迪斯拉发被绑架并转移至奥地利海茵堡，目的是将其引渡到德国——德国当局曾指控他与所谓的“无污染科技”(Technopol)金融犯罪案件有牵连。猜测到斯洛伐克情报处(国家安全局下的一个机构)卷入此事，奥地利人发出强烈抗议并且把小科瓦奇送了回去。总统及其支持者谴责梅恰尔政府参与绑架行为，这也导致了与奥地利外交关系的恶化。

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关系早已因为有关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大坝计划的纷争结果而恶化，该计划起源于 1977 年的一项双边协议。匈牙利于 1989 年放弃了计划中的角色，宣布位于匈牙利大毛罗什的多瑙河发电站的建造将会停止，而 1977 年的那份双边协议不再有效。斯洛伐克随后作出继续进行自己部分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计划的决定，其中包括使多瑙河在加布奇科沃改道，这招致匈牙利的反对和国际上有关对环境的潜在影响的批评。

尽管与邻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日趋紧张，自从 1993 年 1 月成为联合国的第 180 位成员之后，斯洛伐克共和国还是在改善该国的国际地位上取得了进展。尽管斯洛伐克竭力争取达到欧盟成员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却是 10 个符合条件的、在 1997 年夏天受邀参与讨论欧盟和北约成员条件的国家中唯一一个拒绝出席的。对于这两个组织主要的顾虑是斯洛伐克迈向完全民主化的进展状态。

各类经济问题也继续折磨着斯洛伐克。1997 年，梅恰尔政府不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斯洛伐克需要对财政政策和支出实行更严格的控制的警告,引入了允许巨额赤字的预算案。长期以来的任人唯亲和腐败行为并未被消除,而这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在持续增长。米哈尔·科瓦奇于 1998 年 3 月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国民委员会未能选举一名接替者使得梅恰尔总理任命自己为总统——这是宪法所允许的——他行使总统权力直到那一年 10 月。作为总统,梅恰尔随后对与 1995 年小米哈尔·科瓦奇绑架案有牵连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给予特赦。

1998 年 9 月的选举带给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另一次胜利,不过却是通过非常细微的差额——27%对 26.33%——领先于斯洛伐克民主联盟。由于只有斯洛伐克民族党对成为联盟伙伴感兴趣,梅恰尔未能组成一届政府,被迫允许四个反对党采取主动。泪流满面的梅恰尔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宣布他将于 10 月 29 日辞去总理一职。斯洛伐克民主和基督教联盟—民主党的米库拉什·祖林达接替梅恰尔成为总理,并且作为五党联盟的领袖执政,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和斯洛伐克民族党成为了反对党。

262

祖林达立即开始转变梅恰尔的独裁主义和经济政策,此外还改善与少数民族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在开启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同时,祖林达拒绝了梅恰尔于 3 月份准许的特赦,并且努力在之前由梅恰尔及其盟友主导的国家机构中重塑民主。祖林达政府还起草了有关总统直选的提议,该议案于 1999 年 1 月被国民委员会批准。

随着总统选举被安排在 5 月中旬,科瓦奇和其他六名候选人通过申请获得候选资格,然而议会在提名鲁道夫·舒斯特尔和扬·斯洛塔(斯洛伐克国民党)之后,出乎其他候选人预料在最后时刻列入了梅恰尔。尽管科瓦奇撤回了他的名字并且要求选举舒斯特尔,组成一个联盟反对梅恰尔的尝试失败了,舒斯特尔最终获得了 47.3%的选票,领先于 37.2%的梅恰尔,不过舒斯特尔还是低于所需的 50%。在第二轮的投票中,舒斯特尔以 57.18%对 42.8%击败了梅恰尔。

2002 年 9 月的大选胜利使祖林达保住了他的总理职位,他的中右翼斯洛伐克民主和基督教联盟(成立于 2000 年)凭借其他三个中右翼

党派支持的优势——其中包括匈牙利人联盟党——以第二名的顺位(15.05%)战胜了梅恰尔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19.5%)。2004 年 4 月,民主运动的伊万·加什帕罗维奇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击败了梅恰尔,以 59.9%对 40.1%赢得了这个职位。

不顾失业率和生活成本上涨等问题,祖林达政府继续实行旨在使经济现代化和允许斯洛伐克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政策。在祖林达的第二个任期(2002—2006 年)内,斯洛伐克共和国经历了 8.3%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最高的。到 2007 年,经济增长率随着消费物价上涨持续减缓曾经攀升到 10.4%。随着条件的改善,斯洛伐克克服了早期的障碍,在 2004 年 3 月 29 日获得了北约的成员资格,随后在那一年的 5 月 1 日加入欧盟。2009 年 1 月 1 日,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采用欧元取代斯洛伐克克朗。

263

2006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结果是罗伯特·菲乔的左翼平民主义的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胜选,该党与斯洛伐克民族党和梅恰尔的更名后的人民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组成了一届联合政府。伊万·加什帕罗维奇赢得选举,于 2009 年 4 月再次当选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他是在方向—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族党的支持下,在第二轮选举中以 55.5%对 45.5%击败了斯洛伐克民主和基督教联盟的伊韦塔·拉迪乔娃。2010 年 7 月初,加什帕罗维奇任命拉迪乔娃成为斯洛伐克首位女总理,在菲乔和方向—社会民主党未能利用第一位的结果组建他们自己的执政联盟之后,她成为一个四党中右翼联盟的领袖。

在民族主义政客的强烈影响下,到 2009 年年末,由于有关语言法的争议,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和国内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关系持续恶化。1995 年国家语言法的通过为在正式交流中未能使用斯洛伐克语的情况提供了惩罚依据,不过宪法法院删去了该法律中最具争议性的成分。1999 年,作为欧盟要求的成员资格条件之一,斯洛伐克被要求在单个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 20%以上的地区,允许该少数民族语言的公开使用。十年后的 2009 年,斯洛伐克政府修正了 1995 年的法律,要求在少数豁免情况之外都使用口头和书面的斯洛伐克语。未能遵守规定的法

律政策和响应书面警告的行为将导致 100 到 5 000 欧元的罚款,数额视违规的情况而定。这项措施引发了来自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和匈牙利政府的强烈反对。

然而在总体上,斯洛伐克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在新千年中持续提升,尽管第一个十年末的全球经济危机的风暴,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侵袭了斯洛伐克共和国。政治问题在菲乔的年代又有抬头,不过祖林达建立一个现代化和民主的斯洛伐克的成功努力早已克服了梅恰尔时期缓慢和不稳定的增长。

**注释:**

264

1 "Several Sentences," in Bernard Wheaton and Zdeně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1988 - 199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196.

2 英国历史学家和记者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提供了公民论坛和天鹅绒革命的现场目击,参见: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19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0).

3 有关天鹅绒革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导者的演讲、文章和访谈,参见: Tim D. Whipple, ed.,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1). 有关天鹅绒革命及其后果的历史和政治分析,参见: Wheaton and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and Robin H. E. Shepherd, *Czechoslovakia, The Velvet Revolution and Beyo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4 Václav Havel,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Whipple,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77*.

5 有关哈韦尔生活和事业的信息,参见: Edá Kriseová, *Václav Havel: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and John Keane, *Václav Havel: A Political Tragedy in Six Acts* (New York: Basic Boks, 2000). 克里塞奥娃(Kriseová)是前记者和异见者,她是哈韦尔的朋友,从一个知情者的角度提供了一部名人传记。

6 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在他的剧本《摇滚乐》(*Rock 'n' Roll*,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中探讨了摇滚音乐和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剧本在2007年早期开始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上演,在演出的开场和结尾部分,加入了宇宙塑料人乐队成员的现场音乐表演。

7 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原因的分析,参见:Jiří Musil, ed.,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历史名人



**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圣沃伊捷赫,约 956—997)

**Adalbert of Prague** (St. Vojtěch)

出身于捷克贵族阶层中的斯拉夫尼克家族,后来被任命为布拉格主教。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在匈牙利和波兰传播天主教,却在波罗的海普鲁士人手中殉道而死,后来被追封为圣阿达尔贝特。

**布拉格的阿格尼斯**(阿内日卡,1211—1282)

**Agnes of Prague** (Anežka)

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鄂图卡一世的小女儿和瓦茨拉夫一世的妹妹。作为克拉雷安贫会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的院长,"圣阿格尼斯"放弃了她的财富和特权,选择了贫穷的生活和慈善。她后来在 1989 年被追封为圣阿格尼斯。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

**Beneš, Edvard**

捷克政治家,与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同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创建人。他从 1918—1935 年担任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其中 1921—1922 年还兼任总理,随后从 1935—1938 年接替马萨里克成为

总统。作为《慕尼黑协定》的结果，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之后，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首脑，然后从1945—1948年重新成为恢复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共产党在1948年的二月事件中夺取权力之后，贝奈斯拒绝接受新宪法，随后于6月辞去他的职务。



**安通·贝尔诺拉克**(1762—1813)

**Bernolák, Anton**

罗马天主教牧师和语言学家，他编纂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成为迈向建立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语言标准的第一步。

**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1821—1856)

**Borovský, Karel Havlíček**

记者、作家和捷克爱国者。在1948年的革命年代之后，尽管其报纸出版被暂停以及被迫离开布拉格，在布里克森流放三年，仍继续批评奥地利的统治。

**博日沃伊一世**(约852—889)

**Bořivoj Ⅰ**

第一位波希米亚公爵和普舍美斯王朝的创建者。

**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

**Čapek, Karel**

多产的著名捷克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引入了名词“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用来描绘一种人造的人。他还创作了大量短篇故事、戏剧和小说，其中包括《蝾螈战争》，此外还与他的哥哥、艺术家约瑟夫·恰佩克合作。

**什特凡·马尔科·达克斯内尔**(1822—1892)

**Daxner, Štefan Marko**

律师,1848—1849 年革命事件之间以及之后的政治家,协助起草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1861 年,写作了有影响力的《来自斯洛伐克的声音》,其中他要求承认斯洛伐克人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1773—1829)

**Dobrovský, Josef**

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因为他的历史研究和捷克语言编纂,成为了捷克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人物。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1992)

**Dubček, Alexander**

斯洛伐克政治家,1963—1968 年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后于 1968 年 1 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他对改革的支持以及对"人道社会主义"的追求,激励了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直到华约入侵终止了这场实验,并最终导致杜布切克被古斯塔夫·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在 1989 年天鹅绒革命前夕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与瓦茨拉夫·哈韦尔一起在布拉格向示威人群发表演说。杜布切克死于 1992 年的一场车祸,使他无法在那一年末成立的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中起到积极作用。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

**Gottwald, Klement**

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共产党政治家。他作为记者和党务工作者,在斯洛伐克开始其职业生涯。1924 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他后来在战后时期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6—1948 年),并在 1948 年 2 月的共产党政变后成为总统。

**瓦茨拉夫·哈韦尔**(1936—　　)

**Havel, Václav**

剧作家和异见者,为保卫人权与他人共同创建了“七七宪章”组织,因为他的活动以及写作诸如《无权者的权力》之类严厉抨击“正常化”和共产党政权的散文而被政府监禁。哈韦尔后来担任了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和1989年天鹅绒革命期间支持民主运动的代言人。哈韦尔在共产党丧失政权之后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并在“天鹅绒分离”之后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安德莱·赫林卡**(1864—1938)

**Hlinka, Andrej**

天主教牧师、政治激进主义分子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1913年成立了斯洛伐克人民党,随后从1918年该党重建到他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党主席。1918年,赫林卡加入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并且签署《马丁宣言》,支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同盟。他的党于1925年更名为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在赫林卡的指导下,转向推动斯洛伐克自治,作为比加入已经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更好的选择。

**米兰·霍贾**(1878—1944)

**Hodža, Milan**

报人、政治家,斯洛伐克民族党1914年以前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贾促进对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同国家的支持的形成,后来曾担任农民党议员、总理(1935—1938年)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不同岗位。

**米拉达·霍拉科娃**(1901—1950)

**Horáková, Milada**

律师、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治家。霍拉科娃活跃于妇女权利组织,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党的议员。当德国1939年入侵捷克斯

洛伐克时,她加入了反纳粹抵抗运动。在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拘押在泰雷津以及其他集中营和监狱后,霍拉科娃在1945年民族解放之后回归了议会,继续她的政治生涯直到1948年共产党政变。1949年,霍拉科娃被秘密警察逮捕,由于她的反共活动而被指控叛国罪和间谍罪,在一场摆样子公审之后,于第二年被处决。

268

**扬·胡斯**(约1369—1415)

**Hus, Jan**

教士、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受到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的作品和布道的影响。胡斯自己在布拉格伯利恒礼拜堂的布道批评了赎罪券,要求《圣经》的至高无上和本地语言的宗教使用。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出现后,他作为异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后来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竖立了一座雕像来纪念他。

**古斯塔夫·胡萨克**(1913—1991)

**Husák, Gustáv**

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治家,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和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参与者。作为1954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起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清洗的受害者之一,胡萨克后来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后,他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同一职位。胡萨克保持压制性的"正常化"政策,他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75—1989年),并且持续担任党领袖直到1987年被替换为止。

**帕沃尔·奥尔萨吉—赫维兹多斯拉夫**(1849—1921)

**Hviezdoslav, Pavol Országh**

律师、诗人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近代斯洛伐克文学的重要人物。当"斯洛伐克之源"于1919年重建之时,赫维兹多斯拉夫当选为这个斯洛伐克文化组织的首脑。

**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波杰布拉迪的乔治,1420—1471)

**Jiři z Poděbrad (George of Poděbrady)**

圣杯派(温和派胡斯信徒)领导人,作为自普舍美斯王朝结束后首位捷克本土统治者,被波希米亚各政治集团推选为国王。

**约瑟夫·荣格曼**(1773—1847)

**Jungmann, Josef**

波希米亚诗人和语言学家。他通过推动捷克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使用,以及出版一部有助于定义现代捷克语词汇表的捷德词典,促进了捷克民族的复兴。

**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

**Kafka, Franz**

269

出身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获得法学学位。通过《变形记》、《审判》和《城堡》等作品,他成为 20 世纪最独特和重要的作者之一。他的绝望、奇诡和荒诞的主题反映了对近代世界的批判和存在主义观点。

**卡雷尔四世**(查理四世,1316—1378)

**Karel Ⅳ (Charles Ⅳ)**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二位来自卢森堡王朝的波希米亚国王。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和知识事务的庇护人,他使布拉格成为帝国首都,并资助了大量在那儿的建筑项目,为波希米亚的黄金年代作出了贡献。

**瓦茨拉夫·克劳斯**(1942— )

**Klaus, Václav**

捷克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克劳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和公民论坛以及“天鹅绒革命”之后的公民民主党领导人进入政坛。在 1992 年 6 月的选举之后被任命为捷克共和国总理,他与斯洛伐克总理弗拉基

米尔·梅恰尔协商了“天鹅绒分离”。在担任独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理(1992—1997年)之后,克劳斯于2003年被选为总统,2008年连任。

**扬·科拉尔**(1793—1852)

**Kollár, Ján**

斯洛伐克诗人、科学家、政治家和路德派牧师。他促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语言的发展,并且因为他的叙事诗《名望之女》(*Slávy dcera*)而声名卓著。

**扬·马萨里克**(1886—1948)

**Masaryk, Jan**

政治家、外交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创建者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的儿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伦敦为基地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一直占据这个职位直到1948年2月的共产党政变,死因神秘。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1850—1937)

**Masaryk, Tomáš Garrigue**

捷克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他曾为哈布斯堡帝国的联邦化进行游说,并作为青年捷克人党以及随后的现实主义党的代表在奥地利议会中任职直到1914年。在马萨里克决定追求一个独立国家的创建之后,他为了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联盟所做的努力导致了191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创建。马萨里克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创建人受到尊敬,他担任这个共和国的总统直到1935年由于健康不佳而辞职。

**弗拉基米尔·梅恰尔**(1942—　　)

**Mečiar, Vladimir** (1942—　　)

270

“反抗暴力公众”的成员,1990—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中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梅恰尔随后创建了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在1992年6

月当选为斯洛伐克总理之后,与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磋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梅恰尔担任两个任期的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总理,并于 1998 年成为代总统。

**摩伊米尔一世**(? —846)

**Mojmír Ⅰ**

摩拉维亚公国的统治者,在 833 年将摩拉维亚和尼特拉公国合并组成了大摩拉维亚帝国。

**博热娜·内姆措娃**(1820—1862)

**Němcová, Božena**

作家和爱国者,因为她对民间传说的收集和她深受喜爱的小说《祖母》(*Babička*),被认为是捷克民族复兴之母。

**安托宁·诺沃提尼**(1904—1975)

**Novotný, Antonín**

捷克政治家,1953—1968 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还于 1957—1968 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扬·帕拉赫**(1948—1969)

**Palach, Jan**

一名捷克大学学生,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来抗议苏联领导的入侵和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他在布拉格文采斯拉斯广场的自焚行动使他成为民族英雄,他的葬礼发展成为一次对华约占领的重要抗议行动。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

**Palacký, František**

历史学家,捷克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帕拉茨基常常被称为"捷克民族之父",1848 年,他担任反抗集权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布拉格

起义的领导人，后来完成了一部捷克语版的捷克民族史。

**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约 1233—1278）

**Přemysl Otakar Ⅱ**

以“金铁国王”而出名的普舍美斯·鄂图卡二世引人注目地扩张了波希米亚王国的疆界和影响力。他在摩拉瓦河滨的杜恩克鲁特败给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并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

**Slánský, Rudolf**

捷克共产党政治家，1946 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兰斯基在 1951 年的政治清洗中被逮捕并被指控叛国罪，在与其他 13 名被告一起经历了一次摆样子公审后，于 1952 年被处决。

**萨莫**（623—658）

271

**Samo**

法兰克商人，组织斯拉夫部落反抗阿瓦尔人的攻击，并成为后来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和下奥地利地区中的“王国”或者部落联盟的首位统治者。

**帕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1791—1861）

**Šafárik, Pavel Jozef**

诗人、历史学家和斯洛伐克民族觉醒的主要贡献者。由于他用捷克语写作并且支持一种捷克斯洛伐克语言的概念，他也为捷克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米兰·拉斯蒂斯拉夫·什特凡尼克**（1880—1919）

**Štefánik, Milan Rastislav**

斯洛伐克天文学家、政治家和法国军队的将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的成员，他协助成立了捷克斯洛

伐克第一共和国。他还组织了在俄罗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并成为新共和国的军事部长。1919 年返回斯洛伐克途中,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死于一场空难。

**卢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

**Štúr, L'udovit**

教育家、斯洛伐克政治领袖和斯洛伐克民族觉醒的重要人物。什图尔对斯洛伐克语言的编纂促成了一种民族书面语言的创立。他为了斯洛伐克民族而努力奋斗,参与宣布 1848—1849 年的革命年代中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的独立。

**约瑟夫·蒂索**(1887—1947)

**Tiso, Jozef**

天主教牧师、政治家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成员。在 1939 年 3 月德国入侵前推动了斯洛伐克自治以及随后准独立的斯洛伐克政府的建立。在接任赫林卡成为党领袖之后,直到苏联在 1945 年 4 月解放斯洛伐克西部,作为一个实际上是纳粹德国傀儡国家的总理(1939 年)以及随后的总统(1939—1945 年),蒂索成为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蒂索后来被指控叛国罪以及与纳粹勾结,致使他于 1947 年被处以绞刑。

**瓦茨拉夫一世**(文采斯拉斯,约 907—935)

**Václav Ⅰ (Wenceslas)**

波希米亚公爵,被一群与他弟弟波列斯拉夫结盟的贵族谋杀。他后来被追封为圣瓦茨拉夫(圣文采斯拉斯)和捷克国家的庇护圣人,并在圣诞颂歌《好国王文采斯拉斯》中被赞美。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1583—1634)

**Wallenstein, Albrecht von**

波希米亚贵族和军人,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期间成为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天主教军队的主要将领。由于同新教派的瑞典和萨克森协商而被指控叛国罪后,他被他自己手下的军官暗杀。 272

**扬・日兹卡**(约 1360—1424)

**Žižka, Jan**

宗教改革者扬・胡斯的追随者,天主教十字军东征期间旨在铲除捷克领土上的胡斯派"异教"的塔博尔派军事领袖。1420 年,日兹卡的士兵在布拉格的维特科夫山击败了西吉斯孟国王的军队。

# 参考文献

Agnew, Hugh.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4.

Beneš, Eduard. *Memoris of Dr. Eduard Beneš: 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c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Beneš, Eduard. *My War Memoirs*. Translated by Paul Selve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1.

Brock, Peter. *The Slovak National Awakening: An Essay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Brock, Peter, and H. Gordon Skilling, eds. *The Czech Renascenc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Bryant, Chad.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ugajski, Janusz. *Czechoslovakia: Charter 77's Decade of Dissent*. New York: Praeger, 1987.

Čapek, Karel, *Talks with T. G. Masaryk*. North Haven, CT:

Catbird Press, 1995.

Cohen, Gary B.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 –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Cornwall, Mark, and R. J. W. Evans, eds. *Czechoslovakia in a Nationalist and Fascist Europe 1918 – 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British Academy), 2007.

Cosmas of Prague. *The Chronicle of the Czechs*. Translated by Lisa Wolvert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9.

Deák, István.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 – 18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Demetz, Peter. *Prague in Black and Gol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a European Cit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7.

Demetz, Peter. *Prague in Danger: The Years of German Occupation, 1939 – 1945: Memories and History, Terror and Resistance, Theatre and Jazz, Film and Poetry, Politics and W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8.

Dowling, Maria. *Brief Histories: Czechoslovakia*.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2.

Dubček, Alexander. *Hope Dies Last: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Leader of the Prague Spri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iri Hochman. New York: Kodasha America, 1993.

Dvornik, Francis.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Eubank, Keith. *Munich*.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3.

Evans, Robert J. W.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 –161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Feinberg, Melissa. *Elusive Equality: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1918 – 1950*.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Felak, James Ramon. *"At the Price of the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29 –1938*.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4.

French, Alfred. *Czech Writers and Politics 1945 – 1969*.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Frommer, Benjamin. *National Cleansing: 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arton Ash, Timothy.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19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Goetz-Stankiewicz, Marketa, ed. *Good-bye Samizdat: Twenty Years of Czechoslovak Writing*.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Golan, Galia. *Reform Rule in Czechoslovakia: The Dubček Era 1968 –196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Havel, Václav. *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vížďal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Havel, Václav. *Living in Truth*. Edited by Jan Vladislav. London and New York: Faber and Faber, 1989.

Havel, Václav.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 –1990*. New York: Vintage, 1992.

Holý, Ladislav. *The Little Czech and the Great Czech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st-Communi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ggers, Wilma A. *Women of Prague: Ethnic Diversity and Social Chang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5.

Ingrao, Charles.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 – 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elinek, Yeshayahu. *The Parish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76.

Johnson, Lonnie R. *Central Europe: Enemies, Neighbors, Frien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nn, Robert A. and David V. Zdeněk. *The Poeples of the Eastern Habsburg Lands, 1526 –191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Keane, John. *Văclav Havel: A Political Tragedy in Six Ac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Kennan, George F. *From Munich after Prague: Diplomatic Papers 1938 –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Kieval, Hillel. *Languages of Commnity: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zech La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King, Jeremy. *Budweisers into Czechs and Germans: A Local History of Bohemian Politics, 1848 – 19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Kirschbaum, Joseph M., ed. *Slovak Culture Through the Centuries*. Toronto: Slovak World Congress, 1978.

Kirschbaum, Joseph M., ed. *Slovak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oronto: Slovak World Congress, 1973.

Kirschbaum, Stanislav J. *A History of Slovak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Kirschbaum, Stanislav J., and Anne R. C. Roman, eds. *Reflections*

*on Slovak History*. Toronto: Slovak World Congress, 1987.

Klassen, John M. *Warring Maidens, Captive Wives, and Hussite Queens: Women and Men at War and at Peace in Fifteenth Century Bohemia*.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9.

Klassen, John M., ed. *The Letters of the Rožmberk Sisters: Noblewomen in Fifteenth-Century Bohemia*. Rochester, New York: Boydell and Brewer, Inc., 2001.

Korbel, Josef. *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 1938 – 1948: 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Korbel, Josef. *Twentieth-Century Czechoslovakia: The Meanings of Its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Krejči, Jaroslav. *Czechoslovakia at the Crossroads of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0.

Kriseová, Edá. *Václav Havel: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Kusin, Vladimir V.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Prague Sp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ist Ideas in Czechoslovakia 1956 – 19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Leff, Carol Skalnik. *National Conflict in Czechoslovakia: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a State, 1918 – 198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ttrich, Jozef. *History of Modern Slovak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5.

Littell, Robert (ed.), *The Czech Black Book*.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9.

Lukes, Igor. *Czechoslovakia between Stalin and Hitler: The Diplomacy of Edvard Beneš in the 193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cDonald, Callum. *The Killing of SS Obergruppenführer Reinhard Heydri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Mamatey, Victor S., and Radomír Luža, eds. *A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1918 – 19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Masaryk, Dr. Thomas Garrigue. *The Making of a State: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1914 – 191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7.

Masaryk, Tomáš G. *The Meaning of Czech History*. Edited by René Wellec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4.

Mastny, Vojtech.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 –1942*. New York: Col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Mlynář, Zdeněk. *Nightfrost in Prague: The End of Humane Socialism*. New York: Karz Publishers, 1980.

Musil, Jiří, ed.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Navrátil, Jaromír, ed. *Prague Spring 1968: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ocuments Reader*.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Olivová, Věra. *The Doomed Democracy: Czechoslovakia in a Disrupted Europe 1914 – 1938*.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ánek, Jaroslav, and Oldřich Tůma, eds. *A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Prague: Karolinum Press, 2009.

Pelikán, Jiří, ed. *The Czechoslovak Political Trials, 1950 – 195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etro, Peter. *A History of Slovak Literature*.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ynsent, Robert B. *Questions of Identity: Czech and Slovak Ideas of Nationality and Pérs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thkirchen, Livia. *The Jews of Bohemia and Moravia: Facing the Holocaus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Sayer, Derek. *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ton-Watson, R. W. *A History of the Czechs and Slovaks*.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65.

Shawcross, William. *Dubce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90.

Shepherd, Robin H. E. *Czechoslovakia: The Velvet Revolution and Beyo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Šimecka, Milan.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Czechoslovakia*. London: Verso Editions, 1984.

Skilling, H. Gordon. *Charter 77 and 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 London and Boston: Allen & Unwin, 1981.

Skilling, H. Gordon.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Skilling, H. Gordon. *T. G. Masaryk: Against the Current, 1882 - 1914*.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pector, Scott. *Prague Territories: National Conflict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in Franz Kafka's Fin de Siè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tein, Eric. *Czecho/Slovakia: Ethnic Conflict, Constitutional Fissure, Negotiated Breakup*.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Sugar, Peter F., Péter Hanák, and Tibor Frank, eds. *A History of Hung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Sviták, Ivan. *The Czechoslovak Experiment 1968 –19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Teich, Mikulas, ed. *Bohemia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omas, Alfred. *Anne's Bohemia: Czec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310 –14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Toma, Peter A., and Dušan Kováč. *Slovakia: From Samo to Dzurind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1.

Wheaton, Bernard, and Zdeně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1988 – 199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Whipple, Tim D., ed.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1.

Williams, Kieran.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 – 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Wingfield, Nancy M. *Flag Wars and Stone Saints: How the Bohemian Lands Became Cze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skemann, Elizabeth. *Czechs and Germans: A Study in the Historic Provinces of Bohemia and Moravia*.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Wolchik, Sharon. *Czechoslovakia in Transi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1.

Wolverton, Lisa. *Hastening toward Prague: 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Medieval Czech Land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Zeman, Zbyněk. *The Masaryks: The Making of Czechoslovakia*.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1976.

Zeman, Zbyněk, with Antonín Klimek. *The Life of Edvard Beneš, 1884 – 1948: Czechoslovakia in War and Pe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索　　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D**



**E**



**F**

### H



### I



### J

## K



## L

**Q**



**R**



**S**